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出版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 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



目錄

序	中大學生會	5
熱血！熱淚！25年！沒有冷！	劉銳紹	7
中大同學與八九民運	編委	11
卑微的奉獻，真切的情懷	張家偉	23
北京紀行		
北京紀行之一（1/5-5/5, 3/6-5/6）	余晨星	39
北京紀行之二（10/5-25/5）	吳國坤	49
北京紀行之三（10/5-31/5）	羅志輝	61
北京紀行之四（11/5-25/5）	陳仲強	69
北京紀行之五（19/5-27/5）	尹彥超	90
北京紀行之六（19/5-31/5）	一中大同學	102
北京紀行之七（21/5-5/6）	林藹純 陳耀輝	115
北京紀行之八（22/5-5/6）	黎洪	144
北京紀行之九（24/5-5/6）	林亦子	157
外一篇：「六四」前前後後的事		181
北京紀行之十（24/5-5/6）	曾憲冠	205
外一篇：北京回來之後		223
北京紀行之十一（28/5-2/6）	張偉倫	231
北京紀行之十二（28/5-2/6）	一中大同學	239

北京紀行之十三 (29/5-9/6)	謝淑妮	246
北京紀行之十四 (23/5-4/6)	任信成	257
上海紀行 (1/6-6/6)	黎婉薇	262
附錄		
八九民運工作報告	鄒崇銘	284
香港學界角色的進一步探討 (節錄)	莊耀洸	301
中大與八九民運雜談	莊耀洸	306
相片		313



序

中大學生會

八九民運是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其浪潮軒然澎湃地湧到世界每一個角落。當時除了身處中國境內的群眾，世界各地的華人均以不同形式參與其中，而香港人在這場運動中從未缺席。從百萬香港市民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到數以百萬計的捐款，甚至親身北上支援，足可見港人對八九民運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更率先派代表到北京支援學運。

二十五年過去了，「八九」以後還剩下甚麼？本會與當年經歷八九民運的學長，拾起當年中大學生踏過的一片片塵埃與雲彩，把中大學生會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北京紀行」部分重新整理，獨立出版成書。不少人對於「六四」的記憶早已模糊，對沒有經歷過六四的新一代而言，「六四」跟他們的距離就更為遙遠了。然而，為甚麼我們還要重新整理出版這本書，把這些記憶再次展示出來？意義何在？

首先，守護記憶本身就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任務。二十五年來，維園的「六四」燭光始終不滅，不少人堅持

出席悼念晚會，風雨不改。這種堅持，不但是對記憶的守護，更是對良知和道德的捍衛。從當年的袁木，到幾年前的陳一謬，以及一直以來，國內對於六四事件相關資料的封鎖，都可以看出中共政權對六四事件極其忌諱，不惜肆意歪曲事實、指鹿為馬。而「六四」是香港人的一條道德底線，每有重要官員上任，記者總會詢問他們對「六四」的看法。這些記憶，以及其中所體現的良知和道德，我們誓必傳承下去。

再者，八九民運是一場全民參與的社會運動，這段歷史放諸今日的香港，絕對有值得我們學習和警惕的地方。而要從歷史中學習，就必須深入認識歷史。本書是當年中大學生的第一手見聞，記載了作者親身經歷的人和事，把這些文字重新整理出版，當有助於梳理當時中大學生參與八九民運的經過。而《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的其他內容，則會放於網上¹，令八九民運的歷史文獻更能廣泛流傳。無論是本書還是網上的文獻，都刻印著那個時代的經歷和思考，對我們一群學生特別有參考價值。如今香港正處於民主改革的重要一步，「佔中運動」蓄勢待發，學生何去何從，或許可從中得到啟示。

最後，容我們用錢穆先生的一句話作總結——「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忽視歷史的社會是沒有前途的社會。」

¹ 網址〈<http://www.cusu.hk/joomla/index.php/64document>〉。



熱血！熱淚！25年！沒有冷！

劉銳紹

二十五年，四分之一世紀，一下子就過去了。

回首一瞥，這二十五年過得太快了，快得令人感到吃驚。我已經從頭髮濃密的壯年人，變成頭顱半禿的花甲翁。頭頂像脫了毛的椰殼，黑色的頭髮也變成灰髮斑斑；黑髮與白髮交織，就像打亂了斑馬紋。

但另一方面，這二十五年也過得太久了。「八九民運」還沒有得到平反，「六四」的歷史責任還沒有得到釐清，當年枉死的冤魂仍然在奈何橋上徘徊，強忍著天人分隔的家屬們仍然在陰森的氣氛下血淚難乾。

就在這個時候，一批當年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參與過或支持過「八九民運」的香港同學，憑著他們的記錄和回憶，把他們的經歷和所見所聞，化為文字，輯錄成書，出版了這本《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我有點如饑似渴、快速地看了書稿，一下子，當年的影像重現眼前——天安門廣場的日日夜夜、內地學生和北京市民的家國情懷、香港同胞的血肉相連……一個個畫面就像我當年採訪時的新聞，重新展現在我的腦海中。看見這些文

字，身上彷彿還感受著兩地老百姓的熱誠，無論聲音、視像、感覺、思緒，一切猶如昨日，把我的回憶拉到當年的北京現場。

不過，在這些歷久常新的記憶中，很多是我不願再想、但又揮之不去的回憶，那就是當年的血腥場面——坦克軋軋、軍車隆隆、槍聲格格、火光熊熊。其中，我至今仍印象彌深的，就是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在長安街北京飯店附近的一幕。軍隊為了防止人們靠近天安門廣場，竟然向手無寸鐵的市民開槍；槍聲過後，就是倒下的市民，以及冒死衝前槍救死傷者的人群。

我從一九八六年起長駐北京採訪。由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至「六四」鎮壓之後，我沒有一天離開北京，親歷了整個過程，接觸了官民雙方的台前幕後。「六四」鎮壓之後，我成了官方點名的「黑人物」之一，多年來不得國門而入，雖然如今已可以重踏國土，看見中國民間社會的變化，重燃我對中國人民的希望，但當年的一切仍然歷歷在目，不敢稍忘，因為忘記歷史，就是忘記血的教訓，很容易重蹈覆轍。這句話尤其值得高高在上的掌權者重視，因為他們血債未清，很容易重複一如過往的慣性，被權力和權慾沖昏頭腦，再幹出傷害以至殘害人民的事情。事實上，「六四」以來的不少現象告訴我們，中國官方的「三種崇拜」，仍然是懸在人民頭上的鋼刀，那就是崇拜武力、崇拜強權和崇拜金錢。他們隨意揮動這些鋼刀，就會令百姓生活在惶恐之中。

談及「六四」，我不是要從歷史的傷痕中找尋悲情，而是要從熱血和熱淚中找尋避免歷史悲劇重演的藥方。《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的出版，相信也是出於這個殊途同歸的目的。在書中，當年參與活動的香港同學們，從不同的角度記下了學界的活動，保留了歷史的真實。即使他們的參與不一定涉及很深的層次，書中記下來的片段也許只是整個「八九民運」的一鱗半爪，但也從側面反映了當年的風雲歲月。其中一些是我共同經歷的，例如當年與部分香港學生在廣場上的活動，又如「六四」鎮壓後內地同胞怎樣協助港澳學生安全地返回香港和澳門，令人感到人性的可貴。

書中另一個引人思考的內容，就是通過同學們的經歷、記錄，以及與內地同胞一起討論國是的過程，反映出香港和內地同胞對中國問題的思考。無論在香港或在內地，人民都是血肉相連，血濃於水的，患難中互相扶持，危難中互相保護，大家都以國家的事為事，以國家的痛為痛。這是中國最珍貴的強國元素，任何人都必須珍惜。

此書在「六四」二十五周年的時候出版，也起了一種保溫的作用。在過去二十五年裏，一場不見硝煙、不聞戰鼓的戰爭每天都在進行中，就是遺忘與反遺忘的戰爭。官方要人民洗掉「六四」的記憶，趨炎附勢者加入這個「歷史洗腦機」的行列。可是，人民不會忘記，眼前越來越多人參與「保溫大行動」，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平反「六四」的條件。日後，即使「六四」終有一天平反，但

人民也不會忘記；不會忘記不是陷入悲情，而是為了警惕未來，避免悲劇重演。

在書中另外一個可喜的發現，就是香港同學們也記錄了一些冷靜的思考，包括當時天安門廣場上出現一些年青人容易犯上的毛病，事後回顧，這也是一個年青人提升處事能力的過程。

感謝同學們的良知、真摯、努力。讓人們感到：熱血！熱淚！25年！沒有冷！人性，長存人間。

中大同學與八九民運

編委

(一)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北京宣佈戒嚴後不久，新聞系的葉同學一個人從香港飛往北京，香港當天八號風球高掛。

她在機上碰到林同學和陳同學，到達北京後，三人一起搭順風車到天安門廣場外圍，然後圈著手步行到廣場。那天晚上，他們一起在廣場過夜。翌日，入住前門的旅館，然後各自活動。其後，葉同學開始在廣場上碰到認識的人，先是潘同學，然後是曾同學，還有張同學、陳同學、吳同學。他們都是中文大學的同學，有的已經畢業，正在當記者，來京採訪，有的仍然在學，來京聲援。

葉同學在北京逗留至二十六日，然後搭火車南下青島。在火車上，認識了陳伯伯，一位退休軍人。葉同學跟陳伯伯到療養區小住，療養區位處寧靜的市郊，距離市中心約兩小時路程。他們每天一起吃早餐。

六月四日早上，陳伯伯告知她消息，說：「我哭了，共產黨建國是得到學生運動支持的，軍隊不應打學生。」

交通停頓，葉同學走路到市中心，打電話回家報平安。當時記下了一些文字：「學生們大叫『血債血償』，在道路的中心擺路祭，舉行喪禮。他們在行車路中心列隊遊行。」

在潔淨的青島，寧謐的療養區裏，心脈依然與全國一起搏動。放下了槍桿子的解放軍，思想著一生的榮辱；聽著喪禮中學生的喊聲，香港人不知是主是客？

葉同學沒有把故事寫下來，我們相信，八九民運期間還有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正如葉同學的故事一樣，不曾從記憶中抄錄到書面上，然而這些故事卻足以讓人對那段歷史多所回顧與思索。有關八九民運的故事，主體自然是全國各地的學生和人民，但是，故事裏有故事——那分明是中大同學的故事。

葉同學獨個兒赴京，在飛機上遇見兩個同學，在廣場上又連續遇上了多人。這些中大同學不期而遇，在世界最大的廣場上，在浩浩蕩蕩的民主運動中，竟不無大學校園裏熟識的面孔。

中大同學與八九民運是本書編委關注的一個要點。八九民運期間，在北京的中大同學前後達到三十之數。由於沒有資料，我們不敢說中大在京的人數最多，但單就此數而言，以至中大在香港各界之中率先聲援學運，並且學生會派出赴京代表，則中大無疑顯得相當突出。為甚麼中大同學在八九民運期間有這樣的表現？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歌》有以下幾句歌詞：

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

我們還要不停地 我們還要不停地

光大和發揚

不過，應予注意的是，三十在京中大同學當中，學生會代表並無幾人，反倒是以個人身份前往的佔多數。倘說這些同學與其他學生組織的關係，則或疏或密，甚或無關，那麼學生組織的推動力實在也無從確定。至於中大其時崇基、新亞、聯合、逸夫四所書院倡導的書院精神，例如基督精神、儒家思想，是否有以致之，亦難判斷。也許，中文大學建校以來區別於香港大學的自我意識，也在某個特定的時候起著某種特定的作用吧。

這個問題也許並沒有答案，至少暫時沒有，日後或許會有，或許始終沒有，而且會隨著時間melts into the air，甚至是一個假問題，又或許會變成一個真問題。誰知道呢？

(二)

多年以來，中大同學八九民運期間在北京所扮演的角色，不止一次惹起爭議。正如前述，民運期間在京的中大同學前後達三十人；五月二十六日——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成立後兩天，中大同學參與設立廣場上的香港物資站，並

負責管理工作，「六四」鎮壓後《人民日報》於六月十五日就此點名批評中大學生會；五月三十一日中大同學推動建立「天安門民主大學」，六月三日廣場的官方廣播嚴厲指責香港某大學學生搞非法組織。我們的活動是否在運動中舉足輕重，而且威力如此巨大，以至觸動了官方的神經？

從本書所載的見證文字看來，有的中大同學十分自覺不可把自己的看法強加到內地同學身上（〈「六四」前前後後的事〉）；有的同學很清楚自己的認同界限（〈北京紀行之三〉）；有的同學對於與內地同學彼此不同的生活細節很敏感（〈北京紀行之十一〉）；有的甚至對內地同學的處事方式相當反感（〈北京紀行之六〉）。種種情況，都表明中大同學與內地同學之間有距離；他們是運動的主體，而我們是支援者。當然，中大同學的參與之情也是熱切的，在多篇見證文字裏，都可看到我們願與內地同學不分彼此，共同進退；至少是大義當前，不會置身事外。

然而，矛盾也許正是出在這裏——中大同學既支援也參與的雙重角色。是否可以這樣認為：儘管我們主觀上無意介入運動，或影響學運領袖的想法和行動，但我們的客觀作用並不以我們的主觀意願為轉移，我們對運動的涉入實際上相當深？不要說我們可以憑中文大學的學生證進入人民英雄紀念碑下的指揮部，我們也可以接觸到學運領袖，列席北高聯、外高聯的會議，瞭解他們的討論內容和

具體需要。這也就是說，我們的支援不是一般的支援，甚至參與也不是一般的參與。而這中間的關鍵，在於我們除了是香港的學生之外，還在於我們擁有大量的金錢和物質。

於是，批評蠶起。這些金錢和物質源源不絕從香港送到，讓學生得以留守廣場，間接把他們推入危險的境地；而香港的學生有路可退，內地的學生只有承受。其實，我們的角色問題，在輿論的批評出現之前，早在當年五月底的北京已經討論過。（〈北京紀行之七〉）其時的討論沒有甚麼結果，而且有點不歡而散，但即使二十五年後的今天重新檢視，似乎也不見得就能達至明確的結論。我們大可以如一些同學所說的那樣，放棄香港學生的特殊身份，拋開手上龐大的資源，乾脆做個與內地同學一般無異的靜坐在廣場上的學生，這樣的話，來自香港的中文大學學生也就成了內地學生之一，但是，我們撇清了種種的特殊關係之後，是解決了問題，還是取消了問題？香港依然有大量的金錢和物質，正在源源不絕的送到北京，亟需尋找適當的輸送渠道。

而那已不僅僅是中大同學面對的問題，也是香港面對的問題了。

（三）

這裏的十多篇見證文字早已刊行於一九九一年，收錄在中大學生會出版的《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之中，是中

大同學與八九民運關係的主要文獻。中大同學的其他見證與反思不多，一九九零年出版的《六四見證》（Hong Kong: Grassy Plan, 1990）一書，載有數篇中大同學的見證文字，與本書部分內容相同或稍異。還有一些，收入蔡子強等編《叛逆歲月——香港學運民獻選輯（1981-1997）》（香港：青文書屋，1998）一書，這裏作一簡介。

《叛》書中有「對國內民運的分析討論」一輯文章（頁217-234），其中收入特約評論員〈五月十二日那天……〉一文，該文原載《學聯報》（1990.04.26），是作者在八九民運一年後對一段親身經歷的回顧，而同輯的其他五篇文章則圍繞該文的觀點展開討論。

特約評論員觀察了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二日——絕食前一天——中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高聯）常委會的會議，會上討論了絕食的問題。評論員稱，北高聯的常委到當天才被知會絕食的計劃，而且一來就是要求他們動員同學來聲援；他們不高興北高聯被架空，而「整個絕食的行動根本上與北高聯的運動策略背道而馳」。常委輪流發言後，事情似乎已經解決，及後柴玲到場，拍桌責罵常委的氣燄，似乎也給常委王超華壓了下去，評論員回到北師大後，也以為「絕食怕搞不成了」。可是，他翌日才知道，當晚北高聯常委又開了另一次會議，「大家都發現絕食的宣傳已去得太快太廣，收不回了，唯有改為動員同學支援他們。」評論員認為：

……5月12日是八九民運眾多轉捩點的第一個，也是最典型的一個。北京的同學在民間社會的門檻上轉了一個圈，然後漫無目的地離開了，到現在仍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因為看到了甚麼吸引他們的東西而離開的。同樣的轉捩點還出現在5月14、5月19、5月23、5月28……等日子裏，它們的性質都一致的，它們都是一些契機供學生們重新思考下一階段的民運的方向，……

他提出：

……如果當時沒有絕食，北高聯大可轉入低調的發展，各個學生自治會亦不必然要挑戰建制中的官方學生會，四二六社論中的所謂「奪權」自然也就無從說起了，而如果5月11日北高聯常委會的形勢分析是準確的話，那麼這些學生自治組織可能就已經能在中共嚴密的社會控制縫隙中掙扎而存了。

在一個幾乎沒有任何純屬民間的橫向聯繫的社會裏，第一個民間自治組織的存在，雖然可能仍是弱小而被動的，但已是民間社會出現於黃土神州的第一響號角，它將為日後建立一民主的中國提供必要的條件。

同輯之中，徐陽雁〈請討論批判怎樣的反省？——為「那天」？還是為了「今天」？〉一文，針對特約評論員把五月十二日視作八九民運轉捩點的看法提出批評，指評論員以「道德口號」代替政治經濟分析，而徐陽雁的批評則從「民間社會」的視角出發，提出「最重要是我們站在民間的立場：為這次運動建構一個非國家官僚，非資本的民間論述」。

徐陽雁指，評論員的「視野根本一度局限在『北高聯』，卻在侃侃而談整場運動」，是「分不清事件和歷史」，他看到的只是事件，而「歷史是政治經濟的制約和人們對事件的詮釋的創造！」他寫道：

胡耀邦之死是偶然的事件，但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罔顧經濟結構推行市場化造成經濟混亂才是其時的歷史背景。……搞清楚事件跟歷史的分野才好把握這次運動，尤其是市民跟學生的反應。……市民的角色是甚麼？把學生推上斷頭台的看客？這是囿於事件中的事件——學生組織的視野看不見的，要真正瞭解這場運動探討的應是市民跟學生的關係。

徐陽雁繼而鋪陳學生、個體戶、工人和農民幾個社會階層的政治經濟處境，並表示「從經濟社會角度分析很難看出能全面起義的因素」，惟政治有其獨特性，「社會各

階層可以在利益以外被統合起來」。然而，

問題是：「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的承諾未能實現，因「打倒李鵬」的口號太虛弱了，亦連結不上甚麼政治經濟利益（即使是多迂迴），又不能轉化為對政權的全面挑戰，大規模的遊行就漸漸沉寂下去了。……正是缺乏推向更高層次的動量，運動遂沉寂，以致不知所措的組織領袖手舞足蹈，於是看官們又有鼓掌的對象了。道德的感召就是如此虛弱無根，以致我們得承認殘酷的事實：運動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群眾動員，就是抵抗解放軍屠城！

徐陽雁在文末重申他的主張：「重視歷史的制約，呼喚抗爭，以民間為依歸。希望大家能合力建構我們的民間六四歷史論述。」「民間社會」的理念大概即從八九民運前後起開始在香港的學界以至社會運動界流行起來，成為理論和實踐的一大思想資源，至今仍迴響不絕。

（四）

《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出版於一九九一年，印行一千冊，多年以來，除了圖書館尚有收藏外，已不見於坊間。本書的幾個編委有若干年在八九民運周年紀念活動期間偶然碰見，提起《資料冊》，感到當年發行量不多，近

年恐怕已少有人知道或記起這一冊資料，故考慮重新出版，而《資料冊》中的「北京紀行」部分更是中大同學的第一手見證材料，整理重印應還有一定的價值。何況，當年編輯《資料冊》的時候，慮及當中提到的人物仍然相當敏感，為他們的安全起見，全書均隱去他們的名字和相關機構的名稱，而代之以符號X，「北京紀行」部分自然也不例外；至於作者，也不具名。這次出版，倘能把這些符號還原，也算是向歷史的交代。

我們從去年底開始工作，擬定出版計劃和相關活動，作為今年八九民運二十五周年的紀念。我們的設想，是把「北京紀行」和相片從《資料冊》中抽出，獨立成書。原來的「北京紀行」共十五篇，十四篇為正篇，其中一篇是一位香港大學同學所寫，與一篇由中大同學所寫的〈上海紀行〉編入附錄，即全數共十六篇。這次整理重印，除了一篇的作者無意重刊之外，其他的作者都允予重刊，故本書收入的「北京紀行」（含一篇〈上海紀行〉）全數共十五篇，不分正篇附錄。另外，我們也請作者撰寫新的文章，結果收到兩篇新作，我們把這兩篇分別放在作者的舊文後面。

整理重印這些曾經出版的文字，並不如事前所想的順利。首先是確認作者。各篇紀行的作者雖不具名，但他們的姓名和身份證號碼均連同原稿存放在中大學生會，以示作者對這些見證文字負責。可是，多年過去，中大學生會人事逐年更替，會所亦經歷裝修搬遷，這些原稿已不知所

終，無處可尋，而當年負責的編輯亦無法一一記起各個作者。幸好，憑著同學之間相互的指認，以至碰巧的運氣，終於把全部作者認出。然而，困難還在後頭。由於原稿已佚，要把那些符號 X 還原，便只得依靠作者，但由於年月已久，好些作者對這些隱去的名字印象已頗為模糊，部分已難以還原！現在，本書中所見的符號 X，一些是尚屬敏感的名字，而一些則屬無法還原。我們向歷史的交代似還不夠全面。

這次重印，各篇文章均經作者本人校閱改訂，除了更正原版的錯字和排校訛誤之外，盡量依照原文。如有需要，則由作者或編者加上註釋和按語。本書收入三篇文字作為附錄：兩篇取自第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一九九零年出版的《交代號——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銘明莊工作報告》，是該屆幹事會會長鄒崇銘同學和外務副會長莊耀洸同學所撰寫的工作報告和評論文章，另一篇亦為莊耀洸同學所作，取自一九九四年的《港支聯通訊》。這幾篇文字加上「北京紀行」，當可更見出整體中大同學在八九民運中的思想和行動。第十九屆幹事會在八九民運期間，承擔了大量沉重的工作，幹事同學所受的壓力不足為外人道，附錄的文字實在不能傳達於萬一。

《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的「民運文獻」部分，將以掃描樣式上網，以利廣泛流傳。當年與《資料冊》同時編輯出版的，還有《學運八九——清華大學宣傳隊之聲》卡式盒帶。顧名思義，這套錄音材料是清華大學宣傳隊錄製

以作宣傳學運之用的，其中包含多首歌曲和一些講演的現場錄音。這套材料也將連同《資料冊》的「民運文獻」部分放到網上。網址：<http://www.cusu.hk/joomla/index.php/64document>）。

最後，得向若干人士和機構表示謝意。

劉銳紹先生慷慨為本書撰文，實在不只令本書生色。當年在京的中大同學以北京飯店為「基地」，而劉夫子當時是香港《文匯報》的駐京記者，辦公地點也就在北京飯店，我們早已有毗鄰之緣，本書的出版使我們重新聚首，可算是再續前緣了。

資深記者張家偉先生也是中大校友，他熱心相助，為當年的在京同學主持了二月十五日舉行的一次座談會，事後且撰成〈卑微的奉獻，真切的情懷〉一文，充實了本書的內容。

記者蔡淑芳女士借出相片供本書使用，蔡女士當年採訪報道八九民運，她所拍攝的相片是重要的歷史見證，但礙於本書內容所限，我們僅能選用一些相關的鏡頭。

本書的出版雖然是由幾個編委推動，但沒有現屆中大學生會的支持，不能成事，而中大民運基金的撥款贊助，更是不可或缺。

八九民運二十五周年

卑微的奉獻，真切的情懷

張家偉
資深新聞工作者

「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是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的名言。八十年代末期筆者就讀中文大學期間，這句話醒目地繡在國是學會的一面棗紅色錦旗上。這面錦旗是當年國是學會與國內大學交流時獲贈的，多年來一直懸掛在國是學會，某程度上反映上世紀八十年代部分關心國是的中大學生的情懷。

一九八九年五、六月間，約三十名中文大學學生基於關心國家的情懷，分批前往北京支援民主運動（另有兩名同學前往上海）。他們大多在天安門廣場從事供應物資、分派食物、清理垃圾、在街上張貼香港報章關於民運報道的影印本等毫不起眼的工作，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民運貢獻一己力量，部分人更曾親歷八九年六月四日當局鎮壓民運，個別同學回港後也曾協助逃來香港的民運人士。在當時香港大專院校中，以中文大學學生赴京人數最多。這些甚少在傳媒鎂光燈下出現的中大同學，曾撰文憶述當時在北京支援民運的經歷，這些文章其後收入中大學生會出

版的《八九中國民運資料冊》「北京紀行」部分。

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五日，這群中大舊生聚首中大校園，回首四分一世紀前支援民運的往事和當中扮演的角色，並探討八九民運如何影響他們的人生軌跡，以及對中國的看法。

當時就讀數學系的余晨星，是當年最早赴京的一批中大學生，早於八九年五月一日已首次踏足北京，五月五日返港，六月三日再度赴京。余表示，當時抱著支援和參與的心態到北京，希望瞭解吾爾開希、王丹等學運領袖的想法和計劃，以便回港後與同學分享。首次赴京期間，余參加了北京高等院校學生發起的五四大遊行¹，他與另一名中大同學打著寫有「香港中文大學」字樣的橫幅，走出北京師範大學校門，在市民歡呼聲中走到天安門廣場。五月五日，余將攜帶的一萬港元交給吾爾開希，託他轉交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北高聯）。

當時是一年級學生的羅志輝，正參與中大學生報編委會「傾莊」（籌組下一屆編委會），五月十日赴京。他當

1 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十多萬學生和大批記者在北京遊行，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及爭取新聞自由。見《人民不會忘記：89民運實錄》，香港：香港記者協會，2009。而新華社資深記者張萬舒撰寫的《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則指當天「北京五十一所高等院校的數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在天安門廣場集會，並發表五四宣言」。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實錄》，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年5月，頁118。張萬舒曾任北京新華社總社國內新聞部主任及新華出版社社長。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網站，則指十多萬學生參與五四大遊行。



年回港後撰文憶述說：「一切也是突然，突然胡耀邦逝世，突然爆發學潮，突然自己決定上京，自己從來未真正遠行。這次竟毅然遠赴北京，而且是在這歷史時刻，我有點懼怕，在歷史的巨人面前，我沒有做一點微塵的資格，不懂得中國，不懂說普通話，卻成為中大赴京代表團之一員²」。他出席座談會時表示：「當時覺得五四大遊行後，不少院校已復課，學運已進入尾聲³，當時只是打算到北京組織座談會，沒有想到遇上大遊行和絕食行動。」

羅志輝在北京逗留22天，期間參與了多次遊行，並負責替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購買及分配食物。他更於五月底參與北京大學學生辦的《新聞導報》編輯工作，這份每期數頁的油印刊物，是八九學運期間第一份民辦刊物，試圖打破當局的新聞封鎖。

中大代表會主席赴京目標清晰

時任中大學生會代表會主席的陳仲強，赴京目標相對清晰。陳五月十日赴京，出發前曾與中大學生會幹事會討論此行目的，商討後歸納為三大目標：

（一）將中大學生會籌得的四萬港元，轉交北高聯，用以資助他們將來的活動；

² 羅志輝：〈北京紀行之三〉。

³ 一九八九年五月五日，除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其他北京高校普遍復課，學運一度陷入低潮。

(二) 向北高聯提議，在北京舉辦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研討會，北京、香港和台灣三地學生參與討論，議題主要為反思五四運動及中國民主化。中大學生會期望通過舉辦兩岸三地研討會，提高北高聯在國內外的聲望，抗衡中國政府對他們的打壓；

(三) 當時香港各界對北高聯態度模糊，沒有明確承認他們的地位。中大學生會希望率先派代表團赴京與他們接觸，提高北高聯在香港各團體眼中的認受性。

陳仲強抵達北京後，曾與北高聯常委接觸，並列席北高聯常委會議。但籌辦研討會的構思，隨著五月十三日部分北京學生發起絕食抗爭而不了了之。

時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會主席的中大三年級學生林耀強，五月十三日赴京，抵埗後將攜帶的九十萬港元交給北京學生絕食團。雖然香港學生手握大筆捐款，但林耀強坦言在天安門廣場上「感覺很渺小」，「不懂如何幫助北京學生，只想能做甚麼就做甚麼」。

莊耀洸八九民運期間擔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當年沒有赴京，留守香港與赴京的中大同學聯繫。他在座談會上憶述中大赴京學生在學運中的角色時說：「我們曾討論過香港學生的角色，內地學生風險較大，中大學生有事最多回港。由於內地學生面對的風險較大，在規模如此龐大的運動裏、他們是否應有較大決定權、他們決定怎樣做，我們就作出支援？中港學生縱使在分工角色上有所不

同，但又覺得大家既然都是中國人，道義上對於推動中國民運應無分彼此，因此幹事會強調中港一體的理念。」

他坦言，當時中大學生會談不上對赴京的中大學生提出明確策略，「由於北京形勢不斷改變，只能隨機應變」。通訊困難也令中大學生會難以向赴京同學提出詳細指示和方向，當年通訊不如現在般發達，拍發電報是相對便宜的通訊方法，如要撥打長途電話，倘不是在酒店內，便只好到街上輪候公共電話，而且費用相當昂貴。

當年曾赴京支援的中文系學生曾憲冠，直言中大學生當時在北京的角色「很難總結，或簡單說沒有角色」。五月二十四日到北京的曾憲冠憶述說：「以我的經驗來說，中大學生會沒有給我具體指示，沒有嘗試通過我們這些在北京的代表影響學運的方向。」

與曾憲冠聯袂赴京的林亦子⁴也指出，對於如何支援在天安門廣場的內地同學及如何參與這場學生運動，中大同學沒有統一的想法。她在〈「六四」前前後後的事〉一文中表示：「我們的同學大致上有個分工，都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做的，沒有人被指派工作。……那段時間，我們那一批同學是由我和廖雪雲同學負責去旁聽外高聯會議的。我自己的心態真的是去旁聽，並沒有想過去影響他們，或

4 林亦子因事僅能於二月十五日座談會結束前不久才趕到出席，時間所限，未能盡情抒發己見，本文引述林的說話，乃出自她撰寫的回憶文章〈「六四」前前後後的事〉（見本書）。

參與甚麼意見。」

林表示：「從到天安門那一刻，我感到我真的像一名外來者，……這場運動始終是屬於他們的，……香港同學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是我們時時爭論的，當然是沒有甚麼結果。但我們大致上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要做像紅十字會那樣的工作，即在平時做支援的工作，在鎮壓發生的時候就做救援的工作。」林亦子甘於低調，在北京十多天期間，沒有見過任何後來家喻戶曉的學生領袖。

中大學生在北京的主要工作，是維持設於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物資站的運作。物資站在五月二十七日成立，負責提供食物及帳篷等物資。當時採訪學運的香港記者指出，在鎮壓前的一個星期，分發物資工作基本上由香港學生統籌。⁵

林亦子說：「我們的確一開始就背負了物資支援的角色。我和曾憲冠同機飛往北京，離開香港前去中大學生會莊耀洸那裏取了十部對講機，還有一些錢。我們每一批去北京的同學都會帶一些錢和物資去，帶些天安門學生運動日常運作最需要的東西。」

中大學生最初是把捐款交給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讓他們負責購買食物及分發給廣場上的學生。但林亦子後來發現在廣場上的外地同學依然無法得到食物，逐漸

5 羅綺萍、麥燕庭、梁美芬、黎佩兒：〈學生組織與運動策略〉，《人民不會忘記》。

察覺廣場指揮部的同學即使購買了物資，其實並沒有認真地分發給廣場上的同學。林表示：「我們香港同學決定設立一個自己的物資站。這個物資站由香港同學管理，面向所有廣場上的同學，尤其是支援物資缺乏的外地同學」，而中大學生「是刻意想給外地學生多一點幫助的」。

由於林亦子的普通話較流利，購買物資的任務就落在她的身上。林最初跑到天安門附近的商店購買麵包和食水，但迅即發現這些商店的貨源不足以滿足廣場上學生的需要，決定直接向麵包廠訂購。但兩家在天安門廣場附近的廠商維持供貨一兩天後，相信是受到當局的壓力，先後拒絕繼續供應麵包。

麵包廠東主憂心國家前途

她後來在一條胡同裏找到一家願意為學生供應麵包的廠商，東主是位中年女士，十分支持和同情廣場的同學。林亦子說：「這名女士，是改革開放一開始時創業的，事業略有所成，……她不想失去這些生活，但又為這個國家的前途擔憂，十分支持學生的反貪腐、爭民主的理想。她很樂意幫我們提供麵包，不同種類的麵包。……最後一批是六月三日，收據還在。在眾多被記掛著的人當中，她是最牽掛的。」

部分中大同學更發起清潔天安門廣場的工作。林亦子表示，學運期間天安門廣場上垃圾堆積如山，帳篷外到處放著垃圾，她擔心這樣下去廣場上會爆發疫症。她憶述

說：「不知道是誰去採購了一批清潔用具——掃把、垃圾鏟和籬筐之類，準備發動同學自己來做清潔。可惜同學們對此並不熱衷。同學們寧願在帳篷裏呆著，即使是無所事事，也不願意出來幫忙收拾一下，掃一下地。有一次在學聯漂亮整齊的帳篷前，呼籲同學們一起來掃地，不料反應極差，三兩香港同學在示範掃地，外圍圍了一圈同學圍觀，沒有人動手幫忙。當時真的頗生氣，心想難道搞民主運動就不能掃一下地嗎？連清潔自己的環境都做不好還搞甚麼民主運動呢？」

數學系學生黎洪，曾列席北高聯常委會議，有時候某大學需要資金購買油印機，黎便向中大負責同學申請撥款，「主要視乎他們需要哪些支援，我們盡量配合」，同時支援他們的宣傳工作。

就讀中文系的鄭素真五月剛考完大學畢業試，即與一名同學奔赴北京。她們與中大學生組織關係不算密切，不是典型的「組織人」，憑一腔熱血北上聲援學運。鄭強調當年絕對沒有參與及影響內地學生的決定，「只想做見證，作最微小的支持也好」。當時鄭和同行同學負責每天派發食水、麵包、張貼香港報紙。她記得六月三日天安門廣場官方廣播站全日不停廣播，指有香港學生帶了物資到廣場，矛頭直指中大學生，令身處廣場的她感到風聲鶴唳。

中大學生這些看似毫不起眼的工作，也在學運期間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曾憲冠認為，雖然在京期間有頗大無

力感，但當時在廣場附近張貼香港報紙，很受市民和學生歡迎，很多人圍觀，覺得有外來資訊，有助打破官方新聞封鎖。

來自香港各界（包括大學生）的支援，令不少曾經歷八九民運的內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曾任《南方都市報》旗下《南都周刊》副總編輯的內地傳媒人長平表示，「在那一個風雲激盪的春夏之交，香港突然以另外的形象出現。作為參與運動的學生，我們能夠感受到來自全世界的支持，但是香港是距離最近而且最有力量的一個。運動過程中無數的聲援和捐贈，以及運動被血腥鎮壓之後的逃生通道，香港仿若黑暗天空中的一道閃電，讓人幻想著雨過天晴的彩虹。」⁶

北京學運領袖在五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曾討論應否撤離天安門廣場，北高聯、廣場指揮部等五月二十七日建議五月三十日撤離廣場。與廣場指揮部關係較密切的林耀強曾參與討論，但他說：「討論過程中我感到很頭痛，因為不太懂得怎樣跟他們討論，大致原則是如果他們決定留守，就會繼續協助他們，如果撤退也會設法配合。」

林亦子對當時參與心態的回憶，頗能歸納大部分赴京支援的中大同學的想法：「當時我們中大同學大致這麼想：既然運動還在進行中，還有同學需要支援，我們就會

⁶ 長平：〈自由香港的背影〉，「星期日明報」，《明報》，2014年3月2日。

支援到底，不能中途離開。我們要和天安門的同學共同進退。」

陳仲強形容當時中大學生角色「十分微妙」：「我們擁有過百萬的捐款，這使到北京的各股力量皆想聯絡我們，對我們的意見，自然也會尊重；而他們之間（特別是指揮部、北高聯及外高聯）又存有不少矛盾。……這種處境，使我們有潛力發揮很大的影響，……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應有我們的參與，但跟內地人相比，我們始終是站在一個特殊地位。我們有香港可以退，但他們卻是退無可退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對運動有太大的影響。」

部分中大學生參與籌辦天安門民主大學，是中大學生支援八九民運行動中，較具爭議的一環。根據陳仲強的憶述，早在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當代中國學會成員丘延亮（現任台灣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已在北京向他們提出在天安門廣場開辦「民主大學」的構思。二零一四年四月，身在台北的丘延亮向筆者證實，當年確是他向赴京中大學生提出這個構思的。

鄭素真表示，依稀記得民主女神像五月三十日在廣場豎立後，有人提出如何作長遠鬥爭，邀請有份量的講者在廣場舉辦講座，相信這是民主大學構思的根源。多位赴京中大同學也曾聽聞民主大學的構思，主要作用是整頓日漸混亂、氣氛散漫的天安門廣場的秩序。

莊耀洸表示，曾有赴京中大同學致電回港表示打算辦民主大學，希望中大學生會聯絡國際級學者到天安門辦講

座，以減低當局鎮壓的可能，並提出籌措所需器材。他表示：「這不是我們（中大學生會）的指示，我們覺得構思好，便著手進行，也忘記是誰提出。其後幹事會曾討論這個問題，曾邀請當時的中大歷史系教授郭少棠物色講者，但沒有下文。」

籌辦民主大學的構思，觸動了北京當局的神經。根據赴京中大學生陳耀輝和林藹純的憶述，六月三日在廣場協助分派食物時，聽到官方廣播指香港某大學學生在廣場上搞了個民主大學，他們意識到是指在京的中大學生。⁷

八九年六月三十日，當時的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發表《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指學運領袖「依靠香港聲援團提供的帳篷，在廣場建立了所謂『自由村』，開辦了所謂『民主大學』，聲稱要使它成為『新時代的黃埔軍校』」⁸。

北京當局鎮壓民運後，一些論者認為香港人對內地學生的捐助和物資，鼓勵他們堅持留守廣場，間接令當局決心鎮壓。八九年五月中赴京支援的中大學生尹彥超認為：「不可以說某人要負責或某人的參與導致這個後果（鎮壓）、不能這樣評論。當權者一定要為暴力鎮壓負上最大責任，這是大是大非。」

林亦子也不認同香港對八九民運的支援，導致北京當

7 〈北京紀行之七〉。

8 《明報》，1989年7月1日。

局的鎮壓。她表示：「海外的推波助瀾是不是導致了屠殺呢？如果是，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使掌權的人起了仇恨、起了殺心。……我們不合時宜地觸怒了權威，我們不成體統地冒犯了天朝。……殺人難道不是一個底線嗎？北京市民到底犯了哪一門子的罪，招致殺身之禍？我們這些香港同胞挑動了誰的哪一根神經，導致大陸同胞無窮無盡的磨難？」

現職律師的林耀強強調對當年的參與無悔，如果能再次作出選擇，他會毫不猶豫做同樣的事。他說：「中大同學相對關心國家、民族感情較強、當時希望做點事改變中國。但八九年六月六日（鎮壓後兩天）我乘飛機返港後，個人體驗出現轉折。我從八六年開始參與學生運動，希望通過參與令世界變得更好，民運被鎮壓後個人受到很大衝擊，覺得規模再大的運動，最終只會帶來更大的黑暗和政治收緊，當時信念瀕臨崩潰。」

隨著中國迅速崛起，林耀強逐漸失去「改變中國」的豪情壯志，覺得能守住香港這塊陣地已很不錯。他表示：「近十年無力感重了、對中國形勢發展很無奈，近半年更有退縮心態，覺得能守住香港已是萬幸，哪裏還敢奢言改變中國？」

「我們不能低估香港人能做的事情」

現職中學教師的余晨星，面對中國心情頗為矛盾。他剛執教鞭時希望學生關心中國民運，「但中國日漸富強的

同時，在其他方面卻不斷沉淪，環保、公民意識等方面每況愈下，當局對政治的管制較過去更嚴厲，要關注越來越難」。他慨嘆在目前「本土派」抬頭的情況下，即使鼓勵學生關注國事也不容易，「例如應帶學生到大陸參觀交流嗎？如果帶他們看國內的光明面，會被指『洗腦』。如果看黑暗面，則更加強他們與大陸的疏離感，這是現在參與上的苦惱。有時候覺得多向學生講解內地的情況，令他們知識上加深對中國的認識，感情上卻越來越抗拒」。

余與在內地出生的黎洪，均不認同「本土派」指香港應與大陸隔絕、獨善其身的主張。黎表示：「退守香港並不現實，也不是出路。如果中國經濟繼續發展，但維持專制，香港不可能獨善其身。如果中國民主不進步，香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

目前在大學任教的吳國坤，則認為不應低估香港人對改變中國所產生的作用。他表示：「每年六四燭光晚會對國內人很重要，以我所知一些國內和美國學者會出席晚會，甚至參與頌詩，我們不能低估香港人能做的事情。」

後記

筆者當年就讀中大期間，曾參與國是學會及中大學生報工作，說起來屬校內關心國是的「一小撮人」。八九民運期間沒有赴京，二十五年後接下替當年北上聲援的中大同學撰寫回憶與總結的任務，為的是讓更多人瞭解他們當年對民運作出的無私奉獻。

他們大多懷著「苦難的中國有明天」的心願，默默參與後來觸動千萬中國人心弦的運動。不論當年還是今天，他們沒有太多豪言壯語或「宏大論述」，但關心國家、盼望祖國進步的情懷是真切的。這些同學在近年冒起的「本土派」眼中，或許是不值一哂的「大中華膠」，但他們均無悔於當年青葱歲月的參與。

四分一世紀晃眼過去，這批同學近年處境縱有不同，但當年的樸實情懷始終不變。

北京紀行

北京紀行之一

(1/5-5/5, 3/6-5/6)

余晨星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數學系四年級
現職教師

五月一日

我分別去了兩次北京，第一次去的時候是五月一日。當天早上，我很容易就過了海關。來前，閱當天報紙知道吾爾開希已躲藏起來，故沒有到師大去找他，反而到北大找王丹。

北大門口，好多人想進去，但都在門口給公安擋住要看證件，並說八時後不會客。（後來知道，八時前由原本的校警看衛，八時後，就由公安看衛了。）我們就以探訪研究生會主席，急要商討活動為理由，進了北大。

有一批人聚在一棟宿舍下面，他們聽著二樓窗口架起的一雙大喇叭所播出的演講，而我們在聽的時候，正好是來自天津的南開大學學生在介紹南開大學的情況。聽的人在講者講到某些精采處時會鼓掌，但情況並不是很熱烈，可能這樣的演講播放也進行了好多次。

找到王丹的宿舍，他人不在，而我見到的是他對面的X X X，他告訴我們王丹去開會了，一會才回。等王丹期間，我們與北大學生互通港京情況，他們都很想知道我們對學潮的看法。見到王丹，與他談了一些學運的當前問題，例如我們認為對話必定只是手段，建立自治組織才是最重要；首要是自治會受群眾承認而不是受官方承認等等，他都表示基本贊同，但他似乎對這些事情並不熱烈，甚至我們拿出香港同學的血書時，他也沒有甚麼表示，或許是他太累，也或許是與他已不在北高聯的事情有關。

與王丹討論中，一香港記者到來要與X X約時間訪問。從他們的交談中，我們知道明天早上，北高聯同學會在師大會合，駕自行車到三個地方（國務院、人大、黨中央）的辦公室，去交請願書，要求政府對話，答應包括對話在內的十一個條件。

晚上我們住進別的同學的宿舍，結果瞭解了一些普通同學的狀況。他們支持自治籌委會，但對籌委會裏的人所想的一點也不知道。從他們處我們還瞭解了，北大罷課過久，同學都想復課、上課；加上罷課後又沒有甚麼事情幹，又迎上勞動節假期，不少同學都回家或去旅遊了。

五月二日

早上因前一晚X X說他們的同學會在圖書館東門散發資料，故我們到那裏去，但時間已過許多，仍無人散資料。來回宿舍經過三角地，見到許多人在看大字報，後來

瞭解北京市民都習慣到北大瞭解學運的最新情況。

下午，我們到了師大，經過校正門時看到一大堆人，由於汽車快速的駛往後校門，我們沒法看清那批人，後來瞭解就是那些要騎自行車去交請願書的北高聯同學。

進師大後，看到有不少大字報，但大部分是前幾天的。在大字報上找到師大自治會的聯絡處，X X樓X室。在那裏，與我們見面的是外務部負責人X X X。我們與X X X講了那番我們對X X講的話，他表示必會轉達北高聯。我們問他可否參與他們的會議，他就說我們可以參加當天晚上的會議。X X X這個人，社交能力強，又幽默，難怪會當上X X X部的負責人。

晚上的會議原本是一個全北京高校代表的會議，要討論的主要是各種政府可能的反應後的行動。主持會議的是北大的X X X。會議開始很順暢，每個人都珍惜大約只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把自己的意見鋪開，他們大多都準備得很好，使沒有準備的我，不敢浪費他們的時間。會議上對罷課的情況也作出檢討，一些代表說不管情況怎樣，五月四日後要復課，因為與其被動復課，不如主動復課。會議繼續進行就越來越混亂，一方面因主持會議的X X X，沒有好好的控制秩序、會議進程，而且他又脾氣暴躁，給人感覺也不民主——別人提了不少意見，他還是只是說了他自己對北高聯的主張，把剛才其他同學提過的方案當成沒說過似的，只在別人抗辯時，才把那些人的意見加進總結當中。他甚至往往在沉不住氣時，走下講台，由X X X

來主持會議，當他比較冷靜，又會自動的走上講台。另一方面，會場上有超過四十個代表，之前又沒有開小組會，一混亂起來，就難以收拾。

會議在越來越亂的時候，有一些同學甚至離場，最後由於難以定下大家都接受的行動方案，就決定明天政府答覆後，由北高聯常委提出方案，全體代表投票通過。

五月三日

早上，我們到北京飯店打完電話，中午就到人民大會堂東北門等北高聯的同學來，希望馬上知道政府的態度。早上在北京飯店，就聽說袁木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但一直沒有知道他在招待會講了些甚麼，故當十二時已經到時，仍不見高校聯的同學，我就懷疑是不是與袁木的講話有關，在場又聽說他們學生已改往國務院，但國務院那邊的記者也跑到這邊來。由於擔心他們是不是出了甚麼問題，故趕回師大，知道他們只是找了幾個同學去了國務院收正式的答覆。這次改變地點，不知是何原因，人民大會堂當中應也有許多高層人員在等學生，但都在約十一時五十五分同時離開。

師大的大字報多了幾幅，似乎師大自治會在校內通訊方面，做得不錯。

下午，另一個緊張的全體會議要開了，之前我想吾爾開希應會出現，加上昨天已有同學暗示他快出現，所以今天的會議再見到他，我並不覺得奇怪。看來他很精神，躲

起來可能只是要休息一下。香港的傳媒懷疑他躲起來是製造新聞，但我所接觸的師大人，許多都不知道吾爾開希躲起來，因此製造新聞的說法應該不確。

X X樓的會場上聚著超過一百個學生，有不少是外地學生，進場的就如昨天會議，都要通過證件檢查。開始的時候是由社科院的X X X報告袁木在招待會上所講的話，然後北高聯的常委就退席討論行動方案。接著就有藝術學校的同學寫出他們明天要帶唱的請願歌，還有X X X作演講，請他對中共當局「八位一體」、高度中央集權的問題，提出他對這些權力從新分配的作法。

後來北高聯常委來了，他們把方案提出，是兩個，不是一般所說的是一個。看著這兩個方案，我總覺得是有意的安排；昨天可能是有不少聲音提議不遊行，所以今天的兩個方案都是導向要怎樣遊行的討論。尤其第一個方案，決定要遊行，最後同學卻只是走到一個荒地集會，就好像一個在姿態上與第二個方案——遊行到天安門，所有同學進行演講——有很大的差別。投票結果一面倒，投第二方案的有40票，第一方案的5票以及棄權的2票。這當中，只有北京的學生代表才可以投票。

有了結果，北高聯就在師大召開記者會，我們也在場介紹了香港的反應，也接受了一些記者的訪問。晚上大家都趕緊做布橫額。

參加會議的感覺是，我們香港同學還是被看成客人和外人。會議當中還有些較極端的意味，並不能接受有棄權

票的出現，有人說，來投棄權票幹嗎要來。

五月四日至五日

早上，外地赴京學生都集中在一起，我們也在這個隊伍中，打著香港中文大學的字樣，跟著在歷史系後面，走出校門了。走了不遠，就遇到公安警察，前面的隊伍沒有多少困難就衝出去了，但後面還留著許多學生，公安這時加強攔阻，還組成人牆衝過來，起初我們確有點混亂，有些同學向後退，也有女同學在哭，但很快我們就穩定下來，手挽著手向前衝，走到前面，我們知道公安曾打人，又搶旗，我的一個香港朋友差點也給打，由於公安沒有打得太過分，衝突很快就平息，一些警察甚至阻止人群壓向已經跌倒的同學身上去。過了這一次阻攔，就沒有再遇到強力的阻攔（但聽說另外一條路線，遇到三次這樣的阻攔），接著很順利，沿途不少市民圍觀、支持。他們看到外地學校時都很高興，尤其是看到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的橫額時，鼓掌聲更是響亮。不少人說感謝我們香港同學，但不少人也嫌我們只有兩個代表太少。這樣在不斷的歡呼聲中，我們到了天安門廣場。這裏各校有分配坐的地方，但都只是在休息，沒有做原來要做的演講，學生又沒法有一個整個廣場都聽到的播音設備，因此北高聯的常委宣讀了「五四」宣言，廣場上大部分的同學還是聽不到。由於無事可幹，等了一會，同學都解散，向自己的學校往回走。我們因為太渴就沒有跟著隊伍回師大。晚上回去找不著吾



爾開希，故在五月五日早上我們才把第一批捐款，港幣一萬塊，交給他轉北高聯，由他和X X簽名作實，當天我們就離開北京，只留下信給下一位來的我校同學——X X X。

總結這幾天，我們參與得並不是很好，而且學生組織又沒有遇到逮捕和分裂，故我們也沒有特別要做的事，剛好這段時期是一個低潮，因此我們只扮演了聯絡、瞭解的角色，讓後來的我校同學有較佳的開始。

六月三日

我獨自再到北京，已有不少中大同學在北京，但人手不夠，故我和幾個同學都要來此。海關還是查得很鬆。從機場到北京市，沿途仍有不少軍車，也有不少市民在下班後或晚飯後與軍人談，氣氛似乎還是不錯，沒人會想到當天就會發生這樣的慘案。不過到北京飯店，氣氛就不一樣，我的同學都說今晚很可能來真的。十時左右到天安門，氣氛已經很緊張，一方面是官方的廣播站富威嚇性的講話，另一方面，廣場裏外，已有許多人拿著竹棍、木棍甚至是鐵棒，似乎誰都準備與軍隊硬碰。（據現場理解，下午長安街附近已經傳出過軍隊打人開槍的消息。）

留在廣場沒多久，就有一批拿著大木棒子，背著槍的士兵從南面進廣場，他們經過香港物資站，也就是在歷史博物館旁，以及廣場上。這時附近的學生都喊不得打人，但士兵顯示他們受傷流著血的手說「你看」、「我們不會

打人」，甚至一些還舉著V字手勢，確使人感到安心，但群眾的舉動確使我們擔心軍人會反抗亂開槍。這些士兵連著一些後來的士兵，都坐到歷史博物館的行人道上，學生與群眾都坐著，與他們對談，學生還唱《血染的風采》、《十五的月亮》以示親近。

東西長安街的情況就很不一樣，一時許，一輛裝甲車高速從南面經歷史博物館這邊，駛往長安街，這之後，群眾都馬上設路障，還在路上鋪上從棉衣來的，從棉被來的棉花，準備隨時點火。不久，我們看到長安街上，毛澤東像旁，有一輛裝甲車被燒，我們往前看，得知裝甲車把幾個人撞死，故群眾憤怒的把它用衣服及棉被燒了。逃出來的軍人，一些給打死，一些給學生及我一個朋友救去。情況越來越緊急，毛澤東紀念堂上空出現過訊號彈以後，東西長安街就開始響著槍聲，尤其是在西長安街，兩邊的士兵越推越進，更多的人中槍，傷者一個一個往廣場這邊抬來，各個部份中槍的都有。我們香港同學起初集中在物資站，後來覺得危險，還是都搬到人民英雄紀念碑下，這大概是二時多，一些人和我決定撤退，一些我的同學就繼續留下。我們走的時候，發覺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加上我們否決要坐在歷史博物館那些士兵身旁，故我們沿東交民巷走，因為同學想走又不想走，故走得很慢！其中一個我們停留的地方，是公安局和國家安全部的所在地。路上有幾輛大客車，上面好多人，北京同學說這些是便衣，我們還看到一隊持木棍、盾牌的防暴警察進了公安局，這時外邊

響起幾陣砲聲，正罵政府居然用到砲彈時，公安局內竟然響起掌聲，實在使人失望和憤怒極了。

路上，我們遇到了一個自稱北高聯代表的學生，說要看我們的證件，說他要趕路去完成秘密任務，問我們路上的情況。

凌晨，我們躲到一棟大廈的樓底，居民知道我們從廣場撤下，都表現得很關心，他們送水、送飯。他們向我們瞭解廣場上的情況。同在還有一個蘭州大學的學生，以及一些在我們的物資站工作的北京學生。

早上，市內電話還打得通，打回北京飯店，知道附近有槍聲，就暫不回去。到街上，居然還見到一個人在跑步健身，並跑往天安門去。許多居民起來才知道發生甚麼事，他們想，軍隊一定是向天開槍。到崇文門地鐵站那邊看過，只見滿地磚石，並有一大堆士兵四方形的圍在路口。居然還有不少市民圍著他們講話，士兵的態度要麼就是無可奈何，要麼就跟市民爭論，說士兵是自衛。一個長官還說他只知道來維持秩序。我們看到他們的槍都用一個塑膠粒塞著，居民也告訴我們他們的槍沒有上子彈。一個江西籍同學還告訴我，從士兵口音來判斷，他們是從江西來的。居民後來又說，有另一隊士兵，經過崇文門時，不斷向天開槍。

大概是中午，我們停留的那棟樓的電話打不出去了。一些居民都叫我們別出去，他們會保護我們。一些人甚至幫我們去火車站看售票情況。一些人談他們對學生運動經

過的瞭解，和他們對現況的想法。

下午，有居民說回北京飯店的路不危險，我們就回去了。當天聽說北京飯店危險，故我們都搬去王府飯店。

六月五日，我們再到北京飯店拿行李，看到長安街上仍有很多人往天安門方向走，一有槍聲，他們就往回逃，槍聲一止，他們又往前去，有人說，槍聲的頻率是每十五分鐘就有一次。

傍晚我們才到機場，海關很鬆，幾乎沒有檢查，但飛機起飛前，邊防公安還是在飛機內把李卓人以某乘客出境手續未完，把他騙出去，扣留著，由於傳說飛機場於十二時封閉，飛機師不肯停留，飛機在不到半小時內就起飛了。

北京紀行之二

(10/5-25/5)

吳國坤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英文系二年級
現任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理教授

第一部分

五月十日

我和羅志輝及另一位中大同學三人在早上抵達北京，我們在北師大的自治會總部，找到了另一位比我們早到的中大同學，剛巧那天北京學生舉行環市單車大遊行，於是我們幾個一起參加，可惜我們沒有帶旗幟，聲援學運作用大大減低。晚上，我們到北大的自由論壇，然後回北師大住宿。

五月十一日

早上，陳仲強到了北師大，我們商量過一些今次代表團的工作，有以下幾方面：（一）攜帶金錢與訊息；（二）與各大學建立關係；（三）與北高聯合辦三地營；

(四) 拜訪知識分子與報社。下午，我們到北大找北高聯的負責人，結果找到其中一個常委，她講及一些北高聯的內部情況，跟著，我們出席了一個由天津南開大學召開的記者招待會，負責人在會中主要透露天津學生到北京聲援學運的情況。晚上，我們仍舊出席北大的自由論壇。

五月十二日

早上，我們拜訪了北京一家日報的兩名記者，談及學運的情況和他們對爭取新聞自由的看法。下午，我們到了人民大學，接觸了那裏自治會的一些負責人，原來人大自治會的骨幹多來自其中某個學系的學生，他們對學生組織的建構很有見解和策略，而那裏基本上百個系都有自治會，情況比其他大學好。

五月十三日

我們跟隨北師大的絕食隊伍，遊行至天安門，訪問了一些學生關於絕食行動的意義。晚上，我到了人民大學，本來是想出席一個討論會，看看人大學生參與學運的情況，跟其他大學有甚麼不同，不過那天晚上沒有討論會。回到旅館，聽說有位中大同學入了醫院，趕到那裏探望。

五月十四日

整天在醫院陪著留醫的同學。晚上回到旅館，羅志輝和陳仲強往天安門聲援絕食同學，而我不知道，獨個兒在

旅館過了一夜。

五月十五日

早上，我和羅志輝到天安門找到另外兩名已經到了北京的中大同學。下午，我到復興門跟隨著知識分子的進行隊伍，跟著到醫院探望留醫的同學。

五月十六日

這天整日的工作是籌備往天安門聲援絕食，而下午陳仲強也往國務院遞信。晚上，我們主要是和印刷學院的一班學生在一起。

五月十七日

早上回到旅館，我們討論過，認為聲援方式有必要升級，以救助那群絕食學生，於是我們決定在新華門絕食跪請。下午主要是準備工作。我們大約在下午五時到達新華門，但那裏的糾察勸喻我們不要採取過激行動。（一）那天絕食行動有解決的曙光；（二）現場群眾太多，一旦有任何過激行動，新華門外容易有騷動，屆時恐怕得不償失，最後我們也打消跪請的念頭。

五月十八日

這天上午和下午都沒有事做，但晚上，我們又再次討論跪請的行動，因為外圍形勢越來越嚴峻，學生的絕食行

動似乎解決不了，有必要將對政府的壓力加大。

五月十九日

早上，我們和一群到北京的中大同學討論跪請的行動，交代一些工作。下午，我到醫院向留醫的同學交代清楚事件發展的經過。黃昏回到旅館，本來我們相約一起到天安門，但接到中大同學的電話，說北京將會實施軍管，於是急忙到北師大瞭解情況。

五月二十日

早上，我和一名中大同學出發到天安門瞭解情況，跟著我到豐台看看軍隊入城情況。晚上，我會合了其他團員，到天安門聲援學生抵抗軍隊鎮壓。

五月二十一日

早上傳出許多高層「政變」的消息，我們瞭解到學生運動不可避免地捲入政治範圍之中，於是商量離開北京的辦法，哪些人繼續留下北京等情況。我們也處理了一些經濟上支援廣場同學的金錢捐獻事情，晚上傳出李鵬三點血腥聲明。陳仲強和另一位中大同學去了天安門，而要求我們留在旅館。

五月二十二日

那天我心情非常壞，整日躺在旅館。晚上到了北京

飯店，會合剛上京的一大班同學，討論學運形勢，因為二十三日將會有大遊行，但我們恐怕學生運動的成就最後被某些人用作儲蓄實力的本錢，於是傾談明日的遊行，旗號應鮮明地肯定學生運動，口號也不提「打倒李鵬」。

五月二十三日

早上和下午都是進行遊行的工作，但下午的遊行遇上大風雨，我們到了西單被迫停下來，返回旅館，再執拾行李往北京飯店。

五月二十四日

早上，我們到天安門看看司令部¹成立的情形，原本打算在下午開會，但那時柴玲到了北京飯店，商量捐獻營幕的事情。我們在晚上才開會，決定了幾個方向的接觸。

（一）北高聯；（二）外高聯；（三）司令部；（四）各院校自治會。

五月二十五日

乘飛機返香港。²

1 廣場指揮部。

2 由於北京形勢越來越混亂，我的家人也一再催促回家，因而和需要入院留醫的同學一同回港。

第二部分

五月十三日

今天，我和羅志輝一起到北京師範大學，打算跟隨絕食同學遊行到天安門。途中，我和幾個北京的學生談及有關學運的問題。

陳君是北京化工學院的學生，他說學校的學生自治會早在「四·二七」以後，因為受到校方強大的壓力而解散，他今次是自己走到師大來聲援那些學生的，而他的學校已經全面復課，校方也施加不少壓力，以致他的同學不能組成一正規隊伍遊行往天安門絕食。雖然如此，他卻認為同學對參與整個學運的熱情未減，而且他對將來學生自治會能夠成為一合法組織比較樂觀。

他說學校原來的學生會只能提供學生們一些課餘活動，諸如球類比賽、徵文比賽，這些只是偏重康樂方面的。

他又以為今次學生運動比八六年的進步了，因為八六學潮著重的是民主自由，對政府自身瞭解不太多，而今次學生能夠重視政府腐敗的一面、官倒流弊，對政治有明顯的要求。

另一個學生來自清華大學。他說今次絕食的目標是要與政府對話，因為政府一再拖延、由「四·二〇」、「四·二二」、「四·二七」、「五四」一直拖延至現在，政府沒有一點誠意。「一個有誠意的政府，有希望的

政府，應該會在這幾天內答覆，如果還要我們繼續絕食的話，這個政府就沒有希望了，中國就沒有希望了。」

他覺得政府遲遲不肯對話有兩個原因：一是高級幹部和官員根本不瞭解今次學生運動的目的，以為知識分子跟學生硬要跟政府作對，毫不知道中國國情，在動搖國家基礎；二是政府官員不知道學生並不是為了同學本身的利益，而是基於國家已陷入水深火熱的情況因而發起是次運動的。

他說：「我知道在中國人口問題是重要，經濟問題是重要，但政治問題更重要，制度上流弊影響最大，所以我們希望在制度上作出改革，要求新聞自由。但是我們發覺政府跟每個層次『對話』不一，對新聞界『對話』和跟學生『對話』不相同，不過都沒有明顯要求改變的態度。」

他肯定了工人、民眾對學生的支持，但是普遍人民對民族、民主的認識與反省都不夠。

今次運動給他的印象是：它比以前幾次運動都提高了。「五四」關心的是廣大的民族問題，反抗列強入侵。七六年的「四五事件」中，民眾對國家、政府制度認識不深，他們停留在個人膜拜的層次上，對毛、周崇拜，周死了，他們惶然不知所措。今次事件中，民眾和學生基本上脫離了個人崇拜，知道問題在於政府制度，解決問題是透過改革。胡耀邦是一個偉人，但再多一個胡，或胡活多一百歲，也挽救不了中國，要建設美好的未來中國一定要透過制度上根本的改革。「共產黨的確產生不少偉人，

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但問題就是解決不了。」

一方面，他也知道人們對民主討論不足夠。在低層面上，他要求爭取言論自由，輿論開放，使思想能夠溝通，向民眾宣傳民主思想，但步伐不能來得太快。另一方面，他以為要利用現時的熱情，趁它未冷卻之前，趁機對中國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對於學生組織，他有自己的看法。他承認自治會本身受到政府監視，而且八六年學潮中有許多學生遭開除，很多人怕搞運動會受到報復，政府有一個格言：「鬧事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現在，老百姓有話不敢說，敢說也沒有途徑，他們竟要通過「美國之音」去瞭解中國國情。他感嘆說：「我希望中國能在這方面改變過來。」

另外一位同學早於八三年畢業，現在正進修法律。他對今次學運有高度的評價，認為參與的學校跟學生都比「五四」時多，不過，學生不能擁有更多的宣傳工具很吃虧，因為人民很多不知道學生在幹甚麼，真的以為是社論所說的動亂就糟了，而且很多年老的百姓都不敢拿傳單，尤其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老百姓都不敢收取傳單。

王君是人民大學的學生。他認為對話本身並不是目的，對話的精神在於一個國家的公民是有權去批評政府。他覺得今次運動本身最重要是它的啟蒙效果，宣傳民主自由，爭取新聞自由，落實的功夫則是爭取政治改革、新聞

改革、民辦報紙。

他很推崇一個人人享有公民權和個人自由的社會，即使這是一個精英政府，只要有一個好的領導人去保證這個精英政府的正常運作，他覺得國家仍然是有希望的。

五月十六日

晚上我們在天安門廣場露宿，作為聲援絕食的學生。對於自己在當晚的表現，我仍然感到內疚。不錯，我也與很多同學傾談過，整個晚上我們談得熱哄哄的，但明顯廣場的氣氛跟絕食的目的已經脫了節，由於廣場上聲援的人太多，太過熱鬧，形成一種高漲的情緒，一種成功感，反而大家再沒有想過政府一旦不答應學生要求時，效果將會十分嚴重。我又想起這幾晚工人也紛紛起來，每晚大伙兒湊在一起，他們的目的彷彿不再是幫助絕食的學生，增加群眾壓力去逼政府讓步，而是趁一個機會去發出他們的叫喊。

當晚我們與一群北京印刷學院的學生坐在一起。平心而論，廣場上每個人都是來聲援絕食學生的，但由於人數太多，政府也一晚一晚去拖，大家精神容易鬆懈，集會的目的最後成為集會。就拿自己的感覺來說，和一班中國的學生非常談得來，除了個別曾談到學運情況外，大部分時間反而在於結交朋友，那種氣氛相當怡人，令人樂而忘返。這是我的感覺，但不知道其他中大同學是不是這樣。我只是想說明一點，到了絕食の後期，去聲援已經失去了

它的效用，人數太多，時間太長，人的精神容易鬆懈，而且在空間上，資訊上，廣場上的同學與那一群絕食的同学基本上脫離了。

不過，有一位老師曾經談過他對今次學運的看法。他覺得今次學生起來最主要是一種情緒上的宣洩——對時局不滿積累了太久、對自身的前途待遇不滿，甚至是生活空虛都是可能導致今次學運的原因。另外，對學運的結果，他分析了，不外有兩個：（一）學生勝利，政府真正作出讓步，而基於此，高層作出改革，國家走向光明一面；（二）政府採強硬態度，學生失敗。那時，我覺得他的看法太簡單，但現在看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慧眼」。³

五月二十日

今天是政府宣佈戒嚴的第一天，我和一名中大同學到

3 當時來天安門廣場聲援的學生真是來自五湖四海，各省都有，有的是老遠來自廣西美專的學生。據說當時不少地方去北京的火車可以是「免費的」，只要是聲援學生運動便可以，這好像叫「串連」。

閒談之間，許多來廣場的學生，好像並沒有甚麼強烈的政治理念或訴求。有來自美專的女大學生說她最喜歡香港的張國榮和廣東流行曲之類。天安門廣場晚上常常可見到有年青學生彈結他，唱情歌，更不要說後來有人在這兒行婚禮。「非常」時期的廣場有許多「奇觀」。一天下午我見到有樂隊（管樂隊？）在廣場中央演奏《國際歌》及《義勇軍進行曲》。

我後來反省，或許對年青人來說，政治理念太艱澀一點吧，政治社會也太複雜，但是他們追求自由與表達自我的心卻是純潔的。後來我在研究院讀了蘇俄文評家巴赫丁（Mikhail Bakhtin）的「狂歡」詩學與「嘉年華會」（carnavalesque）的文學比喻，大意是說「狂歡」的表達形式是唯一消解極權社會壓抑的文化手段，我便以此為鑑。

了天安門看看情況，最後決定分頭行事。我和一位朋友「跟車」到了豐台看軍隊進城的情況，我們乘坐的是工人的貨車，它是用來載人到市郊去堵截軍隊的。⁴豐台那邊大約有六十多輛軍車，每車均有不多於五十個軍人，軍人未有攜帶武器，似乎未有行動。我們和一個比較高級的軍人傾談，出奇的是，他很明白北京學運的原委，對我們的分析也聽進耳裏，但他就是說沒有辦法。可是，其他大部分的軍人真是不大清楚北京的情況。我曾經和兩三個軍人傾談過，他們來自保定，平日閱報比較少，看的是中央電視台的節目，其中一個軍人說北京城是發生暴亂，他很深信，我想從一個學生的立場去分析，說一個學生不可能有顛覆政府的動機，但他就是不相信。

有很多市民比我更辛苦，他們拿著傳單，讀著傳單，聲淚俱下地解釋學生們的純真動機，希望他們不要動手打學生，但是年青的軍人像是有軍令下達似的，不聽他們的說話，不看他們帶來的報紙。

當日在豐台，我們還聽到一個消息，就是中國外交部不承認以李鵬為首的偽政府。其實，自「五一九」以後，北京街頭流傳了很多消息，加上人們紛紛帶香港報章上來，形成資訊混亂。例如，當日我回到天安門，已有四個

4 我想早在戒嚴以前北京城市的公共交通已基本癱瘓。很多時候我都是徒步從天安門廣場來回大學（北師大）的宿舍。後來當聲援的人群日益壯大，就可以輕易地乘坐「順風車」到天安門廣場。這大概是政治動亂的「非常」現象。以前的北京很多是小馬路，非常好走。

消息在廣場流傳（不是透過廣播，而是人們的口訊，他們到處宣傳）：（一）外交部不承認李鵬偽政府；（二）萬里將回北京支持大學生；（三）進城的軍隊將會撤退；（四）空軍在晚上十時將到天安門，聲援大學生！

在「五·一七」前後的幾天，我們覺得報禁明顯鬆懈了。有很多官方報章開始報導廣場絕食學生情況、「五·一七」遊行的情況，表露了對學生的同情，暗示政府要順應民心。（見五月十八日的《經濟日報》和五月十九日的《北京青年報》。）《科技日報》更將李鵬與絕食代表的講話詳盡報導，使人明白到學生不肯讓步是因為政府明顯沒有正視學生的要求，這比起中央電視台對學生講話部分作頗多刪改來得公平，而其他的報章也出現了正確報導學潮的情況，使市民爭相搶購報紙。究竟是當時政府態度轉過來還是因為政府對報館管制鬆懈，以致記者們紛紛出來說真話？這仍是一個謎。



吳國坤同學（右三站立者）和羅志輝同學（左二半跪者）請北京市民和學生幫忙寫橫額

北京紀行之三

(10/5-31/5)

羅志輝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資訊工程系一年級
現職傳媒

五月十日 抵京 單車大遊行

出了火車站，似乎車站大樓上「北京站」三個字才可說服我：我抵達了北京！我還要以人民英雄紀念碑、天安門城樓及廣場來印證，當然還有各高校之學生。

一切也是突然，突然胡耀邦逝世，突然爆發學潮，突然自己決定上京，自己從來未真正遠行。這次竟毅然遠赴北京，而且是在這歷史時刻，我有點懼怕，在歷史的巨人面前，我沒有做一點微塵的資格，不懂得中國，不懂說普通話，卻成為中大赴京代表團之一員，在這洪流之下，支持這條船繼續前進的恐怕只有一丁點兒的自信與激情。

我們這只有數人的「代表團」乘計程車往北京師範大學，北高聯的所在地。車子向前駛，而我漸漸感覺到緊張和興奮：我遙遙望見前門的城樓，接著是毛主席紀念堂、人民大會堂，轉了個彎，出現了只會在電視、照片出現的

景象：廣闊的天安門廣場、高聳的紀念碑，還有高掛在城樓上的微笑。像看電影似的！霎時間我有一種想兩腳踏在廣場上，兩手擁抱著紀念碑的衝動。

抵達了目的地北師大，便找北高聯之所在地，不過這裏的同學都說北高聯搬了往北大，於是我們便去了北師大自治會之總部。在北師大所見之景象，也是在電視上見過的，所不同的是現在你可上前跟這些同學傾談交流。

找到了自治會總部，前來相迎的是幾位男同學，他們像忙著甚麼似的，原來今天將會舉行單車大遊行，以支持新聞工作者爭取新聞自由。這次遊行是自「五四」以來規模比較大的遊行。這時我真是高興，雖然我還不知道和北京高校學生在北京街道上踏著單車、喊著口號的樣子是怎麼樣的。



羅志輝：單車大遊行
(蔡淑芳提供)

一隊隊的遊行隊伍匯合，一起前往《人民日報》社及天安門廣場，各校各學系各有自己的旗幟，它們全是鮮紅色的，像一團烈火，鮮黃色的金光在火焰中迸發出各學系之名字；旗海和人潮交織著。我也參加了他們的行列。學生們高喊著口號，而我聽得最清楚的是「罷課！罷課！」回聲從兩旁的樓宇反射過來，震動著北京的街道，使得人民的心也產生了共振。學生們每人將布條綁在頭上，變成一支軍隊，一支人民的軍隊，他們用最善良的叫聲作為武器，向當權者發出挑戰。

我感到我和他們沒有甚麼分別，身邊的每一個學生彷彿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我們不時交談著，分享對學潮的看法及訴說自己的生活。他們不介意我那不大流利的普通話，熱烈地和我溝通。我在北京的第一次遊行就在叫喊和交談中度過。

五月十三日 絕食

各校絕食及聲援隊伍已在北師大的運動場上集合了。

絕食是由同學自發的。北高聯原本不希望絕食，認為此學會破壞戈爾巴喬夫訪華，以及將學生與北京政府之間漸趨緩和的矛盾再次激化。然而北高聯阻止不了同學，絕食隊伍向天安門廣場前進。

「絕食是我們最後的本錢！」一位學生向我說。其實這句說話跟「生命是我們最後的本錢！」沒有兩樣，今天學生就作出了這樣的抉擇，這像古時士人向皇上以死相諫

一樣，想不到同樣的事件會發生在今天。

我並不像學生們有這麼大的決心，這時，我只是認同他們，但我始終找不著理由為甚麼我要賠命，原因是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對中國沒有認識，沒有感情，沒有歸屬感。我只是覺得學生的要求合理，卻沒有甚麼情結。然而我將感到這情結越來越繃緊。

這一次不是單車遊行了，我們要徒步前往廣場，一路上，我向學生問著，為甚麼要罷課、絕食？他們說：「建國也整整四十年了，我們的國家還是這樣子！政府太專制了！人民沒有說話的機會。」每個學生都是這樣說，都是因為這理由而豁了出去。他們說他們的心情是痛苦的，但仍對政府存在一點兒希望。

不經不覺隊伍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有大批的市民觀看及拍手叫好，有的更伸出手來和我們握手。「人民的希望啊！」學生成了人民的先鋒。

我首次踏進這廣場。遼闊的廣場由一塊一塊的石板組成，四面皆建有國家的建築：南方，毛主席紀念堂；東邊，歷史博物館；西邊，人民大會堂；北面，天安門城樓。十數年前這裏發生了「四五天安門事件」，聽說人民的血跡需三天才洗淨，今天人民又在這裏聚集，聳立於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屬於人民及學生的。

他們坐下，開始絕食了。

五月十七日 大遊行

絕食了好幾天，我們幾個中大學生也聲援了好幾天，每天都拿著自製的旗幟，在廣場中左穿右插，每次也會帶來掌聲和問好，還有市民給的麵包和冰棍。我漸感到不安，這種不安從受寵若驚轉變為內疚，你怎能忘記正在絕食的學生，而咬著麵包、拿著冰棍呢？漸漸，我忘記了吃飯，每天花幾毛錢買汽水當飯吃。

每天如是聲援似乎沒甚麼意義。鍾劍修提了一個提議：跪請新華門，跪請是請求政府救人和答應學生要求，而不是求民主。此舉對於政府方面的影響可謂沒有，反為對香港可能可以起衝擊作用，引起更多人關注。更大程度上，這是我們全出於情感的呼喚。

我在決定是否一同跪請時是有點猶豫的，我從未想像自己是否可以長跪在新華門前面，日間忍受烈日，夜晚抵擋寒風，不吃不眠。我能忍受多久？我為何要忍受？最後在道德感的驅使下我決定了參加。

今天早上，我們準備好了寫上標語的紙板及布條，然後前往新華門。一路上，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遊行隊伍。到了新華門，大路和小街已充塞著人海及旗海，慢慢的擺動著。這是全民大遊行！

我們的計劃告吹了，因為我們的行動可能引起群眾注意，繼而發生混亂，衝擊新華門事件可能再次發生。然而，不用我們跪請，人民已走了出來，發出他們的要求：「救救學生！」遊行單位眾多，甚至連政府機構也來了。

人民的聲音在新華門前迴響著，領導人啊！您們聽到嗎？

五月二十日 戒嚴

昨晚中央電視台說學生停止了絕食，今早便往廣場看一看。今天可以直接接觸絕食學生了。前幾天因為絕食團指揮部要保護絕食學生，故不讓非絕食人士和絕食學生混在一起。

他們都在停泊廣場的巴士裏面，我找了幾個曾絕食的學生傾談。他們說政府已無希望，現在等待軍隊開進來。當他們看見自己的同學暈倒時，非常痛心，但自己堅持下去的決心更大。聽他們的說話很是感人！

下午，廣場的擴音器（政府的）突然宣佈戒嚴。另外，傳言今晚軍隊會開進來鎮壓，我躊躇了！心裏浮現一個問題：應否留下？這個是關乎生命之問題，其實問題應該是：我願意不願意留下跟學生們一起犧牲？這時我並沒有想：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我要留下來和祖國的學生一起。我始終不能合理化這前提，我只能說自己是香港人，而不能道德地說自己是中國人。結果我還是決定留下，原因是基於人道的立場，我認為學生提出合理要求，卻被強暴的政權威脅，為了表示我的不滿，我要留下來和學生一起，保護他們。這次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考慮自己生與死的問題。

於是，我獨個兒走上一輛巴士上，和學生一起，拿著防催淚彈的濕毛巾，蓋著學生們給我的被子，等待著那猛

獸的侵襲。一陣一陣的恐慌，把倦透的我一次又一次地驚醒。漫長的夜晚就此過去，沒有甚麼事發生。

五月二十七日 《新聞導報》

今天我開始和《新聞導報》的編輯們一起工作。

《新聞導報》是4.27遊行後第一份民辦刊物，主要是由北大的同學辦的。雖然他們不能印製出精美的刊物，但每期數頁的油印紙已打破了一向以來中共的新聞限制。其實自《導報》出版後，陸續有其他民間刊物冒起，而《導報》亦有和這些刊物合作。

成為《導報》的工作人員之後，我感到自己是在真正的參加學運。雖然我只是一個特約編輯，不會正式撰稿，但我也可以在選稿時提供一些意見，以及引進一些新的觀點。此外，我擔當了《導報》與香港及各地消息的渠道，和提供資源、資料及書刊的角色。在《導報》的工作比較靜態，不像北高聯和指揮部的行動型。《導報》作為發起深入討論，及理論提供者，自須冷靜思考，故此我跟《導報》幾位編輯有機會作多方面的思想交流。

《導報》那幾位編輯是比較沉靜而穩重的，然而當有一次我和一位編輯吃飯的時候，我問及他是否懼怕中共會因他辦報而算帳，他便說：「可以做到哪時候，就做到哪時候！」他竟已豁了出去，可見冷靜背後仍有激情澎湃。我很感動。

五月三十一日 告別

家人催促我回家了。

來了北京已二十多天了，雖然我沒有登上長城，遊覽紫禁城，但我卻的確感到，我正在北京，一個領導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我和毛主席的臉容是這麼近，在新華門前我和中共之權威又是這麼近，我更與我身邊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接近。

在這歷史的洪流下，我是有點被沖昏頭腦，我沒有想家！自古國與家不斷為人製造兩難，想不到我今天也置身其中。在電話筒中，聽到爸媽急切的聲音，也能想像得到他們是如何焦急，如何掛慮。

北京需要我的參與，我也希望能和北京的市民、學生、《導報》的編輯們戰鬥到底。然而父母的聲音也是不可拒絕的。結果我選擇了離開，是有點不由自主的，但在歷史下，許多事都像是命定。

我最後一次經過天安門廣場，我看到了剛豎立起的民主女神像，那麼多人圍著她啊！但是車不斷向前駛，我縱回頭也再看不到廣場，那廣場的最後畫面將永遠留在我心上。心在努力記下這畫面時，前面是通往北京站的路。

誰知民運會怎樣？誰知中國會怎樣？

北京紀行之四

(11/5-25/5)

陳仲強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中文系二年級
現從商

五月十一日

我是在五月十一日早上，乘火車抵達北京的。作為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代表，我來北京主要有三個目的：

（一）把學生會在香港籌得的四萬港元款項，交予北高聯，用以資助他們將來的活動；（二）向北高聯提議，在北京舉辦「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討論會，由京、港、台三地自治學生組織參與討論，議題主要圍繞中國民主化。我們所以會提出這一個建議，一方面覺得這討論會本身確十分有意義；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能提高北高聯在國內外之聲望，抗衡政府對他們的壓迫；（三）當時香港大眾（包括學界）對北高聯之立場仍然十分含糊，未有明確表示承認它的地位，學生會率先派團赴京與北高聯正式接觸，希望能夠對香港其他團體有所影響。

我首先到北京師範大學，會合早先到達的四位同學¹，從他們口中瞭解了一些當時北京的情況。自「五四」大遊行，北高聯宣佈復課後，除北大和師大之外，其他院校已分別復課了。運動究竟應如何持續下去呢？似乎沒有人能提出大家可以接納的方案。從師大的大字報可看出當時議論紛紜的情況，及普遍存在苦於找不到出路又不想就此了結的苦悶。

由於在幾天前，北高聯已把總部從師大移至北大去，所以我們下午便往北大，希望能與常委見面。

到達北大，找到了北高聯的所在地，接待我們的，是常委中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王超華。據她的介紹，當時北高聯已取消了主席制度，改由常委集體領導，只設秘書長負責主持會議、對外發言等等。但這只是行政職務，在權力關係上說，秘書長與其他常委是同等級的。當時的秘書長是政法大學的王志新。北高聯內部問題也著實不少，最基本的問題可說是各院校忽視團結，總是把自己院校的行動放在首位。北大同學便常常有學運老大哥的心態，對北高聯不夠重視，特別是比較起北高聯設於師大的時期，北大給予北高聯的支援便顯得不足了。由於院校不看重北高聯，有時會隨意指派代表來開常委會議，這對常委會議的效率自然有不好的影響。正式常委的質素，王超華也以

1 羅志輝、吳國坤及另兩人。

為未如理想，原本社科院在常委中是沒有席位的，為了提高常委的議事能力，所以加入社科院的代表。

王超華還指出，參與是次運動的同學，不一定都有搞組織的經驗，而且有很多都是積極於行動，比較忽視組織的鞏固工作，北高聯的會章及財務運作守則，也是很困難才草擬完畢，打算在明天常委會議討論。在這個運動相對沉靜的階段，應多放一些力量在組織建設的問題上。

由於政府不承認北高聯的地位，所以另外組織了對話團與政府對話。但這樣便出現了對話團與北高聯之間溝通不足的問題。對話團主要由各院校研究生組成，他們差不多每天都開會，卻很少向同學交代情況。

北高聯的財政狀況大致沒有甚麼問題，但對我們的捐款王超華當然表示歡迎，並預計會拿來用作購置影印機。我們提出要北高聯交出這四萬元的財政預算，才會把捐款移交他們。至於「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討論會，王超華也表示十分有興趣。只恐怕有太多技術困難，不容易成事。她邀請我們出席翌日的常委會議（其實我們其中一位先來的同學，已參加過他們先前的會議了），一方面可以就我們的建議與其他常委討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一看他們草擬的會章及財務運作守則。

與王超華見過面後，我們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看大字報及聽學生電台的廣播，有同學提出邀請戈爾巴喬夫到北大演講，也有同學不滿政府遲遲未答應同學的要求，提議把行動升級，到天安門集體絕食抗議，要求同學簽名支持。

五月十二日

我和兩位同學列席了北高聯的常委會議。會議原定是討論會章及財務運作守則的草案，但後來卻變成主要討論絕食問題。絕食行動是由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柴玲等人以私人名義發起的，其中除了吾爾開希外，沒有一個是當時常委的成員，據說在前一天的晚上，已有三千多同學簽名支持這個行動。吾爾開希本人並未有出席這次常委會議，卻派了一個代表來向大家解釋提出絕食的原因。

吾爾開希的代表對絕食的立場並不十分強硬，相反大部分常委都對絕食表示強烈反對。提出反對意見的出席者，主要有王超華、王志新（秘書長）、鄭旭光（北京航空學院代表）及一個北大國際關係系的同學（相信並非常委成員）。他們的論點主要有三點：（一）大部分同學（也包括大部分市民）對大規模的抗議行動已感厭倦，這麼多同學復課是一個證明，所以絕食抗議是脫離群眾的行動；（二）戈爾巴喬夫訪華是關係中國長遠發展的重要事件，大部分人民都希望這次訪問能順利進行，在此時絕食不適當，很難爭取人民支持；（三）自趙紫陽回國後，政府的態度已有明顯轉變，這反映中共高層派系力量的消長，在這時把行動升級，恐怕會讓強硬派找到藉口，重新掌握控制權。有一個常委甚至說，雖然他們應該與黨內任何政治派系劃清界線，但趙紫陽始終是溫和政策的代表，不希望他下台。那個國際關係系的學生，還建議北大與師大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復課，表示對戈氏的歡迎，這將

更有利運動的長遠發展。

吾爾開希派來的代表態度已漸漸改變，討論於是轉為如何制止翌日開始的絕食行動。也有常委表示對吾爾開希身為常委一分子，發起絕食前竟完全沒有和大家商量，這個問題必須嚴肅處理。

跟著柴玲走進會議室，與常委重新展開討論，情況比較前一回激烈得多了，由於我的普通話不大靈光，他們的激辯我聽得明白的沒有許多。場內火藥味漸漸濃了，我們隨王志新走出外面，與他談了一會有關捐款的問題，又告訴他我們希望能以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代表的身分加入對

2 當日在場的另一位中大同學普通話較好，他後來在一九九零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的《學聯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五月十二日那天……〉的文章，記錄了當時柴玲與王超華在會上的部分說話內容：

「柴玲很憤怒的責罵北高聯的決定是獨裁的。她說，北高聯只是一個協調的地方，它的決定連對各自治會都沒有約束力，怎麼敢禁止一般同學參與絕食。她又數說了一些對政府的不滿，諸如把對話一拖再拖，然後便批評北高聯並未做好帶領同學向政府進一步施壓的角色，亦正是由於北高聯的這種遲鈍和軟弱，才逼使他／她們另起爐灶，藉更激烈的行動來繼續這場民主運動。」

「常委們起初還有點抗辯，例如間中以一兩句『你們甚麼都安排好了才通知北高聯，北高聯能作協調嗎？』『你們根本是在製造另一個北高聯！』來打斷柴玲，但柴玲的聲音越說越響，……」

「王超華站了起來，……她說，她小學時唸的是北大附小，中學時唸的是北附中，大學時唸的是北大，她清晰的瞭解每個北大人的好勝心理，文革開始的時候，北大附小便是第一所帶頭造反的小學，這都是北大人優越情結的具體體現。王超華越說越亂，或許是她越說越快，乃至我的聽力開始無法跟上。她大致是說，她搞了那麼多年『革命』，蹉跎了那麼多年的歲月，到現在已是30多歲了，女兒都有了，她背負這樣大的負累來搞運動，為的真實真正為老百姓爭點民主，而不是再來檢閱一次北大人的優越質素。」

話團（這是在早一日的長途電話內，中大學生會方面要求我們這樣做的）。王志新本人表示贊同，還希望我們能帶一些新意見給對話團，但這事還是要由對話團來決定。

晚上，從師大方面得到消息，翌日的絕食請願行動如期進行。

五月十三日

我們分為三組，一位同學到政法大學參加對話團的會議，並向他們提出我們加入的要求。兩位同學跟隨師大隊伍，出發往天安門，觀察絕食行動。我和另一位同學到北大列席常委會議。

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常委接受了絕食行動，他們還發了一份聲明，表示由於政府遲遲未有答應與同學對話及否定「四二六社論」，北高聯常委諒解同學自發展開絕食請願行動的不滿情緒，為照顧絕食同學們的健康，北高聯會發動其他同學支援他們。

這天的常委會議終於是沒有開成，同學們都往天安門去了，常委也各自有工作。最後我也到了天安門，看着絕食行動正式開始。

五月十四日

昨天我們有一位女同學在天安門廣場上與其他人失散了，到半夜我們才收到消息，原來她出了事，進了醫院。她在廣場上爬到一輛三輪車上拍照，車子突然翻了，她跌

斷了一條腿，暫時不能走動。我們通知了她在香港的家人，派一個同學³在醫院陪著她，一個同學仍到政法大學參加對話團會議，我和另一個同學⁴則到師大及北大瞭解情況。

加入對話團的要求為對方拒絕，對此我們也並不堅持（這與香港方面的意見並不一致），這時北京的形勢與我們原來出發前的估計已有很大變化，對於絕食行動，我們在京的幾位同學都並不表示積極支持，這可能是受了十二日常委會議的影響。但如今絕食已開始了，如何回應這一個發展？沒有一個方案，就只有給形勢帶著走。

戈爾巴喬夫翌日早上便會抵達北京，按慣例中國政府會在天安門廣場接待重要外賓。各方面的消息都說，翌日凌晨軍警會到廣場趕散人群。北大、師大校園內滿是緊張的人群，大家都準備晚上到廣場去支援絕食同學，我們與幾個自治會的同學討論，都以為政府不會在戈爾巴喬夫訪華期間，製造不愉快事件，所以用暴力清場的可能性不大。

黃昏，北大的天空給淡紅的雲霞壓得很低。北大學生自治會為我們造了一面「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的旗幟，我們把旗幟捲起來，兩個人擠上了公共汽車，往廣場支援去了。

3 吳國坤。

4 羅志輝。

是否應該絕食？對這一個具體的策略問題，我們雖然未有肯定答案，但是絕食同學向政府提出的要求，我們是贊同的，他們的勇氣也實在教人感動，在今晚這一個關鍵時刻，我們選擇站到他們那一邊去。

到達廣場，天已黑齊。當我們舉著旗幟沿長安街走過去時，路上不斷有叫好的市民。走到同學當中，也引來小規模的騷動。跟著便不停有同學找我們簽名留念，問我們「為何來？」「如何來？」等種種問題。我們的支持，雖然對大局起不到甚麼影響（應說是全無影響），但對部分人來說，卻的確是鼓舞了精神。

到了凌晨時分，一些剛與政府高級官員（包括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北京市市長陳希同等）談判完畢的同學回到廣場。這一群同學代表包括有對話團、北高聯常委及絕食請願同學三方面的成員。他們對應該撤離廣場，還是堅持留下，各有自己的意見，於是廣場中便出現了激烈的爭論。一直到東方將白，吾爾開希以個人身份建議大家退向歷史博物館那一邊，留空近人民大會堂那一邊的半個廣場，給政府用以迎接戈爾巴喬夫。大家接受了他的建議，有秩序地移向東面，然而戈爾巴喬夫終於沒有來到廣場。

五月十五日

我們一直守在廣場上，由早上開始已不斷有市民來慰問學生，並帶來水、麵包、冰棍等等，絕食同學自然不會接受他們的食物，但廣場上還有一大群來支援的同學，他

們有的組織成龐大的糾察隊伍，日以繼夜地守護著他們的同學。市民送來的食物，他們是受之無愧的。倒是我們這幾個從香港來的，在盛情之下，也慚愧地接受了市民的好意。

救護車的號聲來了又去，去了又來，不斷有絕食同學暈倒，但支援的隊伍也隨著而擴大，有本地學生，也有外地學生，市民也開始組團來參加了。我遇到讓人攙扶著的，顯得十分疲弱的王超華（她沒有參加絕食，但卻一直為這次行動奔走），她也發現了我，於是勉力擠出一點笑容，對我說：「想不到形勢會這樣好的。」而我只希望她不要暈倒。

香港學聯的兩個代表也在十四日晚上來到北京，其中一個是我們中大的同學⁵。十五日晚，我帶他們到師大認識師大自治會的同學，當中一個學生領袖向我們說了他對形勢的見解。他認為現時政府高層各派系正處於僵持狀態，沒有人敢作決定，因為恐怕出了事要負責任。跟著又有消息傳來，說有大批市民想衝入人民大會堂，學生怕引起暴亂，所以派了糾察上前勸阻，不知道這事發展如何？

五月十六日

早上到中國銀行提取四萬港元，帶到廣場準備捐與北

⁵ 兩個代表是林耀強和吳國華，其中林耀強是我們中大的同學，吳國華是港大的。

高聯。到了廣場，找來王超華、鄭旭光，最後受款團體是北高聯與絕食請願團，款項將主要用以購置藥物。

下午發生了一個小誤會，我一個人¹在廣場上徘徊，從廣場學生的廣播中聽說有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往新華門遞請願信，我急往新華門打聽，待了很久還不見有中大的請願同學。打長途電話跟學生會聯絡，決定由我往新華門遞請願信，以免別人誤會我們說了不做。

請願信是我在廣場上臨時擬定的，主要是向政府提出三點要求：（一）盡快與同學對話，並現場直播整個過程；（二）肯定這次運動是學生的自發愛國行動；（三）保證事後不追究任何有關人士。信末還強調這是普遍香港人的願望，若政府接納以上要求，將對維持港人信心有很大作用。

新華門當時原來已有來自對話團的同學在請願，他們面朝大門，周圍半月形地坐了幾十個軍警，把上千群眾隔在外面。我可以在人群中擠過去，卻過不了軍警的警戒線，最後只好把信交與對話團的沈彤，由他代我交予國務院負責接信的代表。他把信轉交前，還在群眾的要求下把信朗讀了兩遍。市民的反應十分好，有人說香港人說話應該會有點分量的，也有人走過來向我表示感謝，還要我講幾句話。但我的舌頭卻像打了結般，一句話也說不出。

有一個帶點害羞的女孩子，向我借信的原稿去抄，我問她抄來幹甚麼？她說她來自天津的院校，帶著支援及學習的心情來這裏，她把看到的都盡可能記下來，帶回天

津，讓不能來的同學也可以知道這裏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於是我便讓她抄了。

五月十七日

通往廣場的交通多日來都陷於癱瘓，我們只有靠步行來往廣場與師大之間（約莫要走三個小時）。這天大清早，我很幸運地乘上公共汽車到達廣場，原意是要找回失散的同學（昨日整夜不知去向），遍尋不獲，想再乘公共汽車回去，車站上卻已站滿因久候而發愁的市民，我已料到汽車定是又停駛了。連日來積累的疲倦，使我沒法面對又要步行數小時回去的現實，只好頹然坐在地上，盼好運氣到來。

一輛三輪車駛近，人群一窩蜂擁上前，我也跟在人群中。騎車的是一個看來有六十多歲的老伯，他說頂多只能拉五個人。我正想離去，老伯卻令我不要走，並對其他人說，他必須要拉我這個大學生（我的風衣上有中大學生會五個字），還不收錢的。於是旁人紛紛說自己大清早出來，也是為了大學生，有送水來的，也有送麵包來的。最後我仍是老伯的五個乘客的其中一位，也是唯一不用付錢，更是坐得最於心不安的。

所有人竟然都已回到旅館，此時我們這個中大代表團共有六個人，一人住進醫院，另一個女的是昨夜剛從香港來照顧那住院同學的。現在除了在醫院那位同學外，全都聚在一起了。

廣場上絕食學生的情況越來越教人擔憂，學生暈倒的數字不停上升，有傳聞說已有同學死掉了，有幾個戲劇學院的同學開始連水也不喝。另一方面是全北京市都鼓動起來，今天下午舉行全市大遊行，現在大街上已不斷有揚起旗幟，載滿人的車子，呼嘯著往廣場去了。

我們這群香港學生，因無能而感到深沉的罪咎，於是便想要幹一點事，即使無影響於事態發展，也可以減輕自己內心的痛苦。於是有人提議到新華門門前跪下，請政府接納絕食同學的要求。下跪的原因主要倒不是要表示我們的謙卑，而是要讓肉體受一點苦，若政府堅持強硬立場，我們會一直跪著，不眠不食。

對這一個做法，香港方面的學生會表示反對，但我們卻一意孤行，一切準備就緒，便往新華門去了。

到了新華門，一群主要由北京科技學院學生組成的糾察隊，封鎖了新華門附近的地方。我們向負責糾察工作的一位老師說明來意。他不贊同我們的做法，他恐怕我們的行動會刺激起當時如流水般不斷經過新華門門前的遊行市民，若有人以暴力硬闖新華門，後果不堪設想。此外，為照顧廣場上的絕食同學，已使糾察及醫療人員疲於奔命，我們的行動會為他們帶來更大壓力。最重要一點，他指出這次絕食請願若以要求政府讓步為目標，可說是不可能達到的了（他強調這已是一個僵化了的政權）；但這次絕食的更有意義的目標，卻在於喚起國民，爭取民主，這個目標在今天全市以至全國各地的大遊行中，可說是已經實現

了，所以絕食應該可以終止。後來我們找到了王志新，他也用同樣的理由勸止我們，在場的X X X⁶也表示他也已經停止絕食，並相信其他同學不久也會停止了。於是我們決定再過兩天，看到時的情況再作打算。

五月十八日

下了一場很大很大的雨，但到廣場去的市民卻有增無減，電視也報告了全國各地的情況，還有各地、各界人士的急電，要求政府讓步。然而廣場上絕食學生繼續堅持下去，參加絕水行列的還陸續增加。我們決定翌日找學生領袖瞭解形勢，若事態沒有突破性發展，我們會後天按原定計劃到新華門。

五月十九日

下午，我和另一位同學到廣場，剛好來得及參加學生召開的新聞發佈會，會上宣佈結束絕食行動。消息發佈完畢後，有一個學生叫在場的記者晚上小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記者追問他說話的含意，但他卻不願再說了。此時我們又遇上了香港學聯的同學，他們對我們說，有一個新華社的工作人員來報信，說新華社已給軍隊接管，他是冒死走出來的，當天晚上政府將派軍隊入城，清理廣場，宣佈

6 另一位學生領袖。

戒嚴。北高聯、對話團、絕食請願團的學生領袖俱已不在廣場，可能是跑到秘密的地方開會去了。我們不知道香港記者是否知道這個消息，所以立刻跑到北京飯店找相熟記者查問，希望能進一步確定消息。

到了北京飯店，軍隊要入城的事似乎已人人皆知。我們四個人（兩個中大的加兩個學聯的）決定待到入夜後再往廣場，希望能在這次事件中，作一個見證。

入夜後，很多市民已得到消息，趕來支持學生。我們走上人民英雄紀念碑，這是學生的臨時指揮部。所有學生領袖差不多已全部回來，但會議仍是繼續，而且似乎出現很大爭論。我們找到X X X X X主席X X，他沒有參加會議，因為他認為現在開會已沒有用，軍隊隨時會闖進來，唯一辦法是發動同學及市民堵截軍隊，否則便只有坐以待斃。他說作為負責這次運動的其中一位領袖，他已作了坐牢的心理準備。他說話時含著煙，態度很從容。跟著傳來消息，軍隊已被市民自發擋住，希望學生能發動廣場上的民眾，到各處支援。

後來我們又遇上梁二（即梁擎墩）和程真，原來我們六個人打算往呼家樓看市民如何堵截軍車，但正要離開廣場時，梁二卻遇上他師大的老師劉曉波，劉曉波跟梁二談了一會，我沒能夠聽清楚他們的說話，只是梁二跟著便改變了主意，叫我們一起去當糾察，確保在這混亂時候，救護車的通道仍是暢通無阻。後來我問學聯的同學（他當時站得比較接近劉梁二人），原來劉對梁說絕食同學是他們

這群學生領袖帶來的，現在出了事，他們有責任首先保護絕食同學，不應隨便離去。

我們手牽著手，攔著馬路，不許人隨意橫過，還不斷呼籲路人加入這糾察線。我們見到有很多大貨車，原是載市民來廣場的，後來又在歡呼聲中奔向別處，我估計他們是得了消息，轉去各地堵截軍車。廣場上官方的廣播器不停播出李鵬和楊尚昆有關戒嚴的講話。另一方面，市民正奔走相告，進城的軍隊已被大量群眾弄得完全癱瘓，今夜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接近廣場。到了凌晨三時左右，我們也從糾察線上退下來，回到紀念碑上睡覺。

五月二十日

我們離開了紀念碑，學聯的兩位同學當天便要回香港，所以他們先要回旅店收拾行李，剩下我和另一位中大同學，便往呼家樓那邊看軍隊。

到了呼家樓，人群把道路擠得水洩不通，還團團地圍著軍車，跟車上的軍人談話。有幾輛車載著一些巨大的圓柱型物體，我始終猜不出那究竟是甚麼東西。回去的路上我多次留意賣報紙的地方，發現即日的報紙竟一張也沒有，問報販才知道並非賣光了，而是還未送來。前幾天報紙大多數都有同情學生的傾向。

這天，從香港又來了兩位中大同學⁷，於是我們的人數便增加至七個人⁸。每一個人都希望晚上可以到廣場去。於是這一個晚上我們便一起在廣場等候軍隊到來。

這一個晚上我們在一架停在廣場上的公共汽車中度過（這些公共汽車是由十八日開始便停在廣場上的，主要是為下雨時，給學生一個躲避的地方），車內還有一群在北京讀書的香港青年，我們在過去多日來都曾在廣場上見面，彼此已頗為熟悉，當夜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一樽水及一條毛巾，用來對付燃燒彈：先把毛巾弄濕，當燃燒彈在你身邊落下時，用濕毛巾把它拾起，然後立即倒水，它便會失卻作用。這是一個香港學生教我們的，我們還要演習一次呢！

大概每隔一小時便傳來一次軍隊來了的消息，一聽到消息，大家馬上戴上口罩，弄濕毛巾，屏息等待，跟著才知道又是一場虛驚。當時我倒真的寧願軍隊早一點來就好了！

五月二十一日

上午，軍隊整夜都沒有來，但各種傳聞卻滿佈廣場。最駭人聽聞的說法，是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軍隊支持，兩派的軍隊正從不同地方火速趕來北京，北京將會成為戰

7 尹彥超和廖雪雲。

8 留院同學不計算在內。



場。

我們聯繫上外高聯的同學，他們的指揮部設在歷史博物館門前。從他們口中得知外地來京支援的學生數目龐大，但受到的接濟卻最少，來自外地及北京各界人士的捐款多集中在北京學生手上，分配資源時總是外地學生吃虧。於是我們便把一部分從香港帶來的捐款交給了他們。臨走時那位外高聯的主席，叮囑我通知香港，政府有可能會用軍隊全面封鎖廣場，不讓任何人及物資進出，廣場學生可能需要國際空援救助。我答應他我一定會把他的說話轉告香港。

我留意到廣場上開始出現支持趙紫陽的橫額，和戒嚴之前情況並不一樣，我還記得大約是十五、十六日左右，廣場附近一條行人隧道中貼滿「等小平、找紫陽」的標語，還有十七日晚上一條很矚目的橫額，寫著要鄧（小平）、趙（紫陽）、李（鵬）、胡（啟立）、姚（依林）、喬（石）總辭。我可以說，在戒嚴前運動並不見有明顯支持趙派打擊李鵬的跡象，但在宣佈戒嚴後，情況卻變了。

由於受傳聞的影響，大家都感到廣場上危機四伏，為整體安全著想，大家同意先回到旅館去。回到旅館時，已近傍晚，電視正轉播新聞，報導員宣佈李鵬已下了三道命令：（一）軍隊必須在明日凌晨開進廣場；（二）北京所有監獄準備大量空位安置犯人；（三）安排清潔工人於明日五時清理廣場。我和另一位同學立即再奔向廣場。

五月二十二日

昨夜又是一場虛驚，但對於我分別並不大，因為大部分時間我都已陷入半昏迷狀態，而且我沒有走進學生群中，只是在旁觀察。後來別人告訴我，吾爾開希因為要求大家撤離，給罷免了北高聯常委的職位，反對撤離最激烈的是王丹，他還帶頭宣誓寧死也不撤。

下午，我們往北京飯店找昨夜到達的中大同學和另外一些來自香港的朋友。他們告訴我，香港有一百萬人遊行的消息，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捐款。

晚上，我和三位朋友（並非學生）⁹參加「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與會人士包括包遵信、嚴家祺、王丹、陳子明，還有來自「工自聯」、「首都鋼鐵廠」、「市民自治會」、「外高聯」的代表，另外還有一些青年教師。會上嚴家祺及另外幾個人都強調運動已進入一個新階段，這已不單是學生的運動，而是全民運動，所以應該要組織各界聯席會議來領導運動。王丹對此並沒有多大意見。問到工人的情況，來自「工自聯」及「首鋼」的代表都強調工人並不容易組織起來，若要搞大罷工恐怕不可行。

為了方便以後與廣場及香港聯繫，我們在北京飯店¹⁰租了一個房間。那夜終於有一個安穩的地方睡覺了。

9 這三人現在我能確定的只有當時是香港浸會學院講師的丘延亮，其他兩人則是當時已畢業的中大校友。

10 這個房間成為了中大同學在京的基地，用來開會、擺放行李、洗澡等。晚上同學如不在廣場上過夜，便會橫七豎八地睡在房間各處。

五月二十三日

因我的普通話不大好，所以找了另一個同學代我出席上午的各界聯席會議。我一個人走到紀念碑去，剛好碰到學生召開新聞發佈會。先有柴玲宣佈廣場即日開始由一個叫「廣場指揮部」的新組織負責指揮，它的常委成員包括柴玲（總指揮）、封從德、王丹及王超華等人。跟著王超華站出來對記者們說，當日的較早時間，在廣場學生的廣播中，曾讀出一篇文章，以惡毒字眼攻擊某些領導人。王超華認為這次運動應盡可能保持其純潔性，不希望出現直接捲入高層政治鬥爭，那篇文章卻很容易使人誤會學生在支持政府高層某一派打擊別一派，所以她曾要求新成立的指揮部常委討論此事，可是卻遲遲未見答覆。現在她宣佈退出指揮部常委，表示抗議。有記者叫她評論學運的發展，她說她自己也一度為民眾的熱情而感到高興，但絕食期間，運動的宣傳重點卻大量放在喚起民眾的同情心上，而相對地忽視了民主教育。另外，她又表示一些規模較小，相對地能獨立運作，少受其他勢力干擾的學生團體，例如《新聞導報》，或許更能發揮積極作用。她本人也很希望能參與《導報》的工作。

下午，我們參加了知識界發起的大遊行。有不少院校的遊行隊伍一邊遊行一邊唱著自己編寫的諷刺歌曲，我們有些同學也學著唱。可惜遊行到中途忽然刮起大風雨，然而仍有不少人堅持下去。

晚上，我們商量設立物資站的事宜。產生這個構思的

原因，主要是感到北京當時的形勢極為複雜，如要使香港的大量捐款可以適當地運用，最理想是有一些比較熟悉當時北京情況，並能長期留駐的人負責統籌，而我們正有這條件。而且我們的大學生身份，比較容易取信於香港公眾，使他們把捐款交予我們處理，惹來較少爭議。所以我們便與香港方面的學生會聯絡，成立物資站，歡迎各界人士把捐款交予我們。

上午曾參加各界聯席會議的同學向大家報告情況。這次會議不見了王丹，由柴玲代表「廣場指揮部」出席。柴玲在會上發言踴躍，強調學生在整個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這似乎是扭轉昨晚會議說運動已進入全民階段的調子。在這次會議裏，柴玲還爭取其他各界人士承諾她們指揮部是學運的主要代表組織，各界人士若要聯絡學生，將首先聯絡指揮部。

五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這兩天所發生的事情之次序已記不清楚。我曾經接待過一些帶捐款來的香港人，其餘時間主要是我們自己開會。我們曾經討論對學生應該留還是撤的看法，當時的結論大致上是傾向要留下來的，但廣場的情況必須要有一番整頓，有人提過搞「民主大學」的想法（這個想法是否別有根源不得而知）。我們之間也作了比較仔細的分工，指揮部、北高聯、外高聯、《新聞導報》，及幾間主要院校的自治會都分別有同學負責跟進。另一些同學到廣場中瞭

解一般同學的情況，並與他們討論各種問題，以增加彼此的瞭解。每天我們還會購買大量的香港《文匯報》及影印從香港帶來的報紙，拿到廣場四周張貼。

我們當時的角色可說是十分微妙的，我們擁有過百萬的捐款，這使到北京的各股力量皆想聯絡我們，對我們的意見，自然也會尊重；而他們之間（特別是指揮部、北高聯及外高聯）又存有不少矛盾。但是，我們與他們都分別保持著良好關係，這種處境，使我們有潛力發揮很大的影響，這是我們必須要提防的引誘。雖然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的民主運動也應有我們的參與，但跟內地人相比，我們始終是站在一個特殊地位。我們有香港可以退，但他們卻是退無可退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對運動有太大的影響。

北京紀行之五

(19/5-27/5)

尹彥超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社會學系三年級
現從事企業對外事務

五月十九日

我們於四時半左右出機場，立即感到北京的乾燥氣候。在機場附近行駛的車輛不時都有支持學生的字句或橫額放在車身上，使我以為全個北京市都會如此。但從機場到民航局的路途上，都不見遊行隊伍、人群聚集，一切就像平日一樣。

我們打算先往北京師範大學附近，會合中大的同學。由西四到新街口，沿路所見的一些商店和民居，都掛有支持學生、聲討領導人的旗幟和標語。路邊不時有一群群的人圍著電燈柱張望，原來是在閱讀或抄寫一些油印單張；為防止其他人撕去或據為己有，一些單張被人書上「有良心的中國人不要撕走」。

黃昏時分抵達北京師範大學，當時只有一堆堆的人群

圍著聽人演講。我們沒有久留，只是為了去找中大同學的大本營。至晚上，終於找到他們，但只得兩人，其餘則在天安門廣場。晚上九時十五分左右，從北京電視台的新聞報導中，得悉學生絕食請願團在九時宣佈停止絕食，此消息乃以「緊急消息」作字幕打出，報導員並沒有講述。接著一會，一位香港記者從北京飯店搖電話通知我們戒嚴的消息，謂軍隊會入城武力鎮壓，並迫使趙紫陽下台。整晚的氣氛異常緊張，但當局卻未有透過傳媒正式宣佈戒嚴。

五月二十日

早上得悉全市交通癱瘓，公車停駛，地鐵站被封，上午十時左右，我們進入北師大校園，從學生口中得知凌晨三時左右全廣場二十萬學生宣佈重新絕食；並謂首鋼和開源煤礦的工人罷工。不久，一些學生從廣場趕回校園，說廣場將會斷水和電，要人捐水和協助送水。一時間，一大堆膠瓶和保暖壺被齊集送去。

中午從北京電台的廣播中得知李鵬於上午十時宣佈北京市戒嚴，並下達三條戒嚴通知（詳見五月二十一日的報章）。

下午已獲悉有市民前去堵截軍隊，又傳聞李鵬、楊尚昆和王震組織偽政府，圖控制大局。北師大亦加強戒備，一列由同學組成的糾察線，要查看進出者的證件方放行。

黃昏時分，我們一行六人由北師大步行往天安門，途中的標語旗幟竟較早一天為少。不過，沿途亦見不少學生

在作宣傳，呼籲市民捐水，以及當晚到天安門廣場保衛學生，因為有消息說當晚軍隊會大舉進入廣場，並可能有空降部隊降落廣場驅散學生。因此，在西單附近，已有大堆人群聚集；我們並見過有一列超過三十部的電單車隊駛過，大家都舉起「V」字手勢相向。我們沿西長安街步行往廣場一路上都有不少人，在新華門前更有許多人圍觀，那兒政法大學的學生和教師在靜坐和絕食，門口則有一排士兵正打坐，形成一道屏障。

這是戒嚴的首日，當局明令記者們不可攝影，但拍照的人多得很，又無人干涉。不過，沿途所見，那些反對標語則較早一日疏落，而指揮交通的則是學生，秩序尚算良好。

我們沿隧道進入廣場。場內人數比我想像中少，但仍舊有旗海飄揚之勢。我們走到一輛擋風車頭玻璃掛著「留京港澳同學」的布額的旅遊車前，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輛車本屬北師大的X X X X X學生所佔用，但騰了一些地方



留京港澳同學的旅遊車

(蔡淑芳提供)

給香港學生。

車內的香港人幾乎全都是在北京讀書的學生，以中央美術學院的居多，其中一個卻是從XX大學來的，他是在那兒讀哲學的自費進修生，好像是沒有文憑的；他本身乃匯點成員，時常都掛著馬列主義的名詞在咀邊，儼如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到北京本是公幹，適逢學潮，便加入了港澳生的行列。他無論從外型以至言行都表現得較反叛和激進。當晚他站在旅遊車頂，不時大叫「打倒李鵬」，喊得聲也沙了。

我們爬到車頂，整個廣場都是紅旗飄揚，人民英雄紀念碑被一些黃燈照得金黃閃耀。（這些燈在入夜後不見了，而以後的日子再也看不到。）我們在車頂上與其他港澳生討論萬一遇上軍隊進來時的應付方法。聽說當時的內地大學生會以一個個四方陣形式撤退。而熟悉廣場情況的留京港生則建議我們若要逃走的話，則應從廣場的東南角逃走，因為若從北京飯店的東長安街一直走，會經過建國門的使館區，中國官方肯定不會讓外國使節看到如斯場面。而西長安街及前門則接近新華門和人民大會堂，聞說裏面埋有重兵，所以會更危險。其實我們估計軍隊若真的進來，其主要目的是驅散學生，因此應會留有一個缺口讓人走，若有傷亡的話頂多是因人群互相踐踏。不過，我們最終都以「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原則靜坐，盡量避免逃走，因情況肯定十分混亂。所以，我們整夜都靜待著軍隊來拖走我們，我們掛上口罩，手拿濕毛巾，預備迎接催

淚彈的降臨。

整個晚上我們六人大部分時間都留在旅遊車上，因為連日的疲累，大部分人都在睡覺，坐在我隔鄰的是一位XX研究所的碩士生，攻讀中共黨史。他說要親身參與和見證這場運動；以往所讀的黨史都是印在平版鉛黑字中，現在是一場真真正正的動態歷史。他說要收集所有傳單、印刷品、大字報等，待將來為這場運動下一個歷史評判，我問他為何如此膽壯地在等死，不怕家庭嗎？他說他已有妻室，但這也沒辦法。

五月二十一日

凌晨時分，廣場的氣氛只是數度出現緊張，通過廣播叫學生小心戒備，但一些學生還是不大理睬。這裏有個有趣的現象，就是廣場中有兩個廣播站，一個是北高聯的，另一個是絕食請願團的，它們有時會播放互相矛盾的訊息。例如有一次有一輛救傷車駛入廣場，其中一方說這不是救傷站的，叫人小心戒備，但另一方卻說這是他們所有，不要阻擋。

其實廣場的氣氛一點也不緊張，一些外校來的學生還組隊獻唱，有《我的祖國》、《國際歌》、《血染的風采》等，一些同學躺在地上談天、睡覺。我曾經數次下車巡察，只見周圍堆滿很多垃圾；接近紀念碑的一條救傷車通道則維持得較有秩序，當有車要進出時，糾察會揮舞紅旗，把站在通道中的人趕開去。而紀念碑的糾察線依然很

嚴密，不許普通學生進入，只讓有特別通行證的人士才能進入。

經過一夜的煎熬，至凌晨五時左右，廣場的燈熄滅，曾引起一陣恐慌，但直至天亮，亦沒有甚麼事發生，至早上七時許，我們步出廣場，到天安門城樓東面的一個洗手間，天空中突然飛來六架軍用直升機，它們都是迷彩機身，在廣場上空盤旋了數個圈後便離去；這時，本來在天安門城樓旁駐紮的市民敢死隊，便衝向直升機下面，拋擲塑膠汽水瓶，又揮動旗幟，高呼「保護學生」，直至直升機離去。

我們從港澳留京學生口中，得悉廣場中的外省學生境況淒涼，他們大多沒有帶備充足錢財和物資，一些甚至只帶數塊錢前來。他們本來聽說香港學聯帶了十多萬港幣前來，但卻沒有給北高聯便離開北京，¹所以廣場的經營很苦。北高聯被學生指責，以為他們侵吞了那十多萬。因此他們呼籲我們盡量援助那些外省學生，而北京本地學生則一向有支持，所以問題不大，於是我們把帶來的一萬元送去作購買食物和其他物資之用。

上午，我們沿前門，由崇文門大街往崇文門方向前去，沿途行人頗多，直至崇文門地鐵站附近，有多輛公共汽車被橫放在馬路上，阻塞住馬路，聽說是用以堵軍車，

¹ 學聯代表林耀強事後指並無其事。

而在東單大街到東四大街的十字路口，都有同樣情況出現。

我們到民航處買機票，人雖然不算多，但都是有感局勢混亂而希望盡快離去。

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回到廣場，聽說現時有政變，李鵬欲打倒趙紫陽上台。X X說當晚肯定鎮壓，叫我們為了不要牽涉入政治鬥爭中而應該離去，他與X則會待在廣場。我自己在一種疲倦狀態下，兼且資訊掌握和討論不足，便答應回去。

抵達北師大，校門外氣氛緊張，他們廣播說李鵬發表三項決議：（一）要求學生立即離開廣場，最遲明天早上五時開始鎮壓，為了保持中國穩定局面二十年，死二十萬人也值得；（二）宣佈明天環衛工人照常上班，負責打掃廣場；（三）清河監獄已全部騰空，準備接收犯人。

於是他們通過廣播呼籲人們到廣場保護學生，又不停播放國歌和《國際歌》。但晚上北京中央電台則否認這項傳聞，說有人存心造謠。收音機又訪問了一些單位，說學生阻塞交通替他們造成不便和損失，例如一間牛奶公司的發言人，說因為交通阻塞和癱瘓，早上不能送牛奶予兒童、老人和病人，對他們健康造成影響。

五月二十二日

我們聽說軍隊已進駐火車站，於是我與X、X X從北師大步行出去，沿途氣氛頗平靜。順帶一提，就是交通癱

癩的這數天，我們很多時都要靠三輪木板車代步。普通學生通常都靠貨車，他們只要舉起「V」字手勢，截停車輛便能上去。但自戒嚴後，官方態度轉趨強硬，市民間亦開始有點恐懼，肯免費接送學生的人少了。但是，我們還不時看到裝滿人、車頂插上紅旗的宣傳貨車在大街上駛來駛去。

我們到了火車站，沒有入站台，只是在外面巡察，卻看不到有軍隊，後來聽說他們全都在站台內，是四川來的，被學生勸服不出來的，又傳聞被封閉的地鐵站下，已駐滿軍隊，但我們卻進不了去。

我們從一個北京外語學院的XX學生口中得知他有六十多個同學在六里橋被防暴警察打傷，他趕往去看同學的傷勢。

下午我們在北京火車站附近看到上空有一架民用直升機在散發傳單，聽說是官方的言論傳單。

晚上我們在北京飯店與新一批到京中大同學會合，他們帶來了金錢及對講機，準備送給廣場上的學生，他們並廣開網絡，聯絡多方面不同人士。

五月二十三日

昨晚我們知道一個消息，謂知識分子欲將學生在這次運動中的成就貶低，謂現在乃全民運動時期，藉此剝奪他們的成果，更謂此乃因趙紫陽背後的支持。而今日官方說趙紫陽照常上班，因此否定了下台的傳聞。我們為了不讓

學生成果受到吞噬，於是在今日的市內大遊行中打出支持學生的旗號。

我們以紅布黑字的橫額站出來，大喊「支持北京學生」的口號，一路受到兩旁群眾的熱烈支持，紛紛說「謝謝你們！」接著我們遇上一支以知識分子、「社科院」的人士組成的遊行隊伍，又有許多不同單位的隊伍，他們大都高呼「打倒李鵬」。我們從長安街的東面向西走，到西單又再掉頭走，向天安門廣場進發，當我們遊行至人民大會堂側時，天空突然變色，變得昏黃，並刮起大風，把廣場的垃圾和泥塵吹得漫天飛舞，大風沙一直持續了五至十分鐘，當我們轉入前門西大街時，便開始下雨，在轉入北新華街、到西長安街時，雨勢越下越大，到西單時，我們的橫額已面目全非，只有放棄。遊行途中，曾有錄映，但不知是甚麼單位的。

這時市面已有部分電車開始行走，使交通得以疏導。晚上我們更曾乘搭一輛不走畢全程的公車。

今晚又有傳言說會空出北京一些醫院，以待鎮壓後安置人群。

五月二十四日

昨夜的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再次顯示學生的主導能力，他們並沒有像我們所預想的，反而成立了以學生請願絕食團為領導的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今天上午十時便是總指揮部成立的宣誓；他們宣佈佔領天安門廣場，希

望重新組織起學生，他們認為現時轉化為政治運動乃不可避免，但並非以倒李樹趙為運動最終目的。

下午廣場總指揮上來我們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與我們討論學生的狀況，又為了買帳篷之事，請求協助。

黃昏時分，我們部分同學拿了一些香港報紙，到街上張貼。我和X本想去影印更多，但無奈五時過後很多商店都關門，找不到可供影印的地方。

晚上與今日抵京的中大醫學院同學吃晚飯，他們帶了一批金錢上來，於是X X希望能說服他們，將錢託付給我們處理。

五月二十五日

下午，我和幾個同學到歷史博物館門口，希望與外高聯的常委傾談，作為我們多個介入點的其中一個。因為這本是X負責的，但他將離去，所以找廖雪雲代替，要她與外高聯打交道。

下午的王府井大街有遊行隊伍，是X X醫院的醫護人員，但人數不多，因此不能形成聲勢。

五月二十六日

中午，我與X X X到北京大學，找《新聞導報》的總部，把一批雜誌與香港報章交給他們。他們是在某座宿舍的其中一間房，房門貼上白紙，明示這是《新聞導報》的基地。內面的人正在下棋，見我們來了，便攔下與我們談

了一會，我們要求他們列出一個所需物資的清單，以幫助他們的印刷。

在我們離開時，更看見在一樓的樓梯口擺放書桌販賣《導報》，售價一元。

晚上，我與兩個將在明天離京的同學到天安門度過最後一夜，廣場氣氛散漫，但在紀念碑的西面，有一個北高聯演講團在演說，大多環繞時政而論，有不少學生圍著一個人，聽他們演講。

凌晨二時廣播說有一個白衣綠褲的便衣混入廣場，叫同學小心戒備，我心想這可能又是維持廣場氣氛的技倆，但這段說話播出後，廣場上的學生依然故我，並無緊張，可能因為鎮壓的消息已令他們麻木。

廣場周圍很平靜，只有一些販賣熟食、汽水、西瓜的單車，西長安街更是無人聚集，行人稀疏，若軍隊此時出現，相信學生肯定招架不住。

五月二十七日

下午在北京飯店碰上X X、X X和一個外高聯的工作人員，他們正為購買食物之事憂心，因為今天上午外高聯所分得的物資甚少，甚至出現四人分一個饅頭的情況，所以急需金錢購食物應急。但我們要先與廣場總指揮部取得聯繫，知會他們購食物之事，不致因不知會而多購。但在北京飯店找不到X X，只有到廣場紀念碑找柴玲，但她那時被大批記者團團圍住，我們好不容易才與她取得接觸，

她後來找來財政部與我們談，不過身邊的外高聯工作人員卻常催逼著要去買食物。

這時在紀念碑我們遇到X、X、X，他們本來收集了一些廣場中學生對指揮部的意見，但卻得不到他們接收，於是他們嚷著要去指揮部找常委設訴，那些通傳的人咀臉實在令人討厭，令我對他們印象轉壞。

接著我便與那外高聯人員到前門兩間商店買麵包，我們幾乎把那兩間商店全部麵包都買下，然後用三輪木板車送回廣場外高聯物資收集站。這個站接近馬路，正對著歷史博物館。那人員後來帶我到歷史博物館門口附近一個花園裏的帳幕，介紹了一些外高聯人士給我，但我也不知道他們幹甚麼，只覺其中一個像大專學生似的，在抽著煙，指揮著別人似的。

晚上與X離開北京，到火車站去時，感到有點兒異樣，因為那晚頗熱，火車玻璃卻緊關上，原來這是防止那些離京學生爬窗上來，聽說前晚有人為了上車而打碎玻璃窗，前些時車站更為了疏導學生，未等旅客上車便已放學生上車，他們把硬臥、硬座車廂塞得滿滿的，甚至行李架也坐了人。我們上了車後約十五分鐘，便見大群學生湧入站台，車站只讓他們進硬座車廂，臥鋪是不容許的，但仍有一些混了入來，經過四十五分鐘的延誤，車才開出。其中，武漢、長沙最多學生下車。

北京紀行之六

(19/5-31/5)

一中大同學¹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到達北京，五月三十一日下午離開，六月二日抵港。此行帶備旅行支票外匯券陸仟陸佰伍拾圓，其中包括（一）學生事務處捐出港幣三仟圓及聯合書院學生會捐出港幣壹仟圓，原意是捐給X X，後來轉作中大同學赴京團行政費用；（二）中大學生會捐出壹萬圓港幣給北京學生，後來在五月二十日捐了給外高聯——經手人是X X X。

直接接觸「外高聯」（即「外地高校自治會聯合會」；所謂「外地」乃相對於北京而言）的期間是五月二十六日至五月三十一日。實際上我於五月二十九日已沒有去開會，只是工作。五月三十日擬好辭職信，五月三十一日向他們介紹另一位同學。原本希望這位同學代我的位置，可是據他說，他後來也沒有跟進。

「外高聯」權力架構有新舊之分，我跟進的是新的

¹ 本文作者不具名。

「外高聯」架構中的常委會及執行常委會。本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交代權力架構改組之前的情況，第二部分交代改組之後的情況，第三部分是就我那幾天接觸的「外高聯」作一些批評及建議，並且談談一些從中想到的香港同學要注意的事。第一、二部分將從簡，因為第一部分的資料是二手的，而第二部分中原有太多瑣碎的會議內容。

(一) 舊「外高聯」

我所知關於舊「外高聯」的架構資料來自當時X X X、X X X、X X三位同學的一次匯報（約在五月二十三日晚北京飯店）及A於五月二十五日來訪北京飯店時所說的資料。

「外高聯」是一個由北京以外省市來到北京的學生組成的臨時學生組織，成立日期我不清楚，當初由幾個「在學運初期起過重大作用的外地同學發起組成常委會」（據A說），他們包括A、B、C、D。聽說A參加過絕食。A理解指揮部乃代表北京市高校，而當時各地高校學生在北京成立的高校自治聯會，它的責任是在於保證在京外地同學的發言權，而成立原則是在改革體制，非為推翻某一個人，學生只是作為先鋒，起的是蒙醒作用。

據X X X等說，「外高聯」財政緊張，經費只靠各地同學帶來，聯繫工作有問題，宣傳方面則缺乏物資，例如擴音器。A說，他們的立場是利用現有成果喚起民主意識，把民主意識擴散到各省和城市，長遠來說並不

限於北京。他們想搞全國學聯，並在各地成立分中心，但礙於實際問題太多，所以只是把這個目標放在腦內，不提在日程內。另外，A說他們打算寫倡議書，要求政府取消戒嚴令。他們又說，他們有三十萬人作後援，可以採用換班制，利用同學陸續來回北京，把運動的訊息帶回家鄉各地。

另外，他們面對的問題是（一）每校是否均有代表在京；（二）與廣場總指揮部的關係。

A來訪時說，他們希望我們幫助「外高聯」成立學運資料庫，把有綱領性的文件整理給他們。當時是否答應過我倒忘了，反而後來應允他們假如他們要留下，我們可以供應資源（不過，當時我們在實際行動上有整合他們進指揮部，統一處理資源分配的傾向）；若他們離開，則供應路費，這是中大同學在北京飯店開會通過的決定。而在五月二十三日大遊行回程時，我答應了太原某大學自治會外聯部的一位同學，我們香港可作為日後的全國性學聯的聯絡者。

回頭說「外高聯」的組織，A說常委會有組織部、指揮部、聯絡部、財務部、糾察部，以及急需成立衛生部。

（二）新「外高聯」

五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期間，我參與過新「外高聯」的兩次執委會，五次常委會，其中有兩次是補聽與會者的覆述。以下是各次具體時間：

- 常委會： 26/5 1:30pm開始
 26/5 11:00pm~11:30pm開始
 27/5 10:00pm（補聽）
 28/5 10:00am（補聽）
 28/5 7:40pm開始
- 執委會： 26/5 4:30pm開始
 28/5 10:05pm開始

會議多在歷史博物館外「外高聯」總部附近舉行，最初一次乃通過廣場上播音宣傳召集。

期間，我也有協助「整頓」廣場，其中一個目的是令物資供應集中在廣場上。廣場上共有三個物資站，至我走時，還未把留在廣場上的一個「外高聯」物資站弄走。

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我在中大同學的會議上，答應了跟進「外高聯」。當時並沒有在意「參與」與「跟進」有分別，所以也就不加思索地接受了「外高聯」的邀請，加入了「外高聯」常委會。加入之後，我在中大同學間匯報時，他們也沒有在意我的加入會否有問題，例如五月二十五日下午XX與我出席第一次新「外高聯」常委會。他們把全國（包括北京）分成八區，各區常委互選一人作為執委會成員。後來他們特地加一區叫「港澳區」，因為我是「港澳區」唯一的「代表」，故又很快入了執委會。（澳門「東亞大學」其實亦有一人赴京，但至今仍未與他聯絡上。）執委會分秘書部、宣傳部、組織聯絡部、糾察

部、群眾部、後勤部、機動部。而組織聯絡部，我熟習之後才理解那是指指揮部；「港澳區代表」（即我）及東北區代表同任後勤部。

五月二十七日，我和東北代表落實後勤部的工作，經過幾番折騰，終於設立了（一）聯絡部、（二）財政部、（三）供應站。其中聯絡部負責爭取外援；供應站主要負責實際分發食物工作。

我在「外高聯」發食物／物資時仍按赴京團協議，有需要時開條子申請金錢，X X、X X X和X X批錢給我，然後由我陪同負責同學去買。曾有兩三次我的「拍檔」東北同學情急下覺得物資不夠，或想取錢，而我又不在廣場的話，他便會到北京飯店找我。

（三）對「外高聯」的批評及建議

1. 如何理解這組織

1.1 其架構悉如上述。「外高聯」在短時間內成立，能有如此架構已屬不錯。他們討論架構用了半個至個多小時，其時我提出要有監察組織（即代表會或評議會之類），當時他們似乎覺得臨時組織不必有這種機構。但我覺得，有這個，同學才有罷免及監察的權力，否則，只會製造歷史包袱——新的獨裁者。

到五月二十八日執委會會議時，D出來成立監察處，那就和一黨專政無甚分別。因為身兼執委及監察員，就好比當學生會幹事，又做代表會成員一樣尷尬和不佳。

「外高聯」還缺乏另一監察機構——傳媒。

他們和「北高聯」不同，較遲才興起和組成。絕食以後，《新聞導報》從「北高聯」分離了出來，有著監察學運的潛能。雖然《新聞導報》與「北高聯」相互獨立，但它對學運多少有宣傳的作用。

我覺得「外高聯」的組織就和中共的國家組織類似，同樣有類似全國人大（赴京同學）、全國人大常委（常委會）、國務院（執委會）等的機構，不知是否潛移默化不自覺地有樣學樣。而從他們的侵佔廣播站的行為，可見他們的民主意識中有「我執政為民主，你執政則不民主」的傾向。從另一角度看，則有民主爭不來就搞暴力革命的傾向。（這是我在去年²十二月三十日晚與一位以難民身份途經香港到澳洲的「外高聯」同學傾談之後，對當時情況進一步瞭解後的想法。）

1.2 他們與廣場指揮部有較多接觸、聯繫，我想他們連《新聞導報》的存在也不知道，因為從來沒聽他們提過。

對指揮部、「北高聯」，他們基本上是將之看成一個組織的，應付這兩個組織的調子相似，均是對抗為主。他們口頭上稱與他們協調，實際上卻常用陰謀分析法考慮人家的建議及邀請。這是他們對指揮部在食物及財政上的運作不理解，又不去做調查及協商說服工作所致。他們對指

² 一九八九年。

揮部頗有敵意，這可能與指揮部不承認他們，食物、財政上不予方便有關。這是在替他們互相協調、說服時發現的。舉例而言，指揮部之物資處（取食物的地方）不承認「外高聯」所發的食物票，只承認他們自己發的食物票。他們的政策是：不論外地、本地學生，均可在指揮部物資處排隊領食物票，到時候憑學生證換領食物。而「外高聯」有些同學甚至常委，連物資處設在甚麼地方也不知道，更不用說溝通了。反而指揮部沒有完全抗拒「外高聯」，在我們協調之下，也肯派發食物給外地同學，負責統籌廣場上的食物分配。他們的廣播站也肯播放例如召開「外高聯」常委會、「北高聯」「外高聯」協商會等消息。

而「北高聯」則是個比較重視大局的機構，從他們肯主動與「外高聯」接觸，參加其會議，講解其欲與「外高聯」召開全國高聯協商會，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等，均可見一斑。

我看「外高聯」的不成熟表現在於缺乏器量、缺乏真正顧全大局的意識，包容能力不高，協商、既往不咎、求大同存小異等能力及意識不高。

這個組織在學運中期或許尚有些角色，因為指揮者曾參與絕食，與「北高聯」及指揮部關係也較好，但到後期新「外高聯」（至五月三十日）則因為權力移交不清不楚，人事變遷未能及時通知指揮部，使兩者合作出現困難。

有時「外高聯」的表現，例如侵佔廣播站，更令人啼笑皆非，對學運發展有不良影響。雖然事敗，對廣播站、指揮部沒有構成傷害，但是浪費了精力，浪費了原本可用以「對付」政府的精力與時間，對學運當然無益。因為他們重組的時候，正是官方開始內部「講數」（角力）之時，國務院正在會見學生領袖，而等到新人事稍定即第六、七次會議時，官方已開始抓工人領袖。形勢是天天在變化，實在不容許有太多內部人事糾紛存於學生組織內。不過，從另一角度看他們爭取組織內部要有民主的精神則是可嘉的，因為民主即使是在那樣危急的關頭也是應該受到尊重的。

「外高聯」人事改組的原因，我想跟A、B等人，尤其是前者很有關係。他們大概意識到舊的「外高聯」不具代表性，再運作下去也不能令群眾信服，於是一番好意成立一個較具代表性的新組織，可是沒有考慮到，且在實際上沒有做到解決權力銜接和交替時出現的問題。而改組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他們早期的組織成員開始勞累了，理智不足，尤其是參加過絕食的同學（例如A），急欲找些比較理智的新秀頂上。他的原意是好的，但是沒有意識到他們不可以一下子全退下去，要把寶貴的經驗有保證地交給每一個新領袖。我想，其實新舊「外高聯」有一二成員重疊本是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那就是B和D。可惜，B性格較悲觀、沉實，加上比較勞累，沒有做好與新人溝通的工作；而D在新組織的會議上表現雖屬積極，但連結新人也

不見太圓滿（例如介紹舊組織、舊架構等工作，至少沒有向我做過）。而他和A在五月三十日離開了。另一方面，新人質素不太高也是問題。他們或是沒有魄力，或是力不從心，都忽略了新舊溝通、銜接的問題。

頻密的人事更替，永遠是令學生組織陷入困局的重要原因。

1.3 新「外高聯」的幼稚，在於不能好好分配時間，往往花了很多時間討論基本上應很容易達到共識的東西，例如學運目標，他們竟分長、中、短期去討論，竟在那緊張的時空——晚間討論了整整一晚。當一個探消息的同學氣沖沖地回來匯報當晚軍隊的位置，要求會眾注意後，討論竟仍然集中在目標問題上。後來，一名四川代表也不滿了，提出要大會討論當前急事，主持的人竟然不理，繼續原來的討論。其不善用時間可見一斑。另外，從另一角度想，經過兩個與會者提醒，會眾仍不醒覺，令人懷疑「外高聯」與當時廣場靜坐示威的學生群眾目標未必一致。

而他們也懷疑廣場指揮部的目標，這使他們不能坦誠地跟指揮部討論交流，甚至做出荒謬的行動。侵佔廣播站及「北高聯」不給錢則開會退席等均是最典型的例子。

學生，就如小孩子一樣，永遠被貼上「不懂事」、「不世故」、「沒恆心」、「沒策略」等標籤。面對現實，充分發揮冷靜頭腦、有大將之風、不要給人看死、能照顧具體現實，才是上策。搞內部權力關係、搞內訌、搞茶杯裏的風波，實非在「對付」政府時所應做的。口說顧

全大局，實際也應這樣做，那些問題應在打完這場「仗」後再講。新「外高聯」就是稍缺事前反覆思量的能力，在事後反省雖然也好，但事前的理智分析更加重要。

我決定離開北京時心裏想，留在廣場上的都已是另一批人，有好些人奴性較大，意識較低；而在上的人能力又不足，常為小事大費心思。我自己情緒不穩，能力又不足，容易受人影響，我再呆下去，也沒有用：原來最好的一班都已在做另外一些深化工作。那時我想，中國的知識界（大學生）並不是全都那麼優秀，北京的較好，無論意識、能力、魄力、勇氣各方面均如此，外地的學生則有勇無謀。這次運動大概只成功了一半，在下一次之前必須趕快回去練兵，重新武裝好才可再來，包括我自己。

香港可以做的是搜集這次學運的資料，在國內廣為流傳，把這次學運失敗之處，成功之處加以反思，並予推廣，讓人們知道全民文化素質不能再下降，教育不能再被忽視。

大學生缺乏真正批判、獨立思考及經常反省的能力的現象不能再持續下去。香港學生除了作聯絡工作外，還要親身到全國各地身體力行，與他們一起工作，讓國內同學學習甚麼是具體落實工作，而同時讓香港同學學習甚麼是目標、高遠的東西，互相補充。

2. 我（一個香港學生）在當時「外高聯」的角色

起初只是個旁觀者，期間盡量嘗試投入會議，提出自

己的見解，但是，礙於自己表達能力不足，很多問題明明覺得不妥，卻不能即時作出反對、反應。另外，礙於自己背後沒有同學支持，他們的行動，我也不好參加，一些我反對的行動也只好投棄權票，不好提出強烈反對。

如果香港有幾百同學去天安門駐紮，與在北京的學生共存亡，我說話時信心也可以大一點。由於有這種想法，我只願意做一些邊緣性工作，例如建議他們開會要有議程、會議常規以提高效率。

另外，兩地（中、港）文化差距大，香港人較務實、國內人重視意識形態，這也造成了合作和溝通上一定的阻礙。對國內的情形，例如哪支軍隊的統帥是誰等資料，因為一向只是隔岸觀火，我不太掌握；有時對形勢掌握不太詳細，使我投入不了。他們則不同，雖然他們沒有豐富的資訊，但有時可以靠經驗和對於國內生活的認識彌補不足。所以，在這組織中我起不了太大作用。

他們也很遷就香港代表，這非我所願。（他們老是用他們招呼學生「新官僚」的方法招呼我，把珍貴的汽水給我，我多會拒絕，並說留給口渴的同學。可是有一次，我老是拒絕，對方老是給我，我忍不住罵了他一句，不要再有這樣的官僚作風了，我不想有官僚作風。對方竟嘻皮笑臉，毫不在意。）但不是這樣的話，我早被罷免了。有些執委曾向我表示要在金錢上多想辦法支持「外高聯」。我向他們解釋了我們是以實物形式捐助的，他們似乎不太滿意，一定要錢。兩點合起來一想，我就覺得我那時有點用

錢買官做之嫌，挺不好受。設若我沒有錢，則我必須有香港同學的支持，或自己必須具備工作能力和判斷能力。

我建議不應讓某些會說話又說得霸道的人主導了會議，應多留意少數人的聲音，他們可能被壓抑。由於我們香港學生的特殊身份，一般我舉手要說話多被允許；只要有理，一般也受到重視。那些少數的聲音則不然。因此，香港代表可做的還有把有分量的少數人的意見再提出來，引起注意，讓組織有更民主的發展。（例如蘭州大學有兩個同學都是這樣看待我們的，並委託我代提意見。）

3 餘話

3.1 新「外高聯」不成氣候，因為權力仍在舊「外高聯」，還未完全轉交給新常委。因此，他們在廣場上的實質影響力不大，而我對新組合只搞權力鬥爭（在與指揮部的分歧似不大的情況下）很不滿，後期減少甚至沒有去開會，並已擬好了辭職信。自己無能改善情況，忽覺應回香港去「練兵」，再裝備自己的思想；他們也要裝備自己的思想和改善做事方法。

3.2 認人是我感到最吃力的事，我對他們每一個都陌生。幸好他們各有特點，否則，記不下名字是毫不為奇的。改善方法是請他為你寫下名字留念，下一次又再問，就有本子可覆查。

3.3 他們有一點是很好的，就是有人肯擔任隨身秘書。當某人不在或不能工作時，秘書可以立即頂上。雖然我當時

沒有這樣做，但是，我估計秘書對權力傳承有一定幫助。

3.4 他們也有相當的政治智慧，例如他們好像預知未來可能會秋後算帳，所以他們的執委有編號以便日後聯絡。但是，由於用這種方法的不止他們，而且執委內部彼此之間也辨認不清編號所屬的成員，所以我也記不清楚他們哪個是1，哪個是2。我只記得自己是005罷了。

3.5 另外，我答應了我們香港大專可以作聯絡人。

在京期間，有不下幾間大學的高校代表說希望與我們聯繫。

北京紀行之七

(21/5-5/6)

林藹純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政治及行政學系四年級
現職傳媒

陳耀輝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經濟系

第一部分

五月二十一日

我們在五月二十一日七點多抵達北京，當時機場至北京市的交通已停頓，我們唯有乘一商人¹的汽車轉折到達東交民巷，再沿東長安街步行去天安門廣場。

當我們十點幾去到廣場時，見到東長安大街有很多人往廣場去，其間有一堆堆的人，有人站高了在演講，主要是市民和工人，內容是抨擊腐敗現象。有些工人在講親身

1 羅海星，香港報人羅孚之子。

的經歷，每堆有幾十個，多少不一。有些聽得很興奮，在拍手。我們感到當時的氣氛熱烈；有些講受壓迫的經歷，有一個相信是知識分子或大學講師在講民主運動的原因及因何要民主。在廣場內，秩序良好，有多重糾察線，普通市民是不能進去的。糾察線每隔幾步便有人，用繩圍著，若要過去便會有人問你來的原因，我們過去時要出示學生證。在歷史博物館和人民英雄紀念碑中間的街道有一條糾察線，在廣場內有第二條。進入廣場後，糾察線較密。我們估計中大同學會有自己的旗號和自己的一隊，便四處找，但找不到。我們曾問指揮台去，但不能通過那裏的糾察線。當晚我們在北京一大學的帳篷內過夜。我見當晚仍有很多人，主要是北京的學生。廣場內搭了很多帳篷，內裏睡了很多，帳篷外有些坐著傾談，而紀念碑四周都有人，望去很遠的地方仍有人。我們坐在那裏，有很多人圍著我們，問我們的看法、香港的情況等。

我們那晚聽到廣場有廣播，來源有二：一為「學運之聲」，屬北高聯的，即由吾爾開希、王丹所領導的；另一為「北大之聲」，是絕食團的廣播。兩廣播互相爭論，吾爾開希突然叫人準備隨時會撤，但絕食團則廣播不可以撤，因整個運動已進入全民運動的階段，工人、市民、知識界亦支持，而北高聯已脫離了形勢，若撤走便沒有核心，故不贊成撤。之後王丹在廣播中表示「有人以個人名義提出撤退，現他以北高聯的名義公佈不撤」。我理解他所指的「有人」是指吾爾開希。當晚，我見學生聽到宣佈

不撤時，都歡呼起來，可見普遍的同學都不贊成撤。

在五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日，大部分時間在廣場，但在五月二十二日到過火車站，買了站台票，在站台上見到整列火車內坐滿軍人。有些學生糾察在勸軍人，不要鎮壓學生，據說軍隊已應允。那時軍隊全坐在車內，之後有些出來幫手掃地。

五月二十二日

早上離開廣場時遇見陳仲強、X X X、X X X，由於X有記者證，可以進入指揮台，因而折回。在指揮台第二重糾察線內，有一名繫著「絕食」額帶的國內同學向我們重提昨晚的爭論，論點與「北大之聲」差不多：不能撤，因學運已發展成全民運動，因而廣場必須堅守，以作為中心及象徵。

離開廣場後，找旅館。下午，在前門的旅館睡覺。晚上到廣場，因估計晚上更易出事。但當晚廣場一片平靜。

五月二十三日

在南池子遇到X X X²，知道當天有支援遊行，其他中大同學正在南池子內做橫額。即入內幫忙，製了很多條橫額。

² 一名中大同學。

中午遊行，人數很多，氣氛熱鬧，遊行的人都很興奮，圍觀的旁人也很多。遊行路線：東長安大街，到新華門再折回廣場。遊行隊伍不斷喊口號、唱歌。

我們雖然只有十多人，但在遊行隊伍中卻最受圍觀群眾的歡迎，當他們從橫額中知道是從香港來支援的，都表現得特別熱情：拍手、歡呼、打手勢、甚至走過來握手、問話——英雄式對待。

五月二十四日

中午，柴玲來到北京飯店，找AAA、X X X他們³商談買帳篷之事。柴玲表現得楚楚可憐，訴說廣場物資缺乏，生活艱苦的情況。AAA一再要求要先照顧外地來的學生，柴玲一一答應。

其後，AAA提出對廣場的看法：他認為全國各地最優秀的學生都到廣場來支援，廣場差不多成為一個聖地，因而一定要把廣場搞好，使外地來的同學能把這裏的討論、意見、民主意識帶到全國各地。對他們也是最好的鍛煉，這是傳授聖火的最好時機，不要浪費。（我們認為AAA這意見對以後香港學生在北京的主張、路線，產生了莫大的指導作用。）

下午，廣場指揮部成立，舉行了宣誓儀式。

³ 當代中國學會幾名成員。

宣誓儀式完成後，有人得知我們是香港來的，於是和我們搭訕，要瞭解我們對這次運動的看法。後來更多人圍上來，形成一個熱烈的討論會，論題包括：運動的方向；運動應否和政權內的勢力結合；如何避免被政權內的權力鬥爭所利用；對現今政權內的權力鬥爭的理解；各階段中對運動所抱的態度及其革命潛力。這時，一個十七、八歲的男孩子，操著濃重的河南口音，發表他的意見：中國農民太保守、太反動了，只顧自己，不支持這次運動。然後，含著淚水訴說自己的遭遇：他的農民父母親不讓他到北京來支援，甚至揚言要斷絕父子關係。他自己認為如果中國人再不站出來，中國便再沒有希望了，因而毅然跑到北京來。其他人聽完他的說話，都深深感動了，紛紛要求他簽名留念。

這次討論，雖然頗混亂，也不很成熟，但顯然是有人在思考問題的，討論很熱烈，外地學生更熱切聆聽。期間，我們認識了一個天津來的工人，他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工程師，在運動的感召下來到北京。

離開廣場時，在隧道中看到一個氣氛熱烈的演講會，兩個工人向學生演講，中間不時爆發掌聲、笑聲與喝采聲。

當代中國學會的幾個代表準備離開北京，臨走時，提議成立物資轉運站，由BB、XX、XXX為負責人。

晚上，香港學生開會，希望能統籌在北京的工作，但在對運動的理解及我們的角色等問題上未能達成共識；分工以後，各做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

北高聯——黎洪；指揮部——BB；外高聯——廖雪雲；北大《新聞導報》——黃德興；在廣場與同學討論，期望引起討論氣氛——曾憲冠、林藹純、陳耀輝。

五月二十五日

由這日開始，每天早上都把香港的報紙影印，然後貼在街上當眼的地方，以利訊息流通。在影印上出現困難，很多公司都不讓影印，據職員說是「上面」的指示，職員並表示有人監視。幸好，有些職員冒險偷偷幫我們影印。在街上貼報紙時，心裏有點慌張，怕會突然被抓。

貼完報紙，便到廣場找外地學生傾談，一般外地學生都很被動，也沒有甚麼獨特看法，但大部分的外地學生（特別是落後地區如湖南、河南的學生）都表現得很熱切渴求學習、接受，一有討論，他們便會開動錄音機。傳單及香港報紙成為最寶貴的東西，牆上的詩、詞、宣言、標語也是抄錄的對象。他們很自覺要把廣場的一切帶回自己的地方去宣傳。在湖南一所商業學院的營幕中，還認識了一個青年教師，據說來支援的外地大專青年教師是不少的。

在廣場轉了一圈，發覺廣場氣氛沉悶。外地學生很多，但卻很無聊，既沒事做，也沒討論，最多是到廣場外遊行一周。

在與遼寧一所學校的學生的傾談中，發覺他們的感覺跟我們一樣，甚至更強烈。他們批評指揮部的同學脫離群

眾，完全不知道他們在做甚麼，又不知道運動的發展方向，而現在有甚麼策略部署，跟著下去要怎樣做這些都沒有向群眾交代，使他們完全不知所措。他們又抱怨指揮部同學不組織起外地來的同學，只讓他們呆坐在廣場，既沒有行動，又沒有討論，更不能向組織提意見。所以，很多同學都感到灰心失望，他們都決定要離開（其中有些同學只來了一天）。他們又擔心這樣的情緒對廣場運動的發展會有不利的影響，並擔心帶著這樣的情緒回去，會打擊他們學校同學的熱情。

我們建議他們寫一封意見書，搜集廣場同學的簽名，送交指揮部。他們同意，於是，我們根據他們的意見起草了一份意見書，內容大致上是列舉了上述的不滿及要求指揮部在紀念碑下設立幾個點以收集同學的意見及不滿投訴；組織一些院校之間的討論；要盡快把接到的最新訊息用各種方法傳播到同學中去。

我們帶著意見書搜集同學的簽名，幾乎所有看過意見書的同學都同意裏面的意見而簽上名字。

五月二十六日

中午為了搜集意見書簽名，我們來到社會科學院的帳幕。當時正有一個研究生從外面趕回，報告他所得的最新內幕消息：趙紫陽不行了；某某人入了黑名單，隨時抓人；告誡在座人士離開廣場後要小心等等。

此時，有兩名北京市民來到社科院帳篷，勸他們撤

走。他們認為這樣呆下去也不是辦法，不如回去讀好書，將來取代現在這班官僚。可是那些研究生的反應非常激烈，他們覺得讀書根本沒有用，他們當中很多人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拿起書本了。他們寧願打麻雀、旅行，他們覺得中國沒救了，自己也沒有希望了。生存下去沒有意思，死也不怕，那還撤回去做甚麼呢？撤回去便甚麼都沒有了，守下去還有一絲希望。

就在這場合中，我們認識了王登躍，一個爽朗、熱情的北京工人。他從運動開始，便站在最前線，初時，作為市民糾察隊的一員保衛絕食學生，繼而成為「工自聯」的一分子，代表「工自聯」在指揮部糾察隊工作。當他知道我們是香港來的，便不知道從甚麼地方找來數包紙包飲品招呼我們，當他聽到那兩名北京市民勸學生撤退時，便跟他們爭論得面紅耳赤。他以自己為例，表示他雖然有家庭負擔，有母親、妻子、兒子，但為了中國的民主前途，不惜拋下家庭，如果中國的工人都能起來，運動便一定能成功。他至今仍下落不明。

五月二十七日

中午，繼續收集意見書簽名，簽名已達百多個。在與四川成都市一些學生談起意見書的內容時，他們反應熱烈，他們對廣場指揮部有很多意見：指揮部的官僚作風，如設置了一道道糾察線，使同學想提意見也無法進入；又指他們無能，沒能好好動員廣場同學、流通訊息等。由於

他們意見很多，我們提議他們跟我們一起到指揮部提交意見書，並找負責人提出意見。起初他們不願意，因為他們沒法忍受那一道道防線的刁難，在我們再三要求下，他們才答應。

進入糾察線時，遇到很大困難，糾察隊員都不讓我們進入。後來，我們出示了香港中文大學學生證，他們知悉了我們的身份後，始准我們進入，但卻不准那幾個四川同學進入。我們堅持一定要一起進入，否則便全部不進入，他們才勉強答應。那些四川同學還打趣說，他們是叨了我們的光呢。

到了指揮台，好不容易才能找到一個負責人，他是指揮部的秘書，但有一個自稱是糾察隊長的人又衝上來，要趕我們走，說是為了安全，那秘書為此與他爭論起來，糾察隊長情緒激動，揚言要辭去職銜，多人在旁勸阻。我們對秘書道明來意，交了意見書。他很耐心聽著，但卻沒有甚麼回應，我們感到他在敷衍。後來，他把我們安排到一個帳幕中，找來幾個人與我們傾談，那幾個人對我們的意見反應較為熱烈，但他們都不是負責人，並不能作任何承諾。

離開指揮部時，遇上一個自稱是外地大專教師的男人，要找財政部的人瞭解一件事情：他任教的學校的一個學生從財政部領取了一筆錢，用以資助沒錢回校的同學。但是這名學生卻把錢任意派發，連那老師也派了十元（二十元？）。那老師覺得這造成很大浪費，他想知道財

政部是根據甚麼標準批錢的，並把他所得的錢送回來。但結果，他無功而還，因他根本找不到負責批錢的同學。

下午，與那幾個四川同學商量後，大家都感到廣場氣氛太沉悶，訊息流通太少，連廣場外也不及，於是想在廣場的幾處地方設立佈告板，貼上報紙及從香港帶來的部分文章（一些台灣雜誌如《南方》、《當代》的文章），並初步提議設立一個資料中心，把香港帶來的資料，放在資料中心內，供同學借閱，由四川同學負責管理。

為了設立佈告板，擾攘了一天，買布、買鐵絲網、找木頭、搭建。結果發覺全是浪費，根本不用那麼複雜，只要一塊布、兩支竹竿、便能貼上報紙。

這天，認識了一個北大學生，他幫我們買布、搭佈告板。他是一個高幹子弟，是個很有趣的人。他一方面指出現在中國官僚當道，腐敗無能，不鏟除特權，推行民主制度，中國便沒有希望。另一方面，在吹噓他家庭的富裕情況：買新轎車，平時家中一切食用都是公帑。他一星期用數百元，用完便向他父親要錢。他對同學慷慨解囊，可算是一個自我意識並不調和的人。

學聯到達，帶來一大批物資，香港同學在廣場上設立了物資站。

五月二十八日

下午，用竹及布建造了四幅佈告板，貼上報紙，放在廣場的四邊。

五月二十九日

中午，BB叫我們負責指揮一隊建築隊在廣場上搭帳篷。她在二十八日晚已將竹及帆布派發給各學院同學，又在廣場上搭了三個帳篷模型（是三角形的大帳篷）。但各學院的同學並沒有依照模型的規格搭建，既不美觀又不實用；位置、方向又亂。她要我們拆去這些不合規格的帳篷，按照藍圖重新搭建（當時她已有一個建築帳篷的整體藍圖）。

我們在廣場看到除了那三個模型外，其他帳篷的確搭建得毫不美觀，又很混亂。但我們又覺得不好強迫他們拆去，所以便到處去做說服工作，希望他們自己動手重建。但大部分對我們的建議都沒有甚麼反應，不甚感興趣，只有一個學院的同學接受我們的建議。於是我們便跟他們合作重新建了一座三角形帳篷，然後又叫附近的同學來參觀，希望他們仿效，但他們的興趣始終不大。

事後，我們覺得沒理由由我們幫助內地學生搭帳篷，因此準備向BB建議畫一個帳篷設計圖則，再把竹竿分成一堆堆，分給沒有帳篷的學生，再叫他們參考圖則自己搭建。

晚上，為了能公平地派發物資站的睡袋（好像有二百多個），我們想出一個方法。我們事先寫了數量與睡袋數量相等的條子，在深夜時，由香港學生拿著條子到廣場四周察看，見到有需要的，便派給他一張條子，他便可憑條子取睡袋。期間，曾有清華的學生來到，知道睡袋是發給

有需要的外地同學，而他們只是睡一晚，所以放棄領睡袋。此外，數天後，亦有外地學生因離開而把睡袋送回物資站。

深夜，所有睡袋派發完。BB提出要把二十八號發出的帆布全部收回，原因是：他們所建的帳篷太混亂，不合規格；新買的竹竿已運到，希望能立即搭帳篷，但沒有帆布。但是，由於發出的帆布已各有用途，沒能收回，BB於是提出只用竹竿搭帳篷架。

當時，BB已和另一內地同學在廣場上劃了數個帳篷區，連每一個帳篷的位置也在廣場上標記妥當。她要求在場的十多名香港學生在當晚搭好一個區的帳篷，原因是對內地同學作出示範：當內地同學在翌日早上醒來時，看到如此整齊一個區的帳篷，一定會刺激他們的積極性，依照這模型努力搭建。但其他香港同學持有不同意見：他們不明白為甚麼要在一夜之間搭好一個區的帳篷，有人提出應該由住的同學自己搭建，不應我們代勞，如要起示範作用，一個便足夠了。BB堅持要一區才能有示範作用，雙方僵持，最後其他同學讓步，答應在當晚做八個帳篷。但做了一個通宵，最後只能做出五、六個，我們堅持不下去，索性回北京飯店睡覺。

在這一晚中，發生了兩件事，其一是「民主女神」像的建立；其二是新華門出事，廣場同學聞得消息後，都紛紛向新華門湧去。此外，這晚上，亦認識了一個東北同學，是學藝術的，他教曉我們怎樣才能用鐵線把竹竿紮得

結實。他父親原是高幹，他為了參加這次學運，已預備逃亡，父親阻止不了，愛子情切，只能把一大疊鈔票，包括外幣塞給他（他拿了一疊港幣給我），他學校知他參加學運，還警告他如來聲援，便開除他的學籍。可他不管一切地來了。

五月三十日

中午來到廣場物資站，發現竹竿全部不見了，正自奇怪，才有人告訴我們竹竿已全部用來搭成帳篷架，整整兩三個區，數十個帳篷，在一個早上全部搭好，像是變魔術。這魔術是由X X同學X X X⁴變出來的。他在二十九日晚上當中大同學埋首搭帳篷時，卻不斷與一些北京同學打交道，建立關係（包括給與他們一點利益，如睡袋、帳篷等），再利用這些同學，為他找來一批內地同學，大家分工合作，終於憑著他的人際關係管理法及科學管理法相結合，在一個早上建成數十個帳篷。當時，我們全部人都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下午，王登躍匆匆到物資站，告訴我們「工人自治會」有三個負責人沈銀漢、錢玉民、白東平被抓了。北京市公安局門外，「工人自治會」正在進行抗議活動。我們立即拋下工作，隨王登躍到北京市公安局。

4 一名國內同學。

北京市公安局門外，聚集著數百名群眾，有「工自聯」工人、學生、市民和中外記者。個多月來遊行中的輕鬆歡騰氣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對峙的緊張。

公安局門內，一部攝影機正把抗議的群眾一個個攝入鏡頭內，官方喇叭不斷廣播，警告群眾不要聽信謠言，要遵守戒嚴令，立即離開。另外，據說千多名武警已從後門進入公安局內，隨時準備鎮壓。公安局外，群眾不時向公安局推擁，但都被工人糾察隊所阻截。他們不斷呼籲群眾保持冷靜、克制、守秩序。工人代表來回於「北高聯」與公安局之間，他們要不斷徵求學生領袖的意見。傍晚時候，工人代表宣讀了他們向公安局提出的三項要求後，便遊行到公安部。沿途拉橫額、喊口號的只有幾十名工人，學生全都不見了。

來到公安部門前，聽說南池子已駐有軍隊，公安部門內有軍警在步操，似乎在示威。工人則只有幾十名，兩面夾攻之下，他們景況危險。特別在入夜後，市民散後又沒有學生來聲援，他們簡直就是甕中之鱉。我們意識到他們這種危險，更感到學生應該在這時候站出來聲援，於是決定把這個景況通知廣場同學。我們來到絕食團廣播站說明來意，表示我們希望把「工自聯」情況告訴廣場同學，呼籲他們聲援。站內同學表示同意，我們便在那裏等候。後來，來了一位負責人，他知道我們來意後，不讓我們廣播，原因是：廣場人口已很少，如果廣播之後，同學一窩蜂去了支援，那廣場可能會很危險。我們認為應該讓同學

決定留下還是去聲援工人，而不應該封鎖新聞，代同學決定。他堅決不肯，幸得另一同學幫助，我們搶到播音器廣播。那同學情緒激動，高聲怒罵，揚言我們要對全部後果負責。

深夜，王登躍帶著另一工人找到我們，神色凝重地告訴我們，「工自聯」景況危險，須撤到廣場上來，要求我們陪他們去找「工自聯」的人，因為他們一離開廣場便被抓的危險，我們陪著他們，會安全一點。我們一行四人於是陪著他們兩人到「工自聯」總部。王登躍一路上非常緊張，抓著我的手不放。這是我第一次真正感覺到紅色恐怖的氣氛。他連上廁所，也要其他人相陪。

來到「工自聯」總部，一個人也找不到，王登躍非常慌張，四處找人問他們的下落，後來有市民告訴我們「工自聯」總部已撤到廣場，我們才鬆一口氣。到廣場找他們，他們撤到廣場西北角，有自己的帳篷和廣播站。

五月三十一日

早上，王登躍到北京飯店找我們，表示「工自聯」物資缺乏，需要我們幫助，如影印機、播音器等。我們沒有答應，叫他們跟「北高聯」協調，一起使用物資。

中午，王登躍母親、妻子、兒子親自來到廣場，把他帶走。原來他十三號絕食開始後便沒有回家，家人都擔心不已。他臨走時留下口訊給我們，如六月二日下午還沒回來，便表示他可能遭遇危險。

BB首次把天安門大學的完整藍圖給我們看，整個廣場被分成生活區及「民主女神」像下的講壇兩部分。天安門大學設有多個部（包括財政部、宣傳部、廣播部、物資部、校務處、圖書館等）。BB提議我們（指香港學生）每人進入一個部內作監察，負責各個部的開支監管，並表示晚上有一個會議，商討「天安門民主大學」的建立情況，要我們參加。我們感到BB似乎不只是要求我們擔負監察的角色，更且有要香港同學（及一名廣州同學）「head」起每一個部的勢頭，因而拒絕這樣做，也不去開會。

下午，有兩名北京記者找我們，表示想跟香港合作，在這次運動後搞一個學運資料展覽。他們表示國內資料很多，但如透過香港搜集會比較方便，因而可以合作。

晚上開了一個通宵會，討論問題包括：物資站的運作情況；香港學生在運動中的角色；香港學生握有過百萬元的資源，有否被誤用／利用的問題；香港學生有否主導運動某方面發展的問題。

最後，沒有任何結論，一切如舊，部分同學漸萌退意。

六月一日

下午，李卓人、X X X和一名「四五行動」的成員欲晤「工自聯」負責人，希望我們介紹。我們帶他們到「工自聯」，跟宣傳部長及總務部長見面，並傾談了一會。臨走時，約了翌日再來見韓東方。

這天是兒童節，拿了一些物資站的朱古力送給表演的小朋友。

六月二日

下午，再次帶李卓人等到「工自聯」找韓東方，韓不在。

王登躍回來，沒事，換了一身新衣。

四名知識分子發表絕食宣言。

傍晚，廣場上來了兩個上訪老鄉，是中越戰爭的退伍軍人。他們帶著一個小孩子，無處棲身。送了一個小帳篷給他們，搭建在一間外地學校帳篷的旁邊。後來，有學生覺得他們留在那裏，會給中共帶來口實，說有流氓混在學生中，要趕他們走，我們便把他們帶到物資站。深夜，當北京市民知道有上訪者混在物資站中，群情洶湧起來，要趕走他們。他們睡在帳篷中，那些市民差點連帳篷也要抬走，把小孩子嚇壞了。老鄉很憤怒，我們也很憤怒，差點起衝突，幸得一北京市民解圍，勸其他市民冷靜，又向我們解釋老鄉留下會給中共帶來藉口，提議我們幫他們找旅館。於是由一位港大同學踏單車到處找旅館，終於在西單找到一個地方可以安置他們。

途中（接近午夜十二時）見到軍隊，他們穿白色衫、灰色褲，見不到有武器。他們都很年青，斷斷續續的，一批批蹦蹦跳的向前走去。我當時不知是軍隊，三輪車伕告訴我們那些便是軍人。回北京飯店途中，在東長安大街角

再見軍隊，他們已被市民勸服，開始撤走，未見有衝突。這時是六月三日凌晨一點，我們所見的只是一部分，未知實際人數。西單的軍人，很輕便的裝束，但在東長安大街見到的則是背著小水壺，他們說走了很遠才到，很辛苦。兩批都是很年青的，在北京飯店的一批是軍人裝束，我們未見有持槍。

我們停了下來，和他們傾談，有些士兵很倦，停了。有些則和市民爭論應否鎮壓，爭論民主應怎樣。有些則不肯出聲。我和一些士兵說，北京秩序很好，他們無必要來，他們則說電視都有廣播北京的動亂和交通癱瘓，難道電視會有錯。三點幾，回到北京飯店。

六月三日至四日

下午，回到廣場幫手分派食物，聽到官方廣播香港某大學學生在廣場搞了一個「民主大學」，我們意識到是指我們的。兩點幾至三點幾，陪李卓人到北京「工人自治會」找韓東方，但找不到他，便和其他的常委傾談。四點幾返北京飯店開會，商量回應官方的廣播。開會的主要是中大大學同學，和中大畢業生。開會至六點幾，到王府井大街吃晚飯。

之後，返回北京飯店。當晚有消息傳會有軍隊鎮壓學生，我們便做了些準備功夫，預備濕毛巾和收拾一下。那時，一般的估計是會把人架走，或用催淚彈、水砲等。當晚的氣氛較以前緊張。同時，有消息傳各處有衝突，如新

華門有軍隊，有軍民衝突等，另外各處傳有軍隊開槍。下午，廣場指揮台有廣播：「六月二日有人被車壓死。」

當晚十時許，見有學生拿著木棍、鐵棍，有一整隊穿著紅色制服的敢死隊向東面走去，共十至二十人，估計他們是去攔軍隊。在廣場內則不見有武器。十二點左右，我們在前門見到有軍隊從西面衝來，快到毛主席紀念堂了。我們跑回物資站通知其他同學。跟著再與其他幾名同學走向前門。在歷史博物館前，過了紀念碑的位置，見到路障，有人用棉被、棉衣鋪在地上，淋了火水，估計他們想用火阻軍人，有些用鐵欄放在路中間，車橫放在路上。我見軍隊在幾百米外，數目很多，已接近廣場的位置。

之後，我們回物資站，有同學叫我們坐在那裏，估計不動就會沒事。十幾分鐘後，軍隊進入了廣場，經過我們物資站。十二點四十五分，有批軍隊一面走一面說：「我們不會傷害學生。」那些軍人是有帶槍的，當中有些受了傷，他們說是被人擲物所傷，我們附近的學生在唱《國際歌》，叫軍隊不要傷害學生。軍隊很接近，我們和他們握手，他們經過時並無傷害學生。數目最少有幾百個，全是步兵，手持步槍。軍隊坐在歷史博物館前，市民和學生坐在他們的對面，說「不要鎮壓學生」。市民向他們唱歌，有《血染的風采》和《國際歌》，我們感到他們並非很兇狠，有點迷茫。此外，我們見巴士著火，似聽見不很密的槍聲。

一時許，我們到「工人自治會」途中，見學生拿著原

是搭帳篷的竹竿，斬成一截截。在「工人自治會」，見工人和市民將火水裝入樽，自製火水彈，數目並不多，準備搬上巴士，準備開走。「工人自治聯會」內，只見有幾個人，估計很多已撤退了。我們估計因為他們認為「工自聯」是軍隊攻擊目標。

一時多，我們從廣場西北角沿長安大街走了一段短路程，當時很靜，無人，我們感到這裏定有事。後來見到有人架路障，路障用欄桿來做，當時的市民並不多。之後，開始見到在長安大街有坦克，坦克和我們的距離很遠，只見坦克的車頭燈，從當時所拍的相片，只見一點光。那些坦克是整排的駛來，我亦聽到零星的槍聲，之後是一連串很密的槍聲，我不知是從哪裏傳來的。當聽到槍聲時，我們便向廣場的方向走，一起逃走的有很多人。當逃走時，我們嘗試回頭，走了十多步後，又有一大輪的槍聲，這時大約是兩點。

我們逃到廣場西北面，見有人抬著傷者，從西北面抬入廣場，兩三個抬著一個，傷者不斷流血，我們當時很怕。兩點多，我們在廣場內，見帳篷內的人在睡覺，目無表情，不是很緊張的模樣。之後，我們回頭找失散了的中大同學，見一名中大畢業的同學受了輕傷，他說因幫解放軍勸市民不要打軍隊而被市民打傷。另外，有一名同學因情緒激動，想走去打軍隊，但被我們勸服了。

近兩點四十五分，我們在商量怎打算，四處都有軍隊，又聽到槍聲，最後有兩個同學返回北京飯店，我們和

其他同學則到紀念碑的指揮部和學生一起，當時估計軍隊不會鎮壓學生。物資站內仍有些國內同學，他們表示軍隊不會傷害學生，要保護物資，不肯離去，我們和別的同學一起拖他們走。當到達紀念碑時，有國內的同學勸我們走，但我們沒有立刻離開。三時，有幾千學生環繞在紀念碑附近，我們不知帳篷內有無人，但當我們從西單逃來廣場時，曾經過帳篷，內裏是有人的。

三時許，我們決定走向北京飯店，向東長安大街的方向走去。在未到達南池子時，有學生告知我們軍隊已封鎖了街道，不准人過，我們便回頭。在歷史博物館前的街道聽到零星的槍聲。之後，從東交民巷走，一面走，有零星或一陣的槍聲，路上亦有市民問我們狀況。途中，我們曾停留在那裏坐著。之後，曾回廣場找失散的同學。五時許，學生開始撤，一隊隊很有秩序地走出來，一路上哭喊著，或唱歌，市民則安慰他們。有些學生要其他同學攙扶，他們一面走，後面仍有零星的槍聲，我們很憤怒。撤退維持了十五至三十分鐘，是很有秩序的撤。在撤退的過程中，紀念碑站滿了解放軍，士兵很整齊地站著，廣場內有很多坦克開入。撤退時，坦克跟著學生駛，一直開到東交民巷巷口。有很多市民在那處喊著「法西斯！走狗！」口號是很整齊的喊出。每當一輪的槍聲後，市民便散開，當市民再喊口號，便再有槍聲，市民便又散開。如是者有三、四輪的槍聲。我們當時是在東交民巷巷口，每次有槍聲便撤到後面。只逗留了很短時間，我們便尋路回北京飯店。

在途中見到公安打人，從單車上把人拉到地上來打，十至二十個公安，見人就打，非常兇狠。

七時左右，我們便回到北京飯店。

六月五日

六月五日晚乘港龍包機返香港，起飛前李卓人被騙下機。

我們上北京是以學生的身份，初期是個人名義，後來和中大代表一起工作。回港後，中大學生會給了我們赴京團代表的身份。

第二部分

壽忠：

你好！寄來有關南京事件的資料已收到了。近月來，很多重要的事情發生了，其中之一當是北京／全國的學潮。作為一個旁觀者，亦有幾個片斷的感受。

由胡耀邦的死到李鵬宣佈戒嚴前，我只是在默默地注視著事態的發展，並未有任何行動（剪報除外）。五月十九日深夜，戒嚴！翌日我參與了「民促會」⁵ 搞的維園

⁵ 民主政制促進聯委員。

集會遊行，當時雖是八號風球，但仍有數萬人出席。期間的感覺好壞參半，恨的是「民促會」一貫的以玩群眾為己任，既壟斷了發言權，又只會聲嘶力竭的填塞口號；群眾完全被指導著去行動，指導著去宣洩，原有的自發性從一個設計好的渠道中流掉了。我們企圖爭取自由發言的機會，但遇到的只是官式的安撫與爭辯。

五月二十一日，局勢似乎越來越危急，而在香港等待或作「民促會」的棋子／司徒華的政治資本都覺沒趣。因此，決定到北京去。動機是極簡單的：坐在天安門廣場，與北京／全國學生一起被打、被抬走，期望將事件的影響擴至國外去。（附帶一提，原先本已有很多國是人，中大同學打算在這段期間北上瞭解情況，我則未有去北京的想法，因自覺並不能幫忙甚麼。最後決定北上，全是因戒嚴而激起的，可以說是非理性的，一時衝動的。）

二十一日星期日中午到機場stand-by，即時買到下午的機票。同機遇上兩個也是去聲援的香港人，是搞電影的。傍晚抵北京，好容易才搭上順風車進市區，途中遇到三批截軍車的人群，司機對交通混亂略有抱怨。從東長安街步行到廣場，沿途塞滿了人，三五成群或談論或傾聽，步行的、乘單車／電單車／汽車的遊行隊伍不斷往返，我們穿越了戒備森嚴的糾察線才能進入廣場。

廣場內的氣氛與外邊稍有不同，同學們的情緒並非十分高漲，可能是太累了吧。除了不時傳來救護車的響號外，滿耳就是廣播聲：兩個不同的廣播。打聽了一下，才

知一個是「北高聯」的（即「學運之聲」），另一個是「絕食團」的（即「北大之聲」）。它們明顯地代表不同立場：前者要維護學運的純潔性，吾爾開希甚至要求撤退（據說當時形勢危急，李鵬強硬堅持清掃廣場）；後者則強調目前已發展成全民運動，要在廣場堅守下去，作為運動的象徵。但是，不同的廣播之間並沒有爭論，它們只是相互表明立場，相互干擾著對方，活像一場鬧劇。據接觸到的同學說，對此他們只能表示遺憾，並不願多談。廣場上的同學雖然表現得比較鬆懈，但當王丹宣佈要繼續堅持下去時，仍能惹起一陣喝采聲。大部分同學在不撤離廣場這點上是有共識的。

這就是我們在天安門廣場上過的第一個通宵。直至六月五日我們狼狽逃離北京為止，我們在廣場上度過四個通宵：頭兩天的晚上；五月二十九日通宵搭帳篷，期間目睹「民主女神」像的趕建及新華門外的鬧劇；六月三日、四日的大屠殺。而在述說對廣場及北京學運／民運的片斷印象之前，先把「我們」（包括前後加起來為數十幾人的中大同學）幹的好事交代一下吧。

其實正如某同學所說：「我們」其實並不準確，那裏只有一個一個的「我」而並沒有「我們」。如果要把「我們」所幹的事一件一件羅列出來，可有下面的清單：瞭解情況（包括各個學生組織及廣場領導層）；商討合辦中港台三地營；物資上的援助；逐步架空廣場總指揮部，sell自己對天安門廣場甚至整個學運的理解（手段包括用香港

捐助的錢去營造權力)；對廣場上的同學提供資訊、搞討論，提高同學尤其是外地來的同學的士氣；在北京街頭（限於天安門附近）張貼報章資料。

「我們」分別負責不同的工作，不時有同學加入，人數並不穩定；但就算在較熟悉的一群當中（其中不乏國是前兩屆的幹事），仍是一盤散沙，嚴重缺乏組織意識，是一個個獨裁者在合作。而偏偏它竟擔負著舉足輕重的工作，有難以計量的影響力——原因之一是它擁有資源。

我們到北京之後不久，AAA、XXX、XXX、XXX——當代中國學會的四大金剛，由於機緣巧合，既參與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即廣場總指揮部的頂頭諮詢組織），又成立了名義上是當代中國學會、中大及香港學聯的物資轉運站，統籌香港支援北京學運的資源。

物資站的運作首先暴露問題，在效率的名義下，只有三個人擁有正式的決策權；其他人起初是未有介入的意識，其後是被排拒於外而只能擔負執行工作。因此，XXX可以在管數的名義下作橡皮圖章，懶散地作負責人；其餘二人（BB及XX，其後加上XXX）則獨斷獨行，按自己腦裏的圖像，運用手中的資源（上百萬的金錢）去「實踐」。無論從工作方式／態度到產生的效果，皆足以令我們反省、深思。

誠如BB所言，作為一個香港學生，參與大陸的學運，天安門的事情，是正當不過的。但當時「我們」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手上擁有極大的資源，假如使用不當，極

有可能陷進以錢去建立權力，並利用這種權力去左右學運發展方向（美其名為實踐自己對中國的抱負）的景況中。偏偏「我們」之中不乏一向以中國前途為己任而又極自信的人；主觀上的自以為是，充滿幹勁；客觀上壟斷了物資站，在既無須對誰負責又無監察的情況下，上演了一幕幕名為積極介入的鬧劇。

場景一：香港來的同學，指揮著廣場上的大陸同學，在廣場上搭建帳篷，藍圖是一些三角形的帳篷，分區分行整齊地排列，好不壯觀。為達此目標，實行了所謂科學管理方法，秘訣是用拉關係的方式與一些有權的頭頭拉上了，然後建立一層層的管理架構，推動工作的進展。而究竟廣場上的同學當時在想甚麼，他們到天安門來是幹甚麼的，在所謂自己管理自己的口號下都是無須理會的了。當然，廣場的衛生及住宿問題是很緊迫的，否則只會給共產黨以口實，但是否定要以上述方式解決呢？是否定要假設大陸同學一定是怠惰和被動的呢？是否定要把他們安排在一整個藍圖之中，連日常起居生活等細節也要被統籌？他們來此是為啥啊？他們只被看作對象及工具，而他們來這原是為爭取其應有的地位的。

場景二：天安門廣場的發展方向是要建立一所民主大學／人民大學，為此：紀念碑前是八個生活區，「民主女神」像前是一個大講壇，旁邊是教務處、圖書館、指揮部、物資部、宣傳部。這個構想究竟有多少是「我們」中一兩位同學的心思，連「我們」也不能確知。但事實是

「我們」曾被要求／指派「坐」或「head」起各個部門，名為監察，實為指導。原來「我們」是要為他們建立一個組織（在天安門），然後「訓練」他們去管理，最後交回他們去管理——我們真偉大！（類似的「偉大」工作，正由另一位同學在北高聯及各校自治會中進行。）

其實，我們都同意這一點：就是廣場上的指揮部脫離群眾，導致廣場士氣低落，甚至不少外地來的同學失望而回。假如我們能對此作些工作，將很有意思。因此，我們同意，要提供資訊給他們，搞討論、搞氣氛、搞論壇；建議他們自己做，我們也一起做。但我們萬料不到，我們要取代他們的指揮部，從上而下的為他們建構組織，安排一切，甚至跟著的發展方向。同學們最可寶貴的自發性，竟由我們去扼殺掉。廣場上的同學，先是被一些所謂學生領袖玩弄，繼而被「我們」玩弄；而這些都是在為了運動的發展，運動從來就是如此，為了中國的民主前途等美好（可能也是真誠的）的名目下作出的。

為何「我們」竟有此神通呢？當然，「我們」有看法（這些看法有多少是淵源自四大金剛則不可而知了），有幹勁，最後又最重要的是：「我們」有錢。

為了弄清「我們」的角色，爭論了一個通宵。但結果是：有人堅持按原有方式搞下去，就算這樣作與共產黨的作法沒有分別也無所謂，就算只剩下他們兩個也要幹下去，既自信是手執真理還有甚麼猶豫呢？但就算是共產黨也表面上打著群眾路線的旗號，而「我們」則否認要瞭解

群眾，否認「我們」與同學是處於極不平等的位置上。運動從來是這樣的。（此點「我們」的小金剛與AAA等大金剛是不謀而合的。）

「我們」中的另一部分人（包括我自己）是怯懦的，既無完整的一套對運動的看法（不懂要建立民間社會力量是最高目標，不懂福柯的理論），又對問題的嚴重性後知後覺，更缺乏奪權的意識；當六月三日我們嘗試再談一次，希望扭轉局面時，大屠殺開始了，原來的問題亦消失了。

我們沒有足夠的心理、組織準備去承擔這種鬥爭，我們以往只懂搞project、搞國是這種組織，但我們竟用這些經驗去套天安門的鬥爭；有人自信可行，有人懷疑但只能提出疑問；有人專制，有人未有準備去左右獨裁者。我們都有責任。

當代中國學會的四大金剛尤其是AAA、XXX令人極度失望，他們活動能量大，影響也大；但他們拒不承認要對我們這種亂局負責，百般推卸責任。他們那種言必運動、高瞻遠矚的偉大眼光，只令人作嘔。在偉大的口號、目標之下，還會有任何問題嗎？有，也只是微枝末節吧。

上面，交代了「我們」的一些問題（只是一些片斷感受，尚未能總結得了），但重要的並非這些（雖然這構成了很大的情緒動盪及浪費了很多寶貴的時日），廣場上的情況，對市民、工人的印象，對共產黨的從新認識，這些

更有意思的問題，留待下次信中再談吧。

祝
生活愉快

6
輝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九日

6 陳耀輝。

北京紀行之八

(22/5-5/6)

黎洪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數學系四年級
現職教師

第一部分

五月二十二日

十一時許到達北京機場，過關順利，乘民航巴士去市區時，四度遇到市民截查車上有否軍人。他們有的拖男帶女，一家人閒聊般地坐在路上；有些情侶坐在路旁細語；彷彿攔軍車已成為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到了北京飯店，氣氛相當緊張。原來證實了醫院已空了約二萬個床位。於是，我們幾個同學商量應站在哪裏，有事時應向哪個方向跑。他們還教我如何對付催淚瓦斯。

五月二十三日

凌晨四至六時，我在天安門，並沒有事情發生。回北

京飯店睡至下午一時。下午三時，我們一行十多人拉著橫額，參加了北京市市民大遊行。當沿途圍觀的市民看見我們橫額上寫著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師生聲援團」時，爆發了熱烈的歡呼聲和掌聲，更不時有人叫我們簽名。

五月二十四日

十時許，我們去參觀「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的宣誓儀式。中午去了外高聯總部，認識了X X、X X X。

晚上，我們中大同學開了一個很浪費時間的會，分了工。

五月二十五日

在廣場找吾爾開希和外高聯之人商談。晚上傳出證實已派了子彈給軍隊。

五月二十六日

上午和X X到外高聯開會。這時，他們正進行選舉。三百餘所外地學校各選一人入全委會，各省再選一人入常委會。九個省組成一個地區，然後每個地區選出一人，成為執行常委。X X成為香港地區代表。稍後，我列席他們之執行常委會。在會上，我嘗試要他們討論一下下一步的目標。但他們相當短視，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更有人一下就提出要討論三種撤離的方案。只有西南地區四川省之代

表A與我之意見相似。當會議告一段落。A覺得無意思，離席而去，我留下X X一人繼續開會，也追了出去。和他詳談了一個多小時，包括對外高聯、對學運、對人生之看法。最後，他認為留在外高聯無意思，無作為，決定在日內辭職。回家鄉去帶一些子弟兵來北京。

和A分手後，回到飯店。與中大的同學及科大自治會的負責人之一B一起吃飯。

吃完飯後，坐公共汽車到北大，第一次列席北高聯之會議。稍後，X也到場列席。在會上，先是最近才選出的北高聯財政部部長報告，然後常委們很細節地追問了很多問題，然後，決議在五月二十八日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接著勝利撤出天安門廣場。

五月二十七日

凌晨二時，會議完畢。隨便在北大找了一個地方睡覺。上午九時，與X在三角地碰頭。接著，他帶我到北大、清華及師大找一些熟人。結果，在清華和師大分別找到了X X X和X X X。

晚上，回北京飯店睡覺。

五月二十八日

中午約了師大X X X去買四通的電腦打字機。更認識了師大之X X X。

晚上去開北高聯，才知道昨天六點之北高聯又推翻了

前晚之決定。現在將不會撤離天安門，直至六月二十日人大召開。而且昨天之會議上，來了一個來歷不明的人，名叫陳百忠。自稱是台灣藝文界之代表，說台灣已籌集了十億新台幣，估計可籌得一百億。他還建議用這些錢的一部份在天安門開一個音樂會。當我查問他一些台灣的情況時，他卻支吾以對，顯然不敢面對我。北高聯的一些代表對他很懷疑。如民院之X X X及政法之X X X。但秘書長卻對他信任有加（後來才知他平時幾乎和秘書長一起出謀劃策）。陳百忠顯然平日早有準備，在北高聯會議上經常提出意見。

會後，我坐在X X X的單車後面，去師大睡覺，半路上，X X X請吃夜宵。

五月二十九日

找了一天，跑了清華、師大、政法、人大（坐巴士），一個人都找不到，十分upset。五時許，誤打誤撞闖入了學聯訪問吾爾開希、王丹、北高聯常委等人的會議中。¹

五月三十日至六月二日

列席了數次北高聯會議。最初，場面相當混亂，新任

¹ 會議在北京飯店舉行。

秘書長根本控制不了會議，又不知道自己的權責為何（但他一上任，便把財政制度建立了起來，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功勞）。但北高聯自六月初一些新常委加入後，已趨向成熟。但最大的致命傷是尚未能討論出一些長遠的目標或方向（其實有一些常委已意識到其重要性，而且某些自治會已討論出了一些方向。但基於場面混亂和其他客觀原因如軍情危急，所以北高聯仍未就一些長遠的方向達成共識）。所以每當一些突發的事件發生，他們就會重新考慮對廣場的處理方法。所以幾乎每一次會議都會花二小時以上討論廣場的事情，而沒有時間做別的事。

全支聯²及學聯的人經常做「和事佬」，希望不要有一個分裂的形像給港人和其他人見到。而北高聯則覺得對十五萬北京的大學生負責更為重要。所以在六月二日已安排好一個領導班子，準備在必要時接管廣場指揮部。

除東郊十院及人大外，也和其他七間常委院校的自治會談過。社科院的自治會已經推選；民院基於人的素質（他們自己說的），開展得相當慢；北大則人材多，也很著重一些方向的建立，但意見卻很紛紜。政法是最能說出方向，也最知道自己正在做甚麼的院校。北航、師大及清華基本上運作良好。另外，非常委院校的科大也很積極。

² 編按：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支聯會」）前稱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全支聯」。

第二部分

記北京學運

他們感動了上帝

卻感動不了皇帝

——北大詩選

在北京整整二個星期的感受，可以包括在以下的一句話中：

我未曾見過這樣的政府，

也未曾見過這樣的學生，

更未見過這樣的人民。

首先，讓我從大屠殺的死亡凌晨說起。約凌晨一點，第一批軍隊，約千餘人，手持長棍，背著衝鋒槍，在我們「香港社團物資聯絡站」前面幾尺經過。他們說：「我們不打學生，你們不要怕。」我那緊張的心情又輕鬆起來了。我一直認為，政府最聰明的做法，就是用軍隊把天安門廣場圍起來，或將學生強行架走，把校園也圍起來，然後在市區實施戒嚴，讓市民和投資者漸漸習慣，正如台灣以前一樣。所以，儘管已有「小規模」的衝突（在我面前約有十多個中了不同槍傷的人被抬過），我不相信軍人會

血腥鎮壓我們這群不作抵抗的學生。我想，大不了拳打腳踢，強行架走，抬入醫院或監獄。當然，也可能有一小部分人會死。

二時許，我獨自回到紀念碑的最高層的北面，躺在地下。這時，天空之上隱隱約約閃著幾顆星星，在四周圍槍聲、炮聲的襯托之下，在悲壯的《國際歌》歌聲中，在強烈的燈光下，紀念碑上「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幾個大字格外顯得莊嚴。

當隊伍離開前門約五分鐘，天開始亮了。³當隊伍走到西單郵電大樓時，天已經全亮了，隊伍佔了足足半條長安街。這時，傳來坦克車聲，人群開始亂，我們從路旁欄桿的缺口跑向一小胡同。跑開十多米後，回頭看見三輛坦克，最後一輛上面有一軍人開了十來發機關槍，還扔了一、二顆煙幕彈。人群更加四散逃走。不一會，三輛坦克又走了回頭，令稍為聚集的人群又四散逃命。我離煙幕彈很遠，風也不是向我這兒吹，但我喉嚨很辛苦、很辛苦，嗆得幾乎要把所有東西都嘔出來。我忘記了哪個學生告訴我，這是「芥子氣」。這時，有後面來的人告訴我們，後面有十來人被坦克壓死。於是，我們三人跑回頭，看見大約在我們前面幾十至一百米的地方，有十來人可能因欄桿所擋，來不及跑，有的腦漿溢了出來，有些手腳分開了。

3 凌晨四、五點，一班十人左右的軍人，上到紀念碑的最上面，把學生從最上面開始趕離廣場，學生唯有喪氣地離開。

我在十米外看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我和C、D都認為這三輛坦克的目的是衝散人群，否則我們當中至少死一千人，而衝散人群的目的可能是捉學生領袖，因一大群人回校不易動手。於是，我們三人便落荒而逃，沿途見長安街上很多衝突過的痕跡，如遍地碎石，一大灘、一大灘的血跡，由幾十至幾百平方米不等。三人幾經辛苦，找得一輛順風車，在政法大學門口停下。D先去探路，發覺安全後，三人直奔C宿舍。C隨即離去。而半小時後，政法大隊回來了，還抬了五條冒死搶回來的死屍，而各方面得來的消息令我幾乎支持不住。先是有二個同學進不到天安門廣場，隨即去了六間醫院，估計最少有一千具屍體；然後知道紅十字會在凌晨二、三點的公佈是死了二千多人，而根據最遲走的一批同學報告（包括一個曾藏在樹上），最後一批同學遭槍殺，而軍醫私下透露給學生領袖的數字是至少二千六百多學生因遲撤離而死亡，因為有些壓成肉餅，分不清楚到底有幾人。加上軍隊在途中，見人就殺，包括很多在牆上看熱鬧的小孩子。所以估計最少死了一萬人，包括二名外國記者。⁴

這時，因有幾個政法學生想設路障，軍隊向政法門口開了幾槍，還把門口一度堵塞。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覺得死亡是如此之近。留下去，怕軍隊遲些軍管政法；回飯店，

4 當時北京的消息很多、很紛亂，不少無法證實，外國記者身亡則更屬誤傳。

又怕在街上被軍隊亂槍掃殺。這時死了，可能比蟻還賤。於是，有很強的求生欲望，覺得有必要回到香港，將所見所聞揭露出來。在中午十二時左右，由一個政法同學帶著，騎自行車，回到飯店。

直至六月九日鄧小平出鏡前，我還以為是軍人弄權，想人民憎恨政府，好從中得利。但從最近的跡象看來，政府愚弄百姓，大舉搜捕學生和工人，又預先偷拍市民和學生之種種「破壞」和其他行動，很明顯又是一次「引蛇出洞」之「陽謀」，把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的人一網打盡。但其手段之殘暴，比希特拉更甚（希特拉只不過殺外國人），稍為接近的，可能是赤柬。但赤柬那時是剛取得政權，他們的軍人很天真地以為殺的是美帝的走狗。有誰可以想像得到出自人民的「人民解放軍」，在改革十多年後，可以毫不手軟地殺自己的老百姓。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的力量、血肉長城可以抵抗武力，但這次，卻暫時失敗了。

第二方面，我想談談學生。「四二二」、「四二七」冒死上街，令官方面子全失，這是建國四十年來未見過的。而「五·一三」之後的絕食，更喚醒了全北京市市民、全國，甚至全球華人。廣場上救護車的響聲，牽動著全世界華人的心。在現今，個人主義、虛無思想如此泛濫的中國，竟有這麼多人不顧自己的健康，甚至性命，去換取「對話」這麼小的要求，最令我心焦如焚的是絕食後第六、七天，眼看數千精英一齊變成「植物人」，這可比死

更痛苦。

北京所有的大學生都很自覺地罷課，五月底，我問一些畢業班的同學，怎樣看自己的前途。他們很理所當然地說：「對一個如此的政府，我們怎能安下心來讀書呢？」

當然，我不是說學生們都十全十美。例如有些學生糾察手腳「不乾淨」，但「六四」時，死的第一批，往往就是他們。又例如北師大一位學生領袖在學運前只顧考TOEFL，但國家需要時，又勇敢地站在最前線。我想說的是：人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平時他們表現出不少缺點，但在最危急的關頭，他們的優點卻表露無遺。

最後，我想提一提北京的市民。這次市民對學生支持之大，付出之多，恐怕在世界歷史之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從「四二七」、「五四」上街幫學生，到戒嚴初期冒死攔軍隊。六月四日，六里橋、木樨地、復興門等地一夜成名，不都是用市民們的鮮血換來的？當他們知道學生們被困在天安門，他們不顧性命地從西單撲向天安門，死完一批又一批。

在完畢之前，我想呼籲，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北京學生或北京市民，而非給柴玲一人，因為她不配（我將推動知情者詳述之），也沒有任何一人配。但北京學生卻是當之無愧，獲獎將是全球對此事之公開表態。

第三部分

水晶般的精神

——北京學運與屠殺

你的名字和你的事跡
在你的骨骸乾枯前已被遺忘，
你被謊言屠殺
那謊言已埋在更大的謊言之下；
但我在你臉上所看見的
沒有力量可以自我心中奪走；
沒有炸彈的爆炸
能震碎你那水晶般的精神。

——歐威爾

北京的學運及大屠殺，引起了全世界各階層人士的注意。它摧毀的固然是北京市民和學生的肉體，敗壞的卻往往是中國學生和知識分子的靈魂。只有少數人度過這場考驗，冶煉出「水晶般的精神」（the crystal spirit）。筆者在這裏所記的是一位默默無名的學生——E。

這次學運，有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像廣場指揮部和外高聯大部分領袖們的貪污、腐化、專橫、獨裁。例如廣場指揮部的人，屢次冒認北航之北高聯常委X X X的簽名，發出一些重要命令和通告。（這樣的事情多不勝數，

若非發生屠殺，學運也難避免走上歧途和帶來很壞的影響。）此類事情已令大部分香港的駐京記者、在京的學生和市民，甚至一部分海外人士感到很失望。而更多的人，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更產生了絕望。

E卻沒有走上變節或幻滅的末路，反而發展出堅定的「平等社會主義」信念。他和本校的學生在廣場的生活，讓他有機會呼吸到以「平等」為基礎的「革命氣氛」。在他的心目中，這是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內容。而且他知道，這種「社會主義」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有截然的差異。他心目中的社會主義，著重點在於個人的平等和自由，而「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幾乎將所有社會生活納入一元的官僚機器支配的統治方式。E似乎缺乏理論思考的興趣和能力，因此他沒有用概念來鋪陳自己的觀點。他只是平實地透過一些深刻的經驗，尋找自己的路。

E認為：「社會上一般的階級劃分消失的程度，在越來越追求金錢的中國，幾乎是無法想像，這裏只有學生和市民，誰也不是主人，可以擁有另一個人（當然，只是指佔領廣場的初期）。當然，這樣的一種狀況無法持久。它只是正在整個地球表面進行的一場大遊戲中的一個暫時的、局部的階段。但是這足以讓經歷過的人，受到它的影響。你處在一個小社會裏，其間希望比冷漠無情或玩世不恭來得正常，其間『同志』的稱呼，代表同志之情，而不是像大多數國家中一樣，只是騙人的玩意兒。你呼吸到的，是平等的空氣。我知道，現在的時尚是否認社會主義

和平等有關係。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裏，都有一大群文棍和教授，忙著『證明』社會主義不過是指計劃性的國家資本主義，貪婪動機則原樣不變。幸運的，是還有另一種與此大不相同的社會主義觀。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吸引人，使他們願意為它犧牲，也就是社會主義的『魔力』，正是平等這個理念。在北京學運期間，廣場和大學是一個具體而微的無階級社會。在那個沒有人意在圖利，一切都短缺，但看不見特權，看不見奴顏諂媚的小社會中，或許正可以粗糙地窺見社會主義的開始階段可能是甚麼一番模樣。到底，它非但沒有使我幻滅，反而對我產生了強烈的吸引。它的效果是讓我比以往更迫切地希望看到社會主義的建立。……」

這樣的文字，讀起來當然顯得太過天真、太過浪漫、太過理想主義、太缺乏理論的內容和現實的意義。但是，E連續幾個通宵不眠，在大屠殺的當日，還幾乎被坦克壓過。在這種情況下，他其實是在整理、反省自己最真實的經驗和感受，找出那對自己生命有最強大支配力量的道德價值。

北京紀行之九

(24/5-5/6)

林亦子
八九民運期間為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
現職醫生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我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將物資交給其他同學。

我們組織了一個物資站。我們決定分工負責跟各組織，例如外高聯、北高聯，和群眾工作。

之後我負責買食物的工作。大部分時間我在天安門廣場物資站和北京某食物工廠之間穿梭。從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下午期間大部分時間都是做買食物的工作，所買的食物包括麵包、水果、蔬菜、肉類、蛋等；還有買帳篷。

每天我都要來往在天安門附近的工廠一至三次，接觸最多的是工廠的員工。那些工廠大都是民營機

構，他們都給了我們不少的幫忙。

我們的物資站在廣場的東北角，運送食物不用經過糾察線運送。一般運送食物的程序是從南池子大街經長安街到物資站。後期部分運送食物的司機用三輪車或所屬單位的車輛。因為物資站附近時有不明身份的人拍照，所以那些司機有點害怕。

五月二十五日我到廣場與學生談話。我到廣場時是中午。廣場上的衛生情況很差。廣場上沒有水源，水源只設在廣場外圍。我曾與一名剛從河南來的學生談話。

據我所知，外高聯、北高聯、聯席會議等組織都很散亂。北京學生的膳食都是由他們學校的食堂供應。但外高聯及外地學生的膳食則無人負責。

我們到外高聯幫忙是因為想協調北高聯和外高聯。我曾參與外高聯爭論策略的研討會，但沒有甚麼價值。外高聯告訴我，指揮部沒有為外地同學準備食物。但實際上指揮部已為外高聯預備好了食物。期間又曾見到外高聯的總部，原設在歷史博物館，但後來卻不見了。感覺上外高聯的組織很鬆散，而且似乎不理廣場上的同學的死活。

我曾見過好幾個同學分吃一個饅頭，又或是只吃白飯而沒有菜的。因此我選擇幫助外高聯搞供應食物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時間跟食物工廠聯絡、算賬、接收食物等。我與學生傾談時原本是調查廣場內食物供應的情況。學生們雖對膳食有不滿，但他們都沒有甚麼投訴，套一句話說就是「挺一挺便過去了」。他們對民主、自由、官僚、腐

敗、官倒等問題更有興趣討論。

我曾到寧夏學生的帳篷。帳篷亦有其他工人與他們討論官倒問題，如大官倒的問題，一張條子轉一下手已幾十萬了。

工人又提到他們的工資有一半被強迫用來買國債，他們說這是單位要他們用五成的工資來買國債，但國債卻不見用在建設上。那些北京工人，約二十多三十歲，他們對學生有很高的期望，後來他們聽說廣場上的學生亦有貪污的現象，都很失望。工人都說每天都要來看一下學生才放心，又看看他們有甚麼需要。

我又曾見過兩個老婦人來看學生。一位老婦人對學生說他們如果肚子餓可到她家裏或任何人的家中，都有人做飯給他們吃。另一位老婦則勸學生回家，說他們的目的已經達到了。

那時學生只在廣場上靜坐，但廣場上氣氛卻不怎麼好，學生的情緒普遍低落。

北京學生的帳篷比較好，物資供應亦較充足，但外地學生的供應卻明顯差許多。

初期廣場指揮部說要二萬份食物，但後期在六月一日左右的時候只需要二千份食物便足夠了。但當有遊行時，或到處堵截軍隊的學生又回來了，所需的食物便再次增加。

我感覺學生都很辛苦，體力也不繼。有些學生辛苦得口號都喊不出來了。五月二十八日的全球華人大遊行，學

生的反應亦不見得很熱烈。

有一個晚上，我們到新華門附近去看看。見到那兒有五十多位學生在門口靜坐。我們曾與某大學的一名知識分子談話，他說敢留在新華門的學生都不怕死，他留在那裏是要支持和組織那裏的學生。他在日間常與學生討論各種問題，例如貪污等。我們所見在新華門的學生是最有秩序的，衛生亦很好。我們發現他們自己籌到的錢已用得差不多了，我們便給了他們一些錢。

初時我們與廣場指揮部在聯絡上有困難，就買食物一事有很多爭論。最初指揮部與物資部配合頗混亂，指揮部的負責人對浪費或多買食物一事很敏感，後來我們說把多買的麵飽做成麵飽乾，把問題解決了。我們亦瞭解到百姓捐錢後，月底已沒有甚麼餘錢了，所以對浪費食物很小心是難免的。

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二時，我與一名同學在長安街上走動時，見到長安街近王府井大街有六、七輛水車¹。那時我們感到氣氛很怪，那天早上路上有許多小販在賣《北京晚報》，而四下都有許多橫額寫著「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動亂」之類。前一、兩晚曾與一名工人談話，他說十年前北京天安門事件——七六年周恩來逝世時，鎮壓當晚，軍隊入廣場鎮壓、大屠殺後，立即清洗，故對水車特別敏感。

1 洗街車。

六月二日官方廣播不斷勸外地學生回到原來的地方，又說可以免費坐火車。六月二日當天沒有甚麼特別事情發生，但他們完全沒有警覺到會有甚麼事情發生。

六月三日下午我們與自願來幫忙的學生開會談論訂食物的事，開始有點組織，不用每天奔忙。開會時聽說六月二日木樨地有軍車撞死四個人。我們早上經過事發現場，那兒有施放催淚彈，一些學生馬上到廣場指揮部取來一些口罩給我們。

我們開會時曾聽到官方廣播點名指斥香港某大學學生在廣場上辦「民主大學」，又說這是非法組織，口氣很嚴厲。約五時，我們回北京飯店開緊急會議，討論廣場廣播問題。還沒有開完會，已接到香港朋友打電話來勸我們回香港。又有人告訴我們官方電視勸市民晚上千萬別上街。當時決定過了當晚再決定怎麼回應官方的廣播。當時仍不覺有甚麼事情會發生，反而說笑要吃最後晚餐。

晚上我與一個同學在吃飯，與他就是否回天安門廣場一事爭論，在公共汽車站等了好久也沒有車到王府井大街，所以步行往吃飯。在王府井大街上一間餐廳吃飯期間，曾見許多人到中國美術館那方向去。約九時，曾有消息說有軍人用皮帶打人，又曾見過一輛小軍車載著幾個軍人經過，但軍車在中國美術館附近的十字路口，五四大街與王府井大街的交界被市民截住。

我與同學爭論是否回天安門廣場，有一個三輪車司機來找生意，我們坐了上車經南池子街看天安門廣場，並駛

近廣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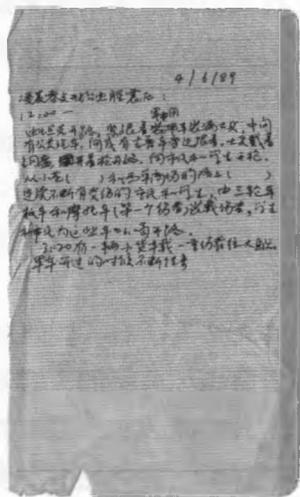
那天是天安門民主大學的開幕禮，所以廣場及馬路中有許多人。我們後來先向西回到X大學去看看，然後再約一時回廣場。到新華門時，那兒的學生已撤去。我們沿著長安街西行，經過中南海到一條天橋附近。約十時左右，開始擠得不可前進。我見到離我們一百米處有三輛普通公共巴士，其中一輛車頂有一個人把車上的軍用物資抖出來給圍觀的市民看，原來車上都滿載軍用物資、軍衣等。那時約十一時，車在那兒停了一個多小時。

不久有些學生騎單車經過，不住在喊告急消息，說某某地方有事發生云云。過了一會又看到約一百個學生糾察隊行列整齊的操過，他們的表現都很嚴肅，我把日間發給我的口罩給了其中一人。又過了一會我見到一些工人手持木棍，三三兩兩地隨學生糾察隊走的方向跑去。因為擠迫，我們的車仍不能前進。

十二時許，從遠處傳來一些槍聲，同一時間那兒的三輛軍用巴士燃燒起來，圍觀的市民都撒到附近的胡同內逃跑。我們坐的那三輪車的司機也走了。我們跟著市民撒入胡同內。胡同跟西長安街平行。過了一會我們嗅到有催淚彈的氣味，頗難受。有些市民早有預備，但我們的口罩都給了別人了。我在西長安街後的胡同內走動觀察四周情況。不久即有軍車在西長安街經過，槍聲越來越密。我沒見到坦克，但與我一起的同學則說他見到坦克經過。

後來我見到一輛摩托電單車載著一個傷者經過。我見

到他掩著左眼，左邊身及衣服滿是鮮血，市民紛紛叫讓路，傷者亦清醒，可坐在摩托電單車後座位上，但要人扶著他。我聽到不斷的槍聲持續了五分鐘，並不斷見到三輪板車載著傷者經過。我曾見過一百至二百個傷者，有些似乎傷的很重，動也不動，眼也合上。我不能分別是生是死。到了三時左右，沒有軍車的聲響，我坐在街角記下一些資料。



六月四日三時左右
匆匆記下的一些資料

我見到一些傷者臉色發白，不住冒汗，非常痛苦的樣子。²一些市民扶來了一個傷得較輕的人給我們看他的傷

² 應該是休克狀態。

口，我們見到他背部有一條約七吋的傷痕，另有一個有一厘米口徑似的子彈傷口，但不見流血。我所見的傷者之中多是傷在前、後身，但卻不見手腳受傷的。

有些人找來各種的武器如刺刀、子彈等。我的同伴說從槍聲得知，是發自半自動步槍、機關槍、手槍，亦聽到許多放催淚彈的聲音。在胡同口連接橫街的地方，不斷有救傷車穿梭接傷者到醫院。

我們在胡同內接近長安西街口偷看軍車的來臨，我們一聽到槍聲便躲到停在附近的車後面。曾有一次有一股很強烈的水柱向我們射來，我也給弄濕了。

後來我們跑到人群後面看，聽到外面有人唱《國際歌》，歌聲悲壯，但路上都擠滿了人，槍聲很密。但因路上都滿是人，見不到他們退。有些人在附近大樓上拍照，但閃光燈一亮，槍彈便射過來了。

三時許，天安門廣場上的人來到。有人說軍隊向學生開槍，另一人說軍隊已包圍了廣場，再一個人說軍隊雖包圍了廣場，但留下一個缺口讓人離開。此外還聽見目擊者說在我們撤入的胡同外的西長安街，他們見到三個學生舉著紅旗在長安街上與軍隊對峙。軍人放槍打死了舉著旗的學生，等其他兩個學生舉起旗後亦遇到同樣的命運。

凌晨四時許，我們從長安街後的胡同撤走，沿路所見有許多雜物，花盆、欄桿、垃圾桶被壓扁。一些路人見到我們便問消息。他們知道軍隊用真槍打市民學生，都很憤怒。他們又叮囑我們回去後必須告訴其他人這天北京發生

的事情，又教我們如何沿胡同撤走的方法。

期間我曾打電話回北京飯店同學的房間，但聽電話的是一個操純正北京口音的男子，他說我的同學已到了廣場去，又問我在甚麼地方，我因為懷疑他的身份，沒說甚麼便掛線了。後來同學們告訴我那是北京學生。

回X大學途中，有時要走出大街，見十幾輛巴士作救傷車，送傷者到北大醫院及二龍路醫院急救。我們回到X大學的時候已天亮了，那兒很平靜，市民如日常般擺賣。

六月四日下午我才聯絡到原先留在廣場上的同學。從大學區外出到那附近的賓館，卻見不到出租汽車。但有一個駕三輪車的老人家，我們便坐他的車繞胡同到火車站，電報局已關了門。火車站那兒很平靜。

我們沿大街從大學區到北京站，路上有如戰場般，地上明顯有坦克車壓過的痕跡，民居的窗戶也被打爛了，沿路都見到許多壓壞了的路障。車伕還說前一晚他曾見一個人拍一間車鋪的門，但內裏的人沒有開門，問他有關廣場的事，他說軍隊真的開槍殺人，他說他當晚載過廣場上受傷的人。

六月四日下午我才聯絡上同學，原來我的同學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被人搜查過，所以便換了房間，卻沒通知我。

回到北京飯店，見到東翼的玻璃大門明顯地有一個槍眼。飯店的人說，曾見到有一個人在北京飯店門前被槍殺了。

我們會合後，等待其他同學齊集（他們有些是由外地

學生送回來的)。然後我們到王府飯店下榻，整天在飯店內看CNN的新聞。全支聯的人去聯絡大使館和飛機票等。六月五日早上，我們等去飛機場的車，沒有甚麼事情發生。

第二部分

六月三日晚上至六月四日

三號下午香港同學開完會後大家去吃「最後晚餐」，我想與A在一起，所以約好其他人在天安門我們的物資站等。料想出飯店的時間大約在八點左右。沿著王府井大街，想乘103或104公共汽車，但站上的人說已經沒有車向這個方向開來了（向美術館方向），估計有些地方出了事。我們在附近唯一的一家餐館吃飯。那時我們一直爭論應否讓我回廣場，並討論這次學潮的種種啟示。我們都預感當晚會出事，但A估計的嚴重程度比我估計的高，並且有些考慮的出發點不同。A認為如果武力鎮壓，而被迫撤離的話，女孩子是對整體行動的負累，而我認為勇敢的女孩子大概能發揮一些男孩子要付出更大代價才能發揮的作用。那時舉了南韓的例子，心目中也就想所謂武力鎮壓也不過像南韓那樣。A認為我去了，他一定也跟我在一起，而他是外國人，在廣場是極不適宜的。而我認為我為天安門而來，最後也得回到天安門去。還有就是我和同學們是來共

患難的，這時我不能離開他們。爭論沒有結果。晚飯後在街上走時看見許多人向美術館方向去，我們也前往那兒探看。

大約十點左右，我們到美術館附近的十字路口，那裏聚集了很多人，整個馬路和行人道都是人。旁邊的人跟我們說許多話，告訴我們那裏剛發生了一次軍民衝突，軍人拿皮帶打人。我們逗留期間，有一輛很小的卡車載著幾位軍人。車開進了人群，被群眾擋住了。前面的人告訴我們擋車的人要車上的軍人喊「打倒李鵬」才讓走。軍車過了好一會才離開，聽不見有沒有喊這個口號。並沒有發生衝突。過了一會，我們離開那裏。

在美術館對面時，我們還拿不定主意，不知去哪兒。那裏有一輛三輪車上前兜乘他的板車，說汽車都不能在街上走了。我們上了車，還沒有目的，只是說到處看看。A堅持回X大學，我說如果回X大學，我要在下半夜一點再出來看天安門（因為一直有人說會在夜裏一點動手）。後來爭取到了在南池子街口看天安門。最後爭取到了長安街，沿長安街看天安門。A堅持不讓我進天安門，說我一旦進了物資站就不會再回來了。那時想去X大學裏看看也好，盤算著一點鐘再來看。

沿著長安街經過天安門廣場北邊，天安門一切如常，但人多了許多，街上滿是自行車，而且在廣場北面的長安街上設有路障，只留小路讓自行車行走。我們經過新華門，新華門前的靜坐師生已不知在甚麼時候撤走了，我想

起有一天下半夜我們拿睡袋來給這裏的老師和同學們，我們與一位很有意思的老師一直聊到五點。後來聽說那位老師與一些官員吵了一架，以後便沒有他的消息了。那天晚上還有五十多位老師和同學在那兒酣睡，這時空蕩蕩的了。那時候我心裏特別難受，想到天安門廣場也可能突然之間變得空空蕩蕩。

再往西走，看見B和C坐在攔開汽車和單車道的欄桿上。我們直往西走，到了西單，離天橋二百米，我們再不能夠前進了，便停下來看熱鬧。前面有三輛公共汽車，裏面有軍用物資。其中一輛公共汽車車頂有人，那些人將車中的東西拿出來並扔得老遠。遠處看見他們扔出軍衣、軍帽、盆之類，並沒有看見槍枝。我坐在行人道邊有一人高的欄桿上。有些學生騎單車經過喊著某某處告急了，這些單車都是從西邊來的。後來有一隊學生糾察隊模樣的學生從廣場方向操過來，有近百人，大多數有白口罩，但有的沒有。他們手上只拿口罩，並沒有任何武器，我把下午在廣場發的口罩給了一個走在隊伍後頭的沒有口罩的學生。我發現這些學生的面部表情非常嚴肅，他們看來只有十幾二十歲，後來我才恍悟他們這一去是去赴死的，這些學生是準備去犧牲自己年輕的生命的。學生隊伍走過之後，有零星的工人模樣的人三三兩兩手拿木棍、鐵棍，向學生走的方向走去。我沒有記住他們的面孔，我想這些人和學生都被當成暴徒殺害了。

十二點，遠處（西方）傳來槍聲，這裏的人群有點騷

動。有人開始燒車，三輛車幾乎同時被燒。槍聲漸近，人群開始撤入胡同，我和A隨著人群走進胡同。人群撤退很有秩序，毫不慌亂，群眾的情緒也並不緊張，有的準備好口罩和手絹。不久，我感覺到催淚氣體。接著在胡同裏聽見槍聲，很近，大家豎起耳朵判斷是哪一種槍聲，是否真子彈，一時議論紛紛。我沒聽過槍聲，只以為不是真的槍聲。問A，他說是半自動步槍，旁邊有人同意。胡同裏的群眾情緒開始有點激動，一 CCP 堆堆人在議論。

我奔跑於幾個人堆聽人們的議論，不知道甚麼時候軍車開進了胡同前面的大街（西長安街），A說是給坦克開路的。終於有第一個傷者進入胡同，是由摩托車推來的，傷者坐在後座，手捂著左眼，左臉和左邊的衣服流滿鮮血。傷者清醒，由幾個學生扶坐著。有學生在摩托車前開路，吆喝著：「讓開！讓開！快讓開！讓開一點……」使摩托車能快速衝過人群。傷者走後，我回到A身邊，人群也不再一堆堆圍著。大家都在問：「這是否橡皮子彈打的。」人們的腦子還轉不過來。這時我集中注意力聽大街上的軍車聲和槍聲。有各種不同的槍聲，我一一請教於A，得到A愣愣的回答，「衝鋒槍」、「手槍」、「半自動步槍」、「瓦斯」。傷者越來越多，由三輪板車跑著推，照例有一群學生護著，有的穿白大衣，也吆喝著搶路。我盡力往前擠去看受傷的人，以證明他們是被橡皮子彈打的。群眾也議論紛紛，不知如何判斷。多數傷者看來傷很重，其實很難判斷他們是否已經死了。我極力想記住他們的面孔，

我想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的樣子——慘白的面孔、雙目緊閉、滿面滲汗、身體某一部分一片血，一副極度痛苦的模樣。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多數不是學生。群眾只能閃出一條路來給這些載著傷者的三輪板車，不知道怎麼反應，不知道能做甚麼。後來有一個學生拿來一個彈殼，兩把刺刀。人群圍上去，有人在鑑定刺刀柄上的花紋是否軍中特用，有人在鑑定子彈是否真的。子彈殼是銅色的，大家都認為是真的，但並不清楚是否體內爆炸的子彈。兩把刺刀則有人懷疑是否普通製造的，後來有口氣好像很權威的人說其中有一把是軍中特用的。後來又有一位傷者被送來，人群圍著看其背部的傷口，看來傷得不很重，能坐在三輪板車上。在胡同裏昏黃的燈光下，並不見到血在流，但有一道很明顯的紅色的痕，有一點較為深色的地方，有人拿著子彈殼在傷口上比劃看，像是示範子彈的路線。

可以看到人們開始清楚槍口子已對著老百姓，而且開始大屠殺，情緒也憤怒起來了。胡同裏有的中型卡車被開出去救人，有幾個人跳上貨卡。卡車急速地開出去，聽得出開足馬力的汽車發出的吼聲，是憤怒的聲音。較早時有一輛救護車開來停在路口，受到群眾鼓掌和歡呼：「好！」估計那晚自始至終只有一至二輛救護車在此使用。停泊的一輛，走了就沒有了，後來又來一輛，所以同時出現的只有一輛。至於是否總是同一輛被使用，還是有另一輛在輪流，則不清楚。反正救護車與三輪車的比例太懸殊，運載傷者（或死者）主要靠三輪車。外面槍聲很密

集，間中只有很短暫的停歇，催淚彈的聲音也很密，但我這兒已感覺不到了。胡同裏運傷車的吆喝聲越來越多，死傷者從兩條路被運去醫院。後來我向街上一位女子打聽他們將會被運往那個醫院，回答是二龍路醫院和北大醫院。我沒有算死傷的數目，不過我親眼看見被人送走的估計有幾百個。

大街上有人喊起口號，口號聲越來越響，初時不知道喊些甚麼，後來問旁邊的人，才知道喊過「殺人犯！」「法西斯！」「獨裁！」「打倒李鵬！」響徹雲霄的憤怒的口號聲與槍聲夾雜在一起，一直沒有斷，槍聲並沒有使人群後退。胡同裏的群眾有的很惘然，有的又圍在一起討論起來，有的跑到胡同口、街上看。「我們這個政府徹底完了。」「槍口竟然對著老百姓打了。」「國民黨還不至於這樣對待咱們老百姓。」「中國幾千年歷史沒有這種事。」「世界歷史上也沒有。」「回去好好說說，我們這個政府就是這樣對待咱們老百姓的。」「中國人是殺不完的。」「他們倒下，還有我們。」……他們心中沒有悲傷，只有憤怒，他們只有一種心理準備，就是去戰鬥。紅色恐怖之後的白色恐怖，他們會怎麼樣？

槍向胡同裏開，人們躲在胡同裏食物車、汽車等掩護物後面避子彈。槍聲停了，人們又出來在胡同口看大街。槍聲一響，大家又四處逃散。

聽見大街上有成千上萬人在唱《國際歌》，歌聲響徹雲霄。在胡同口望去，外面黑壓壓一大片人。我這才知道

大街上有這麼多人沒有跟我們一起撤入胡同，他們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向對著他們開火的軍隊示威。《國際歌》歌聲夾雜槍聲，人群一直在歌聲和槍聲中沒有動。這是我看見的最壯烈的一幕。這一幕至今還常常浮現在我面前，那帶槍聲的《國際歌》至今還常常在我耳邊迴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這《國際歌》歌聲中倒下，他們用自己的生命來換取真理，用生命證明真理。

有一次槍聲稍停，我跟人群又到胡同口向外張望，突然有軍車開過，我感到一股很大壓力的水向我射來。幸好不是子彈。人群四處躲避。

近三點，這裏已經平靜，因為軍車隊已全部駛過這個地段了。人們仍在胡同裏等待甚麼，還有人在議論。有人從天安門過來，講述天安門的情況。有位年輕人說天安門已被包圍，軍隊向學生開機關槍，向帳篷掃射。我以為我們中大同學都遇難了，以後一段時間一見人就問知道天安門的消息嗎，後來有一位從天安門來的人說天安門雖被包圍，但留了一個口子讓學生撤退。那時無法確定事實是怎樣的，只判斷以上兩種說法的情況都同時存在。心裏很焦急。這時從天安門來的消息是廣場西邊的路口被封鎖了，我們不能去天安門了。

本想在那裏呆到天亮，就在胡同裏的一盞路燈下湊著很暗的燈光寫剛剛發生的事情。A幫助我澄清一些事。寫了一段，又跑去打聽天安門的消息。湊到一個人堆裏，但人們並不在談天安門，倒聽見一位戴眼鏡的青年人講三個學

生的悲壯故事：

就在我們這個路口，有三個學生舉著一面旗，站在軍車旁邊。士兵向舉旗那個學生開槍，他倒下了。其餘二位學生彎腰看了看自己的伙伴，其中一位又舉起了旗子。士兵又向他開槍，他倒下了。最後一位同學舉起旗，也倒下了。

我想起那面旗。在撤退之前我看見路口唯一的一面旗，是一面紅旗，我看不清楚是否國旗，不過肯定披上血染的風采了。那塊用年輕、勇敢的生命保護的紅旗，時時在我腦中飄揚。

三點多，因為軍車都過去了，這裏的人群逐漸散去。我們決定離開。從天安門那邊過來的人告訴我們路已被封鎖，我們再不能過去天安門那邊了，我們決定先回X大學，利用電話與北京飯店聯繫。一路上到處打聽天安門的消息，可是一路上看見在路邊聚集的人們都是等待天安門消息的。直至我們走了很久以後，看見一位年青的三輪車夫急沖沖地跑到一家店門口猛拍店門，拍了很久，裏面才有微弱的聲音應著，門並沒有開。年青人口裏大罵：「X X X這老頭不愛國！」我看了看店牌，知道是車鋪。我趕緊跑去他前面打探消息，問他天安門怎麼樣，開了真槍嗎？他面帶怒氣地說：「我這不剛從天安門拉出幾個被打的學生嗎？」問他廣場上是否開了個口讓學生撤，答曰不知道。我沒有心情再與他扯話，繼續趕路。

在這之前我在路邊的電話亭打電話回北京飯店4078³，接電話的是一位講純正北京話的男子，我愣了一下，問：「是4078嗎？」對方停了一會，答曰：「不是。」我正覺奇怪，對方又問：「你是誰？」我說：「我是香港學生，我想問我們的同學現在在哪裏？」對方停了一下，又說：「他們出去了。」「去了哪裏？」「天安門。」「甚麼時候去的？」「剛剛出去。」我心裏越來越著急，越想越糟，唯一期望就是同學們真的是剛剛出去，而如果天安門已經被封鎖了的話，他們不能進去便不會有危險。對方又突然問我：「你在哪兒？」我心裏很慌，不敢告訴他我的位置，只說我在街上。掛了電話，很懷疑對方是特務，莫名其妙怎麼這個時間我們房間有這樣的人，而且說的話很值得疑心。

路上仍有許多群眾，在議論，在等消息，看見我們從天安門方向來，又去電話亭打電話，看似記者或學生，旁邊又有外國人，便蜂擁上來，問看見開槍了嗎，是真槍嗎等問題。一一回答後，各人嘆息，各人紛紛囑咐我們將我們所看見的和所聽見的回去好好說說。當人們知道我是香港學生，是來聲援的，都紛紛勸我趕快離開這裏，離開北京，趕快回家。雖然如此，我還是與路上的人們談了許多話。我覺得我們都是一樣的，我們對這個國家有同樣的感

3 編按：中大同學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號碼。

受。那時我的嗓子幾乎說不出話來了，老百姓還是跟我說了許多，而我能做到的便是不斷地作出許諾，說我回去了，一定把一切都說出去。

一路上所遇到的老百姓給我的印象就是很迷惘，大家圍在一起，極力用自己的回憶和想像，問這樣的問題：中國歷史上有這樣的事嗎？世界歷史上有這樣的事嗎？問我旁邊的外國人：你們國家有這種事嗎？很明顯，他們和我們都無法找到肯定的答案。「這政權沒了，徹底沒了！」夾雜許多憤怒的罵聲，好心的人悄悄地叫我們快點走。

我們一直走到天亮才到西直門，一路上許多群眾圍在門口、路口議論。我心裏很著急，不知道同伴們的下落，萬一出了事怎麼辦？我們開始急速地趕路，避開人堆。穿過一道道胡同，一段段大馬路，不知道前面路口是否有坦克，一直很警惕。靠近西單的那段馬路上有很明顯的被坦克和裝甲車壓過的和撞了的路障——有欄桿、花盆、垃圾桶，亂糟糟一大堆一大堆堆在馬路中央。其他地方並沒有軍車走過的痕跡，街道上起初有許多人，人聲嘈雜，到後來只有一些人聚集在路口或蹲或站，越來越沉默。人們看著救護車呼嘯而過，後來用卡車和公共汽車運著一批批學生、工人衝向天安門方向，車窗擄出紅十字旗，相反的方向開來的是運載傷者的車，卡車駛過可以清楚看到救護人員用氧氣罩和料是輸血的容器施在傷者身上，救護人員是站著的，挾著以上的東西，有的扶著傷者，公共汽車則只能看見裏面有人在忙著些甚麼。

六點多，我們在西直門立交橋下取了單車，問了寄存處的老師傅有沒有軍車，老師傅說沒有以後我們稍為放心。我們騎回X大學，一路上平靜得好像另外一個世界，小攤販在準備開市，我們在地鐵口買了幾個油條，覺得這個世界竟還需要吃東西，心裏有說不出的奇怪。當把油條強咽下去時，覺得自己簡直不想活下去了，不知道甚麼能使自己活下去，生存的意志在這個平靜的世界崩潰了。

X大學的門口很平靜，門口沒有甚麼人，只看見一個滿面塵垢，表情沉重的人，從他那副樣子猜想他是從戰場上逃出來的。A告訴我別向任何人說我們從哪裏來，只說我們剛從清華過來，佯作甚麼都不知道，不要跟別人搭話。我們徑直向我們所住的Y宿舍去。這時只有六點多，Y宿舍毫無動靜。到了我的房間裏，我倒頭便睡，不知道接著應該做甚麼，無法想，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麼樣，不知道軍隊何時開進來。迷迷糊糊睡去，似夢似醒，像是剛睡著，便被A叫醒。去了另一位D的房間裏。那位留學生曾在我家作客，挺熟的，前幾天我見到他，還聊起天安門，那時是興高采烈的。這時我一句話也沒法跟他說，只是啃著他預先為我準備的早餐，聽他講昨晚BBC對天安門屠殺的報導——坦克開進天安門壓學生。我腦子裏登時浮現一幅幅恐怖的畫面。我不敢相信他在講的是發生在我的國家的事。離開他的房間時，我覺得自己像難民一樣，在自己的國家受著外國人的保護，我們到底做了甚麼壞事？那時唯一的想法就是逃出去，逃出去。

在校園裏走的時候不知道門口是否有軍隊或公安，心想如果是公安的話是我的幸運，可能免於一死。A跟我說話，我無言以對。A說我應該堅強，應該首先去找我的同伴們。我說我無法去北京飯店冒險，我必須先打電話。商量結果，我們去火車站，在那裏買好火車票隨時準備溜，那裏也可以打電話回家和打電話去北京飯店。

在X大學附近一間飯店門口被兜乘一輛三輪板車，每人四十元去火車站，如果能報銷的話還得四十五。師傅說所有汽車都不走了，而且長安街被封鎖了。去北京站必須過長安街，師傅說他熟悉小胡同繞過去。師傅一路問他的同行去北京站的路怎走，又跟我們談話，講的都是近似昨晚街上市民的那些話，不過他還講了昨晚的親身經歷。師傅告訴我們昨晚他一直在街上接載傷者，他告訴我們昨晚最激烈的戰鬥在建國門橋，是他親眼看見的：建國門橋上有幾十個老百姓向軍車衝去，軍人向他們掃射，他們倒下了。接著又有一批向前衝去，又被射倒了。不斷地向前衝，不斷地倒下。一批倒下，又有一批人衝上去。他說死去的有幾百人。師傅跟我們說這些時語氣並不特別憤怒，就像小時候大人講戰爭故事那樣。這時才知道我以前只不過是將那些戰爭故事當成神話來讀，當神話變成現實的時候，我是多麼驚慌，我要逃離現實，使之重新成為神話。然而，師傅講的是現實生活中的東西，他無法逃避，或許沒有想到逃避，他講的是生活中熟悉的事情，大屠殺以後他依然要工作，要生活，他不會像我那樣驚慌，他不會像

我一樣想回到自己的地方尋回自己的生活。這只是他們的地方，這只是他們的運動嗎？有甚麼道理他們要付出這麼多？有甚麼道理我們可以離開？

我們在胡同裏繞來繞去，後來走到了大街上，師傅將路旁民居牆上和窗戶上的子彈孔指給我們看，路上的公共汽車上也有一些子彈孔。師傅還叫我們看地上的白色痕跡，那是坦克車履帶壓過的痕跡，從這些痕跡可以想到坦克車的數目相當多，因為印跡很雜亂，覆蓋的面積亦相當廣。還有許多燒過的公共汽車、卡車，許多市民在圍觀。大街上有許多人，或走路或騎自行車。沒有汽車行駛。

火車站外面有許多人，並不像想像中冷清，也沒有看見軍隊，入口處只有往常那種穿制服的鐵路糾察隊，沒有檢查甚麼。我在那個口上進出不下五、六次，那些糾察隊連看也不看一眼。我們先去火車站對面的電報局打電話，電報局沒有開門營業。電報局門口的公共電話排著長龍，於是我們先去售票廳買票。我決定與A去長春，然後乘飛機去廣州。A本來買好下午去長春的火車票。

火車站沒有預料中緊張，沒有看見軍隊和警察，也沒有看見很多學生。旅客比往時少多了，候車室裏很空，國際售票廳一個人也沒有，國際候車室有一些外國人，氣氛平靜。

很容易買到下午的車票，便去打電話。北京飯店的電話極難打通，打通了也往往沒有接線生聽電話，接了電話去4078又沒有人聽。兩人輪流打了不下幾十次電話，都沒

有結果。

借電話給我們的地方是靠近火車站的一間介紹住宿的小鋪，在那小鋪的前面我碰見了前幾天晚上在天安門某省學生的帳篷裏認識的小學教師，她是來北京上訪的，與某省學生住在一塊兒。六月三日晚上有好心人勸她早點離開，她在十二點左右離開天安門。我看見她就像看見隔絕了半世的親人，我無法形容當時那種激動的心情。我求她快點離開北京，但她告訴我她不知道回去以後怎樣去給那些鄉親父老交代他們的孩子們哪裏去了。她說她還要去住在前門的一個熟人，想去那裏打聽一下。我無法勸阻她。她講話的音調和表情就像前幾天在帳篷裏跟我講她的十一歲兒子被警察打死的時候一樣，眼神裏帶著一種哀傷和堅定。她不相信她十一歲的孩子有甚麼錯，今天她也不相信跟她同住十幾個日夜的孩子們有甚麼錯，要遭受那麼殘酷的殺害。我第一次見她的時候是我去他們帳篷調查食物的問題時，那個帳篷裏還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工人，我當時問他們食物怎麼解決，因為廣場上的學生憑學生證每人只能領取一份食物。他們告訴我是學生們省吃一點，分給他們。我們給同學們搭的帳篷，他們擠著住，他們就是這樣互相幫助地過著這十幾天的日子的。一夜之間，孩子們不見了，她能這就回去嗎？

我還要去我的同學們，我不能跟她一起去找人。離開她以後，我常常揪心地想這位四十多歲的女老師和那頂新帳篷下的那些人。那帳篷是我們買的第一批帳篷，是我

和外高聯的同學去買的，也親眼看著帳篷搭起來。我在那頂帳篷裏從天剛黑坐到下半夜，和那裏的同學、某省來的工人和這位老師，還有其他市民、工人聊了許多。我至今還未與他們聯繫上。我寫信給那位老師，還沒有回信。那個帳篷在廣場北面，處於當晚非常危險的地帶。

臨上火車，終於與北京飯店的E聯繫上，知道我的同學們都安全。後來聽電話的人叫我馬上回北京飯店，因為英國大使館會保護我們。

天在下雨，回北京飯店的路並不危險。回到北京飯店，又以為很安全，因為有英國大使館的保護，但不久便發現這只不過是各人的自我安慰而已。

「六四」前前後後的事

林亦子

八九民運期間為社會學系四年級學生

現職醫生

(一) 回想

快二十五年了，一直都不敢去碰「六四」的資料。零零散散的影像、文字總會碰到一些，但每年在特定時間展現在書店當眼之處的書籍，我一直迴避著。實在是太沉重了。一直知道自已的故事就在某一個角落的。

一直遺憾著、焦慮著、放心不下一段歷史被遺忘、曲解。不能再等了，腦子裏刻印著的記憶正在慢慢流失。

「八九六四」後，我急切地留下屠殺當晚的一切細節。這段經歷被錄過見證，也寫了下來。「六四」以前的故事呢？那麼多年一直沒有動筆。

這麼多年來，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晚會是每年盡可能參加的。即便是在外地不便參加，六四當天必會絕食24小時，並有一束小白菊花放在案頭。對於當年親歷這場運動的我，每年的節目就算多麼死板、口號又怎麼千篇一律，

又有甚麼相干呢？我們每一位學生畢生都背負了一個債。我們受了多少北京市民的恩？答應過多少北京市民的重託？縱然我們學生之間有少的爭論，我們在廣場上見到如斯的負面事情。但這些東西，能抵消我們對歷史的責任，能改變這場學生運動的意義，能合理化這場屠殺的性質嗎？

縱然很多細節遺忘了，但總有一些記憶沉澱下來。今天第一次讀到中大同學們的「北京紀行」。絕大部分已經紀錄下來的事實仍和腦子裏留下的相符。我的記憶看來還是可信的。但請原諒，我無法再記得大部分人的名字、具體的時間和地點。

（二）廣場

天安門指揮部設在人民英雄紀念碑。指揮部的守衛森嚴，有三重糾察線。一般的同學是不能隨意上去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們是如何跟廣場的廣大同學溝通的，真是天曉得。我們中大同學似乎有特權，憑我們的學生證可以上去指揮部。後來憑中大學生證可以領取前往指揮部的通行證一張。我還保留著當年的通行證。

我並沒有經常去指揮部。事實上我並沒有



憑中大學生證領取的通行證

甚麼事情要去指揮部談。我們另有同學負責和指揮部的聯絡工作。

所有去過天安門的同學都會感到天安門的環境十分不理想。外地同學營地的環境更是十分惡劣。

大家都不知道運動如何進行下去，也不知道如何去結束這場運動。這場運動已經發展到無人能駕馭的地步（也許還有同學不贊成這個看法）。有外地同學離開，更多的外地同學湧到天安門。他們肯定帶了某些理想、想法、熱情、追求而來。這是我們無法去控制和疏導的。儘管我們的看法跟他們有不同，正如我們中大同學之間的意見、看法一直不同，我們無法去操縱其他同學的想法一樣，我們無法、也無權去控制內地同學的想法。

當時我們中大同學大致這麼想：既然運動還在進行中，還有同學需要支援，我們就會支援到底，不能中途離開。我們要和天安門的同學共同進退。我們這幫中大同學真的有一種願望：如果同學們還需要使用天安門廣場，我們就必須整頓天安門。但我們對這場運動該怎麼發展，並沒有一個清晰的想法。我真的十分希望我們這些同學好好回想一下，我們當時是怎麼想的。我本人當時是極為克制自己，免得將自己所帶有的既有的偏見強加於內地同學身上。例如民主的理念、開會的方式、討論問題的作風、民主的胸襟。我們憑甚麼去影響他們啊？在此刻，所有平時在書本裏讀到的民主理念，用得著嗎？其實也沒有時間讓自己好好思索。

整頓天安門應該是從學聯送來帳篷開始的。廣場絕食後，學聯送來幾十個（具體數目是多少？好像總共是120頂）色彩鮮艷的野營帳篷，一個個整齊地架設在廣場一處，蔚為壯觀，使廣場上的人精神為之一振。當時的學運有沒有因為海外的支援而受到鼓舞呢？那肯定是有的。這些帳篷應是優先分給參加絕食的同學使用的，指揮部也取去一些。所以指揮部上也有幾頂五顏六色的野營帳篷。

物資分配和其他帳篷的架設是整頓廣場的第二步。學聯直接從香港運來的帳篷顯然是杯水車薪，在天安門廣場只是一種點綴。所以有同學負責起在北京購買綠色的軍用帳篷，給其他同學用。

有一晚在廣場上通宵幫忙搭帳篷。當第一個綠色帳篷整齊地被架設起來時，多麼高興。那晚看到廣場上當值的糾察同學穿著綠色的軍大衣，我穿著白天的短袖T-shirt，冷得發抖。我壓根兒沒有想到北京晚上會那麼冷，根本就沒有帶冬衣來北京。北京白天和晚上的溫差很大，白天很熱，下半夜的溫度恐怕只有攝氏幾度。如果同學們要在廣場上呆下去，帳篷的架設逼在眉睫。

清潔廣場也是整頓廣場的一環。廣場上垃圾堆積如山，帳篷凌亂，帳篷外到處放著垃圾。剛到天安門的那一刻，我就感到十分擔心，這樣下去的話，廣場上會爆發疫症，到時後果不堪設想。不知道是誰去採購了一批清潔用具——掃把、垃圾鏟和籬筐之類，準備發動同學自己來做清潔。可惜同學們對此並不熱衷。同學們寧願在帳篷裏呆

著，即使是無所事事，也不願意出來幫忙收拾一下，掃一下地。有一次在學聯漂亮整齊的帳篷前，呼籲同學們一起來掃地，不料反應極差，三兩香港同學在示範掃地，外圍圍了一圈同學圍觀，沒有人動手幫忙。當時真的頗生氣，心想難道搞民主運動就不能掃一下地嗎？連清潔自己的環境都做不好還搞甚麼民主運動呢？內地同學可能會覺得我的想法很小家子氣，很沒有大志。但這的確就是我的作風。搞民主運動和生活的小節有何矛盾啊？

後來就有了更多更大的天安門整頓計劃，包括民主大學、全盤的天安門分區圖之類的東西。天安門大學的目的是讓同學可以學習民主、實踐民主。免於用不民主的手段去爭取民主，免於變成「小官僚打大官僚」。民主是需要長時間醞釀的，不能建立在浮躁的革命情緒之上的，那時我隱約感到這一點。天安門的藍圖一開始怎麼來的？那張藍圖是誰畫的？需要當事人同學來回憶一下。整頓天安門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有一晚我們幾乎所有中大同學都一起到指揮部去了，那晚要討論整頓天安門。通過幾重糾察線，到了看來是最核心的帳篷裏。說實在的，一直到處跑來跑去做實務性的工作，一下子跑到「權力核心」去，覺得挺別扭的。天安門是屬於廣場上所有同學的，不是屬於學生領袖的，當時是這麼想的，所以當時所做的工作是以幫助廣場的同學為重點。指揮部並無燈光，帳篷裏大概只是用了強力的電筒。具體有誰參與，看不清楚。只知道當時有柴玲和封從

德在場。中間幾個人坐在那裏討論，大部分中大同學站在外圍。沒有見到柴玲和封從德的面容，自始至終，我都沒有見到廣場上任何一名學生領袖。那次開會一開始就聽到柴玲的聲音，很大聲。她似乎是在發脾氣，聲音沙啞，焦慮而混亂。聽不清楚她具體在講甚麼。後來封從德講話了。他講話很從容和冷靜，就著面前的天安門藍圖在講。藍圖裏面有天安門的具體分區。當時沒有看清楚這張藍圖。有沒有人把這張藍圖保存下來呢？

這張藍圖肯定是沒有實踐過的，因為很快就鎮壓了。

天安門曾經是多麼熟悉。物資站、帳篷區、指揮部、外高聯帳篷、北京飯店，走過多少遍了？多少年了，合起眼睛都很清楚這些地方的位置在哪裏。這些地方已經深深刻印在腦子裏了。但現在記憶已經開始模糊，不復記得學聯帳篷的具體方位，外高聯的帳篷位置也想不起來了。

當時在北京，氣氛是挺緊張的。但當時也沒有時間去多想。大家依稀覺得總有一天會被鎮壓，但天天講著鎮壓，著實也有點麻木了。當時想到的鎮壓場面就像七六年天安門事件那樣，在廣場裏鎮壓。香港傳來的消息更加恐怖，當時的通訊並不方便，唯一的聯絡方法是打電話到北京飯店。成天在外面，家人即使打電話到北京飯店也找不到人。有一次收到家裏的電報，稱家父病重，催我回香港。後來磨磨蹭蹭，也終於沒有離開北京。

大約是六月一日，還是六月二日，晚上從天安門走回北京飯店的東長安街半路，遇到一位中年男士在和幾個人

討論著甚麼。當時應該是十分晚了，沒有行人，街燈昏暗，氣氛有點詭異。原來這位先生是七六年天安門事件的參與者，在講他當年在天安門的經驗。中國的歷史是斷層的，廣場上沒有多少同學聽過天安門事件。反而我們這些香港同學比較清楚。平時我們有研習中國現代史，整理過民運資料冊，辦過現代史研習班，中大國史學會也保留了天安門事件的原始資料。許多當時的重要民運分子的文章我們都仔細研讀過。這位先生的身份馬上就吸引了我加入討論。習慣了不問別人的名字，對這位先生也不例外。一直沒有記下任何有關這位先生的資料。但現在講起天安門的故事，總會講到他這一環，總會想起他。但願他一切安好，沒有受到第二次的天安門劫難。他也是八九學運的天安門常客，這天他特意站在東長安街來告訴學生們一些事情。他希望我們注意他所在的附近的一些東西。他指著停泊在路邊的洗街車，告訴我們，這就是清場的先兆了。七六年天安門鎮壓後馬上就派洗街車清洗現場，鎮壓第二天天安門已不再留下任何鎮壓的痕跡了。我這才注意到，東長安街兩旁停泊了好幾輛洗街車，頗不尋常。平時這裏並沒有洗街車停泊，而且半夜三更的，泊那麼多輛洗街車在這裏幹甚麼？這裏平時也用不著那麼多部洗街車洗街啊！可是也許由於當時每天都「狼來了」，並不特別在意這個先兆。當時還天真地想，本來就準備在鎮壓的時候扮演救援的角色啊。沒有人會離開的。現在想起來，這位先生的觀察和預測真精準。

這位先生還和我們說了一些當年在天安門裏清場的情況。如果天安門大學能有機會開課，真希望這位前輩來講講課。

廣場上一定有許多交談和互動。這裏有來自不同地方的同學，有不同年齡的人，有不同國家的人。像個嘉年華。海外的支援和參與對天安門運動有沒有影響呢？肯定是有的。海外的推波助瀾是不是導致了屠殺呢？如果是，我們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使掌權的人起了仇狠、起了殺心。我們的「罪」在於扮演了「潘多拉」，打開了魔盒，讓所有的災難、邪惡暴露在世人面前。我們不合時宜地觸怒了權威，我們不成體統地冒犯了天朝。可是到了今天我還沒搞清楚甚麼是時宜，甚麼是體統，甚麼是權威，甚麼是天朝。殺人難道不是一個底線嗎？北京市民到底犯了哪一門子的罪，招致殺身之禍？我們這些香港同胞挑動了誰的哪一根神經，導致大陸同胞無窮無盡的磨難？

（三）外高聯

當時天安門的學生組織有北高聯和外高聯之分。北高聯是北京高校聯合會，外高聯是外地高校聯合會。廣場上有大量外地學生，來一批又走一批，來自不同的地方，組織必定是十分鬆散。外地學生的資源比不上北京學生，也是十分明顯的事實。他們的意見容易被忽略。我們這些中大學生是刻意想給外地學生多一點幫助的。我們去外地同學的帳篷瞭解他們的想法，瞭解他們物資上的需要。他們

挨餓受凍，我感到焦急。我們的物資站和帳篷搭建大部分都是衝著外地同學的需要而做的。

對於如何支援天安門的同學，如何參與這場學生運動，中大同學沒有一個統一的想法。每天都會爭論，那是常態。在中大時一直如此，在北京天安門／北京飯店也是如此。但我們的同學大致上有個分工，都是按照自己的興趣去做的，沒有人被指派工作。有同學去外高聯的帳篷裏去旁聽他們的討論。中大同學先先後後到北京，有的先到，有的先離開。我們並沒有一致的步調。那段時間，我們那一批同學是由我和廖雪雲同學負責去旁聽外高聯會議的。我自己的心態真的是去旁聽，並沒有想過去影響他們，或參與甚麼意見。從到天安門那一刻，我感到我真的像一名外來者，因為我並沒有像內地同學那麼強烈的感覺和衝動。這場運動始終是屬於他們的，他們遇到的問題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的訴求來得熱切，是很自然的。我始終是十分冷靜的。香港同學應該扮演甚麼樣的角色是我們時時爭論的，當然是沒有甚麼結果。但我們大致上有一個共識，就是我們要做像紅十字會那樣的工作，即在平時做支援的工作，在鎮壓發生的時候就做救援的工作。我們每一個人都會和天安門的同學共同進退。

剛開始物資組織工作還未成為我們的主要工作時，我去外高聯的帳篷還是比較頻密的。

外高聯的帳篷設在天安門廣場外圍，在歷史博物館前面。離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指揮部挺遠的，顯得有點孤單。

在天安門裏的帳篷看上去比較令人安心，在天安門裏總像有人保護似的。市民經常會到天安門廣場裏去探望學生。有的人每天都要去天安門裏走一走、看一看才安心。北京市民就像守護自己的孩子一樣守護著天安門的孩子。但天安門外圍的孩子就像孤兒，天生就沒有安全感。尤其是夜幕低垂後，天安門外圍無燈光，氣溫驟降，恐怖的氣氛就會襲來。印象中外高聯的領袖們是不能單獨外出的。有一次見到外高聯主席在帳篷外走，單獨一人，感覺十分詭異。他是十分年輕、瘦小、書生氣十足的同學。他走路時一直向四處張望，神情十分慌張、焦慮，走路速度很快。從他的不安，可以看得出他好像預想到一些危險，一些他所不能預知不能掌握的事情隨時會發生。那時天天都流傳著清場、鎮壓的消息，每天回到北京飯店，總有記者拉著我們這些學生來講——收到消息，很快就會鎮壓了。大家心裏都好像預感到鎮壓即將到來，但又僥倖著災禍不會發生。

旁聽外高聯的會議都是在晚上。是不是只在晚上才開會就不得而知了。每次開會的氣氛都很緊張。會議大概沒有很好的程序，也沒有很好的會議記錄。先會交流一下目前學生運動的形勢，進而會討論策略。這時是失控時間。氣氛會越來越升級，沒有人能控制場面。開會的同學坐滿帳篷，該有十幾個人，每個人都在講述自己的主張。似乎沒有人在細心聆聽別人的主張和分析，沒有人用心回應別人的說話。每個人只是在搶著表達自己認為正確的想法。

事實上每次會議都會如此：隨著會議的進行，都是一個比一個講得激昂，提出的主張一個比一個的激進。每次總是以暴力革命、全市全國工人大罷工為最後一個人的主張。沒有人能作出一個總結。無法再討論下去了。氣氛僵住了，情緒失控了。開會總會充滿焦躁不安的氣氛。當時的運動已陷入僵局，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走，不知道出路是甚麼。可以看得出，學生領袖們也許感覺到很強的不安全感。激進的主張，無論不可行，看上去總算像一個突破口，也許還可以掩蓋心中的恐懼，也許這樣顯得自己更有力量。

回想起來，縱然當時的同學顯得多麼幼稚，多麼不現實，一切都可以理解，一切都可以容忍。同學們每天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踏出了一步，這就是不歸路。參與學運就等於是豁出去了。他們前路茫茫，不知道將來的路怎麼走。也許會有生命危險，也許升學和就業會出現阻滯。這一切，都是他們的現實，都是他們的生活。學運不能自動結束，學生們不停地來。一方面有強大的信念、強大的訴求在背後推動他們，也有巨大的無形的擔憂和恐懼在背後支配著他們。

（四）香港物資站

香港物資站的物資是由香港市民捐獻的錢購買的。由中大學生主持，當地學生協助管理。物資站設立在廣場的東北角。物資就堆在一個稍為分隔的地方。這裏是遠離設

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指揮部的。這裏靠近北京飯店——中大同學的住處，靠近長安街，交通運輸相對便利。

一開始我們香港學生並沒有設立自己的物資站的打算。就那麼幾個香港學生，負責廣場上那幾千個人的物資是不可能的。但我們的確一開始就背負了物資支援的角色。我和曾憲冠同機飛往北京，離開香港前去中大學生會莊耀洸那裏取了十部對講機，還有一些錢。我們每一批去北京的同學都會帶一些錢和物資去，帶些天安門學生運動日常運作最需要的東西。

當初，我們是把捐款交給廣場指揮部去支配的，由他們去負責購買食物，也由他們去分發給廣場上的同學。但一次又一次，我們發現在廣場上的外地同學依然無法得到食物，以及受凍。有一次，我看見（相信其他同學也看見了）指揮部前的垃圾堆裏堆放了大量的麵包。很可能是因為這個觀察——即指揮部的同學即使購買了物資，其實並沒有認真地去分發給廣場上的同學，使我們香港同學決定設立一個自己的物資站。這個物資站由香港同學管理，面向所有廣場上的同學，尤其是支援物資缺乏的外地同學。

大概是因為我的國語比較靈光，過去也擔任過內地交流團的聯絡人，購買物資的任務就落在我的身上了。

每天早上由潘毅那裏取得一筆人民幣現金。記得預料每天大概需要一萬多元。實際用去的數目每天不同，但每天購買的食物漸漸增加，用去的錢也會稍為增加。每天把收據交給潘毅，大概聊聊買物資的問題，和大略預算一下

次日需要的錢。每天數過萬元的錢，這一疊疊的人民幣放在背囊裏是沉甸甸的。我們的原則是每天的食物必須充足，但也不能浪費。也必須考慮到衛生，食物不能變壞。

一開始購買物資就直接跑到天安門附近的商店去。主要是買麵包和食水。但有一次店員把店裏所有的水和麵包都翻出來了，還不夠我需要買的量，我就在盤算直接向廠家去訂購了。這些店子賣的商品也比較貴，會超過預算。為了省錢，向廠家直接訂購是合理的。商店的店員態度有點怪，冷冷的，和一般北京市民的熱情有不少反差。好像有點不願意賣給我，但又想做這筆買賣。

由商店的人提供廠家的資料，也從商品標貼上找到廠家的資料。在天安門附近的，直接摸上門去找。坐的士司機照例不收費。很感謝他們的厚愛。那時的北京人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支援廣場上的學生。的士司機的支援方式是不收學生的車資。總有辦法把錢塞給的士司機的。他們的生活也不容易啊！

麵包供應是一個重要問題。我很想找一家可靠的廠家，可以有穩定的供應。在天安門附近胡同裏能找到的都是民營企業，應該是改革開放第一批的民間創業家。每到一家麵包廠，說明來歷，都會得到很正面的讚許和熱情接待。廠家爽快答應提供麵包，也答應安排運輸。我會事先把準備好的現金預付。沒有人不守信用。每天都有麵包運到，或早或遲。其實氣氛是越來越緊張的。運輸麵包的人力三輪板車要穿過長安街來到我們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北角



購買麵包的收據

的物資站。當初交通警並不為難騎板車的運輸人員，甚至協助運輸人員穿過馬路。後來交通警開始為難運輸人員，截停他們、盤問他們。人力板車必須繞路而行。

過了一兩天，第一家麵包供應商拒絕提供麵包了。隨後又有第二家拒絕我們。供應商的態度有明顯的轉變。這些轉變都完全可以理解，他們明顯地受到了壓力。

繼續走路去找麵包廠。在一條胡同裏找到一家。向負責人講明來歷和訂麵包的意圖。出來接待我的是一名中年女士，十分熱情，也十分支持和同情廣場的同學。這次我用了不同的策略，先講我十分明白目前的緊張氣氛。我們

談了很久，有了一個基本共識。我們都很清楚我們都承擔了風險。我們互相不問對方姓名，不留對方的任何聯絡方法。這名女士，是改革開放一開始時創業的，事業略有所成，有私家車有房子，有孩子，是一個小康之家。我很清楚這一切來之不易。她不想失去這些生活，但又為這個國家的前途擔憂，十分支持學生的反貪腐、爭民主的理想。她很樂意幫我們提供麵包，不同種類的麵包。我們還詳細地談了很多細節，包括運輸上的細節。她的工廠後來一直幫我們提供麵包，最後一批是六月三日，收據還在。但她的名字我一直不知道。這段歷史細節一直被我刻意收藏著、隱瞞著。在眾多被記掛著的人當中，她是我最牽掛的。她有沒有因為為我們提供麵包而受到審查或惹上麻煩？

後來我不滿足於買麵包和膠樽水了。還想買一些水果和豆漿。最後一天，即六月三日的物資是最豐富的，有一箱箱的袋裝豆漿和水果。但隨著天安門被清場，我們的物資站被付之一炬。我一直在所有天安門清場時和清場後的圖片裏尋找東北角的痕跡，注意到我們的物資站是被火燒掉的。

（五）逃亡

六月四日下午回到北京飯店之後，見到記者和同學。大家聚在一起商量對策。當時流言四起，有說北京飯店的廚師昨晚被打死了。北京飯店的大門玻璃的確留下了一個

個大大的槍洞。在房間的陽台上可以看到東長安街的坦克陣，坦克陣前市民在呼喊口號，隨之一陣槍（似乎並沒有聽見聲音，像默片似的），市民慌忙後撤，留下一批人躺在地上。槍暫停，市民又往前跑，去抬走躺在地上的人。口號又起，隨之又一陣槍。這是昨晚一直聽到，但又看不見的場面，在這裏延續著。現在是白天了，看得見。昨晚在北京城上演了多少這樣的場面？維持了多長時間？死傷多少？這些或死或傷的人都被送到哪裏去了？他們後來的遭遇是怎麼樣的呢？歷史留下了一大片空白，誰有權把它抹掉？

情勢看來越來越緊張，北京飯店顯然越來越危險。有人決定撤退。穿白制服的北京飯店服務員似乎暗示讚許我們這樣做。北京飯店的服務員都很友善，有些服務員挺面熟的，因為經常打照面。我們在北京飯店的一舉一動他們都應該瞭如指掌。我們在北京飯店幾十個人擠在一個房間裏，房間亂七八糟，有時候還在走廊講話，甚至坐在走廊上的地板上分物資、分錢之類。服務員們從來沒有微言或干涉我們。我一直相信（直至今今天），我們這幫來自香港的同胞之所以能逃離北京飯店，避開搜查和拘禁，實際上是服務員們在暗中協助我們。這些服務員後來有沒有遇上麻煩呢？他們有沒有將他們所見所聞記錄下來呢？

我們要撤退到王府井的王府飯店。不知道是誰提出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事先聯繫好的。從北京飯店走路到王府飯店要穿過王府井大街和一些大街小巷。不知道誰在帶

路，我只是跟著走。當時的精神肯定是很恍惚。平時車水馬龍、人頭湧湧的王府井此刻靜極了。這座城市經過一晚的劫難此刻停了擺。這座城市又是怎樣重新上路了的呢？那一場有數十萬人見證的劫難被遺忘了嗎？那一段故事明明還在，但卻被埋葬了嗎？

路上見到一羣人穿著白衣，有人抬著用白布包裹著的人體。白衣人羣神情哀傷，有人在哭泣。見附近的建築物有「協和醫院」的招牌。不知道為甚麼，沒有上前詢問，也沒有哭泣。並沒有恐懼的感覺，也沒有急切逃離的想法。大概此刻的情緒已經僵固，大概已經心照不宣。那些離開醫院的被白布包裹的人體是不是昨晚，甚至是剛才在坦克陣前呼喊口號的北京人呢？這些人為甚麼就這樣，用這種不尋常的方式離開了人世，離開了醫院呢？當時醫院裏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呢？首都的醫院昨晚和接著的一段時間的情況是怎麼樣的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那麼多生命的故事在醫院裏結束，醫生們有為這些陌生的北京人記下一點甚麼嗎？這些人在一天前大概還沒有想到自己會用某種方式去赴死。以我昨晚所見，這些人都特別年青。生命戛然而止。受傷的人呢？有沒有得到康復？心靈創傷的人呢？

路繼續走。時間似乎已經凝固。不知道多久才走到王府飯店，也不知道中間是否有走錯路。此刻，有誰在乎呢？

王府飯店似乎離危險的長安街遠一些。這裏似乎安全

得令人驚詫，感覺怪極了。這裏的氣氛跟肅殺的北京飯店有如天壤之別。大堂有「屈臣氏」（第一次在北京見到香港店鋪），裏面有不少人提著籃子購物。這裏的人沒有談論昨晚發生的事情，這裏的住客也許不知道昨晚發生的事情，新聞完全是封鎖了。這裏猶如另一個國度。剛從戰場上過來的人不太習慣。

這裏的經理原來是中大的畢業生，大概是改革開放最早期派駐內地工作的香港人。記得有人問他會不會撤退回港，他說不會。不知道是不是傳媒已經無法報導事實，非目擊者得以免於恐懼。

王府飯店的房間比北京飯店的強多了。該屬於外資的吧，相對安全一些。房間裏可以看到CNN之類的外國媒體，電視裏好像一直在播北京發生的事情，大家一直盯著電視的報導。我們都是電視裏訴說的故事的一部分。我們見證著這一段北京的歷史。

此時，我們最大的任務是逃亡，雖然大家的心中一定還在牽掛著這些天來見過的北京人。有人聯絡了英國大使館，使館拒絕安排往機場的汽車和回香港的飛機。大家似有點不滿和失望。有人聯絡了港府，終於說會派港龍專機來接我們。此刻，飛往北京的飛機應該全部停航了吧？

往機場的交通怎麼安排？此刻，所有公共交通工具都停止了。從北京飯店到王府飯店，沒有見到任何車輛，好像連單車和前晚滿街都是的三輪板車都不復見。酒店經理十分為難。終於，安排了一輛中型的酒店巴士載我們上

路。司機是講地道北京話的中年男士——感到十分熟悉而親切。這段時間在北京見到太多這樣的熱心北京市民。今天往機場的路一定跟平常很不一樣。司機隨機應變，迂迴曲折地走了很多小路，一路跟我們講話。路再怎麼曲折，總還是遇上一些立交橋。立交橋上無車，交叉的位置有軍人守衛，或坦克或軍車，氣氛肅殺。一路很少市民。

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才到了機場。司機是怎麼回去的呢？他還記得我們這些逃亡的人嗎？十分感念那位想盡辦法為我們弄到一部車的中大師兄酒店經理，那時一定很不容易，他一定很為難。那位司機是當時無數冒著生命危險守護著廣場的學生的北京市民之一，最後還守護著我們這些香港記者和學生。若沒有他的自告奮勇、拔刀相助，我們去得了機場嗎？

機場氣氛平靜，旅客稀少，彷彿一切都停頓下來了。檢查人員還是有上班的。但無論是證件檢查還是行李檢查，跟平時都很不一樣，證件檢查是隨意的，行李根本沒有檢查。我背囊裏還有六月三日買食物剩下的九千多元人民幣，沒有人查問，覺得怪怪的。直覺覺得，這些檢查人員是在暗中協助我們逃亡的。他們後來有沒有遇上甚麼麻煩呢？

香港派來的是港龍專機。這時的機場應該處於關閉狀態的。機組人員來北京前在香港一定看到了北京發生的事情，他們一定清楚北京的危險和我們的處境。他們來營救我們，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有想到危險嗎？他們擔心自

己的安危嗎？

我們似乎沒有機票，也沒有劃位。坐下後，等飛機起飛。我們不知道起飛時間，也不知道在等甚麼。最後見李卓人被人帶下飛機，飛機不久就起飛了。我們當中有一位是不能回去的，提醒我們，我們能夠離開，不是理所當然的。李卓人被帶走，沒有人作任何解釋。忿怒、不滿、恐懼、擔心都有，但都被對北京人的巨大想念蓋過了，一切的情緒都變得淡淡的。

（六）回港後

剛從北京回香港後的那段時間是十分混沌的。主要做了幾件事。第一是協助「黃雀行動」，第二是去社區作「六四」的見證，第三是去學聯剪報紙，第四是回憶歷史。

學聯在彌敦道的會址堆積了大量的「六四」前後的各大報章。但沒有人整理、分類。有一段時間像上班似的天天在那裏剪報。思緒很亂，茫茫然不知所措。有數位中大同學在幫忙這個浩大的資料整理工程。大家不怎麼談話，大家的心情大概是鬱悶極了。靜靜的剪報，心情可一點都不平靜。時間靜靜地流過，似在療傷。不知道做些甚麼事情才好。一心想，我們要留下這段歷史，保護好這段歷史。隱約感到這段歷史又將會被刻意抹去。這是「遺忘」和「拒絕遺忘」之間抗爭的開始。但願以前保留下來的資料如今尚完好。

回到香港，回到國是學會。開始有義務律師和法律學生來幫我們這些赴京的中大學生錄口供。大家都害怕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會變得模糊。當時的口供只集中在屠殺當晚的見證。律師們問，我們回答，筆錄加錄音。這些記錄現在還在嗎？保存在哪裏呢？

我們也寫下自己在北京的觀察。我們寫的東西後來變成中大學生會出版的「北京紀行」。我本人當時只寫了「六四」當天的事。「六四」前前後後的事也一直想寫，但一拖就拖了二十五年。有的細節不復留在腦裏，無法追憶。剩餘記憶裏的點點滴滴，藉著同學們的鼓勵和提醒慢慢重組出來。

我們在北京見過許多內地同學，「六四」後的「黃雀行動」開始營救工作。我自然也需要作一些證明，證明某人真的是民運人士。這些證明都極簡單。也許收到一個電話，報上某人的名字；也許某人取一張照片，讓認一下。只要口頭確認一下，就可以了。「黃雀行動」只要有人確認就會去營救。至於營救是否成功就不得而知了。當時也是永遠不打聽其他同學在做甚麼，不問任何民運人士的下落，不留任何人的電話及聯絡方法。有一段時間，家裏的電話是被竊聽的。那時好像不少同學的電話也被竊聽。那是頭一次知道電話被竊聽聽起來原來是這樣的。不管是善意還是惡意的竊聽，我已不介意。聽就聽去唄，有甚麼怕人聽的。若說「六四」對我最大的影響是甚麼，那就是放下自己、無所畏懼。

我們有八位中大同學本來在大埔尾村同住一層村屋。這層村屋當時讓出來給被「黃雀行動」營救出來的民運人士。當時是誰告訴我們要這麼做的？真的一點都想不起來。我們本來就沒有床，打地鋪睡。三間房間有一間是女孩子們睡的，有一間是男孩子睡的，中間是書房。那時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房間都讓出給民運人士住了，我們全部回家去住。被營救出來的民運人士不限於學生，也有中年人。當時我們那裏就住著《血色黃昏》的作者老鬼。到底他為甚麼需要出走呢？他有沒有跟我們講過呢？真的不記得了。當時他們是怎麼被安排過來的？誰照顧他們？誰幫他們辦理手續？一概也不過問。知道那是十分危險又秘密的工作。

有人負責在港民運人士的生活，有人會定時來探訪他們。跟我們這些香港同學一樣，他們的心情肯定十分鬱悶。但最大的分別是，我們已經回到家了，他們卻遠離家人。前路茫茫，這一走不知道甚麼時候才能回家？走的時候大概都十分倉促，沒有來得及向家人道別。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鬼，他那時已經是中年人了，有家室，十分思念家人。有一天有人帶來一部無線電話，他在陽台上跟家人通電話，那種傷感，至今無法忘懷。

我偶爾會回去探望大埔尾的民運人士，和他們聊天。也曾帶他們上街。他們有港府發出的「行街紙」，在香港不屬於非法入境者。若警察查問他們，他們可以示之以「行街紙」。他們在香港應該算是安全的。我曾經帶他們

去市區看電影，好像是去了灣仔，到底是影藝還是新華戲院呢？看了哪些電影呢？其他當時在香港的民運人士都有哪些經歷呢？

後來民運人士逐漸得到外國政治庇護而離開香港。我再也沒有見過他們，也不曾通信。現在也對他們的去向一無所知。從一開始，就沒有問他們的名字。但願他們生活安好。

「黃雀行動」我就是從旁做了這麼些小事。對當時「黃雀行動」的組織所知極少。只知道司徒華的名字，知道他是其中一名主角。偶然聽到司徒華又在營救民運人士，而且又是用他自己的錢去付給直接營救民運人士的江湖人物。對司徒華的印象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後來無論司徒華說甚麼做甚麼都離不開這個影子。

有些民運人士逃出來了，但還有大量民運人士逃不出來。當然是十分焦急和牽掛的。還有一些死難者家屬呢？有一段時間，我們還嘗試去救助這些人士。聯絡十分困難，證明真正需要救助的人的身份也十分困難。當時曾帶數千元去深圳交給一名內地學生，他說是用來救助死難者家屬的。實際上無法去證實是真的還是假的。反正錢是一定要送去的，一點意思，但願真的能幫上一點甚麼忙。說實在的，若不是真的，倒是好。是不是被騙，不在乎了。那幾千塊錢是誰給我的？現在想不起來了。我身上購買物資剩下的九千多元過了好一段時間，問了好多次，都沒有人要回去。有一次偶然問起潘毅，她剛好急著要錢去救助

一些人，就把錢交給她了。

在北京期間我們和香港好像斷了聯繫，無法感受到香港的氣氛。屠殺後全城悲痛，民間紛紛動員，譴責屠城。回港後我們這些學生在社區作了一些見證。我去過一兩個屋邨，向居民講述「六四」當晚所見。好像在中大的烽火台，也做過類似的見證。去過北京的我，情緒和感情都是複雜的，這一切無法言傳，也難以為人理解。此後，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講過「六四」這個話題。

二零一四年二月至三月

北京紀行之十

(24/5-5/6)

曾憲冠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中文系四年級
現為文字工作者

第一部分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四日，大約下午十二時，我和一位同學搭飛機從香港到北京，目的是聲援中國學生民主運動。我是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去的，到達後便和已經在北京飯店開了一個房間的香港學生聯絡。當晚我們討論分配工作的事。我負責在街上張貼報紙，和對廣場上的同學提供些服務，包括提供資訊和分配物資。

每天在天安門廣場都有聽到政府的廣播，通常是報新聞，間中也有例如批評民主女神像等言論。直至六月三日我感覺到廣播內容有所變化，政府開始宣佈有人搞「反革命暴亂」，這是之前沒有提及過的。我覺得氣氛緊張起來了。

在六月二號晚上至六月三日凌晨，有一隊少年軍在東長安街沿路走過，當時我在北京飯店門口，看見他們正在向西面撤回。撤回的原因是市民擋住了他們的去路。士兵沒有穿軍服，只是穿白色上衣，沒有帶槍，我也沒有看見有任何暴力事件，只是聽聞有市民用單車撞向少年軍，後來我看到路旁一輛單車的輪確被撞彎了。

六月三日下午，我在廣場的香港物資站負責分配食物。我聽到政府廣播譴責「香港某大學」的學生幫助非法組織「民主大學」，於是我們決定回北京飯店開會討論對策。

晚飯過後，大約十時許，我們決定回廣場和學生一起靜坐，當時已聽到消息，當晚軍隊會盡一切手段進行清場。我們去到物資站，在物資站內坐下來。

凌晨十二時半左右，有一輛裝甲車從廣場南面向北面駛來，速度很快。裝甲車過後，學生和市民把路旁的鐵欄拆毀，放在路中間作路障，國內的同學教我們用毛巾濕水掩著鼻口。

之後，聽說軍隊從南方開來，所以我們向南走去看看。途中聽人群說軍隊已逼近，所以我們又向北撤回，回到物資站。而那時軍隊已從南面來到廣場，人們向他們擲物，他們便用動作嚇退人群。軍隊跟著開進廣場，經過我們的物資站，繞到廣場東面一堆公廁前面的行人路坐下。軍隊經過物資站時，我看見他們有人受了傷，他們舉起流著血的手表示是人群打傷的，還高聲說他們不會打學生。

凌晨一時後，我見到北面那輛裝甲車著了火，是先前由南向北駛的那輛，我便向北面走希望看看，我看見一輛救傷車由南面駛來，想轉向東長安街，但在路口被人群擋住，有人多次開它的門，但又都關上，糾纏了很久救護車才能離去。

大約在這個時候，從西北面傳來連續的槍聲，一直沒有間斷（直至我離開天安門廣場時還聽到）。我回到物資站和同學集合，跟著向西北槍聲的方向走去，走近那方向時，後面的香港同學說危險，勸我回去，我便回去。我並沒有太接近開槍的地點，最接近的時候也有二百幾碼，看不到有人被槍打中，只是見到一個男子（很年輕的）的手受了傷，給幾個人扶著退回廣場。而當時西北面的城樓著了火，在火光之中我見到有軍車及軍隊在那裏。

返回物資站一會，我們討論過，覺得物資站因在廣場邊緣，較為危險，所以大概在三時左右我們撤退到廣場中間紀念碑下面。那裏有數千人聚集著，看來是從帳篷中退出來，聚到這兒來的。

大約三時許，有些國內同學來勸我們離開，他們說廣場危險，想送我們走。我們討論了一會，不能作出決定，他們亦走開了。跟著又有一些國內同學來勸我們，我們除了二人外都願意離去。於是我們一行十幾人一起向東走，希望返回北京飯店，到剛轉入東長安街處，便見有一批士兵橫排在路上，阻了我們的去路。他們只是坐著，手上有槍，但沒有任何行動。我們想走近他們，告訴他們我們只

是想返回北京飯店，但未接近他們，便被學生糾察勸阻。糾察說如接近軍隊會有危險，所以我們便撤回向南行。

南行至大概廣場中央，我們轉向東，走入一條小巷。沿著小巷走了很久，沿途很平靜，也沒看見軍隊，但曾聽到廣場東南方有些槍聲，和幾響爆炸聲。我們步伐很慢，有些同學又折回廣場看情況，所以當我們在巷中找到民居暫避時已近天亮，大概六七時了。那民居的門是開著的，我們走了進去，裏面沒有人，只有些衣服和被鋪，原來這兒早已住著來京聲援的外地學生，等到七八時左右，便見有些市民起床外出，他們看見我們在樓梯處便來看望，並且給我們送來飲食和藥物。我們繼續在樓梯休息，那座大廈的人都不清楚發生了甚麼事。到十時左右，我們利用那大廈管理處的電話和北京飯店的同學聯絡，再等待到比較安全的時間才離去。在休息的時候，還有其他外地學生回到那大廈，他們有些很激動，說「同學有的死的有的散」，有位同學還將一枚拾來的彈頭給我們看，後來我把它保留到現在。

我們大概下午三時離開那民居，因為有一市民告訴我們，從那處到北京飯店的一段路很平靜，我們於是便起行。沿路的確很平靜。我們來到長安街，在北京飯店門口看見兩輛被火燒了的巴士，而滿地都是碎石和欄杆。

大概四時回到北京飯店，看見其中一道玻璃門被流彈打中。我們認為北京飯店不安全，決定當晚晚飯後便轉移到另一間飯店去。當晚在飯店裏仍可聽到疏落的槍聲。

六月五日早上十一時出發去機場，我們搭小型客貨車，沿路見到一些軍隊，但他們沒有理會我們，而市民和軍隊談話。

第二部分

北京宣佈戒嚴後，軍隊從四方八面開進來，形勢相當危急。民眾蜂擁起來，跑出街上堵截軍車，廣場上的學生也進入了「備戰」狀態，準備承受軍隊的暴力。然而一連幾個晚上都只是「狼來了」，軍隊並沒有進城。

我到達北京時局面已逐漸平靜下來。長安街上浩瀚的自行車流明顯地一天比一天減弱，市民的熱情和戒備好像退卻了、放鬆了。廣場的糾察線最初還推至鄰接長安大街的鐵欄附近，但過了幾天卻已收縮了，後撤至只剩紀念碑指揮部範圍。

這時，廣場上賣冰棍、汽水的小販可以隨便進入，外國遊客也可以隨時來參觀拍照；衛生環境越來越差，垃圾一堆一堆的，臭氣薰人。睡鋪就放在垃圾旁邊，而學生在睡鋪旁邊大口大口的吐唾沫。每日氣溫達到三十度以上，紅太陽惡毒地照耀著。

但情況惡劣不僅僅由於廣場秩序渙散、學生有壞習慣的緣故，最重要的是運動落到了低潮。運動究竟要爭取甚麼？繼續留守天安門要達到甚麼目標？如果要爭取的目標

有了，面對這樣的政府，又能不能夠爭取到呢？學生都感到惘然了。

「對，是困難的。不過廣場是一面旗幟，不能倒。」一位從蘇州來的姑娘向我說。她是來聲援的，才到不久，她在北師大的同學那裏，和他們閒聊、吃冰棍。她很認真的對我說：「廣場不能撤，全世界看著中國，全中國看著北京。」雖然對於目標十分迷惘，但天安門是一個象徵，讓全民都出來，共同反對腐敗。

學生其實也知道這樣的堅持是沒有結果的。他們對於這個政府早已不信任了，根本不相信政府會真的理睬他們，只是為了全民運動，廣場還是要撐下去。一些研究生對我說：「我們不走，要走他們走好了。」說著手指指揮部。「我們坐下去，等它叫軍隊來把我們架上車再算。」他們原本或躺或坐，百無聊賴地在帳篷裏休息，但一談起這些問題，他們就都霍然坐起，七嘴八舌地搶著說了。

「那麼坐在這裏又可以怎樣呢？」我問。

「我怎麼知道明天會怎樣？我只知道我坐在這裏一天，就還有一線希望，回去了就甚麼希望都沒有了。它說不算賬，你相信它？」

他們又說：「最初遊行的時候，誰知道有那麼多同學響應？後來不是說要回去了？但是有的同學不復課。絕食的時候不是也有人說回去嗎？但是也堅持下來了，而且市民越來越多支持。運動有今天就是因為我們不要回去，我們早回去，運動就沒有了。當初誰想到有今天？」

今次的學生運動，揭櫫「民主」的鬥爭目標，在許多人看來，無疑是中國的一次大震盪，因為至少已有一批人，意識到了改革中國政治現狀的需要。但是，「民主」如果只是作為一個奮鬥的目標，那麼它可能會變得十分空洞。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如果不能具體地實踐「民主」的運作方式，那甚至有可能將「民主」變成專制統治者的漂亮口號。

五月二十五日，戒嚴進入第六天，同學的情緒已相當低落，閑坐無聊，大白天都索性睡覺去了；呆不住的，便跑到街上去隨處逛。我們幾個同學來到遼寧學生駐紮的地方，發現他們原來屈了一肚子的牢騷，跟他們一談，他們就把不滿盡情吐露了。

他們說，坐在廣場上很是無聊，爭取的目標不具體，坐著沒意思。指揮部嚴重脫離群眾，不瞭解群眾的想法，而群眾也不知道他們在幹甚麼。他們又說，很多外地同學懷著美好的憧憬而來，現在如果帶著失望的心情回去，對整個運動的影響就很不好。指揮部應派遣一些糾察來到同學中間，發動同學討論。

這些遼寧學生後來草擬了一份意見書，搜集同學的簽名，遞交指揮部。

這份意見書在兩天內得到過百同學簽名支持。我們在四川同學的營地傾談，準備離去的時候，有兩個學生匆匆跑過來，滔滔不絕，但說的並不是怎樣特別的意見，卻是一通牢騷。他們認為指揮部實在太不像話了，撤與不撤，

猶豫不決；同學又不知道他們的想法，難怪士氣低落……

他們說了很久，圍觀的人逐漸多起來。我們想，何不叫他們到指揮部去直接反映意見？他們最初仍是大發牢騷，對我們的提議興趣不大。幾經勸說，他們才肯去指揮部。乘著身份之便，我們陪同他們一起去；在那裏，我們看到一幕「群眾向領導者請願」的場面。

紀念碑戒備森嚴，如果不是因為我們幾個香港來的學生，恐怕兩個四川同學是上不去的。我們先被招待到物資部，好些物資部負責人來向我們瞭解情況，給我們斟茶遞水。談了大半個鐘頭，他們唯唯諾諾；有的同意他們的意見，也一同發起牢騷來。這時我們才醒悟到他們只是接待人員。

結果，幾經要求後，他們才把我們一行人帶到指揮部負責人那裏。等了好一會兒，從帳篷裏鑽出一個人來，臉上頗堆著一些微笑。四川同學向他說了意見，叫他在廣場上設些宣傳點，幫助廣場上下溝通意見。這位指揮部的男同學不住的點頭，表示聽進去了。我們問他是誰，他說是秘書長，然後轉身鑽回帳篷去。

四川同學提出的情況，後來不見有何改善。

第三部份

晚上的北大校園十分寧靜，有的人帶著孩子在散步，

學生推著自行車邊走邊聊天，給人祥和的感覺，看上去不像有一場浩蕩的學生運動正在進行。昨天來參加了《新聞導報》（學運期間學生自發創辦的一份報刊）的一個「懇談會」，認識了一位研究生王同學，他有很多意見，所以今晚再約他談一次。

王同學昨晚提到很多問題，但都離開當前運動形勢較遠，這次來倒想先聽聽他對當前情況的看法。他說：「現在運動又進入了一個艱難時期，五四到絕食以前也是這樣，但絕食一來，運動又再有高潮。廣場這一顆心頭刺他們是一定要拔的，到時便是一個轉折。」他並不困擾於當前運動的膠著狀態，對於運動，他有更為廣闊的觀察角度。他說：「問題是在『四二六社論』，就是它把學運打成動亂的，否定了它其實最容易不過了，但也是最難的。」

離開天安門廣場——運動的中心，在寧靜的校園裏似乎可以更為深入地思考問題。昨晚來時，聽王同學談啟蒙，現在我希望他能詳細地發揮一下。他說，啟蒙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要長遠地做，不斷累積下去。」我們坐在塞萬提斯像的草叢上，天已全黑。王同學開始談到一些和這祥和的環境不大相稱的尖刻的說話：「我們民族退化了，歷史不是成為經驗，而是成為束縛。血淋淋的四十年變成枷鎖，現在年紀大的都不敢出來說話，龜孫子似的，怕風險、駝背、窩囊，自甘受委屈，媳婦讓婆婆欺負了不要緊，媳婦將來是會變成婆婆的，到時就翻過來了。每個

人只看到自己，都只是保存自己。」

「這些社會、文化的問題，是長久形成的，殘酷的現實把人們都嚇慌了。要改變它們不能依靠個人唯心地去進行，而需要有『大環境』，也就是說要由國家提倡。例如建立競爭的機制，而不是提倡雷鋒精神，讓人們知道自身的利益，為自身的利益鬥爭。有了這樣的經濟基礎，改革才有可能。」

「現在人們不滿政治狀況，你剛才又提到社會文化以至經濟基礎的問題，這會不會導致全面的否定，全面的打倒呢？」我問。

王同學望一下我，反應很快。他說：「你是不是說中國會陷入全盤反傳統的怪圈？我想不會的，因為所謂全盤西化根本就很難搞，而且從來也未達到過。而反傳統卻是好的，傳統裏好的東西我們沒有，有的只是封建的東西，西方的文化也並非最好，但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這些精華，我們是應該學習的。反對全盤西化的人說中國有自己的國情、特色，但中國特色是甚麼？就是封建！」王同學的說話叫我想起八六年學潮後中國官方批評「全盤西化論」，經過了兩年多，學生在思想上似乎已對官方作出反擊了。

第四部分

鎮壓前的幾天內，我發現了一些「異象」，從中或可窺見鎮壓乃是有組織、有計劃的部署，政權並沒有發瘋。

從北京飯店到天安門廣場的一段東長安街，沿途每天我們都貼上香港的報紙，起初報紙一直累積著，但到了鎮壓前差不多一個星期，每天所貼出的報紙都被撕去，戒嚴令似乎開始要認真貫徹了。民主女神像豎立以後的某天，東長安街上沿途竟有多個報販在叫賣《北京日報》，先前不但沒有那麼多的報販在街上，而且甚至是沒有報販的。《北京日報》的頭條便是有關要恢復廣場秩序的消息，頭版更有多篇有關女神像的讀者來函和報導。輿論攻勢正在開展。

就在那幾天，市內可以看見很多橫額，都是紅底黃字的，寫上「反對動亂」、「要安定團結」之類的語句，我從北京大學回到市中心，沿途都有所見。還有的便是遊行，政府在市郊組織了支持政府的遊行，造出有人支持政府的氣氛。除此之外，六月二日晚軍車撞死人，另又有一批年輕軍人徒步進入市中心，接近廣場，和市民發生了一些衝突。六月三日下午，政府更將武器「送」到群眾手裏，為其鎮壓行動製造藉口。至此，文的武的手段都出來了，當它認為武裝力量已部署好，宣傳已經搞妥當以後，六月三日廣場上的大喇叭便一下子將廣場上的活動打成「反革命暴亂」，電視台循例便發出最後通牒，警告市民

不要外出，否則責任自負。

有一件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我們有幾個同學負責每天在長安街上張貼香港報紙，那天因為要補充些漿糊和毛筆，我們便跑到百貨店去買。中國的服務人員，無論在哪个地方、做哪個行業，其待客態度之惡劣都是有名的，首善之區的大企業也沒能例外。我們找到了賣文具的櫃台，選了幾瓶漿糊和幾枝毛筆，那些店員小姐當然是擺出個愛理不理、敷衍的款式，取貨遞貨全不在意，眼睛從始至終不瞧你一下，好像要忙著盯著別的甚麼似的，也好像有兩個心。看到這種情形，便想回敬她兩句：做得晦裏晦氣的，不做好了。然而終於也忍住了。不知如何，我們拿在手裏的一疊報紙給她們瞧見了，她們馬上表現了莫大的興趣，向我們索看，要我們送一分給她們。我們說我們也不夠用，我們要把這些報紙貼到街上，讓更多的人可以看到。她們知道我們是從香港來北京聲援的，漿糊也是用以貼報紙，一下子她們的面目也就轉過來了。原來僵硬的面部結構忽地重新組合起來，面上的器官變出了一個笑容來。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奇異的一景。

她們說她們天天都要到廣場去看看學生才安心，上班前去一趟，下班後又去一趟。我們臨走時，她們還是請求我們送她們一些報紙，我們不好再推卻，便留下了一份給她們，她們歡喜地接受了，並且高興地讀著。我想，她們的苦臉之後是有著一張笑臉的，對於憎惡的生活會露出苦

臉，對於解放的生活會露出笑臉。

我在廣場的香港物資站幫忙分配食物的工作，好不容易把分配程序弄妥，開始進行分配了，然而卻又來了令人很不舒服的事情。

學生排著隊領取食物，我們在旁維持秩序，儘管如此，插尖的事仍有發生，叫我們無可奈何。最令人氣惱的是有些人多拿了配給量以上的食物飲料。有些糾察便是這樣，他們甚至橫來，不排隊就要取食物，看守物資站的同學和我們雖然阻擋著，但他們反而越弄越兇，最後我們都敵不過他們，讓他們拿了。在他們看來，他們當糾察是一件很吃力的工作，理應獲得相當的，即比一般同學為高的報酬。（他們工作吃力自然也是事實。）有一個糾察在拿飲料時多拿了一包，我馬上喝止，將飲料一手搶回，他看著我，然而不是正眼看，而是乜斜著眼看，身子也是側對著我，然後用手背在我的胸口彈了一下，說，我和他也是一樣的辛苦，別這樣子對他。說完就走開了，一副很了不得的模樣。我聽同學說，先前有一個晚上，一伙糾察跑來物資站要取食物，手拿鐵鍊條，喊打喊殺，也是說自己工作辛苦，我想他們大約是同一類人。

運動處於低潮，他們的醜陋都暴露出來了，在早期運動處於高潮之時，他們表現出來的那種崇高，全都不知隱沒到哪裏去了。

然而，六月三日晚上，當我從北京飯店趕往天安門廣

場的時候，在東長安街上我又遇上了這些糾察，他們都是穿著紅外衣，手裏或執鐵條，或拿木棍，一個跟著一個，約有十個八個，向東面走去，路上的群眾向他們鼓掌吶喊。在危急關頭，慷慨赴義的卻又正是這種人。崇高和卑劣兩種極端的矛盾的素質，在他們身上統一著，形成一種強烈的反差。我得承認這就是他們，是真真實實的他們，雖然我寧願他們只是一個個庸俗的平均數。

第五部分

剛到機場，就有一位自稱是律師的先生歡迎我們，歡迎我們回到香港。他說，這裏是一個有法治、有人權的地方。一剎那，我驟然感到我現在的處境是多麼的不同，眼前一切漂漂亮亮的，地方乾乾淨淨的，連燈火也是明燦燦的，比之陰慘、肅殺的北京城，我彷彿從地獄回到人間了。

才是上午，我們還在市中心的一所飯店裏；才是下午，我們還在機場的大堂裏候著。從飯店到機場，穿過大大小小的街道，看見許許多多的軍車和軍人；我們收起了無線電話和照相機，我們真能到達機場嗎？機場真有飛機回來嗎？然而，彷彿只一瞬間，我們回來了，穿過幾許時間和空間。

我們安全了，因為我們回到這安全的地方，這裏是我

們的退路，是一個保護罩，我們可以在此獲得安全。這是我們所特有的，然而北京市民和同學所沒有的。我想，這也許便是他們勇於赴死的一個原因，因為他們委實是無路可退。

我們是沒有理由特別的，我們跟其他的中國人、北京的中國人有甚麼不同呢？就因為我們還有一塊香港？就因為我們還有以退麼？然而，我當時都沒有考慮這些了，我只是想逃，逃出屍首纍纍、彈痕纍纍的北京。

我當時真的沒有想到別的，只是想著哪一條才是生路。軍隊已從四面將廣場包圍了，我們無法從東長安街走出去，幾個國內同學來說送我們從南面走，然而幾經猶豫，結果連南面也不能走了。廣場的東南角有個小路口，從路口可轉入一條小巷，我們當時自然不知道這路之所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埋伏了軍隊。五六個國內同學來保護我們，和我們一起離開廣場向東走去。

我們離開的時候，同學差不多都聚到紀念碑四周來了，好多的同學神情呆滯的坐著，有的躺著睡覺，有幾個敲著結他，唱《一無所有》。我們離開了，把他們丟在後面，那是凌晨三時許，後來據說軍隊不久就開入了廣場。

四五個國內同學護著我們往前走，他們說，你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不要再犧牲。在他們的心裏，我們是特別的，我們對他們的聲援已經足夠了，沒必要連性命也賠上。我們有我們的限度，死是屬於他們的，生是屬於我們的，正如法治人權是屬於我們的，坦克子彈是屬於他們的

一樣。然而，又有誰是應該將性命賠上的呢？

沿著那條小巷往前走，我們看見許多市民站在街上，不知在等待著甚麼。有的市民問我們廣場那邊怎樣了？我們只是說打起來了，開槍了。從東南面還不時傳來槍聲，是那邊又開了新的戰場了？

我們停停走走，想找個庇護的地方暫時躲一下，然而有兩處地方都不敢收留我們。天開始亮了，黑暗逐漸變成灰暗。我們來到一處民居，在梯口旁的一個小間躲起來。原來這兒早已是來京聲援學運的外地同學住宿的地方，我們躺睡在他們遺下的衣被上，暫時紓解一夜的勞累。天已亮，幾個同學從廣場跑回來，他們有些是認識的，見對方安然回來，都擁著一起哭。他們一邊哭，一邊說自己的同學，死的死，散的散了。一個同學捏著一個彈頭和我們說話，我後來把彈頭拿了收起來，將這殺人武器帶回了香港。市民也陸續起來，也都來看我們，都發出同樣的詛咒，有位老太太說：「我五十幾歲，只在電影上看過一次這樣的事。日本人沒有做，國民黨不敢做，共產黨做了。這叫共產黨領導！」

我們也沒能睡去，耳邊「喪盡天良」、「回來報仇」之聲不絕。市民又給我們買來烘餅，給我們倒水、煮稀飯，更加給我們送藥，叫我們好好休息。而這時，窗外的一面黑板上已寫上今天是國難日，大家應戴上黑紗和白花的字眼，黑板旁邊早有大疊黑紗和幾朵白紙花放在窗台上。在未來的日子裏，我將以北京市民裁剪的黑紗，裹上

那一枚殺人的彈頭，永藏在仇恨的心裏，永記著慘痛的歷史。

從民居轉出後街，崇文門一帶街上滿是碎石磚塊，軍隊設置了一道封鎖線，將路切斷，只餘一條自行車徑讓人通過。市民走到士兵跟前和他們談話，說解放軍跟人民的關係有甚麼時候像現在這樣壞？士兵只是聽著，微笑，說你們跟我說也沒有用啊。他們彷彿不大曉得他們在外圍封鎖，而裏面則在殺人。

我們不知道街道上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往北京飯店那邊的路的情況，長安街上會不會仍是槍林彈雨？逃回民居來的同學和市民說外面的士兵現在不分是誰，見人就射。於是，我們只好在民居躺下去，等待時機。

意見很是紛紜，有的市民說外面很危險，不要出去；有的說不要回飯店去了，坐火車到天津吧，火車站的路沒問題；有的說剛從飯店那邊回來，路上平靜。我們決定還是回到飯店。沿路沒有幾個行人，只是在醫院門口堆了好些護理人員。東長安街上沒見士兵，然而街上十分狼藉，兩輛燒焦了的公共汽車停在路中心，是惡戰後的局面。

我們回到酒店，準備打點一切離去，一時又將在民居裏的市民和同學丟在一邊了。後來據說那幾個同學平安離開，乘火車去了天津。市民呢？市民當然還在民居裏，繼續面對著政治、軍事的恐怖。我們這些特別的、受保護的人，在乘車往機場的路上看見滿街是燒殘了的車子；交通告示牌、報紙櫃上滿寫著正在流著淚的字，說毋忘六四，

說血債血還。而我，竟不復記起那些市民對我們的愛護，和他們叫我們不要作無謂的犧牲，要將北京的事情帶回去的話語了。只是現在，當我想起我沒有特別的理由，沒有活下去的理由時，我才想起這些話來，並將之作為理由，化為繼續走人生的路的勇氣。

北京回來之後

曾憲冠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中文系四年級

現為文字工作者

(一)

北京回來之後，我在襟頭別上了黑紗，那是北京市民給我們裁剪的。有一次父親對我說：「我知道你愛這個國家，但現在不是時候。」我想那其中很有智慧，既愛而又能收放自如，必須把握好分寸。

然而我真的愛國嗎？我想，不是不愛，也不是很愛；當然，較之目下的所謂「本土派」、香港人、世界公民之類，我只能給劃歸到愛國之列，就此被愛國，而且恐怕還是很「膠」的那一種。

八九民運之時，所想的無非願意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變得更好，上下結合，煥發改革的力量，然而中國終於失去了一次絕好的契機，而那是歷史性的，革命推翻中共政權，是六四以後才有的念頭。

(二)

倡議武裝起義者有人，AAA教授即是。八九年下半年，我和一些同學在維多利亞公園涼亭搞了幾次「對談會」，我們只帶了一具手提擴音器，一放在地上，插上麥克風，即成為論壇，承接民運自由即興的餘緒。

我在一次會上說，孫中山的革命是真刀真槍的，他買軍火搞武裝鬥爭，但我說完後無人回應。

一位好像是支聯會的人士預先沒有打招呼，熱心的來到我們旁邊，拉起二胡給我們伴奏，樂音頗覺悲涼。我問同學那是誰，同學說好像是BBB。

(三)

人民有革命的權利，我至今仍是這樣認為，然而調子不能唱得太高，太高了會掉下來的。所以，現在不大有人——包括我在內——說這些了。

有許多年，人們一直在說，經濟發展起來了，不必追究過去。這種說法實在連邏輯也不通，不值一哂。不過，經濟發展十分重要，因為這好比下棋，一著即佔去了先機，而我們幾乎無棋可應，堅持平反固然是應有之義，但也似乎成了唯一的選擇了。

我們高尚得只剩下道德。

(四)

六四一周年，新華社香港分社外面聚集了一群人，都來悼念民運，我也忝列其間。皇后大道東已經封閉，但新

華社門前的西行線不准示威者進入，人群只能集結在伊利莎伯體育館門前的東行線上。

人群認為活動應在新華社門前進行，但警方拒絕開放西行線讓人群進入，於是人群與警方展開了角力。警權是否過大、面對警察是衝還是不衝、示威抗議的地點應在哪裏，諸般爭議大抵便肇始自那個時候。

那時，一群人手挽手串成一條人鏈，與馬路中央的鐵欄成垂直之形，在一個好像是香港大學學生的指揮下，向鐵欄對面警方防線「衝」過去。

事後回想起來也覺滑稽，怎麼幾十人竟不乾脆一哄而上攀過鐵欄跟警方搗亂，卻如此白費力氣，但那時就是那樣聽從指揮。

我們與警方拉拉扯扯了好久，連警官也沒好氣的說，你們這樣是沒有用的。港同盟議員大學講師CC先生不知怎的也到場來了，他跟警方說了些話，但不見得對局面有甚麼影響，也許他不說我們會被鎮壓的。

但畢竟，經過一九八九年，香港的政治生態是徹底改變了，之前反對大亞灣興建核電廠搞街頭簽名運動已嫌激進，群眾上街遊行簡直是無法想像的。群眾運動其後日見旺盛，我那時想，那正是我想看見的。

(五)

八九民運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事件，以前六四燭光晚會舉行前，維園足球場上有民主藝墟，人們用不同的方式來

紀念，而我們的紀念方式則是我們的婚姻。

有人也許會認為，那是死亡，與婚姻所意味的新生相反，但我覺得八九民運不是只有死亡，我明明還看見中國人有生命。

那是六十四周年，記者校友DDD來訪問，說選擇在這天結婚，是否希望把自己的生命與中國結合得更緊密？當事人有時未必比旁觀者瞭解自己，但我覺得他說的也不錯，也就回答是。只是有一點我們是肯定的，那就是我們不會忘記，你們也不應忘記。

(六)

其實，革命與死亡、生命不可分，也與愛情和性不可分，因為革命是解放，是自由，是欲望。柴玲和封從德曾經是一對，李祿也是在天安門廣場上結的婚。我們的革命領袖，從孫中山到蔣介石，到毛澤東、周恩來，都是在革命途上與伴侶攜手，甚麼時候有過敵人未滅，何以為家的呆氣，我們又豈可後人。

八九年下半年起，好些民運人士從大陸逃到香港。聽說，有位女士很欣賞民運人士，很願意在他們滯留香港期間幫助他們，與他們交往。

結果，女士與湖南學生EEE一夕酒醉，而至於覆雨翻雲，但女士聽說好像不是十分情願的，然而事情後來似乎也沒有鬧大。

另一件事則是我所親歷。我幫忙接待過六七個流亡學

生和工人，他們被安排住在一起，由於他們是非法入境，所以不便外出，生活所需由一位來自美國的熱心志願者L先生協助照料。

支聯會的負責人FFF後來告訴我，L先生是同性戀者，而流亡人士為此感到頗不舒服。這才使我回想起我去探望他們的時候，L先生對我彷彿也很熱情，而且有點毛手毛腳的。而那時正值炎炎夏日，一班大男孩在屋裏也就光著上身，只穿一條短褲子。

(七)

湖南學生GGG也實在令人氣結，那不是由於他行為不夠檢點，卻是因為他撒了謊。

他說自己是北京學生，名字叫甚麼甚麼，學運期間擔任甚麼甚麼職位，可是聊起天來卻連北京地鐵路線是甚麼形狀也不清楚。

我們終於翻出他的證件，事實勝於雄辯，他唯有承認了。他看來並非間諜，也無不軌意圖，只是信口開河，處事馬虎。

但按諸他們的素質，我又覺得不足為奇。

莫說年輕學生，年長者的表現也不大成熟。

作家老Y是中年人，也許一天到晚悶得發慌吧，說要一部衛星收音機，收聽全世界廣播的訊息。有關方面大概也不缺錢，於是便答應了他的要求。

那次還是由我陪他到市區去購買的，就給他一個人買

了一部。

老Y後來到了法國，但聽說後來又回大陸去了。不危險了嗎？莫名其妙！

那六七個大男孩之中，也有一兩個後來回大陸去了。但願他們都平安！

(八)

HHH先生是稍後才到香港的一位。

他說是在廣州的公安部門任文職，因為文章犯禁，所以要逃跑，他是從中英街那邊踱步過來的。

他住在我處，也許由於情況不嚴重，所以遲遲未有著落，我和他都漸漸不耐煩起來。我問負責聯繫的FFF，竟不得要領。

HHH關在屋裏無事，就拿我的書來看，我發現他還用筆劃出重點，讀得頗認真。

他有一次覺得我好像懷疑他的身份，便嘆了口氣說，你以為我是間諜呀！他後來獲准留在香港，在油麻地請我吃了一碗麵。

(九)

北京回來之後，曾想到我們的個人資料是否已經記錄在案，我們日後是否還可以進出大陸。

然而，多年以來我們絕大多數同學進出大陸均通行無阻，最近問起一位睽違已久的同學，他說六四後不久即已

返回大陸，往來兩地工作多年，絲毫未有遇上麻煩，他也頗覺奇怪。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乘搭六月五日的港龍航機回來的，登機前關員把我們的出入境登記表副本一一收妥，我那時就想，大概都將記錄在案了。登機後，也就是那位關員把李卓人先生騙下飛機的。

不錯，我們的資料大概早已在甚麼地方立了案，我們的舉動恐怕也一直在注視的範圍之內。但是，這不正是我們所想要的結果嗎？那麼，連同這書裏的一字一句，都請好好記錄在案吧。

(十)

這篇文章收筆的時候，剛讀完前文化部長王蒙先生的書《不革命行嗎？》。話說當年毛主席看京劇《白蛇傳》，看到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憤然而起，喝道：「不革命行嗎？」

王著的思路自然是充份肯定改革開放的成績，但是「八九風波」只出現了兩三次，而且未嘗多加著墨，卻頗令人意外，大約身為共產黨員，不便讓領導尷尬。

然而，我倒沒有咬住「六四事件」而否定改革開放。每回踏足大陸，看見經濟日趨繁榮，建設卓然有成，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禁由衷嘆賞。

前年到浙江跑了一趟，杭州地鐵剛建成試行，紹興市面熱鬧繁盛，又不失人文氣息。晚上八九點鐘，在紹興老

城區的大街上踴躍，路上燈火通明，人車來往，商店還沒有休息的意思。這完完全全已經不是我從前感受過的中國的印象了。

經過一家門面窄小的店鋪時，忽然聽見裏面一個靠櫃台站著的男子高聲說：「連話也不讓人說，還講甚麼民主？」

毛主席當年的反問，現在大概無人有興趣回答了，但商店男子的話，恐怕並非一時的街談巷議。

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七日

北京紀行之十一

(28/5-2/6)

張偉倫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社會學系一年級
現職傳媒

五月二十八日

我們一行四人大約在下午一時左右到達北京，從機場到市內看不到半點我想像中戒嚴地區應有的景象。這天正巧是北京學生發起的全球華人大遊行的日子，我們來到長安大街時，遊行已近尾聲，遊行隊伍正返回廣場。

我們首先到北京飯店與中大同學聯絡，交付帶來的物資（包括報紙、影印資料、四個睡袋、八盒眼藥水和一部巨型收音機），並瞭解一下廣場的情況。根據 X X 的表示，北高聯、外高聯與指揮部之間有嚴重的意見分歧，廣場秩序混亂。中大同學的主要工作是負責廣場的物資供應，人手方面頗為短缺。（這與我們在香港時所瞭解的情

況剛相反。)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住宿問題，4078¹的雜亂，情況不但令我們吃驚，也使我們意識到那裏是再容不下我們四人的了。於是我們到前門那邊的X X旅館租房子，先把自己安頓好。

安頓下來以後，我們到廣場去觀察環境。廣場上旗海飄揚，唯靜坐同學人數稀疏，剛下班到來廣場的市民倒有不少。廣場上隨處可見一堆堆的垃圾，與靜坐的同學為鄰，我覺得廣場就像一個大難民營。我失望，也後悔來得太遲。我不明白學生在這情況下為甚麼還不離開廣場，我很想瞭解他們的心態。

物資站被市民包圍著，外圍也有很多人，一堆一堆的在討論問題，我們靠近人堆去瞭解他們談論的內容。當時有一中年女人正在發表意見，我問了她一些問題，但她強烈的情緒和措詞使我有點不知所措。她是支持學生的，但她覺得客觀的環境不容許市民有進一步的實際支持行動。從她的說話中可看出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態。以下是部分說話內容，是用Walkman錄下的，當她發現我們錄音時，曾堅持要我們把錄音洗掉。

中年女人：「你跟誰要民主？你跟他要？你跟我要？你跟黨要！理你啊！文化大革命如何？現在又如何？我們當然支持學生，學生太可憐了，絕食太傻了，老百姓心痛

1 編按：中大同學在北京飯店的房間號碼。

啊！我們支持又怎麼樣？你別忘了，那政權不是你的，你掌握不了。就你這一點人啊！全國十一億，你才一百萬。支持運動？他吃飯不吃飯？難道都像你們（學生）這樣啊！工人一天不上班，一天沒生活，農民不種地吃甚麼？只有大學生才能在這兒呆著，但是你們還是耽誤了學業。怎麼不支持？心裏都支持啦。」

之後，我們常被市民包圍，詢問香港支持北京的情況。當中有不少人認為這次香港反應激烈，是因為香港市民認識到「今天的中國就是明天的香港」，如果中國沒有民主自由，香港也不會有。

五月二十九日

大清早，當我們還在被窩裏時，中大同學來了電話，分派了第一件工作給我們。這天要在廣場豎起四個大橫額，大橫額上貼上我們帶去的報刊雜誌以供市民閱覽。由於新聞封鎖，北京市民對自身的處境以及中央高層的變動也感到迷惑，他們渴望從外來的渠道中多瞭解當前的局勢。街道上張貼著香港報紙影印本的地方總有很多人圍觀。

我們要買的東西包括白布、鐵絲、繩子、漿糊和鉗子。由於人地生疏，買了大半天才買齊。吃過午飯後便開始工作，在我們貼資料的時候，已有大批市民圍觀，急不及待，想先睹為快。

晚上廣場很熱鬧，聚集的人數顯然比日間多。有些市

民說他們照常上班、照常生活，全因不想給政府藉口說北京有動亂。市民都說這政府太狠心，學生太可憐了，無論如何他們亦會繼續支持學運的。的確，北京市民的團結齊心是顯而易見和令人感動的。市民在廣場上逕自發言，公開討論，發言的人都沒有避忌，暢所欲言，這種情況在共產專制的中國確是不可思議。

我們在廣場四周找本地和外地的學生閒談，他們大都說對政府不抱任何希望了，並且認為天安門廣場是民主的象徵，有其特別的意義，所以有堅守的必要，一旦撤出，這場民主運動便會叫人淡忘。他們認為撤出要等待時機，如召開人大的時候。

廣場組織混亂是很明顯的事實，據聞北高聯、外高聯和指揮部意見不一，各組織間沒有團結，這不免叫人感到遺憾，這天且聽到柴玲要辭去總指揮之職，理由是與人意見不合。有學生說他們已經決定在六月二十日撤離廣場。我一直擔心香港在金錢、物資上的援助會間接鼓勵學生留在廣場，也曾經有市民這樣問我。但我知道守或撤的決策權不在香港學生手裏，我們所能做到的也只是盡量提供我們能力所及的援助。

凌晨時分，我們開始第二件工作——派睡袋。在派睡袋的過程中，有叫人感動的，也有叫人失望的事情發生。有些北京學生告訴我們，他們不需要睡袋，叫我們留給外省來的同學，並主動引路。我一直沒有忘記他們這種無私的行為。但也有些人搞特權，拿著有柴玲蓋印的紙條來取

睡袋，像理所當然似的，一點也不守規則。我們且碰見一些學生在開舞會，有的男同學髮長及肩、佩戴耳環，這種場面叫人失望又噁心。

五月三十日

這天沒有特別任務。有時候覺得很多中大同學很忙碌，但他們忙的東西我們似乎幫不了，也無從入手。這天印象最深刻的是看到「民主之神」豎立的景象，廣場整晚熱鬧得像在開嘉年華會。這座「民主之神」為處於靜坐低潮中的同學帶來新的刺激。

五月三十一日

這天我們跑到清華大學去參觀，沒有騎單車到清華簡直有點自討苦吃。看到同學們在綠蔭大道上騎著自行車來來往往，中大的斜路又再次令我感到遺憾。清華校內平靜，我們看到有些學生在做運動，張貼大字報的地方也有不少圍觀。

晚上回到廣場，廣場重整藍圖已畫好。如按藍圖分區劃一地搭起帳篷，廣場的秩序必大有改善。我們去收帳篷的時候，大部分人已入睡，我們逼不得已叫醒了一批把帳篷搭得亂七八糟的同學，但他們顯得不願意交出帳篷，並和我們理論分區的計劃。我們最後也是收不成帳篷，當時雖有點氣憤，但後來想起又覺得我們本不應該在人家睡覺的時候去收帳篷的。

六月一日

今天受X X X所託買竹竿，竹竿是搭帳篷用的。我們一行四人，我、一個北京工人、一個香港工人和一個X X X X X的學生。由於貨車不能（或不許？）進長安大街，我們只好坐九路汽車到建國門附近找貨車。找到貨車後，先後說服了貨車司機及其所屬單位的負責人，然後我們坐貨車到朝陽路，在一間物資公司買下1,000支竹竿。在搬竹竿上車的時候，遭到物資公司職員的查詢，當他知道這些竹竿是要運到天安門廣場去的時候，隨即表示要請示上司，那貨車司機嚇得臉也白了，幸虧最後也順利通過。

我們把竹竿運到建國門的高級住宅區那裏，由X X學生和香港工人看守著，我和北京工人則回到廣場去叫板車，同時多叫兩個同學幫忙。叫了兩輛板車後，北京工人歉意地對我說：「交給你了，我還要回家做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他做起事來的那種拼命和認真的態度使我深感佩服。要不是他幫忙，我肯定這次買竹不會這樣順利。（順利得叫很多人也感到奇怪。）

當板車去到建國門時，我們發現缺少了繩子，附近的居民很幫忙地為我們找來繩子，他們顯然都是支持廣場的學生的。下班途經的兩位市民更自願用自行車載我和另一位女同學跟著板車回到廣場。

在運竹的過程中，有一件事令我有頗大的感想。

有一位內地學生拿著汽水（廣場同學平時飲用的那種）和麵包到建國門那裏給我們，那時我渴得很，但沒有

飲用，我知道那些汽水味道不好也不解渴。在北京，在內地學生面前，我常感到自己有如特權階級；我可以住旅館，可以在飯店吃飯，我深深懷疑自己可不可以像他們那樣三餐吃那些麵包，飲那些汽水。我想我不可以。

這天晚上，我們在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下流連，這是我們此行的最後一夜，我們想盡量利用時間與多些學生交談。廣場雖然秩序混亂，環境惡劣，更有錢財被濫用，物資被盜的情況出現，但我結識的大部分學生都沒有令我感到失望。他們表示對政府都感到絕望了，但沒有對自己絕望。我相信正如他們所說的：「我們不絕望，中國有希望。」除了談及學運，我們還東拉西扯地談了一夜，我覺得恍如置身在交流營中。自「六四」之後，我對他們更加懷念了。

六月二日

這天我們大部分時間到王府井購物去。下午回到廣場時，知道知識分子開始絕食，廣場上多了很多人。我們覺得這是學運的另一個高潮，使將要離去的我們加添了不捨之情。

晚上十時半，我們終於離開北京了。留京的這幾天是多麼的風平浪靜，我的心情輕鬆得像在度假，哪會想到還未到香港，天安門廣場已面目全非了！

作者附記

二十多年後再看當年的記錄，對細節已不應亦不能再添加了。但五月二十九日，我作了一段很可笑的敘述：「……碰見一些學生在開舞會，有的男同學髮長及肩、佩戴耳環，這種場面叫人失望又噁心。」現在重看，我實在不明白有何令人噁心之處。反而，我仍記得當時在廣場見到有人彈結他、跳舞，氣氛是挺愉快的。

北京紀行之十二

(28/5-2/6)

一中大同學¹

第一部分

五月二十八日

一行四人，從香港直飛北京。

1:30pm到達北京首都機場。

行李內放了兩盒眼藥水、睡袋及一些學運的資料，所以在過關時，有點兒膽怯；但是，卻料不到過關是這麼輕而易舉的，根本不檢查行李。

甫踏出關口，已有司機向我們兜生意，但叫價卻非常高，要百多元外匯券才願駛入市區，他們所持的理由是：北京的交通癱瘓，地下鐵也關閉，所以沒有車可以入城，他們接載乘客至市區是一個冒險。可是，我們不大相信他們的話；最後，我們是乘搭巴士到北京飯店的。

3:50pm到達北京飯店，找到中大的基地。

¹ 本文作者不具名。

但是，似乎沒有工作分配。

而中大的房間卻是一團糟，十多人擠在一起，所以我們決定另謀居所。

5:00pm在前門X X X的X X旅館安頓。

打點好一切後，再到北京飯店看看有甚麼工作分配。

7:30pm在天安門廣場蹣跚，發覺周遭很污穢。

五月二十九日

10:15pm到達天安門廣場。

今天的工作是張貼從香港帶來北京的學運資料於廣場四周。

凌晨12:30在大部分的廣場學生都睡了之後，便觀察有需要禦寒衣物者，以派發睡袋。晚上，在北京飯店睡覺。

五月三十日

中午時分，在天安門廣場周圍觀察，與學生及市民傾談。

晚上，「自由女神」運進天安門廣場，掀起了一個高潮，使本來較為冷清的廣場擠得滿滿的，人聲嘈雜，好不熱鬧。

今天，更傳出三個工人被捉拿的消息，因此，有人到公安局門外靜坐抗議。工人被捕的消息傳開後，廣場周圍的氣氛又好像緊張了，人們一小撮一小撮的圍攏在一起，討論這件事情。

五月三十一日

中午左右，乘公共汽車到清華大學，想看看校園內的氣氛。校園內只有很少人，寧靜一片。有人在打球，有人在散步，似乎沒有半點兒異樣。但是，一張張動人的、充滿諷刺性的大字報卻耀目地張貼了出來，使你不期然對其行注目禮，也不得不對當地學生那種含蓄中帶諷刺的筆法感到欽佩。

晚上，中大的同學決定為學生重新分配地方和搭帳篷。於是，我們先從搭設得最差的帳篷著手，以求逐步改善廣場的環境。

六月一日

下午，在王府井大街逛，發覺周圍的人很閒適地在流連，選購貨品。

7:00pm遇到《明報周刊》的記者，他強調政府重申戒嚴令，記者不許攝影與採訪，很多記者也預備撤走。

但是，我們嘗試與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駐守的外籍記者傾談，發覺他們並不準備離去。

後來，在紀念碑附近，有兩個學生受了傷：一個睡在地上，一個眼角傷了，正在接受訪問，原來他們是被公安人員打傷的。

六月二日

中午，政府發起的遊行無人參與，反而有反政府遊行出現。

6:15pm侯德健等四人的絕食開始了，廣場上又再度聚滿人群。

10:30pm乘火車離開北京。

第二部分

決定到北京去只是經過很短時間的考慮，更遭到家人的強烈反對；但感到北京的學運似乎搞得有聲有色，很希望看個究竟，瞭解真實的情況。

翻閱歷史書，閱讀新聞資料，看到很多這類的反抗或爭取行動，但是，很多行動似乎年代太久遠，有些又似乎不屬於我的世界。然而，北京的學運卻發生在這個年代，發生在中國，這些都促使我前赴北京。

前往北京之前，甚至是留在北京的一段時間內，一直都以為這個學運只是爭取民主自由的一個起點，以為它會靜靜地過去，成為歷史。直至六月四日的大屠殺發生了，一切的想像或猜測都已化為子虛烏有。

抵京當天（五月二十八日），北京的學生正舉行最後一次遊行，場面比先前已冷清了不少。廣場上堆滿了垃圾及雜亂的帳篷，更不時傳來陣陣惡臭。廣場的環境壞極

了，但學生們卻以廣場為家，實在苦了他們。有許多從外省來到北京的學生，更是身無長物，帳篷也沒一個。學生們穿不暖、睡不好、吃不飽，為的只是要求一個與政府對談的機會。既然是機會，它不代表政府或學生任何一方會勝利，但至少它是個機會，可以讓雙方作一瞭解，為甚麼政府硬是不理不睬？

香港與國內實在大不相同了，我們自小生長在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似乎甚麼都不用爭取。事實上，我們不需爭取，便使我們不懂得如何爭取。一切的制度、法律似乎都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不去問個究竟，我們安於現狀，所以對於任何問題，我們不會想深一層，不會去理論。面對北京的學生，實感有愧。

初抵天安門廣場，看到冷淡而混亂的情況，很使人氣餒，心想：在這樣的環境下，怎樣鬥爭？廣場上紅旗飄揚，每張旗幟上都寫了學校的名稱，突然間覺得中國真的很大，一時間薈萃了差不多全國的高校，場面確是壯觀。

在北京的時間，學運發展到低潮，一切平靜得使人無法相信。市民告訴我們：廣場上的學生人數只及初期的五分之一左右。很明顯，市民的熱情也已減退了不少，他們沒有再送衣物或食物給學生；但是，下班後他們仍到廣場探望學生或發表言論。一個市民對我們說：他是很支持這個學運的，他認為學生的行動是勇敢的；可是，他一天不工作，一天便不能生活。生活的擔子足以迫使他們把熱情壓抑著。

每天晚上，廣場的氣溫驟然下降，但氣氛並不太冷清，因為很多市民都來到廣場，各自討論學運，周圍是一圈圈的人群。每有人開始談話，人群便聚起來。其實，中國人民實在有太多抑鬱，太多意見需要發洩和表達。奈何沒人理會！

逗留在北京的短短幾天，沒有做過甚麼轟烈的事情。只是帶了一些學運資料，分派睡袋、分派麵包給當地的學生，我們只是帶了一顆支持的心到北京，卻不是與他們共同籌劃，始終像隔著一層似的。

在天安門的工作，很多是晚間進行的，例如：派發睡袋、分配麵包。有時候，又與學生或市民聊天，凌晨三、四時才睡。有兩個晚上，更睡在廣場。那些作糾察的學生，每次都會勤快地為我們搭帳幕，又拿被子給我們，他們對我們的關心和殷勤，反使我過意不去。反觀糾察隊，他們有帳幕也不睡，因為他們要在晚上輪班看管物資。他們簡直把我們作上賓看待。

和市民聊天，發覺他們很關心我們的工作情況，又不時詢問我們香港的情形，並要求與我們握手、傾談。就算以我的不太靈光的普通話，在他們耳中，也是甘露。他們很留心地聽你述說，也不時提出發問。晚上，與他們傾談，市民們很喜歡問我們睡在哪裏，每當我們說：或會在廣場上睡，他們便好像有點兒不安，似乎我們不應睡在廣場。與學生們傾談時，他們更遞上一件件厚衣或食物來，似乎真可與他們混在一起，但我們終究是不同的，他們為

理想而奮鬥，我們為甚麼呢？為同情？為支持？為歷史作見證？……有時候，連我自己也搞不清。

在北京的六個日子裏，一切都是這樣寧靜，曾經後悔到北京，好像沒有甚麼作為似的。六天的寧靜欺騙了學生，也欺騙了我們，沒想到血腥的鎮壓會在我們離開北京後便發生。所以，一切對我來說，不但是個噩夢，更是……

北京紀行之十三

(29/5-9/6)

謝淑妮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藝術系二年級
現定居美國，從事藝術工作

五月二十九日

今天下午四時三十分，我與林乙彬乘CA910班機往北京。我們各人帶著一個帳幕、兩個睡袋和一疊報章資料，海關沒有任何搜查。我們前往北京飯店，與香港同學取得聯絡後，旋即前往天安門廣場。廣場是黑壓壓一片。周遭是東歪西倒的帳篷，和一堆堆垃圾。在廣場的正中偏北，有一大群人圍攏著，原來是中央美院等校正在進行豎立「民主之神」的工程。聞說有一些人反對，發生少許事端。我前往深大帳篷閒聊一會後，便回飯店。

五月三十日

今天一早，我回廣場看看物資部有甚麼需要幫忙。我知道有很多物資分配的事宜，是需要我們幫忙的。可是，

我發覺我與早一批去廣場的香港學生聯繫不太好。我問他們我可以做甚麼，沒有人能告訴我們。而我卻發覺他們忙得不可開交。我很想問他們，我可以分擔他們的工作嗎？回覆仍然是不知道。我唯有在廣場四處走走，與廣場學生閒談，也有市民問我香港人對這次學運的看法。我又拍下一些照片，包括一些標語和廣場的情形。這個時候，「民主之神」已經巍峨地矗立在廣場上，在藍天之下，她非常耀目和尊貴，面向毛像，更有一點挑戰的意味。

回到物資處，發覺沒有甚麼香港學生，只好在那裏與糾察聊，直至天黑。傍晚的時候，聽說有工人領袖和摩托車隊員給公安局抓去了，工人與公安局交涉。工人們也有在歷史博物館前集會。我又從香港學生中聽到吾爾開希會帶人整頓廣場，但實際的情況全不知。我真的很想清楚地瞭解，究竟香港學生在廣場上扮演一個甚麼角色，是物資上援助，還是參與民運的策劃，他們現在正進行甚麼支援工作，與廣場學生有何種的聯繫……我很想知道，但看來沒有人會告訴我。我離開香港之前，國內支援部¹很明確地對我表示，我們只是作物資的支援，我亦同意，但現在看來，好像不是這樣。

晚上的時候，我終於接到了「任務」，就是把沒有竹

1 編按：「國內支援部」應為「國內支援組」。當時中大學生會成立了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初期設國內支援組、香港推廣組、校園策動組和資料組四個小組，後來加入突破新聞封鎖組，並由核心小組負責統籌。

竿的帆布收回來，以便築起帳篷。原來他們打算把廣場劃分為若干區，好讓帳篷能有計劃地撐起來。其實，那個時候很多同學都睡了，要拿走他們當地席的帆布，有點於心不忍。幸好，那幾個西安大學的學生非常合作，立刻起來，把帆布搬往西南方，還整夜不睡，與我們一起搭竹竿子，撐起帳篷，這使我很欣慰呢。

五月三十一日

同行的林乙彬告訴我，他明天要走了，我卻不想走，我很想留下，為北京學生做點東西。我還有個計劃，就是想留在廣場睡，這樣才能更切實地與廣場學生一起。這天我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廣場，與糾察們談了不少。我仍然不知道可以做甚麼，但我知道只要留在物資站，就能隨時幫忙。這天天氣不太好，廣場學生很焦急，都紛紛湧到我們這裏要帳篷。這時西邊已整齊地排了十多個帳篷，多麼令人鼓舞，因這標誌著他們可以長期鬥爭。還記得有一個學生，他的學校沒有帳篷，我們的竹竿又不夠，急得他說了很多賭氣的話，情緒很激動。他說我們有這樣漂亮的帳篷（Nikko），他們甚麼也沒有。我們連忙解釋這是放物資用的，但我聽了心裏也不是味兒。

晚上，我們要派麵包，我終於可以負責登記的工作。雖然這只是雞毛蒜皮的事，但只要能為這群理想之鬥士盡一分力，我已非常高興。

當天晚上，我走入廣場中的帳幕內與學生們促膝長

談，又與他們唱歌，互訴心聲，十分高興，也十分難得。²

我決定把火車票退了，留下來。

六月一日

今天，我應廣場一學生之邀，前往北大校園。沿途我發覺在天安門城牆上，還有工人清洗貼在上面的大字報，他們動作迅速，清洗認真，使途人都有點惶恐。有人說，官方是越來越看不過眼了。但是，廣場隧道的兩端，依然有很多人圍觀香港報紙和其他評論文章、諷刺漫畫等。還有不少人認真地記下重點，這是在香港絕對不能看到的。

我很欣賞北大清幽的校園，但我更欣賞的是北大學生那積極、承擔的精神。與他們談理想，談國事，都使我獲益良多。

北大有自由論壇，擴音設備很好，在宿舍可以很清楚聽到。他們對於學運未來的策略，爭論得很激烈。我也是從那裏知道明天有四位學者絕食。

我認識的那位北大學生表示，其實她並不贊成繼續在廣場靜坐，因為這是很消極的做法，只是等，政府也不會

² 當時我問外省學生們為甚麼他們的帳篷日間是空的？學生們跑到哪裏去了？他們笑咪咪地說，都到北京各處觀光去了。當時的我覺得他們明明是來廣場靜坐的，幹啥跑去當遊客？但其後很快意會到，他們可以「自由」地乘免費火車到北京，不需通行證；可以「自由」地跟各方人士暢所欲言；可以「自由」地唱歌、跳舞，甚至結婚——這些在民主社會屬很平常的事，對他們而言差不多是無法想像的。

理睬你。她認為還是撤退，然後做民眾教育比較實際。可惜，外高聯卻很堅持要留至六月二十日。

從北大回到廣場，發覺北大門外有很多騎單車的居民圍著校門的廣播器，聽著北大的自由論壇。沿途，亦有不少市民圍成一個一個圈，大概也是討論時事吧。那時已是晚上十時多了，他們還是那樣支持學運，積極參與，很令人鼓舞。

回到廣場，工人自治會在西單方向集會演講，措詞諷刺，引到不少人鼓掌。

六月二日

今天，我向XXX³表示，我是來援助他們的，希望能指派一些工作與我，好讓我能積極幫助學生，我滿以為，留在廣場的日子還多呢。

這天下午，北大生舉行了「反反遊行」，他們拿著「戒嚴期間，奉命遊行」的標語，還有「支持鎮壓」、「支持獨裁」、「每人十元，擁護李鵬」等口號，使人捧腹大笑，不少市民亦大聲叫好。

晚上，我如常到各個帳篷訪問，突然間接到消息，說在西單有四人被軍車壓死，氣氛比前幾天緊張多了。

過了一會我回到物資站，立即接到騎單車來的市民通

³ 一名中大同學。

風報信，說有三萬軍隊正向天安門推進。初時有點怕，但河南糾察卻笑著說，等他們等了很久，又說要送汽水、送麵包與他們。所以我也不打算離開廣場，因為我對北京市民有信心，他們定會保護我們。知道軍隊越來越逼近，A⁴說他想到長安大街看，於是我與他和兩名糾察，手牽着手，一起操出長安大街。就在北京飯店附近，果然看見軍隊了，他們沒戴帽，穿白衣，樣貌很年輕，只有十六、七歲吧，他們顯然很疲累。北京市民很快地把路障橫截起來，他們不時呼喚別人不要袖手旁觀，要一起組成人牆。他們又叫人們坐下，我充分地感覺到市民的勇敢與團結，有衝動要走到前線去，勸軍隊回去。可是民情洶湧，A把我拉在路旁。我們走到較高處，看著市民與軍隊之角力戰，半個小時之後，軍隊都後撤了。他們狼狽撤退的樣子，都一一給記者拍下了。

回到廣場，各方向都傳來堵截軍隊之捷報。大家都很高興，感覺到人民始終是勝利的。

六月三日

一早起來，潘毅叫我與XXX買桌子、掃帚等物資。我們奔走了好幾間商店，才能找到合適的和所需的數量，最難得的，是北京市民知道這是給廣場學生用的，都提供

4 一名中大同學。

不少援助。

下午回來的時候，經過新華門，從那裏至廣場，一路都擠滿很多人，顯然是有甚麼事發生。

我看到有數部壓壞了的單車在路旁，前面則有兩輛旅遊巴橫截在路上，巴士的玻璃給人打破。再走前一點，有人在遊行，還有人高舉軍人的武器、車牌等示眾。我還感覺到那處曾放過催淚彈。

回到廣場後，中大同學終於說我應該參與今晚的會議。

由於廣場上的政府廣播曾表示民主大學是不合法的，政府不會承認，亦有說香港某間大學有份參與。所以香港學生的討論要點是集中在關於民主大學一事的澄清。

我是從政府的廣播中，才知道有天安門民主大學這一回事，香港的同學從沒告訴我，我全不知情，這叫我怎樣討論？這麼重要的事為甚麼沒有人告訴我呢？我有點氣惱，加上昨晚整夜沒睡，非常疲倦，所以中途退出了。

當晚的情況是有點異樣，但總的來說，我覺得不會有甚麼事發生。但是他們開完會後，說吃「最後晚餐」，又商討應否留在廣場。我覺得很奇怪，為甚麼說是「最後晚餐」呢？他們知道會有甚麼事發生嗎？我並不知道，我還是打算回廣場的。

我在北京飯店吃飯，突然外邊好像是發生甚麼事，外國記者都衝出去，我也連忙衝出去，那時大約是晚上九時，剛想出門，就碰到一個滿臉鮮血的解放軍，他正由兩

人攙扶進北京飯店。我望向長安大街，只見有一隊解放軍往後撤退，人民不斷鼓掌。我又往前走，試圖前往廣場看個究竟，但X X X阻止我，遠望過去，只見有一大群市民圍著廣場，看來學生很安全，不會被軍隊進佔，X X X勸我回飯店，待會才回廣場。

怎料這次回飯店，便永遠不能回廣場了。

飯店裏只有我與A，及兩個北京學生，其他人都在廣場。大概在十二時許，突然接到香港的長途電話，是中大打來的，他問我外面的軍隊是否真的開槍，香港的學生安全嗎？我頓時心驚膽戰，軍隊開槍？真的開槍？香港的同學都留在廣場呀，他們怎麼辦？我真的想衝往廣場，但還是冷靜下來，接聽響個不停從香港打來的電話。中大又打電話來，叫我把會議紀錄、重要文件燒掉。天呀，我怎麼知道他們的會議紀錄放在哪裏？沒有人告訴我。我瘋狂地尋找，一看到桌上好像有些名單的東西，便燒了，怎料驚動了防火系統，服務員敲門，我恐慌極了，幸好他沒說甚麼。我扭開電視，發覺戒嚴部隊真的執行命令，報告勸諭人民的安全要自己負責。我看著房內的兩部巨型中文打字機發呆，可以把它們藏到甚麼地方呢？不久，潘毅終於回來了，我多麼高興，起碼有一個同學安全無恙，但她顯然是極度哀傷了。我又接到電話，說北京飯店已開始搜查房間了，此處還是不宜久留，我們離開房間，到了lobby。整晚都呆在lobby裏，動也不敢動。

從lobby的窗外，可清楚看到長安街上不停有坦克與軍

車駛過，外面槍聲不絕，極像新年時的炮仗聲，整晚沒有停。後來，還有些「便衣」驅散在窗口旁觀看的住客，又聽到飯店門口有槍聲，所以連窗口也不敢望。

直至清晨，我們才走到4062，歇息了一會。

六月四日

我很擔心香港的學生，因為有半數還未聯絡上，其他的都回來了。回來的同學訴說著屠殺的情景，我心劇烈地絞痛著。民主的鬥士，就這樣白白的犧牲嗎？

直至中午，我們才肯定所有香港學生都安全了，這才叫人稍為放心。但是，天安門的學生，他們又怎樣呢？

A說我們應盡快離開北京，因那時未確定有飛機，所以我們決定乘火車⁵。從飯店往火車站途中，長安大街滿目瘡痍，焚燒的汽車，滿地的玻璃碎，屈曲的路障，叫我心碎。天空還不時有直升機經過，市民都紛紛走避，四周傳來一兩聲噼啪的槍聲。

安全到達火車站後，一直等10:30的火車。

5 其實當時我並不是不想等包機。A說這包機上的香港學生到港後會成為媒體焦點，亦有可能被中共列入黑名單。當時的我不太畏懼列入黑名單，但確是不想受媒體注目。重點是我覺得我與其他中大學生有一段距離。我在五月底才到廣場，曾很努力地加入支援工作，可能各人都太忙，沒有架設一個傳遞內部籌劃及形勢轉變資訊的機制，像我這樣後期參與的學生有在外圍的感覺。我不一定要參與討論策略的會議，但如有資訊與人身安全攸關，掌握資訊的人是有義務傳送給有關人士的。

六月五日

火車在武昌不遠停下，A忽然說他想到武昌，看看他們是否知道北京的慘案，也可聯絡當地的學生。三小時後，火車重開，我們到了武昌。一出火車站，就看到有一些公共汽車被人塗上了「李鵬槍殺人民」的標語，但有些標語給人塗蓋了。

在大街小巷裏，都貼了一些大字報，報導北京消息，其中包括王丹被殺，香港人要求一九九七不要歸還中國，由於小道消息流行，所以我也半信半疑。

長江大橋給市民堵塞了，火車也在長沙一帶給人堵塞住，武昌的交通陷於癱瘓，市上不時有小隊的遊行隊伍，他們掛起花牌，悼念同胞，又聲討李鵬。

在火車站裏，有學生的宣傳隊在作宣傳，他們又勸市民不要走，在危急關頭，不應消極逃避，應積極抗衡。

他們又把屠城真相印在傳單上，但數量太少，很快便搶光了。

我本想上前與學生聯絡，但當地的一位市民勸告我還是早點回家，武漢的情況是越來越緊張了。

六月六日

由於沒有火車，沒有飛機，我只好坐麵包車到長沙去，然後才想辦法回家。（早在前一天，A說他要到上海，所以我們分開了。這時，只剩下我一個，我很想回家。）

六月七日至九日

坐了一整天車，才到達長沙。長沙火車站曾舉行哀悼大會及遊行，但市面的情況，還是比較平靜，比武昌平靜多了。

在街上，我發覺有人在販賣「最新消息」的報章，大概是報導學運，用紙一份一份包好，應該是用油墨印的，人民幣五元一份。我想，很多市民也不大相信官方傳媒，所以也有不少人買來看。

我接觸到一些學生，他們說從廣場逃回來的只有很少，還是負傷的，大部分也失蹤了，其他的我也不敢多談。

我很擔心，我究竟怎樣回家呢？甚麼交通工具也沒有，幸好遇上兩個德國人，他們是經商的，自然有辦法弄到機票，所以我才能到廣州。九日晚上，終於回港了。

北京紀行之十四

(23/5-4/6)

任信成¹

八九民運期間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學系三年級學生
現從商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到達北京，天陰下雨。當晚買了一些雨衣給一些學生，因的士司機說很多學生都沒有雨衣。當天晚上到天安門廣場，當時警戒森嚴，有多層關卡，要出示學生證。有高聯的負責人勸諭我當晚不要留在廣場，因廣場情況隨時會有突變。

在其後的日子裏，在最初的數天，多與廣場內的同學一起。及後與中大同學一起工作。

我在廣場的工作主要是購買物資。我特別負責買竹竿與帳篷。每一次都得廣場同學們的合作，才可以將竹竿等物資拿回廣場。但當時最令人頭痛的是所有的卡車都拒絕送竹竿到天安門。一個負責人這樣說：「一個月前我可以

1 編按：任信成同學雖非中大學生，但在北京期間與中大同學一起工作，故將其見證文字收入本書。

免費跟你送，但現在不行。」因各個部門都受到政府的壓力。有時貨車只可將竹竿放在離天安門老遠的地方，有時較近，但每一次都令人頭痛，不知怎樣才可以將它們運送到來。有時僥倖有一些司機冒險載貨，有時有三輪車司機幫忙。一次原已約好了一卡車到售賣竹竿的地點，所有的竹竿亦預備好了，但那卡車沒有來。我與其他同學都很不高興。我們回到天安門廣場，跑到馬路上截卡車，望有司機幫我。最終失敗。幸運地，最後得以與一些三輪車聯絡上，一整夜地搬運竹竿。有了竹竿便可搭帳篷，同學們便可免受日曬雨淋之苦。

但當廣場上環境一步步改善的時候，北京市卻越來越緊張。六月二日晚上，一大批、一大批的少年軍人走在長安街上，一些更在北京飯店對面路上坐下。我心想，天安門被鎮壓是早晚的事，學生在這次運動中，只能從愛國、和平的精神去感染群眾、去感動軍隊，武力反抗不行，消極抵抗亦不好，何不積極地使軍人們，無論他是否已決心鎮壓學生，去感受一下天安門學生偉大之精神。有些同學阻止我說，現在拿了食物給解放軍，明天廣場同學便沒得吃。我想：「解放軍現已來鎮壓，難保今天各同學還能留在廣場，還怎管明天食物夠不夠。」但作為一個小心及謹慎的計劃總是好的。因我明天已訂了九百個飯盒，麵包及一些糧食是超過明天所需的，我便拿了一批食物給解放軍，並找了廣場一些同學幫手，他們都明白在做甚麼，一些同學還替我解釋，說要向軍人作一些表示！每當我們將

食物拿給解放軍時，他們都不敢要。而停在北京飯店門前的少年軍，一見我們給他們食物，便掉頭避開。數千解放軍便是這樣的撤離了。

六月三日晚上，剛吃過晚飯，長安街上早擠滿市民及一些士兵。我連忙趕去天安門廣場。在天安門廣場，最初還是平靜的。但近凌晨的時候，一排一排的軍人在我們前走過。一輛裝甲車在旁邊急速行駛時，我心想：「終於來鎮壓了！」當時周圍都可以聽到槍聲，還有滿天的訊號彈。

我跑到廣場近長安街的地方看見一輛裝甲車被燒。群眾在拍手呼叫，我亦差點歡呼起來，幸好聽到在旁一中年男子說：「不好，不要這樣！」當時我不知應否支持這行動，我彷徨無計，便離開。當我走回廣場的旁邊，我看見一個軍人被一班人用竹棍打，這軍人當時已昏在地上，賴他身旁的大學生保護。我立即衝上前，與其他大學生，將這軍人扶入天安門廣場的救援站內。那群人揮動著他們的棍棒，盡情地發洩他們的憤恨。這時仍有十大學生圍著我們保護，形勢危急。好不容易才將這軍人送進救護站。倦極了，我差點暈倒了。這時，被驚動了的大學生都很緊張，數十大學生就這樣手牽著手，圍著救護站，高呼：「不准任何人襲擊士兵！」我當時緊緊地與他們手牽著手，但幼稚地懷疑：「他們是來鎮壓我們，為何我們這樣善待來鎮壓我們的人。」在這危難中，廣場的大學生仍保持理智、冷靜與和平，無知的我，深愧不如。救護車來，

軍人送走，我們亦鬆一口氣。

再走回近長安街的廣場旁邊，看見有三個同學抬著一個受傷的同學，我毫不猶疑衝上前，看可有幫忙的地方。我用我的左手拿過受傷同學的右手。我看見他的頭後仰得很厲害，便用左手托起他的頸。我的腿不停地跑，但我的心涼了，我不相信他的頭是完全破開，我的手指可以直接摸著他的骨頭，我當時真想伏在地上大哭一場，但我不能，因我得趕忙送他入救護站，因我不願相信他的頸是完全爆開、不想相信他必死無疑、更不敢相信這晚的是大屠殺而不是鎮壓。當我將他抬到救護站時，他不停地吐血，吐在早已染滿血的上衣上。

當晚在廣場上，救護車穿梭來往。為了送一傷者上車，我們走在一輛行駛中的救護車前，望將它停下。它駛過我們，不想停下。我們太憤怒了，旁觀的人亦忍不住圍著它，大力拍它的車門。司機很無奈又悲憤地打開車門，說：「車已載滿了，再多一個也放不下。」我看見救護車內已載滿了傷者，他們都奄奄一息，我們只得目送救護車離去。

三時半離開廣場，四時半回去，正是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近三千學生，他們哭著，很激動，但他們仍很有秩序，一間學院一間學院整齊地出來。我這時只好停下，高舉兩手作V字。一些同學我認識的，我與他們握手道別。一些同學叫我一起走，我說不，因我想歡送所有天安門廣場的同學離開。我不停地流淚，為的是這次偉大運

動的暫時結束、為的是偉大的同學市民們壯志未酬、為的是這個運動、這個壯志代表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榮辱興衰，所有中國人得回人天生賦予的基本人權。一個同學大叫：「我們有沒有做錯？」當時痛恨這個同學，為甚麼懷疑我們這個偉大的愛國愛民的運動。我當時只好大聲回答：「你們當然沒有錯！」當近三千同學離開後，我跑到近歷史博物館前，望向天安門廣場，全廣場已被士兵、坦克等覆蓋著，我看不見任何同學。我重回同學撤離之東南面，但已不再見有同學撤離，卻發現有一批同學手牽手地組成糾察線，將他們身後荷槍實彈的士兵及坦克與在他們前方的學生及市民分開。多麼勇敢的大學生。

上海紀行

(1/6-6/6)

黎婉薇
八九民運期間就讀新聞及傳播學系四年級
現職民間基層團體

六月一日

大清早，我們走進復旦大學校園。華說校園的氣氛和北京相差太遠了，大字報不算太多，而同學圍著討論的氣氛也不多見。我想，這不是「空校」嗎？不是許多同學回鄉嗎？誰跟你討論？

友人告訴我，在學潮開始的時候（四月底左右），校園的確有許多大字報，但現在校門外一張又一張的大字報，早已被校方洗刷得乾乾淨淨。

步入校園，大門附近貼上一幅校方的通告，謂校方要學生盡速回校，說甚麼考試、分配工作照常進行，甚至說甚麼若不回校會發警告信給學生家長云云。這份通告對同學的影響，的確無人知道，但對於一些搖擺不定的同學，確實構成一定的壓力。

後來，在校門附近我們亦看見一張小字報，內容是「我們是小撮極少數堅持復課者，我們亦從未參與任何罷課行動，校方不要發信給我們的家長」之類的字句，引來一陣噓聲。這時候竟有這種反動分子，我和同伴不禁咒罵這類極少數的復課分子。我想，八六年的學潮中上海學生的熱情理想去了那裏？

毛澤東像冷冷的立在校園內，有學生利用了這石像的石基練習網球，校園顯得冷清清。當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文革，很多人痛恨他對知識分子的殘酷，可是，他所說過「鎮壓學生運動沒有甚麼好下場」這句話，難道現在的領導人不懂得嗎？今天許多血腥鎮壓學生群眾的屠夫，當年何嘗不是積極投入過革命運動、學生運動的？為甚麼歷史卻這麼荒謬？它在重覆……

和友人步入校園中心，一座自由女神像立在紀念碑前，碑上的大字報許多已被人撕掉，一些報章如香港的《文匯報》的影印本，也張貼出來；餘下的大字報，許多是討論有關李鵬、楊尚昆「五一九」講話的，當時許多同學對李楊的講話十分憤慨，認為是污蔑了學生純潔的要求。亦有些大字報內容討論當前的學運方向，例如加強理論的研究、強化自治學生組織、不要再搞山頭等。和友人談起，才知道現時復旦自治會跟其宣傳部是存在分歧的，但分歧的原因好像是因為策略不同，更令人驚奇的是，宣傳部一些組織者自己亦隨著空校行動回鄉了，甚至把喇叭鎖起，令到自治會宣傳工作極為困難。我心想：現在大事

當前怎能搞內部分裂？但實際分歧點在哪裏，也得日後我們接觸一些組織者才知道。

我們看罷大字報，便貼上帶來的香港學聯《民運專號》及香港的評論文章，這時立即引起部分同學圍觀。可是，友人告訴我，大字報被撕掉的情況十分嚴重，今日貼上了，晚上可能便不見了，可能是同學拿去抄，或是校方撕掉。於是連續幾天進入校園，我們便是「天天來、天天貼」。

在校園周圍溜，冷清清的，一點不像在搞學運的樣子。下午溜到友人宿舍，他剛巧不在，和一個唸哲學的研究生傾談，大概知道復旦自治會的情況。據他說，當時自治會組織十分鬆散，領導的組織班底經常撤換。北京開始學運，上海也跟著遊行、絕食，亦有民宣隊往街頭去，但行動卻看著北京如何走，實在過於被動。另外，原本復旦自治會有一群年青老師和研究生做智囊團，但後來自治會排斥了研究生的意見，甚至投票時亦不理會研究生的票數，故研究生索性退出自治會。至於年青老師，後來也受到校方的壓力，所以現時基本上亦不存在甚麼智囊團。

提及當時上海高校的空校行動，他亦表示當時約有過半學生回鄉了，但空校有甚麼作用？據說，是為堅持學生繼續罷課，以及令學生回鄉宣傳學運。可是，六月二十日人大常委會開會了，到時有甚麼事情發生怎樣動員同學？而實際組織者的考慮是怎樣，也得待我們接觸組織者才知道。

六月二日

早上友人帶來一個面孔瘦削的年青人，驟然想到在甚麼地方見過他，原來是去年底在中文大學國是學會的交流團時見過這個同學，當時我們一起討論《河殤》，我還記得跟他爭論馬克思主義是否一套發展哲學。

這年青人C是一份地下刊物的編輯，刊物附屬於復旦自治會，但卻有相當的獨立性，由五位編輯負責，他們全是研究生。C告訴我們，起初自治會的人說要甚麼審稿之類的東西，他就十分反對，現在學生爭取的不是新聞自由嗎？為甚麼又搞甚麼事前審稿制度？後來經他爭取，刊物還是有其獨立自主性。這份刊物於五月下旬創刊，主要呼應北京的《新聞導報》，文章的內容主要分兩部分，一是一些探討民主理論及討論學運的文章，另一部分是報導從「美國之音」¹或BBC²得來的消息。上海市收聽「美國之音」和BBC的干擾不算太大，他們便把最新消息報導出來。C說，印刷這份刊物的成本十分貴，每份差不多要一元人民幣，因為是影印的關係，每期打算印刷二千份，發給上海各高校。C雄心勃勃的告訴我們，現在也許不能一下子全部文章討論政治，但可以發表多類文章，例如文化思潮，作為「過橋」。他這樣計劃著，似乎已對民間辦報邁開第一步……不過，C告訴我們，其餘四位編輯都因空校行動回鄉

1 「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 VOA。

2 BBC,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英國廣播公司。

了，只剩下他一個人。我們當時還戲言若官方要抓人也許要他一個人揸黑鍋呢！唉，希望這戲言不曾變真！

後來，友人和C帶來自治會的組織者見我們，他就是姚勇戰。當時他化名叫張才，他實際亦無告訴我們他真正的名字。（我返港後，他的被捕消息證實了，才知道是他。）他告訴我們，現時上海高校罷課空校是為了徹底罷課及回鄉宣傳。我們曾經質疑他們空校後若北京有甚麼事情發生這裏如何動員同學？同時，他們回鄉宣傳沒有任何組織，只有獨自或三三兩兩的回鄉，這種毫無組織的回鄉可能令效果大打折扣。

他亦告訴我們有關上海高校自治學生會的情況，當時核心是交通大學、同濟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另外還有三十多間大學。現時常委有五人，裏面再分開幾個部，包括財政部、外聯部（對外聯絡）、理論部、警衛（負責遊行秩序）、聯絡部及總部。但上海高校自治聯會只屬協調組織，它的決定對任何高校都沒有約束力。例如一間院校有行動，在高自聯討論後，其他高校喜歡追隨便由高校自己決定。不過，今次空校行動，卻只有四名常委決定，贊成與反對為三對一之比，結果決定上海高校空校行動，他們的決定就是在這樣少數人的討論下作出的。我不知道其餘三十多間院校的參與有多少，可是，這種決定過程過於集中，不夠公開，同學支持嗎？理解嗎？整個運動的主體去了哪裏？

姚亦表示復旦自治會和宣傳部有些分歧，分歧點在於

復旦自治會組成的部分，他說正值學生會選舉學潮便來了，當時同學認為學生會代表不了他們的意見，結果一群同學自己組成自治會，但當時亦有些原是學生會幹事的同學加入，此舉引起了部分同學不滿，結果引致自治會和宣傳部內部分裂。

見過姚以後，感覺並不好受，眼見他們組織鬆散，在考慮空校行動時又不夠周詳，加上領導班底亦不固定，似乎上海的學運前景困難重重。而我們實際可以做甚麼？同伴和我亦無甚心情，中午去了虹口魯迅公園溜了一會後，她獨自探朋友去了。一個人沒甚麼事好做，便獨自回宿舍找朋友。

走上一幢漆黑的宿舍，心中又感到戚戚然，宿舍的環境委實差勁：八個人一間房，光線陰暗，滿地雜物，凌亂不堪。找到友人的房號，卻不見友人，他的同房說，他去了北京一個多星期了，於是便和他的同房攀談起來。他叫阿華，他說，現在學校的同學均十分低沉，罷課後沒有甚麼好做，有些人平時是麻派³、玩樂派，空校罷課嗎？倒不如省回時間提前放假了，上課反正沒有甚麼意思。我記得在宿舍偶然亦傳來香港流行歌曲的聲音，操場甚至有人打球，一點不像有學潮。

華又告訴我有關悼胡的情況，在悼胡那段時間，復旦

3 麻派是指打麻將的玩樂派，八十年代思想雖然相當開放，但學生之中也有不問世事的。

學生反應十分強烈，當時校方不准學生衝上街上，找校警在大門攔阻他們，但卻被他們突破成功了！他們遊行至市中心的人民廣場，高舉「民主」、「自由」的標語。後來，上海《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撤職，北京學生開始絕食，上海學生也開始絕食支援北京學生。華又說，在遊行的時候，同學均手牽著手，恐怕有不法分子混進去，避免有類似長沙的事件發生，給予官方打擊學生的藉口。華說，可能上海是經濟改革的地方，人民生活較好，他們對學生雖然支持，但還未有甚麼實際行動。據他說，若工人參與學生遊行，可能被扣下工資獎金，故此上海情況不算熱烈是可以想像的。

後來我們又談起有關學運的方向，當我說到台灣校園政治控制跟大陸差不多，和台灣學生校園民主化的鬥爭經驗的時候，友人說了一句：「他們大概不用擔心分配工作吧？」我竟一時為之語塞了。真的，台灣學生畢業後有選擇職業的自由，在校園搞甚麼，最多是情治單位找你談談，或者用甚麼手段要你留級，現在已少用秘密逮捕學生的手段。總之，台灣的政治控制儘管嚴密，學生還是可以搞下去，可是，大陸學生的命運卻被他們的個人檔案操縱著，分配制度是官方對學生最大的威脅。你現在積極參與學運嗎？四年級分配的時候，可能會調到老遠的新疆、內蒙，誰願意離鄉別井？說到這裏，國內每個人的選擇機會畢竟受到那麼嚴重的壓抑，但他們卻在這種制度裏生活著！！

跟華也談到「李鵬下台」這句話背後的意義，說實在的，他們對民主的認識真不比我們差，一個國務院總理，違憲宣佈戒嚴，又把幾萬學生的生死置諸不理，哪有當總理的資格！不過，歸根究底，一個領導人上台下台這回事，中國見得多，但沒有徹底政治制度的改變，沒有制衡的機制，趙紫陽也可能變成另一個鄧小平。他們流行一句笑話：「毛澤東幹部，兩袖清風；華國鋒幹部，無影無踪；鄧小平幹部，百萬富翁。」經濟改革，一部分人富起來，而起來的卻是擁有最大政治權力的幹部，搞官倒，害得老百姓叫苦連天。政治與經濟分不開，政治上若無制衡力量，他們和古代的貪官污吏有甚麼不同？華說到今次學運有這樣的基礎，老百姓才那麼熱烈地支持學生。

我們也談其他的瑣碎事，不覺快夜幕低垂了，華那時才記起今晚有一個討論會，是復旦自治會搞的，我們立即奔向球場，但似乎已散會了，只剩下十多個同學圍在一起討論。聽他們爭論的內容，多是質疑自治會空校的行動，及批評他們決策過程太封閉，同學根本不清楚。那位回應同學質疑的組織者，也不過是鋪陳姚勇戰早上跟我們說的理由，又說甚麼已經過各系會代表的討論。似乎，他們的組織經驗不足，導致了這倉卒的決定吧！

六月三日

今天和同伴再進復旦校園，打算接觸宣傳隊和自治會的同學。在貼民運專刊和文章的時候，一些同學問我們索

取，我手上拿著的一疊，很快被他們搶去一空。後來幾個同學問有關香港的情況，我們告訴他們香港有百萬人上街支持，他們都感到有點驚奇，因為他們覺得香港人很少會這樣做。上過北京的同伴也告訴他們有關天安門的情況，他們均十分有興趣聽下去，不過，上海同學有組織上北京支援的不算多，據說只是獨自或三三兩兩的去。像我的友人，他便是獨自上了北京，和他那個在北京航空學院就讀的朋友一起。

這時候，我們亦碰到一個從中山大學來的同學，原來他也是和我們一樣，打算接觸高校的組織者，湊巧碰到一個復旦自治會的人，他便帶我們到自治會的總部（即學生會的地址）作簡單的介紹，組織的同學介紹自治會的架構。自治會主要由各系代表組成，再在代表中選出常委，一切是常委決定，再交由系代表討論通過。一般來說，系代表有責任向普通同學交代，但問題是，系代表不一定要選出來，有些是自願當的，權責不清，意見是否真能來自基層同學，然後再向常委（或系代）反映實屬疑問。好像昨天跟友人傾談，他便一直質疑空校行動，但這種意見有被提出嗎？不知道。決策越集中化，出現錯誤的機會越大。

我們此次會面只談及他們架構的問題，並未論及其他重要問題，例如學運方向、如何鞏固發展現時的組織等問題。不過，自治會現時最大的問題是資源，其中一位常委告訴我們，現只剩下兩三萬元，印刷、擴音、通訊等設備

極不足夠，基本的資源不足，做甚麼事也一籌莫展。但面對一個如此鬆散的組織，你放心支持他們麼？我和同伴只好商量一下，回港後才作打算。

就在隔壁的房間，我們遇上北高聯一隊民宣隊的成員，其中一個戴起小紅帽子、架著眼鏡的小伙子S，是北師大的同學。他們到達上海比我們遲一天，二十個人分成小隊，前往上海不同的高校，瞭解當地自治會的情況。我們真窩囊，來到上海第三天了，兩個人還是呆在復旦裏瞭解摸索，其他高校情況卻甚麼也不清楚。他們很快已聯絡了幾間高校。S告訴我們，民宣隊南下有兩個目的：（一）向各地民眾、高校同學宣傳是次學運的意義；（二）瞭解各高校情況（但這過程只是瞭解，不是搞「串連」）。他們在五月二十七日離開北京，一行二十人去過南京。S告訴我們，南京的組織情況較好，他們已於六月一日舉行長征。而今次到上海，主要也是宣傳。但據S說，上海的情況是比較冷淡，同學亦感到有點失望，不過，由於最近情況有點變化（早上我們致電回港時，知道有三位「工自聯」的工人領袖在北京被捕了），所以他們打算翌日離開上海返回北京，瞭解最新情況才作打算。當時他還邀請我們加入他們的民宣隊一起宣傳，我說：「遲些我們可能會上北京，到時我們可以和你們會合哩。」他說：「甚麼時候？」「大概六月中以前。」我們就這樣相約。可是，今天這個約定卻幻滅了。

下午，S帶來了兩位年青人，一個外表十分穩重成熟的

男孩子，我猜想是今次民宣隊的隊長吧，他和S也是同學，今年畢業了。另外一位是在北大唸書的研究生，他可能是北高聯的智囊。我們作了簡單的介紹，便討論當前的局勢，當時大家都感到，現時高層權力正在變化，而軍隊駐城的作用，可能是對付另一個高層領導人，也可能要像台灣一樣，長期實行「戒嚴令」，使北京市長期處於緊張的氣氛。（當然，誰也料不到人民解放軍翌日立即成為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我們說到策略，可能要轉去地下，必須把校園民主化提出來，抗爭到底，然後是工人……

我們又把一些討論台灣社會運動經驗的文章和民運專號給了他們，裏面有許多討論「民間社會」的理論和實踐的文章，北高聯的同學感到很興奮，他們很高興的收下來，也邀請我們上北京和他們作更深入的討論。當時，我們的確十分天真，台灣和大陸的政治控制不是一樣很嚴密嗎？但這幾年台灣的民間運動的確建立起來了，他們的工會、農民、環保、學生運動不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嗎？曾幾何時，我們這批人曾天真地以為台灣學生的鬥爭經驗可以給他們一點參考，香港的學生運動太不濟了，從六十年代「反資反殖」、七十年代中期「金禧事件」迴光返照一番，便一直沉寂下去，而八十年代前途問題出現，學界又好像有些領導角色，但現在這歷史時刻，我們窩囊的學界卻不知可以幹甚麼。算了吧，離題了，畢竟這裏的歷史脈絡不同，鬥爭經驗又是實實在在的一回事，到了這種膠著狀態，我們可以幹甚麼？

我們每個人腦子裏一片空白，他們都說：「整場運動要和政權分開，當年北京之春運動不是被鄧小平用作鞏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工具嗎？地位穩了，連幾個文弱書生魏京生、王希哲、劉青等都容不了，難道他又容許現在這場偉大的運動嗎？但人的主觀願望往往被客觀所限制，明明是一場政治權力鬥爭正在開始，學生及群眾又一次被官方利用、鎮壓了……」

我們又談到在上海的情況，發覺可以做的東西不算太多，他們建議可以嘗試列席上高聯的會議，看看他們的情況。

這是北高聯民宣隊逗留在上海的最後一晚，他們一行人只有二千多元，每人只有百多元，當時我恨不得把身上的錢都交給他們（我們兩個人也只有千多元），好讓他們的宣傳工作順利進行。晚上，他們開會檢討，總結是次行動的經驗，我們也列席了他們的會議。

晚上，二十多個北高聯同學齊集在會議室，大家一起聽「美國之音」的直播。當時每人都感到一陣莫名的緊張氣氛。報導稱有軍隊自動交出武器給群眾，有部軍車壓死了三個人，憤怒的群眾燒掉軍車……軍人亦向學生群眾發放催淚彈，情況似乎越來越危險！每個人都聆聽著，那個當隊長的男孩子，叫每個隊員起立，一起唱《國際歌》，激勵士氣。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

不！這絕不是最後的鬥爭！這是一場長期的鬥爭！永永遠遠，留在人們仇恨的心田裏！

我不知道這是否我們最後的告別。臨走的時候，除了衷心希望他們順風，我們還說六月中相見哩！唉，現在你們去了哪裏？或者你們走的那天，已聽到屠城消息，也許你們已知道親愛的同胞、朋友，已經被無情的坦克車輾碎了。可是，坦克車只輾碎他們的肉體，他們那顆追求自由、民主的心，卻永永遠遠不能輾碎。你們現在是否已經安然無恙？求求您們，讓我知道你們的消息。那位戴紅帽的小伙子，他說，考試當天哥巴卓夫來北京，他們去了靜坐，那怎辦？管它哩。他說，這時候有誰稀罕考試這鬼東西？但往後的日子怎麼辦？唸研究生，要分配吧？可是，最近整天白色恐怖下大搜捕民運分子，你們在逃亡邊緣，垂死掙扎，還是……？我不敢想像，我只希望我的顧慮是多餘的。

六月四日（國殤日）

這是中國最黑暗的日子！這個血腥法西斯的政權，竟然用人民子弟兵去殺害成千上萬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群眾。而學生和群眾真的用血肉築成新長城！為甚麼？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早上匆匆走往友人的宿舍，他隔壁的宿友說，他們半夜出去攔截路口了，我們心知情況不妙！打電話回港才知道北京發生的事情。在悲憤和震驚之餘，我們可以做甚

麼？我們立即把這些消息交給復旦的同學廣播出去。天色陰沉沉，灑著毛毛細雨，如鬼神泣訴天安門死去的同胞。我們趕去八角路，途中見所有馬路被學生用石臺或鐵欄之類的東西堵塞了，全市交通陷入癱瘓。學生組成宣傳隊，把北京屠城的事情告訴市民。可是，由於擴音設備不足，加上許多同學回鄉了，在宣傳上困難重重。這時路面被學生佔領，也沒有甚麼公安人員干擾，群眾撐著雨傘，沉默地聽著北京屠城的事情，我感覺到當時每一個人都很悲慟！當天，我和同伴差不多每隔半小時就致電回港，瞭解北京最新的情況，然後再告訴其他院校的同學。

說到這裏，我不得不感到迷惑，這裏的訊息十分封閉，我們既不知國內有甚麼事情發生，甚至上海的情況當天如何，我們也不太清楚（因為我們一直在市郊，城市內的情況亦不太瞭解）。從香港的消息獲悉，上海亦可能出現軍管。事實上，當天在上海我們也聽到許多傳言：例如當天上海可能出現軍管，軍隊已駐在城外，學生尤其擔心他們會從黃埔灘那邊進來。同時，我們也聽過當晚公安人員可能進入校園搜捕，因為屠城當天北京亦流傳這樣的消息。面對如此紛亂的訊息，我們頓時也喪失了平日應有的冷靜頭腦，分析當時消息的真確性。事實上，當時處於封閉的狀態，每個人根本很難判斷當時一切的傳言，加上一個血腥法西斯政權可以幹出這些瘋狂的行為，似乎甚麼也非我們可以預計。我們知道若上海出現軍管，對外的交通將會全部停頓，到時想走也走不了。於是我們便決定翌日

離開上海，盡早回港。

下午匆匆趕往友人宿舍，看樣子他十分疲倦，原來他亦是一早去了堵截路口，下午才回宿舍休息，我告訴他要離開上海了，他倒樂意為我奔跑，張羅了兩張黑市火車票，我們才稍感安心！而那天下午，我就只是打電話回香港取最新消息而已。

今次事件發生得太突然，我們想做的事情許多來不及辦好，便要匆匆離開。臨走的時候，友人問我們何時再回來，我不敢回答他。一年？兩年？還是……

別了，上海的朋友。

去了北京的朋友，你已做了歷史的見證，已有個多星期沒有你的音訊了。求求你，讓我知道你現在平安與否？

北高聯民宣隊的朋友，屠城當天你們回老家了，幸虧你們避過這場「血洗」，可是，往後的日子怎麼辦？回鄉匿藏，還是……我不敢再想下去！求求你們，讓我們盡快知道你們的消息。

別了，一切我認識的朋友。願你們平安！

六月五、六日

早上從友人家中去火車站，街上和平日沒兩樣，很熱鬧。很多人仍騎著自行車上班，似乎未受北京屠城事件影響。我不清楚上海市內有多少人知道屠城事件，就以我友人的姐姐為例，她也透過「美國之音」聽到北京屠城的消息，但今天她亦沒有罷工，可能他們認為罷工不能給予政

府壓力吧。

我們趕上開往廣州的列車，列車延遲了個多小時才開出，因為上海一些學生堵截路軌。心中又是焦慮，又是矛盾，我們忘記了這幾天火車軌一定會發生一些事情的。火車開行了個多小時便停下來了，一停便二十多小時，原本三小時到杭州的車程，到了翌日早上還未到達。我們就呆呆的困在火車廂內，硬座車廂空氣悶熱，扭曲著身子坐，實在並不好受。我們跟火車上的乘客談屠殺事件，他們都沒有甚麼反應，就像我們在說謊一樣。後來，我和一家人聊起來，其中一位是老黨員，我們傾談的時候，他沒有說甚麼，但講到屠城時，他卻是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只說了一句：共產黨甚麼也幹得出來。他可能看透了，還是有甚麼別的原因？他們之中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說了許多他對現在中國政治不滿的事情，他告訴我他從來未去過投票選甚麼「人大代表」，因為他覺得這些選舉全是被控制的，那些候選人全都是預定的，故他沒有興趣投票。跟著他又談到現在中國人民的意識問題，因為座上有位乘客說中國人民文化太低，給予全面普選是無用的，但這位男孩子卻駁斥說，正因為他們沒有選擇，沒有嘗試過民主制度的運作，才不知道自己的權利！你必須先有這個制度，讓他實踐，政治文化自然會提高。我不想捲入這場討論，但發覺他們的思想是從實踐出發的。說到這裏，又好像扯得很遠，我們又談起現在的改革，他說我們看事物太天真，看中國不要只往大城市裏鑽，應到一些內陸的農村走

走，看看貧窮的農民生活是如何，這樣對我們瞭解中國問題更有幫助。我一直還記著這句話。（事實上，乘火車北上的時候，和我們聊天的一個乘客也曾對我們說過類似的話。）

我們就這樣的聊天，或睡覺、或寫信，呆呆的困在火車上二十多小時，快到黎明，我們隱約見到一隊隊遊行隊伍在火車軌旁，他們大多是十多二十歲的年青人，手持橫額，叫喊著「反對官方血腥鎮壓」的口號。我和同伴當時真有一種衝動，想跳下火車和他們一同遊行抗議哩。喊口號的聲音漸漸遠去，又剩下冷冷的早晨。隨便吃了些早點，我們知道再呆在火車廂裏不知將會被困多久，可能是幾天，也可能是一星期，當下做了決定，半途下車，步行往杭州市。

杭州市的氣氛顯然比上海緊張得多，我們在解放中路（杭州市中心）看見貼滿了許多香港fax來的報紙，「六四屠城」的報道和相片也貼得滿街。學生自己亦油印了當天BBC或「美國之音」的消息。杭州市跟上海市一樣，學生堵截路口，交通陷於癱瘓，交通指運站亦被學生佔領。杭州學生似乎亦有自己的做法，他們佔領了交通指揮站，用作廣播最新消息，群眾就在附近聽著消息，然後圍在一起討論。我加入其中一個討論圈內，起初大家對於政府法西斯殘暴的手段感到十分氣憤，後來有些百姓越說越激動，扯到現在的官倒問題、通貨膨脹等生活問題，討論會變成了百姓對官方發洩積怨的地方，有些人說得太快，我

只有很吃力地聽著，但我深深覺得，今天中國的老百姓不再是沉默的一群，他們瞭解共產黨的本質，比我們這群初生之犢更清楚。在杭州的街道旁，我們不時見到許多標語譴責當權者的法西斯暴行，例如用紅色漆油寫成的「還我同胞，血債血償」、「絞死李鵬」、「李楊集團，不得好報」，而我們看見一些香港報章說甚麼「傳言鄧小平被軟禁」，一時又傳「鄧小平已經死了」等等流言，令人感到難以捉摸，和在上海時情況一樣，很難判斷當時消息的可信程度。

後來，和同伴往郵電局拍電報回港，說打算在杭州逗留幾天，然後再去打聽回港的機票或火車票。就在我們往中旅社途中，遇上了兩個香港人，他們很匆忙的告訴我們，快快回港，不要久留，因為傳聞會打內戰哩。我們登時嚇了一跳！又說甚麼杭州可能出現軍管，到時可能沒有交通工具離開。消息的混亂，和在上海時差不多，心中一陣煩悶。我算著口袋裏的錢，不足一千元港幣，要留在這裏也非沒有辦法，但這時要張羅兩張機票談何容易！（火車已全線癱瘓。）果然，中旅社的人表示機票要十三日的才有，我們正在猶豫，預備往機場等候候補機位。

下午四時三十分有飛機往廣州，這時差不多三時了，杭州市中心距離市郊的機場約四十五分鐘的路程，市內交通差不多全癱瘓了。好不容易截了一輛計程車，司機開天殺價要六十塊錢人民幣才願意接載我們，我們來不及跟他議價，最後五十元便跳上他的車子，「飛」往機場。

機場的氣氛顯得比市內更加緊張，每個人均憂心忡忡，就好像內戰即將爆發，旅行團和商人全部返港，我們只有呆呆地等待著，看著一些人利用「走後門」的方法取得機票，這原是見怪不怪的事情，但這時候對這種好像已成為「制度」的運作又感到憤憤不平。

四時三十分，那班飛機飛走了，今天只剩下晚上八時四十五分的班機飛往廣州。這時候機場的流言更加多了：甚麼今晚的飛機可能是杭州最後一班機，因為今晚杭州可能出現軍管；又說軍隊已駐在城外，隨時會進城……上海的經驗竟然在杭州重覆了一次。我望著蔚藍一片的天空，還以為自己處於夢中，因為這兩天事情變得太快，叫人無法估計下一階段的發展，可是，我們卻明明要面對它，儘管很想拒絕。

好不容易弄來兩張機票，臨上機的時候，關員微笑的問我們：「香港許多人支持學運吧？」「是的，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

別了，中國的朋友。

別了，上海的朋友，北高聯民宣隊的朋友。

匆匆逗留了幾天，原先計劃要做的事情沒辦好，一切完全在意料之外。屠城那天開始，中國的歷史將開始改寫……那天，一滴眼淚也流不出，反而在這回程的時候，淚水再也忍不住了。我認識到，此刻每個人都上了深刻的一課。不，同胞的血不能白流！！

後記

二十五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原是忙著應付大學畢業論文和學位試；由四月至六月間校園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四月十五日胡耀邦去世，北京學生起來的時候中文大學范克廉樓的學生組織中人開始噪動，我還記得一個晚上在國是學會大伙兒表示要趁魯平來港到新華社請願，要求政府正視學生的要求。中大學生很快就覺得今次是很重要的，非要支援不可，所以在學聯未行動前中大同學已率先到北京支援。當時我仍在考試（雖已難以專心溫書），所以沒有去北京，後來在中大學生組織內部討論時，認為民運中心雖在北京，但究竟中國城市的學生工人會有甚麼反應？他們會支持這場學運嗎？中國發展民主，同時需要民間社會如自主組織的成立，加上國是學會過去一直與內地大學有交流，我們就決定在既有基礎上走到不同的地方看看，再思考究竟香港能夠做些甚麼，所以當時我和另一位國是學會的同學便去了上海。那次數日的上海行對我是很大的衝擊，離開時感到像個「逃兵」，跨過香港邊境的那一刻像「安全」了，但我那位去了北京支援的友人後來被迫寫檢討、悔過書，失去唸研究院的機會；至於那些短暫認識的北京朋友卻音訊全無。我覺得當時真的很壓抑，也不知道可以做些甚麼，去過北京和其他地方支援的同學覺得至少要留下一些記錄，所以才有這篇文章的出現。

二零一四年四月

第八卷 工藝書

附錄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說明文字）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說明文字）

附錄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說明文字）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說明文字）

（此處為模糊不清的說明文字）

八九民運工作報告¹

鄒崇銘
八九民運期間為中大學生會會長
現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

I 前言

驚天地、泣鬼神的八九學運／民運轟轟烈烈的過去了，短期而言，它是失敗了，被統治者鋪天蓋地的鎮壓、鉗制，使中國重新步入黑暗時代。但同時，它的影響亦肯定是深刻而全面的，它象徵了全民力量的展示，新一代自由民主意識的醒覺……

回顧香港的學運歷史，總不難發現它與祖國有著血脈相連的關係。早期的保釣、火紅的國粹派，以至八十年代的反篡史和民族回歸的提出，不論多少成敗得失，都反映著深厚的民族情懷。然而，自《中英聯合聲名》簽訂後，

1 編按：本文為一九八九年第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工作報告的一部分。十九屆幹事會於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上任，旋即趕上八九民運，經歷校園內外的風風雨雨。「六四」後，幹事自七月十二日起相繼辭職，至九月五日正式解散。幹事會翌年二月十三日發表《交代號——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銘明莊工作報告》，交代各方面的工作。

香港的本土意識強化，香港未來規劃成為焦點課題，過渡期產生的種種社會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在公安法、大亞灣事件等之上，中港對立更成為尖銳問題。另一方面，學運的逐步萎縮，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抬頭，學生只能退卻到周遭的切身問題，例如教育、校政等方向上。

八九學運／民運帶給香港的衝擊是巨大的，一方面是學運／民運本身的震撼性，另一方面是中港一體的意識表現（這與台灣的反應產生強烈對比）。香港學界在是次學運／民運的介入程度是空前的，中大學生會也不例外。相對於本土的學界先輩，我們無疑缺乏理論基礎，對中國問題缺乏分析；但從實踐上，客觀形勢卻提供了極大機會：我們有更多直接參與國內學運／民運的渠道，更豐富的資訊，更強大的本土社會支持。

在這樣的歷史契機之下，我們選取了我們的工作方向：支援國內學運／民運為主，本土群眾工作為輔。這個決定，一方面奠定了赴京同學日後的參與基礎，同時卻成為幹事會與群眾衝突的導火線。惟必須釐清的是，若將群眾工作的缺失，視作組織力和領導能力的不足，是錯誤的；缺乏對中國問題的分析，無法引導同學作深化討論和反省，才是有所不足之處。

十九中²於出閣的時候，並沒有將中國事務放在重點

2 編按：即第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

工作之中，亦未有就中國問題作深入討論。組織內部問題，包括種種架構及行政問題，已構成沉重的工作壓力，故無法想像突如其來的學運／民運所帶來的衝擊。另一方面，學運初期面對校內考試，幹事會無法有效組織及動員同學，亦導致群眾工作無法及早開展。總括而言，雖然面對種種困難和缺失，對我們付出的努力及我們所堅守的立場，我們的評價是肯定的。

II 基本立場

雖然我們對中國問題缺乏瞭解和分析，但在不斷實踐和反省的過程中，我們建立了一定的看法，作為運動方向的指引和行動的綱領，並無太大的困難。毫無疑問，這與自學運初期便與當代中國學會和國是學會保持密切聯繫和合作有關。

1. 我們的角色

香港作為中國血脈相連、一同呼吸的部分，香港的學生，除了在不同的地域上和社會環境中開展其運動的空間外，我們看不到我們的角色在本質上有任何差別，在目標上有任何大分歧。故此，我們認為我們是學運的參與者、介入者，而非旁觀者、支持者。當然，在後來危急的時期，我們亦意識到我們所須要付出的代價將遠遠低於國內學生，故此亦審慎避免過度干預國內學生的決策。

2. 對學運／民運的看法

(一) 我們界定是次學運／民運是一次群眾自發的，獨立於高層政治勢力的愛國民主運動。雖然在學運後期，曾有部分親官方的知識分子試圖介入，但學運／民運的本質沒有改變。我們相信，只有民間自發力量的建立，才是長遠民主化發展的出路；任何依附於現有政權，企圖藉建制內的力量改革現狀都是妄想。因為專制政權的本質，就是以維持政權的利益為依歸，即使是最開明的統治者，在這種遊戲規則之下亦無可避免走上腐化、出賣人民利益的道路。

(二)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中，知識分子往往建立自身的角色，成為依附政權，鞏固現政權的工具，無法成為批判社會的進步力量。五四運動本來起著啟蒙的作用，喚醒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良知，惟最終仍難免被國民黨和共產黨吸納，成為政權的一部分。十年前的改革開放的政策，使普遍人民將中國的希望放在鄧小平身上，最終亦難逃「絕對權力令人絕對腐化」的規律。惟改革開放，卻深刻地喚醒了人民潛伏的力量，並有機會接觸西方的思想，成為抗衡專制政權的洪洪巨流。

(三)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認定運動的目標在於建立長遠及有組織的民間力量、監察政府、制衡政府，而非央求統治者的施予和同情。我們認為，為了達至這一目標，(i) 我們必須爭取建立具獨立性及充分代表性的學生及民間自治組織，進一步爭取活動的空間；(ii) 爭取民

間辦報的自由，散播多元的思想，監督政府。我們必須清晰，要求與政府對話，和懲治貪污、官倒等問題，只是達至上述目標的手段，或爭取更大發展空間的短期目標，並不能取代真正的目標。

基於以上的目標，我們相信和平請願的方式是達至上述目標的適當手段。在當時的形勢下，學運／民運應保持高度自律和有秩序，任何過激的行動只會導致統治者的強硬反應（雖然最後仍是事與願違），以及削弱本身的可團結力量。我們認為，以務實的態度有層次地提出理性的要求，才能逐步爭取群眾的支持和統治者的讓步。

III 具體工作

1. 觀望期（4.15-4.24）

幹事會在這段期間對學運抱觀望態度，主要工作是搜集資料，瞭解情況（包括期待學聯赴京考察團的成果）。幹事會採取較審慎的態度，主要原因是：（i）雖然胡耀邦象徵了大陸的改革和開放，於平反眾多文革被批鬥者亦有其成就，但總體而言，他並無太突出表現，故應否對胡作高度評價，我們有所保留；（ii）透過支持改革派打擊黨內保守派，只會步入如以往天安門事件被高層政治勢力利用的死胡同，故在未清晰學運的主要目標前，不宜輕率表態支持；（iii）歷來民運均常被統治者扣上「外力介入」、「顛覆中國」的帽子（這次也不例外），故必須顧慮「幫倒忙」的可能。

幹事會於此階段亦曾考慮以大字報形式引起同學關注，惟因時間倉卒，而未有實行。

2. 全面介入期（4.24-5.19）

就國內的局勢的發展而言，這長達差不多一個月的時期可被視為學運／民運的發展和成熟期，運動的方向逐漸清晰，組織及領導逐步確立（雖然斷續有不少波折），而社會大眾，特別是不同知識分子群，甚至官方／半官方團體，對學生的支持不斷上升，並有蔓延全國的趨勢。這段期間大致可分為：（i）前期以遊行請願為主；（ii）後期以絕食為主。其中尤以後期更具社會震撼力，並藉戈爾巴喬夫的到訪引起普遍關注。

就香港的回應而言，一般反應依然是較冷淡和零星，直至絕食開始後才逐步加強。故是時學界的工作更為突出，在本土社會上發揮了先鋒作用。而中大學生會亦於較早時期開始全面介入學運，而基本考慮是如何使短暫高漲的群眾運動有效轉化成長期組織力量，故種種工作，包括籌款；承認北高聯代表性及合法性；以及參與北高聯的會議，商討結成姊妹會及籌辦交流活動等，均與協助學生自治組織生存之目標有關，並起歷史見證的作用。

中大學生會幹事於4.24會見當時訪港的王漢斌³，遞交

³ 編按：王漢斌時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副主任兼人大副委員長。

請願信，要求官方公正評價學運及正視學生要求，正式介入學運。當時的考慮是：（i）官方傳媒對學運作歪曲報導及攻擊；（ii）官方對學生的態度十分強硬，有全面衝突的可能。自此而下，學生會的工作大致可分三方面：

（一）籌款運動

中大學生會於是次運動中，總共舉行了兩次籌款運動。

第一次於4.26開始，籌款目標為「資助國內學運發展，並促進學生自治組織之成立」。籌款方式最初以密封籌款箱於校內募捐，對象是中大師生及職員，反應理想，於頭兩天估計已籌得七千元以上。其後成立籌款戶口，使捐款者得以直接存入，減少失竊的可能。

及至運動引起社會普遍關注，社會上各類型籌款相繼湧現，甚至有不法之徒藉此行騙，幹事會遂公開宣佈停止以籌款箱募捐。惟事後仍舉行了兩次街頭募捐，包括接受沙田區兩間花店義賣及藝術系同學的街頭義賣。

關於款項之運用，由於籌款之始的規定，故全數皆交予國內之學生組織，或代為購買所需物資，並透過本會駐京代表團公開直接交予國內同學手中。故後有第二次籌款出現。

六四事件後，支援國內工作亦告停頓，有關捐款的盈餘將透過代表會草草成立基金，其原則以不違背原籌款目標及合乎法律程序為主。

(二) 駐京代表團

自5.1起，中大學生會絕大部分時間均有代表留駐北京，推動三方面工作：

(i) 對北京學運作實質支援，包括金錢、物資和資訊。代表團於5.4起，分批將總數達二十萬元的款項直接送交，或購買食物、日用品、通訊器材等交予北京同學，解決其物質困難，於通過海關時並無受到阻撓。

(ii) 建立與北高聯之聯繫和交流。原來的計劃包括結成姊妹會及籌辦中港台三地交流活動；代表亦有列席北高聯會議，監察並商討其發展方向，確保其能代表群眾，不受官方控制。

(iii) 聲援工作。包括參加了北京同學的歷次請願遊行，及聲援了5.13開始的絕食行動，並分別於4.27及5.16發表聲明；其目的是提高國內同學的士氣，並希望能對官方構成壓力。

此外，代表團亦曾考慮加入絕食對話團，加強參與，但未能實行。

幹事會並無參與駐京代表團，只留港作統籌工作。幹事與駐京代表作緊密聯繫（每日以長途電話通訊），一方面聽取代表滙報，商討工作方向，另一方面交流兩地資訊，分別在北京及香港發佈；同時不斷組織志願同學赴京，預備所需物資，並商討代表之工作守則。

幹事會盡量鼓勵代表就當時局勢作回應，並主動向港方交代；而且奉行不與官方接觸的原則，除非涉及北京同

學的安危；並計劃於北高聯受鎮壓時，對全國學聯採取報復性行動；最後，幹事會亦要求代表考慮其人身安全及家庭之顧慮問題。

（三）群眾運動

如前所述，由於校內考試，學生會無法於此時期進行有效動員同學工作，故歷次群眾運動的反應均未如理想。學生會曾組織的包括：

(i) 4.27烽火台集會，重點之一是呼籲同學參加新華社門外靜坐，聲援當日的北京學生大遊行；惟集會亦同時進行多項活動：收聽新聞，注視北京最新形勢發展；以大字報引起同學的關注，並提供公開園地；展開籌款活動；舉行自由論壇；並在當日整日作聲援北京學生靜坐。

集會以開放形式舉行，並無特定程序和規則，同學可自由進出及選擇參與方式，集會歷時五小時以上，與北京遊行相呼應。集會效果不俗，最多同學的時候約有四十人，並有一大部分前往新華社，長時間的集會能不斷吸引同學的注意，開放的環境亦為同學提供思考和表達的機會。

(ii) 五四大遊行。聯同本港13間大專院校進行，聲援北京學生遊行。由於我們的遊行路線較長，故需整日時間，幸而普遍同學均能堅持，而亦能按預算時間完成；我們沒有領取遊行牌照，惟警方亦有沿途協助維持秩序；較大問題出現於渡海小輪，由於缺乏準備，領導層混亂，九龍區同學亦極為眾多，故一度出現混亂情況。

路線較長亦導致於中大起步時同學較少，約五十人，而及後加入的同學相信有很多亦未能歸隊；惟人數較少有利於秩序維持，以及整體士氣提高。沿途以車跟隨確保了物資的補給和與外界聯繫。同學除沿途高舉橫額、紙牌、高喊口號、唱歌外，亦向途人派發單張，途人反應熱烈，不斷加入我們的行列並贈送飲品。

(iii) 5.15新華社門外絕食，參加的同學不多及以組織人為主。部分絕食時間較長的同學一度入院治理，絕食地點缺乏足夠衛生設備，亦曾引起幹事會之擔憂。絕食期間，中大與理工學生會發表救命書，呼應於北京代表當日致國務院之公開信，其後由學聯用作全港簽名運動。

(iv) 5.17維園集會，配合北京環市大遊行，聲援絕食學生；由中大提議，學聯籌辦。中大同學有很多參與整天的簽名收集工作及大會糾察工作。

總括此階段工作，學生會較能採取主動，除了積極及迅速回應國內局勢，亦能有效介入運動並帶動香港社會關注。惟同時亦較早局限了我們的工作方向，導致無法應付日後急劇轉變。

3. 全民動員期（5.19-6.4）

5.19晚上，李鵬於黨政軍大會上發表強硬講話，並宣佈戒嚴，意味官方將採取更強硬手段，使學運／民運進入嚴峻階段。李鵬講話即時掀起國內外巨大反應，本已停止絕食的天安門同學宣佈立刻進行二十萬人大絕食；在香

港，李鵬講話亦引起了公憤，群眾的情緒突然被推至極點。當晚深夜二時，約三百中大同學聚集於烽火台，士氣高漲，並隨即透過電台呼召的士往新華社聯同港大及浸會同學示威，而當時已是三號風球高懸；次日，三萬人在八號風球的暴風雨下集會；再次日，百萬人參加了環市大遊行。

在這個階段，全體香港市民被急劇動員起來，各團體紛紛表態並組織行動，港支聯⁴亦成立了。中大學生會除了繼續前階段的工作，同時亦面對著廣大熱血澎湃的同學；事實上，類似的情況於全港各大專院校均有出現，如何組織這批同學便成為新的課題。另一方面，在國內局勢方面，面對官方鎮壓的恐嚇，是否將運動升級，抑或撤離天安門，成為戰略上的主要爭論。

（一）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

由於廣大同學被動員起來，學生會並無既有架構吸納同學，故同學醞釀成立自主性的關注組織。惟礙於財政及行政上之考慮，而幹事會亦希望同學能分擔幹事會的壓力，故聯委會終成為幹事會轄下的專責小組，向幹事會負責。

聯委於5.25由自發同學籌組，於5.28的師生群眾集會上正式成立。曾參與聯委的同學先後約四百人，其中主要參

⁴ 編按：即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後改稱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

與民宣工作。聯委初期設四小組：國內支援組、香港推廣組、校園策動組及資料組；聯委並設一核心小組，由各小組召集人及各學生會代表組成，負責決策及協調工作。

有關聯委與幹事會的關係，已詳見於幹事會解散之討論文章，此處不再贅述。惟總括而言，聯委會與幹事會之間的主要矛盾，在於聯委與幹事會一貫的工作並不配合，同時亦並不瞭解學生會的運作情況。聯委作為幹事會轄下的專責小組，卻構成龐大的監察及行政問題。事實上，幹事會只好盡量將權力下放，對香港推廣組及資料組等只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監察，並給予極大的自主性；惟對較敏感的國內支援工作及一些牽涉學生會立場的校園策動工作，進行決策。歸根結底，讓一個如此龐大的組織架構隸屬於幹事會，並不適當，其工作性質亦無必要隸屬於學生會；而牽涉政治立場的工作，更只宜由幹事會直接處理。

有關聯委工作的總體評價，就效果而言，聯委的確產生了不少正面的社會影響，同學參與本身亦有教育作用；就運作過程而言，聯委實替學生會造成很大的混亂和困難。

（二）籌款活動

中大學生會於五月下旬舉行第二次籌款活動，籌款目標為募集「支援國內民主運動經費」，背景乃是隨着學生會於學運／民運的工作增加，所需的活動經費，特別是駐京代表的交通費、通訊費，以及個別同學因工受傷所需的康復費用，均十分龐大。籌款於校內進行，方式包括於群

眾集會上以籌款箱募捐。六四以後，先前由私人機構捐助原擬運京的千多個睡袋，經有關公司同意，作街頭義賣，籌得款項撥歸是項賬目。

該筆捐款之盈餘，亦將於代表會成立之基金中另設一賬目，同時管理，其原則以不違背原籌款目標及合乎法律程序為主。

（三）駐京代表團

隨著局勢急劇轉變，駐京代表團的工作亦進入新的階段，包括：

(i) 代表團與當代中國學會及學聯合設了一個社團駐京物資聯絡站，接受香港各界的捐助，向北京學生提供物資援助。

幹事會注意到過度介入會否嚴重左右北京學運的方向，尤其是撤出天安門與否的決定。惟我們最終相信，若北京同學主觀意願是留下，我們實有道義給予起碼的支持；況且，我們當時亦相信，若能繼續留守天安門，對整個學運／民運的發展，包括士氣的維持，作為其他長遠部署的掩護，以及串連各省赴京聲援的同學，均屬有利；只是到頭來官方已部署殘酷軍事鎮壓，實非我們所能預計。

(ii) 代表團參與各學生組織的會議及工作，包括北高聯、外高聯、《新聞導報》等，實現京港學運結連的理想。

(iii) 代表團於天安門廣場進行民宣及資料發放工作，傳達最新局勢的消息，並發揮鼓舞士氣及引發討論的作

用。

駐京代表亦曾嘗試於6.3晚上以人道立場試圖協助救傷工作，惟亦無法預計當晚情況。部分同學曾於屠城後失去消息，惟均於短時間內取得聯絡，並安全回港。

(四) 群眾工作

由於群情洶湧，群眾參與的積極程度空前高漲，全港大小遊行、集會不可勝數，甚至有不少是自發組織的；故學生會的動員及組織工作，實際上已變得不重要。

(i) 於5.19晚上、5.20集會及5.21的百萬人大遊行之中，幹事會均有參與組織工作。惟限於時間倉卒及人手有限，故無大規模地投入資源；此舉導致部分同學不滿，包括太遲宣佈集合地點、橫額製作質素及遊行隊伍不夠整齊等。

(ii) 於5.24的「反李鵬集會」中，我們聚集了較多同學，特別是組織人的協助，故能有較充足的準備，並參與了糾察工作，惟亦因權責不清而出現領導混亂情況。學生會於是次活動中，特別提出本身的看法，以抗衡普遍社會的偏差觀點；並透過大量印製傳單於街頭派發，以收教育市民之效。

(iii) 參與5.28百五萬人大遊行及6.4黑色大靜坐的組織同學工作。

(五) 對外聯繫及輿論工作

學生會於此一階段，曾先後發表多次聲明，及藉駐京代表所得的資訊，多次發放新聞稿，抗衡社會上偏差的觀點及增加市民對學運／民運的瞭解。其中包括：

(i) 就街頭募捐的籌款方式發表中止聲明，並引起社會對藉籌款名義行騙事件的關注。

(ii) 就向北京送交捐款的方式發出呼籲，避免市民送交捐款落入官方手中，無法有效及適當運用。

(iii) 抗衡「打倒李鵬」為主要運動目標的看法。

(iv) 抗衡部分「北京學生不需要金錢援助」的不確實言論。

(v) 公開報導學生會駐京代表團活動，增進市民「中港一體」的概念。

學生會於5.22加入香港支聯會，外務副會長莊耀洸並於稍後以個人身份當選及參與支聯會常委會的工作，出任教育組召集人。

學生會作為學聯的一成員院校，於學運／民運跟進工作上保持密切合作，例如：社團駐京物資聯絡站及香港民宣工作等。

有關中大學生會與學聯於學運／民運跟進工作中之關係，此處從略，詳情可向十九中幹事會查詢。

總括此階段的工作，幹事會除原有工作外，還增加了組織廣大同學的工作，聯委的成立更造成很大的監察及行政問題，構成沉重的工作壓力；同學對幹事會的工作表現不滿，造成謾罵與對立的狀態，亦對幹事會的士氣構成嚴重打擊；另外，普遍市民均被動員起來，學界已失去前階段的先鋒角色。故學生會較處於被動，只能於個別事件上發揮局部優勢，例如已有一定基礎的駐京團工作及輿論抗

衡工作。

有關書院學生會及屬會於學運／民運的參與，亦有其意義，詳情可參閱載於，《中大學生》⁵ 62期的〈倒庄頭七悼文〉。

IV 總結

透過冗長的工作報告，我們不難發現：5.19不單標誌了北京學運的一大轉折，同時亦成為學生會工作的轉捩點。踏入全民動員期，我們發覺更難掌握運動發展的方向；工作的多樣化亦使我們面對資訊膨脹及工作超重的情形，因而無法作出果斷及有效的決策；加上種種突發因素，例如幹事的個人事務、會所職員的突然辭職等，均加重了我們的負擔，構成了嚴峻的考驗。

如果5.19是學運／民運的一大轉折，則6.4毫無疑問是另一個更大的轉折，可以說：個多月的心血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熱情變成悲痛，夢想變成失落。至此，學生會更無法掌握前面的方向，除了新生的突破新聞封鎖工作，其他的工作均很快沉寂下來，各方面的單位也得重新探索其位置。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基於幹事會本身認識上的局限和運動本身的規律，學生會始終沒有開展引導同學深化討論的工作，將學運的訊息扎根和延續；6.4過後，除了迷失和

5 《中大學生》是中大學生組織「中大學生報」出版的一份報紙，發行範圍主要為中大校園和各大專院校。

無奈，學生會亦曾提出一點點建議，如民運日、資料出版工作等，卻逐漸面對幹事會本身的內部問題和荒廢了很久的其他工作所帶來的問題，最終無法實行。

我們希望藉此對遲來的交代工作致歉，不瞭解在過去日子中造成不少誤會和矛盾，溝通同學的困難可說是幹事會面對的最大困難，沒有積極尋求改善亦當然是我們的缺失。

展望未來，中國內地的局勢雖然暫時得到控制，惟民心的醒覺和怒憤終不是槍桿子就能壓住的，回顧歷史（例如十三年前的四五天安門事件）總會發覺有很多驚人的相似，隨著自然的更替，新的變化不難再次出現。

香港方面，洶湧的愛國情懷被當頭棒喝，失落和無奈中只得將目標轉向自保；惟中方的干預如波濤洶湧，人們無法不意識到：沒有中國的明天就沒有香港的明天。

中大方面，經過學運洗禮的校園似乎不見得有何大變，眾多自發組織不斷在探索方向；同學國家民主意識提高了？學運是復興的時候？種種疑團無法識破……

香港學界角色的 進一步探討（節錄）¹

莊耀洸

八九民運期間為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現職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教授人權法律

談角色是為了清晰路向，縱然肯定了學界的兩大角色：社會良知和先鋒，當我們碰到很多現實問題時，仍不知所措。為此，須要進一步探討學界的角色。這些困擾的問題包括：香港學界應否加入八九年五月底在北京成立的外省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我們應否加入全國對話代表團？我們應否建議國內學生在五月底仍堅守天安門廣場？香港學生介入國內學運的程度一度備受爭論，甚有討論的必要。（下略）

香港學運與中國學運的關係

談到「支援」，當然要有一個被支援的主體，若國內

¹ 本文原載於一九八九年第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所發表的《交代號——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銘明莊工作報告》（1990年2月13日）。關於《交代號》，參看本書〈八九民運工作報告〉一文註1。

學運是主體，則香港學界只扮演支援角色。然而，香港學界向來堅持中港一體的民族立場，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香港學運必然是中國學運的一部分，亦即香港學運乃主體的一部分，則不存在支援的問題，若我們仍堅持支援角色，便顯示我們以香港人而非中國人的身份參與學運，這就違反香港學界一貫的民族立場：強調中國同胞的身份認同。

事實上，如果香港學界只擔當支援的角色，則當中國學運被鎮壓後，便即時失了運動方向，因為帶領運動的主體消失了，所謂支援便流於空喊口號。「支援」本身的被動性，說明了香港學運的一大局限，六四後學運的急促退潮正是最佳印證。

香港學生以未來中國主人翁的心態參與中國民運，好處是：貫徹學界打破中港隔閡的價值取向。再者，透過香港學界更直接介入全國學運，一方面使中共有更大的顧忌（增加了鎮壓的代價），另一方面提高了港人以至全世界華人對中國學運的認識和認同，這對於提高港人關注中國民運有幫助，當學運未發展成民運前，此作用尤為重要。就在這樣的想法下，中大學生會不單只成立駐京代表團（前後約有三十人，六四時有十四人），列席北高聯，並在天安門搖鼓吶喊，鼓舞士氣，還加入外高聯，中大代表成為外高聯的常委，並參與《新聞導報》（中國學運刊物）的工作，代表任該報編輯，而大部分同學則參與物資聯絡站和天安門廣場的民宣工作。由深化運動以至解決當前運動

所需，均有所參與，所謂全面介入中國運動，而中大學生介入得最深入的，可謂直接策劃廣場指揮部的工作，與廣場正副指揮成緊密戰友，合作無間。此外，自中大學生會五月四日的第一筆捐款以來，中國學運的物資源源不絕，也是運動得以延續和壯大的要素之一。而透過香港學生的長途電話聯絡，自五四遊行起，中港兩地已喊著同樣的口號，京港學運很快演變成全體市民參與的愛國民主運動。

香港學生全面而深入的參與中國學運，其實有很多問題：例如我們對國內的情況不清楚，若我們加入北京學生的對話代表團，我們如何談官倒？如何談貪污？我們對具體情況只有很粗略的印象，而國內學生則有親身的體會，可見香港學生這方面的代表性很有疑問。即使在會議上發言，香港代表也得向香港學生以至市民解釋會議的決定，但身在香港的普羅市民和學生很可能更不瞭解實際情況，以至孤軍深入的香港學生有脫離群眾的危機，只是八九民運黑白分明，根本沒有出現這種情況的可能性。

香港學運只應扮演支援角色的原因還有：香港學生比國內學生在運動所付出的代價不同，故角色應有主次之分，例如香港學生可聞風先遁（回港），或遇事則尋求英國領事館的庇護，但國內學生則冒極大的風險。這種說法的弊端在於：根據這樣的邏輯，則有更大保障的人參與應越少，那麼高幹子弟不應積極參與，吾爾開希就不當出任北高聯常委，北京學生比外省學生的顧慮更多，便應讓外省學生事事充作先鋒。這種謬論不但減低運動的規模，更

有分化運動的惡果。事實上，最重要是所有參與的人對運動均有所承擔，不會因為個人的人身安全得到較大保障就做出一些不負責任的事情，罔顧整體運動利益。香港學生曾以絕食方式投身中國學運，足以證明香港學界有資格直接介入中國學運，而六四屠城的晚上，京港學生同樣有生命的危險。故此，只要對運動有所承擔，無論參與的學生來自北京、上海、廣州還是香港，均是運動的主體。

然而，直接介入的最大顧慮就是幫倒忙，無論香港學生如何理直氣壯的全面參與這次學運，恐怕官方即以外力介入為由鎮壓學運。問題的吊詭在於：香港學運以壯大全國學運為目標，但壯大運動很可能導致鎮壓的惡果。這吊詭乃源於無法得知官方決定是否鎮壓究竟基於哪些因素。香港學生表現得保守會受極大的群眾壓力，表現得前衛則惹來好大喜功的指責，總之，每一種做法都會備受批評。我們認為決意積極介入中國學運的決定無論對與錯，總比一味觀望或搖擺不定的做法好得多。

另一個影響京港學運關係的因素是捐款，如果處理不當，可能導致削弱北高聯的領導地位（如只捐錢給各院校），分化國內學運（如捐給外高聯的金額比北高聯的還多）。再者，香港學生掌握捐款分配權的結果，不只使香港學生成為國內各學生組織爭取支持的對象，更恐怕使香港學生的意見有較大的影響力。所以香港學生參與中國學運時，言論要相當慎重，不可憑藉本身較大的本錢而過分影響運動的路向。假如香港學生不希望五月底在天安門廣

場的靜坐堅持下去，也不應該透過停止捐款的手段來達到目的。事實上，運用中大學生會的捐款原則並非完全基於本會的政治決定，而是基於人道立場和國內學生組織經民主程序的議決。

總結而言，縱然理論上香港與國內學生的角色無異，同樣任重道遠，但實際上，兩者應以發揮其最有利的條件為最高原則。所謂支援與否的簡單二分法，已不足以明確界定中國學運與香港學運的關係。只有具體分析兩者在不同事情上的分工，問題才能得到較圓滿的解答。然而，不要妄想問題有圓滿的答案，因為香港學生參與中國學運，必須小心估量形勢，而形勢經常的在變化，無法得出一個介入程度的準則。

中大與八九民運雜談¹

莊耀洸

八九民運期間為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
現職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教授人權法律

……正在這時絕食開始了，我專責與中大駐京代表聯絡，那時北京學生多日絕食，幹事會跟中大駐京代表在策略方面有分歧，以及分別有一中大同學在天安門廣場失蹤近兩日和受傷，均使我「吃不下」。而有時候是忙得吃不下，那時買了早餐回會所，響個不停的電話使我需兩小時才吃完早餐，離開會所半步也須告知職員（這一點也沒有誇大）……

……

很多現代人害怕抉擇，但搞學生會要經常作出抉擇（無論對與錯，政治決定是必須及時的），我們不可能一味說國內情況複雜難明，要觀察清楚才支持國內學生，如果對國內學生的支持慢了一拍，保守了一點，會即時引起重大的抨擊。我們並非害怕群眾壓力而迅速作決定，而是形勢的要求使然。加上學界的一大角色是先鋒，反應遲鈍便失去此角色。

阿莊〈感言篇〉，

載於《交代號——

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銘明莊工作報告》

（1990年2月13日）

1 本文原載《港支聯通訊》二十四期（1994年1月），署名山中人。

「九唔搭八」與八九民運

平日「亂噏一遍」，「廢話」連篇，說來這與八九民運不無關係。中大學生會的電話被監聽可謂人盡皆知。自五月一日起，我在學生會幾乎每天都收到來自北京的長途電話，我便與某位上京同學預先協定一些暗號。也許我們的系統太複雜，莫說竊聽的人不明白，連我們也越談越疑惑，最終只用了幾句暗語而已，當時設想，假如我們有一套本身的小圈子語言，則無往而不利。自此，暗語、鄉音和句子重組往往是我們的語言特色，或許這正反映八九民運後的世界秩序。須知道語言反映世界，「無厘頭」的語言恰好反映末世的荒謬。

民運缺乏準備的厄運

其實要緊的，並非我們的語言缺乏準備，而是我們對中國民運缺乏準備，對中國的認識和關注不夠，使我們起初對中國學運的介入有點遲疑，兼且不懂如何介入，最終只有被動地見招拆招，例如學聯於四月二十日的上京團只命名為觀察團，沒有旗幟鮮明地聲援，反而被中方傳媒所利用。四月二十五日，中大學生會才首次公開表態支持學運，在會見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時表示，當局切勿以西安騷動為藉口鎮壓學運，至於當時的社運界「大哥大」民促會，遲至五月十七日才表態支持學運。假如八二年反對日本篡改侵華歷史一役後，學界能保持對中國事務的關注，我們在八九年的回應會快一點、好一點。然而，現在仍無

法記取歷史的教訓。一旦民運再度爆發，我們將自責對民運何不早作準備。似乎香港學運和社運難逃事件導向的厄運。誠如黃永玉所言：「牙痛，就忘了全世界；牙一好，就忘了牙醫。」

中港呼應的五四遊行

五月三日深夜，中大學生會駐京代表致電給我，報告了北京學生所選擇的綱領，我們認為合用，一於照抄，連夜趕製橫額，使京港兩地喊著相同的口號，宣揚著中港一體的意識。

五月四日早上八時半，我們與北京學生同步離開校園。中大一行約五十四人（寥寥數十人因中大處於考試時期），由烽火台向遮打花園進發，伴隨我們一起走的還有一大群記者、採訪車，以至直升機！從高空拍攝幾十人的遊行隊伍，實在「搞笑」新聞中的經典！到達馬騮山附近的柏立基師範學院，遊行隊伍闖進飯堂大唱民族歌曲，場面動人得很，一生難忘！我們好像弔民伐罪的義師，熱血沸騰，暢論國家大是大非，「愛國」、「爭民主」、「反腐敗」都掛在口邊，當時大家都是這樣的高談闊論。自「六四」後，不知從何月何日開始，我們又覺得談「愛國」、「爭民主」很刺耳、很老套，我現在知道原來壯志的語言要在大時代才聽得進耳、才覺得自然，連穿上民運衫也覺自己越來越礙眼，渾身不自在，情況恰如民運時期的黑白分明不復見，反而是非越來越模糊不清，甚至要向

兒童解釋何以下令屠城者仍然在位時，也日益倍感艱難。

學生校長誰最克制？

五月十六日，我們跟北京學生一同發出「救命書」，整天上午派傳單，呼籲政府回應絕食學生的要求。同時，我們提議學聯舉辦維園集會，以聲援中國學運，並希望藉此促使新華社門外的絕食行動隨集會而結束。但不知甚麼原因，絕食行動沒有結束。在北京方面，一名中大代表，正打算在新華社門外下跪，冀望政府答應學生的絕食要求，我透過電話反對那位同學的計劃，認為政府不為所動，學生雖寧死不屈，但尊嚴誓不可奪。但他目睹國內同胞在垂死邊緣，不忍心如此下去。後來，絕食同學費了一番唇舌才說服那位同學放棄他的計劃。其實學生當時絕食和靜坐，是一直給予政府改過的機會，是相當克制的，從沒有搗亂等越軌行為，連北京的扒手也張貼告示「罷偷」！可是更形克制的，倒是我們的大學校長！

新華社門外的絕食學生以中大最多，多間大專院校校長，以至新華社社長也親自慰問絕食學生（連李鵬和趙紫陽也到天安門慰問絕食學生），中大卻只見學生事務主任和輔導長到場。

五月二十日凌晨的「李鵬講話」後，三百多名中大學生，包括幾十名在中大進修的國內學生，於凌晨三時齊集烽火台。在電台呼籲下，部分的士更義載，助同學們趕往新華社示威，而五月二十日正值學位試考期，可是校方不

允延遲學位考試。考試開始前，校長高錕曾問，有無需要把考試延期，但校方見考生既已到場，便沒將考試改期。

「六四」期間，很多大專院校讓學生延期考試，中大卻依然故我，既然中大校長如此政治冷感或敏感，又何苦當起港事顧問來？

李鵬下台非民運勝利

五月二十日下午，幾十名中大學生冒著八號風球的狂風暴雨，上街呼籲群眾參加當日下午五時的維園集會。我至今曾參與的遊行數以十計，但從沒參與過如此慷慨激昂的遊行，「打倒李鵬」是每個人發自內心的怒吼。再經過百萬人大遊行的洗禮，學運已發展成全民動員的民運，而數以百計的中大同學也趕回校園，積極投身民運，計有國內支援、突破新聞封鎖及民宣工作等。

五月二十三日晚傳出李鵬下台的消息，支聯會隨即宣佈舉行慶祝李鵬下台遊行，我們又趕製單張，以抗衡李鵬下台即民運勝利的輿論，申明即使李鵬下台，在專制的政體下可以有第二個李鵬。但五月二十四日的形勢急轉直下，慶祝李鵬下台的遊行突然改為打倒李鵬遊行。過了幾天，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成立，並發起師生大集會，中大學生會贊同成立北京物資聯絡站和民主大學；籌備工作在港進行得如火如荼，豈料鎮壓竟真的迫在眉睫，更想不到鎮壓後，我們的基礎是何等薄弱。民運的工作會如斯迅速的沉寂下來！箇中原由，多少人能深切反

思呢？

六四後有甚麼作為

六月三日晚形勢危急，我特地致電北京飯店的中大同學，得悉他們吃晚飯時，聽到天安門情況吃緊，差不多立即全部跑到天安門廣場，只剩下兩名同學在飯店。我一方面替他們擔心，另一方面又深深佩服他們的勇敢。自絕食以來，一些中大同學一旦聽到鎮壓的消息，總跑到糾察線以內，與國內學生共同進退。

「六四」凌晨，那批中大同學一直沒有返回飯店，我們只從電視機聽見天安門的槍聲隆隆，我們呆坐到天亮，也想不出有甚麼事可做。直到今天，有多少人能想出何事可為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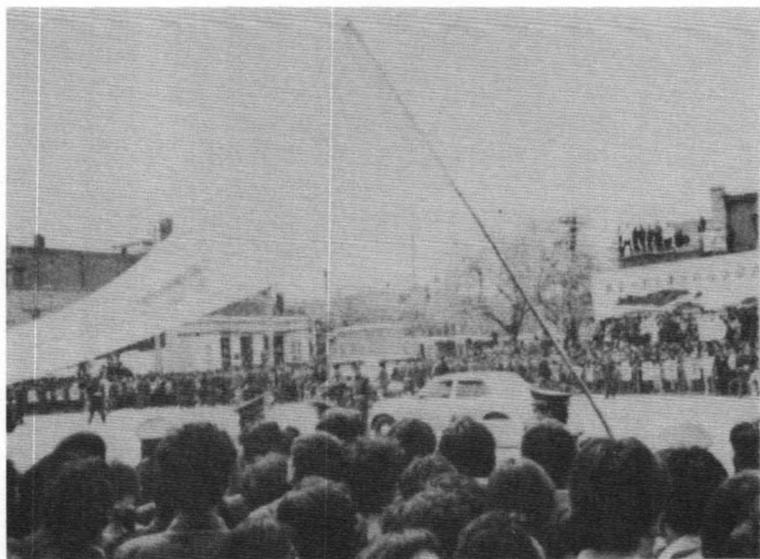


相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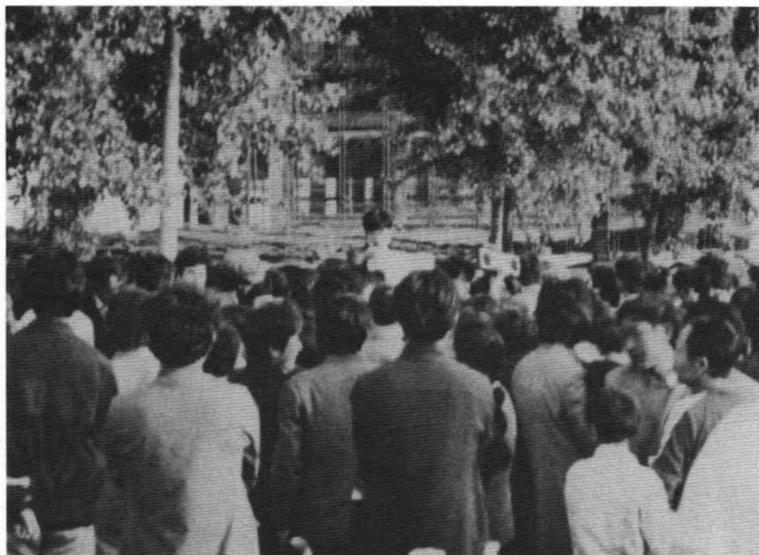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二日 天安門廣場上中國政法大學的抗議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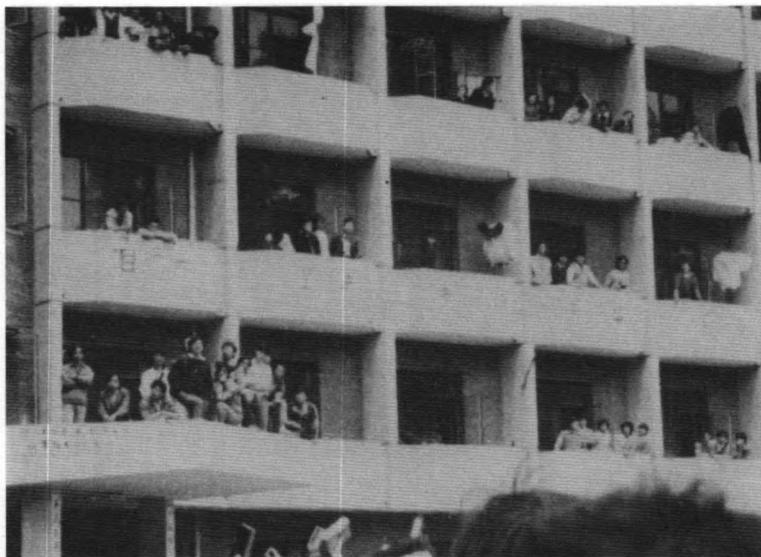
四月二十二日 送殯行列



四月二十三日 街頭演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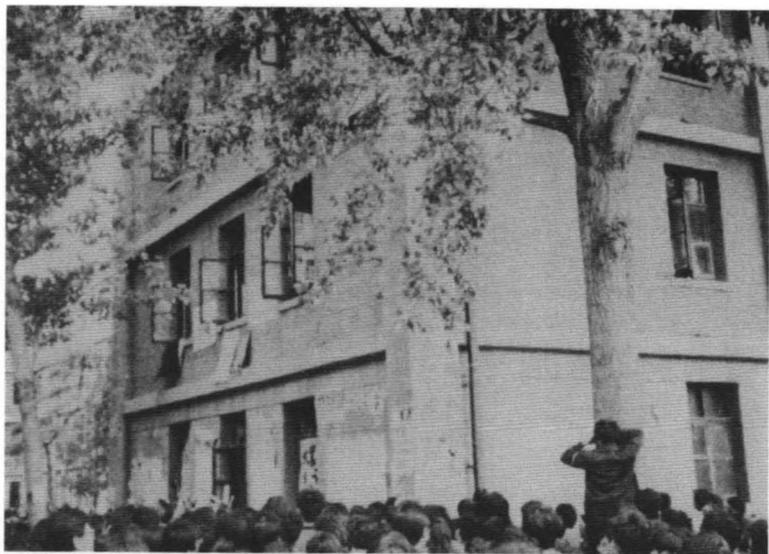
四月二十四日 清華大學大字報



四月二十四日 清華大學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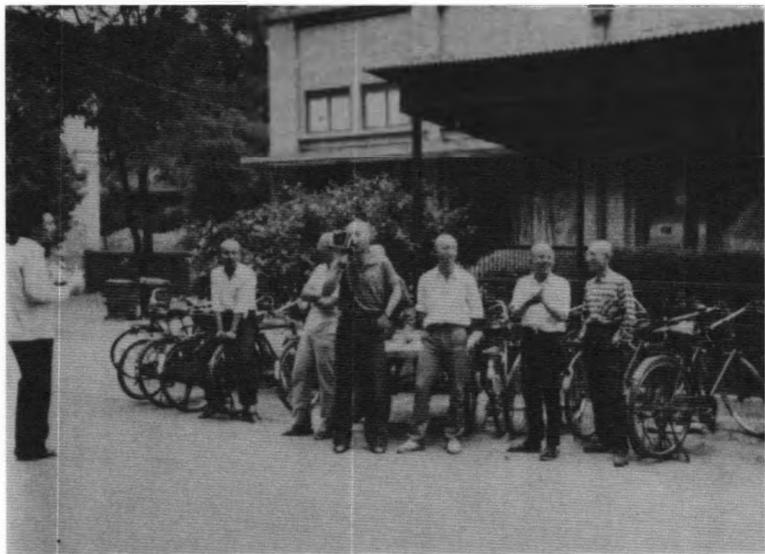
香港學生聲援



四月二十五日 北大三角地



四月二十六日 众志成城



五月初 北大剃頭行動



五月九日 北師大廣播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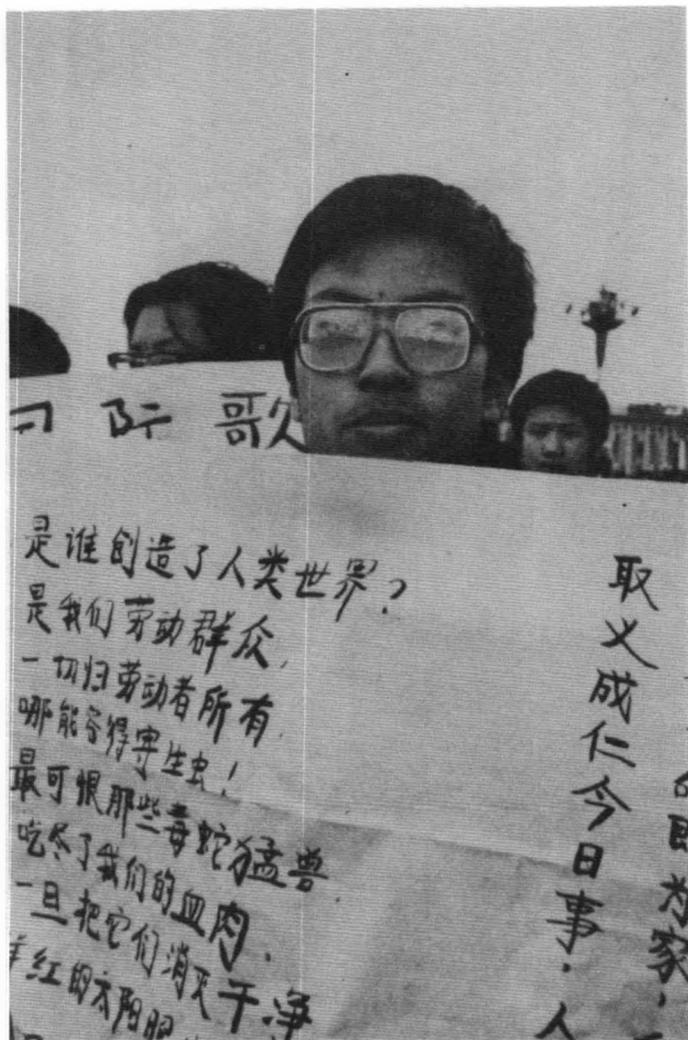
五月十日 單車大遊行



五月十四日 廣場上之抗議標識



五月十四日 廣場上的抗議者



五月十四日 廣場上手持國際歌的抗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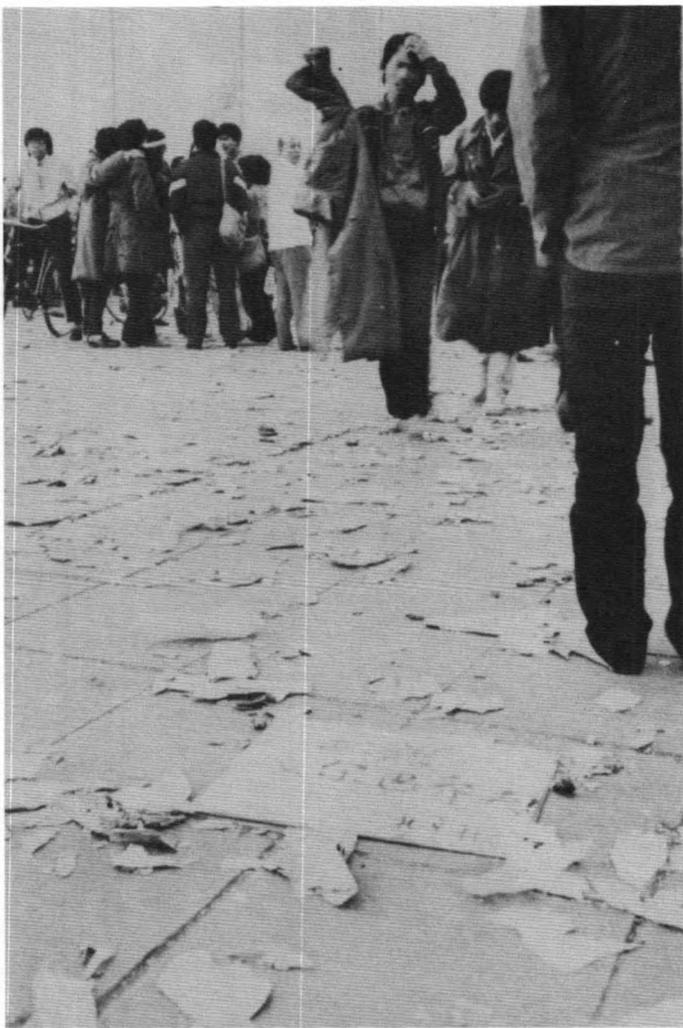
五月十五日 絶食者



五月十五日 淚光



五月十五日 絕食不絕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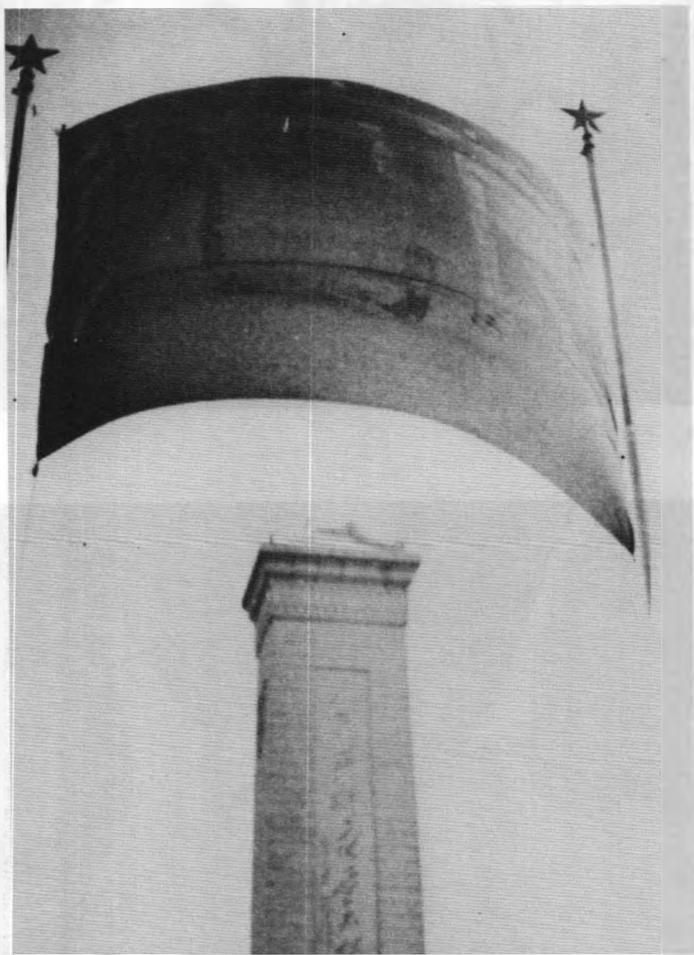
五月十五日 歡迎戈爾巴喬夫之後



絕食：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五月十五日 糾察線



旗幟



電影界聲援學生



五·一七遊行



五月十七日 紅粉添粧



五月十七日 尋人啟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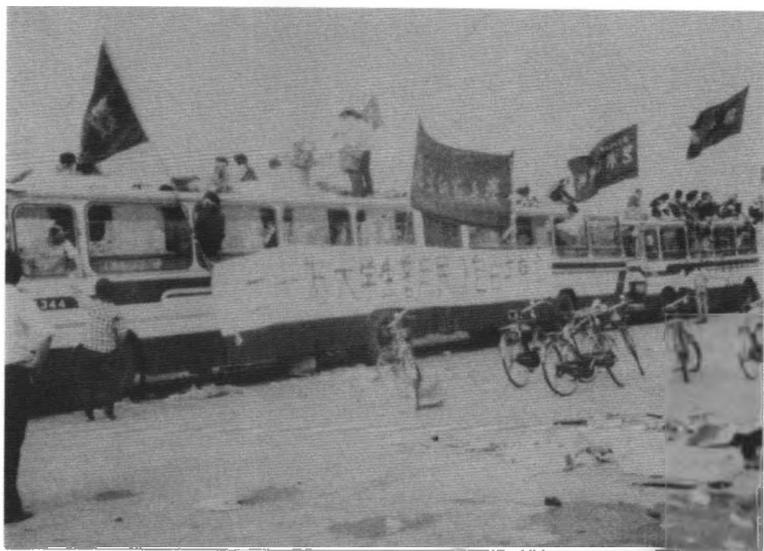
五月十七日 天安門廣場北面的橫額



五月二十日 戒嚴第一天，仍有人遊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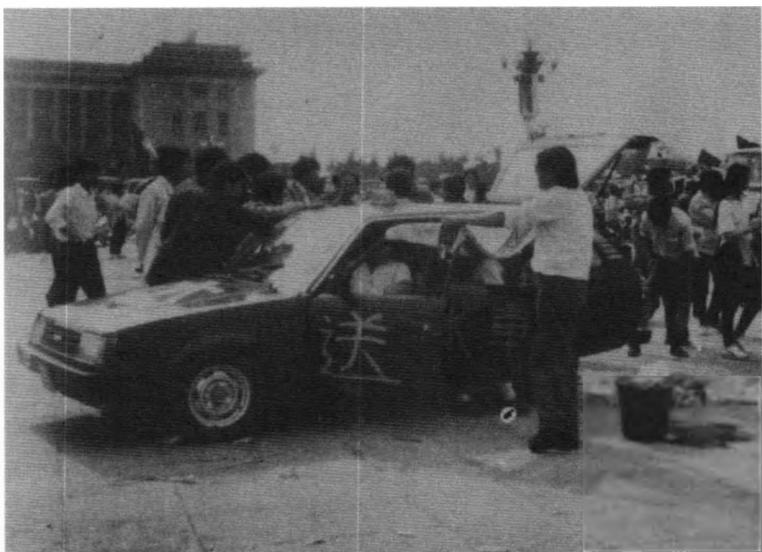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 號召



五月二十日 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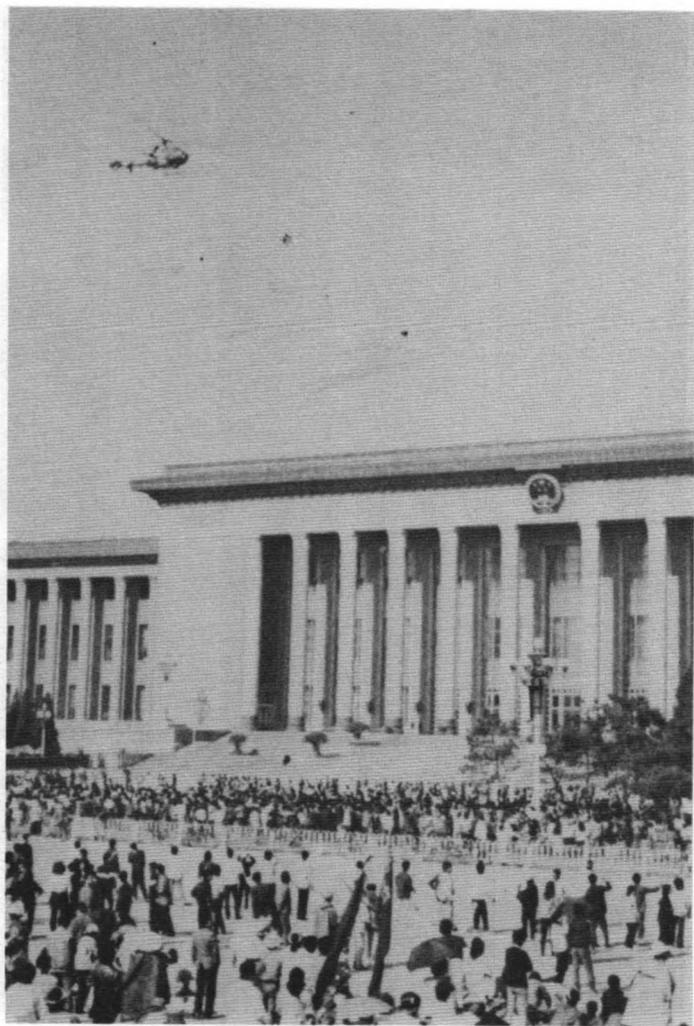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 露宿



五月二十日 市民送水



五月二十日 廣場附近路牌上的標語



五月二十日 官方直升機向廣場散發傳單



五月二十日 學生準備阻截從地鐵站口出來的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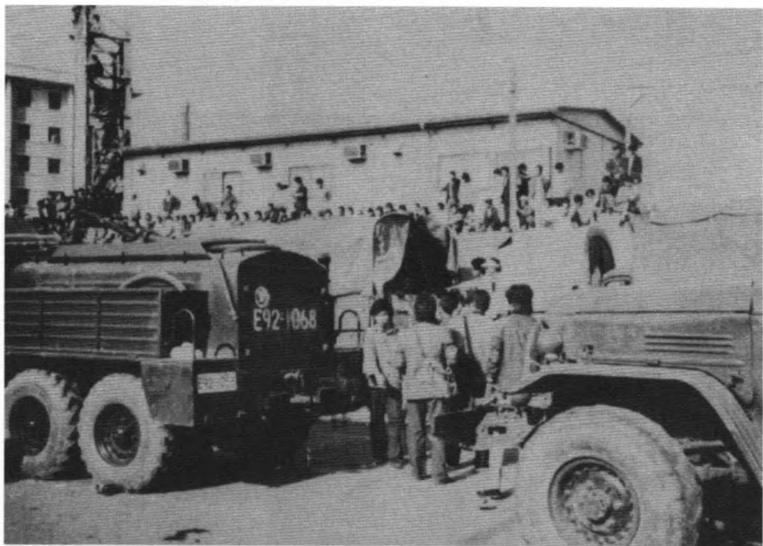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 呼家樓，市民阻截軍隊



五月二十日 呼家樓，市民阻截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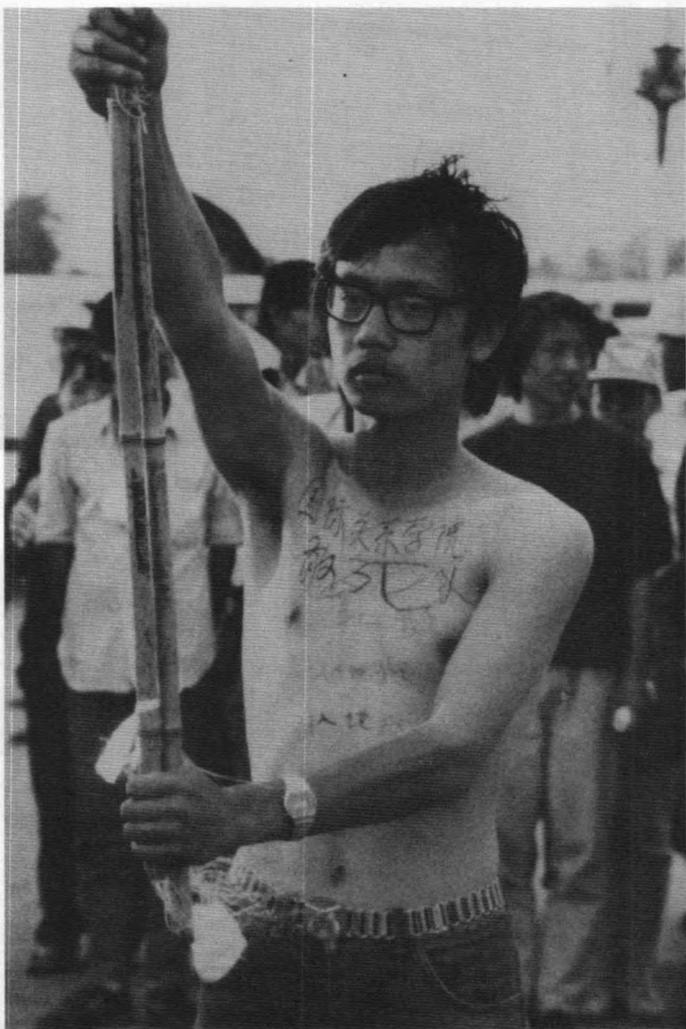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日 呼家樓，市民阻截軍隊



五月二十日 呼家樓，市民阻截軍隊。



五月二十二日 「黑手」名單



五月二十二日 旗手



五月二十二日 民主大合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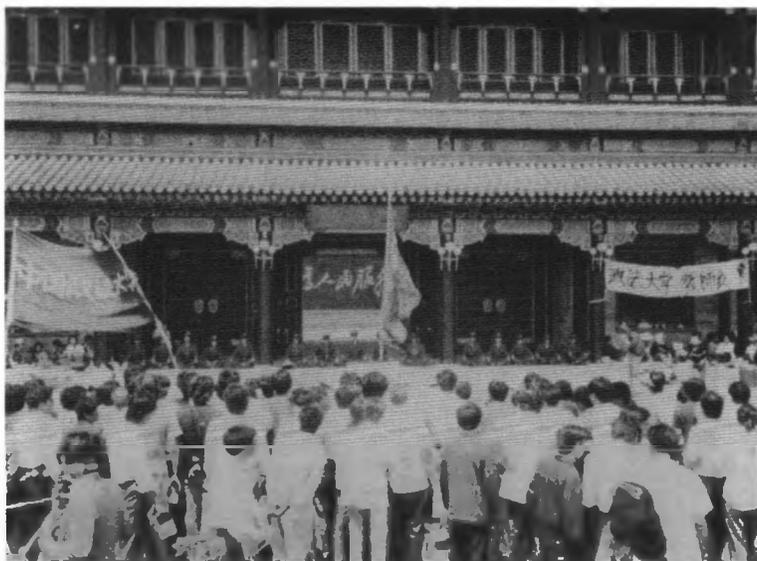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二日 歷史博物館前，學生正在曬晾毛巾
（前一個晚上用作防避瓦斯的）。



五月二十二日 首都文化界、知識界、出版界遊行，首鋼工人和「工自聯」也有參加。



五月二十二日 首都文化界、知識界、出版界遊行，首鋼工人和「工自聯」也有參加。



五月二十二日 新華門前



五月二十二日 學生給軍人做思想工作



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站內，開來了滿載軍人的列車。



五月二十三日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五月二十三日 这不是人民幹的
學生



五月二十三日 反對戒嚴



五月二十三日 南池子內，香港學生製作遊行橫額。



五月二十三日 香港學生遊行情況



五月二十三日 香港學生遊行情況



五月二十三日 香港學生遊行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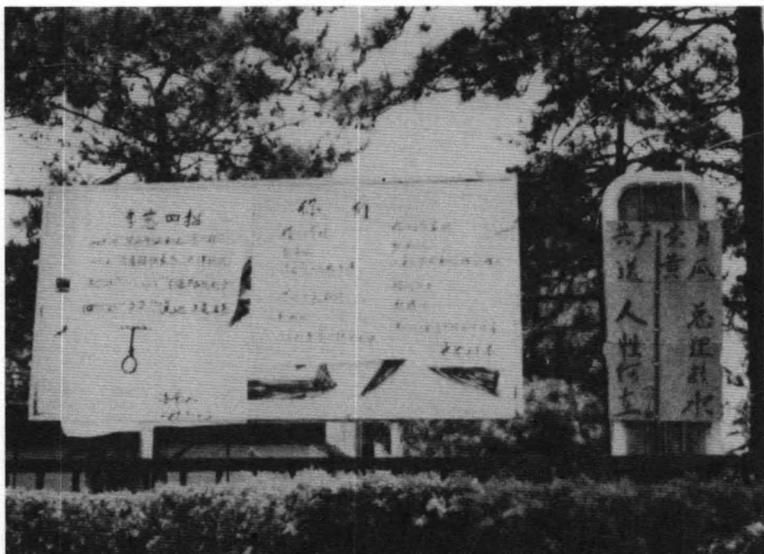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四日 廣場指揮部成立之誓師儀式



五月二十四日 廣場上的醫療物資



五月二十四日 「李鵬之鼠！人民之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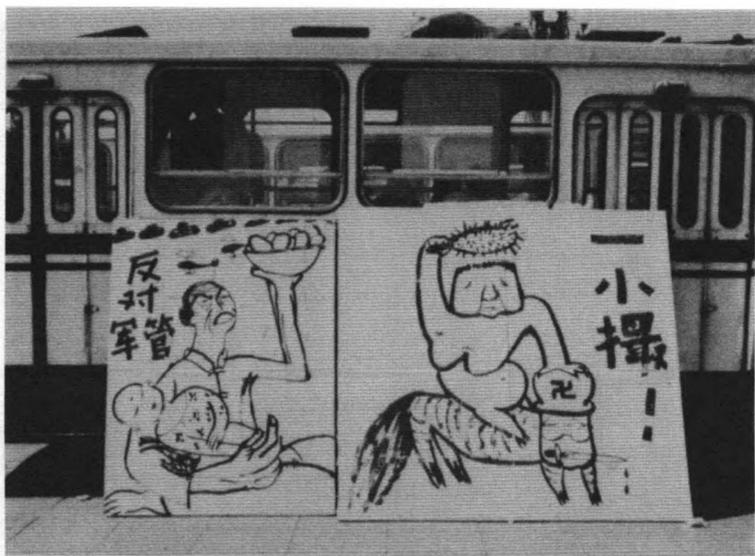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諷刺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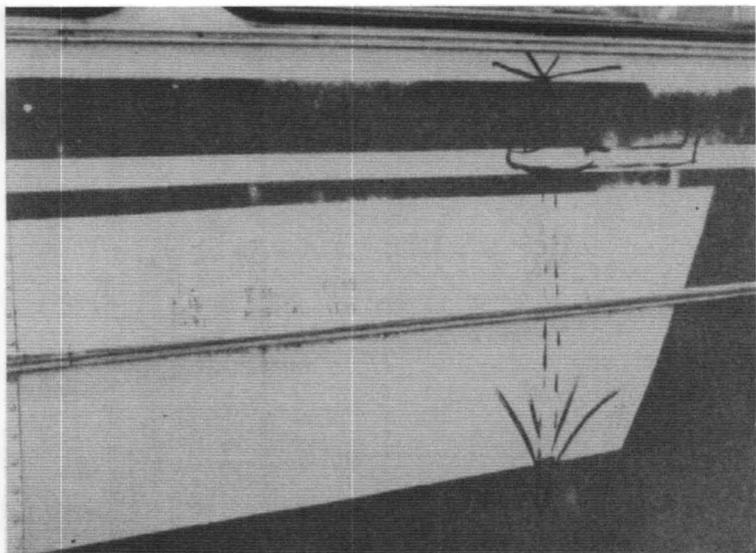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海外聲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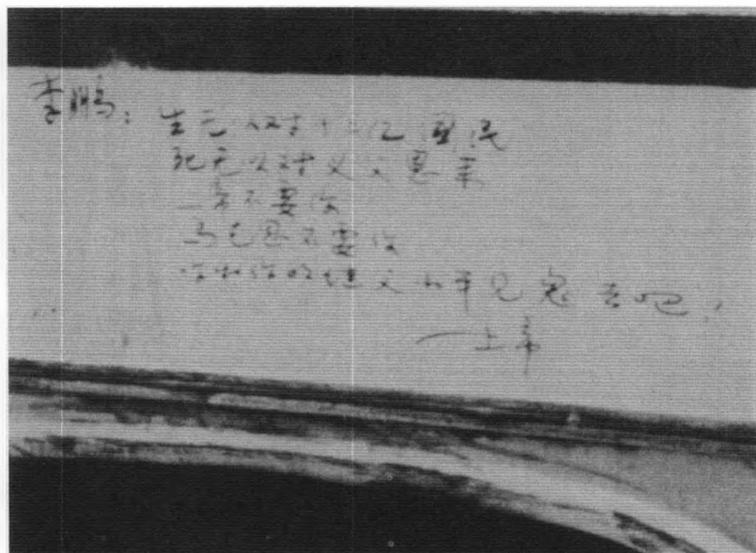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廣場小擺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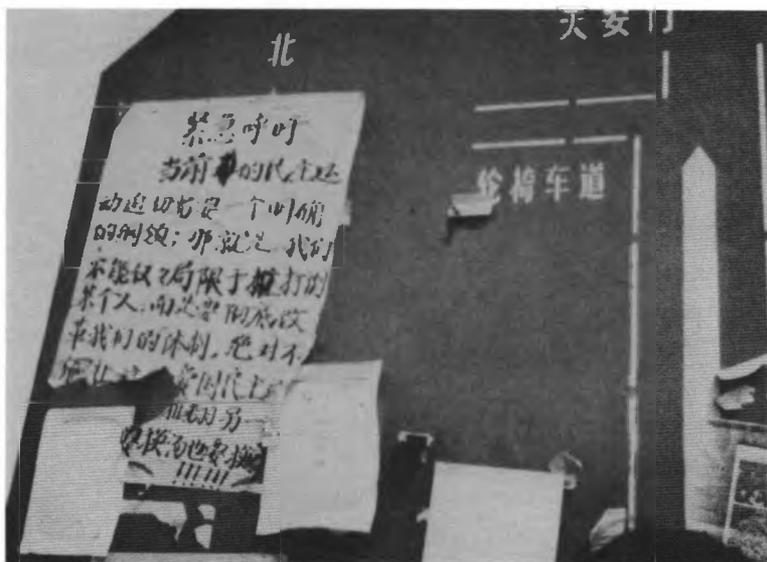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漫畫傳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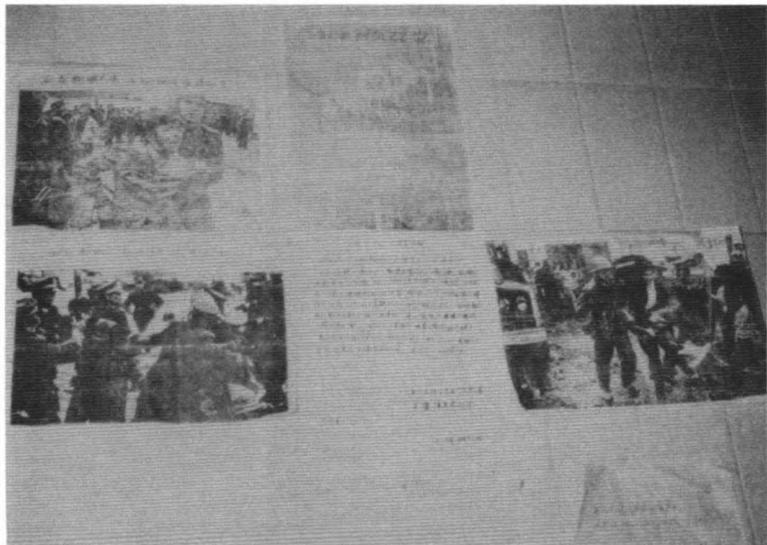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圖文並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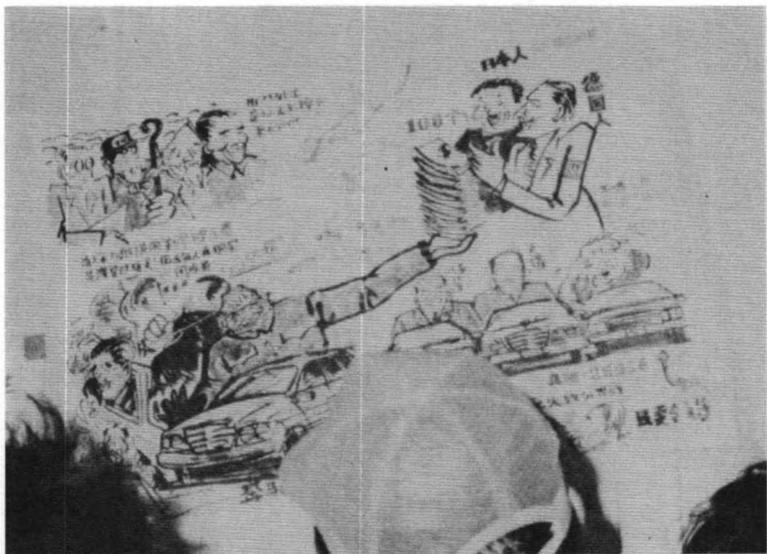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God damn you!



五月二十五日 緊急呼籲



五月二十五日 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圖文（貼於廣場附近隧道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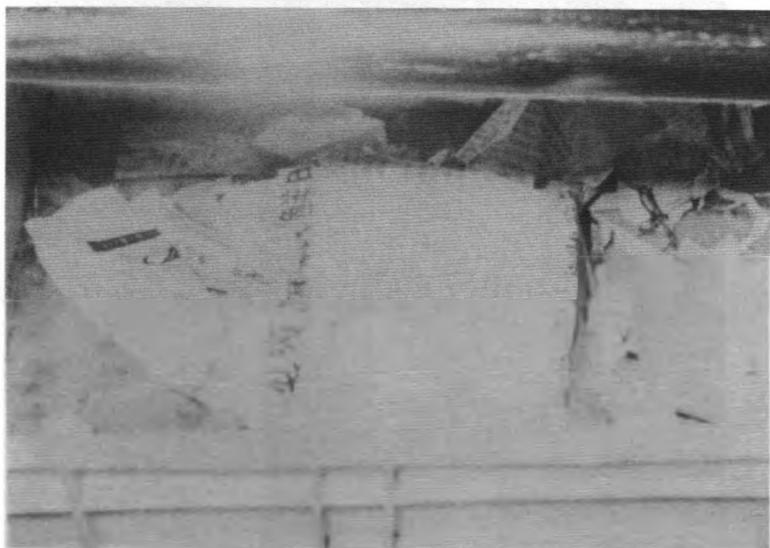
五月二十五日 升官圖（貼於廣場附近隧道內）



廣場衛生日益惡劣



香港學生聲援團捐贈物資接收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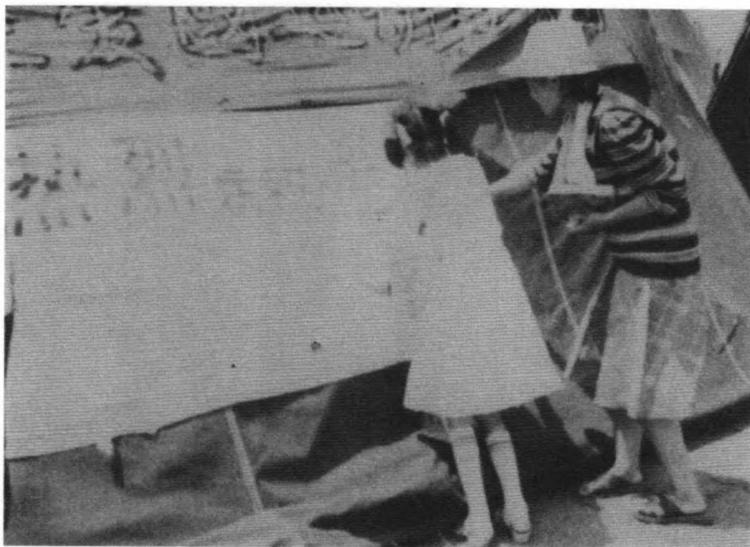
王府井大街一郵局內「四·二六社論」之下場



戒嚴期間，街道上的海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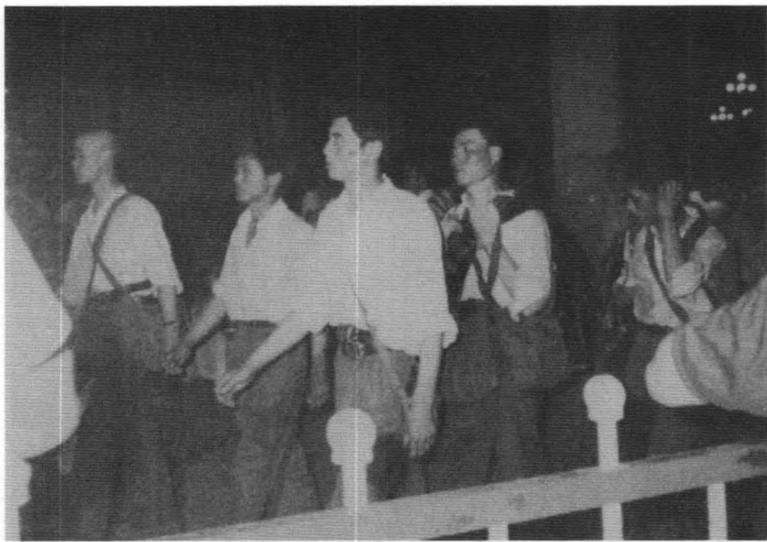
五月三十一日 致敬



六月一日 慶祝「兒童節」



工作人員把提供給絕食知識分子的帳篷架搬上紀念碑第二層



六月三日凌晨 少年軍人在長安街上被市民截停後，向東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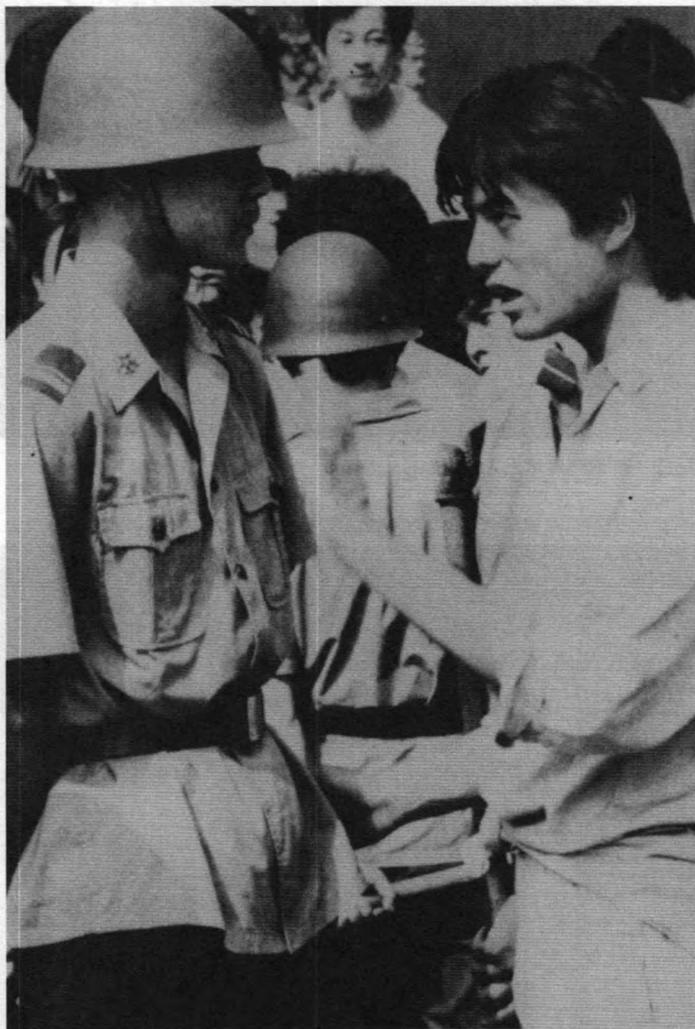
六月三日 新華門外，學生和市民展覽所繳獲之軍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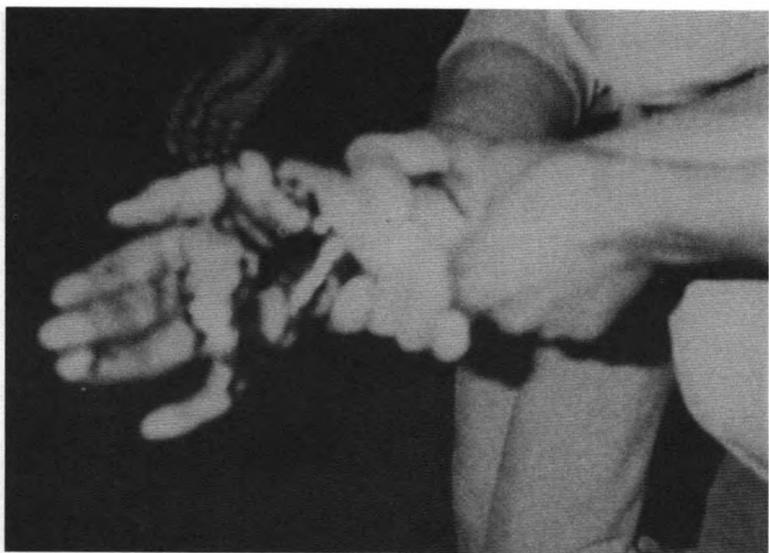
六月三日 新華門外軍人之人牆



六月三日 軍人武器在手，蓄勢待發。



六月三日 市民感化軍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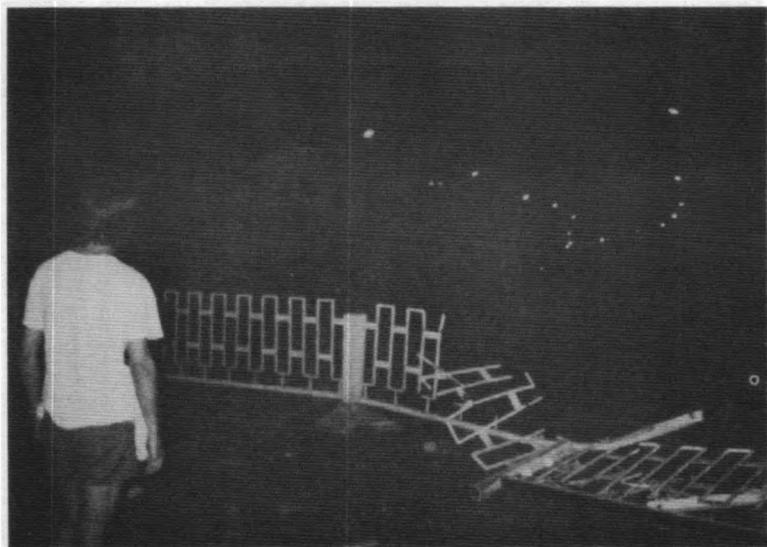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凌晨 血手



六月四日凌晨 裝甲車被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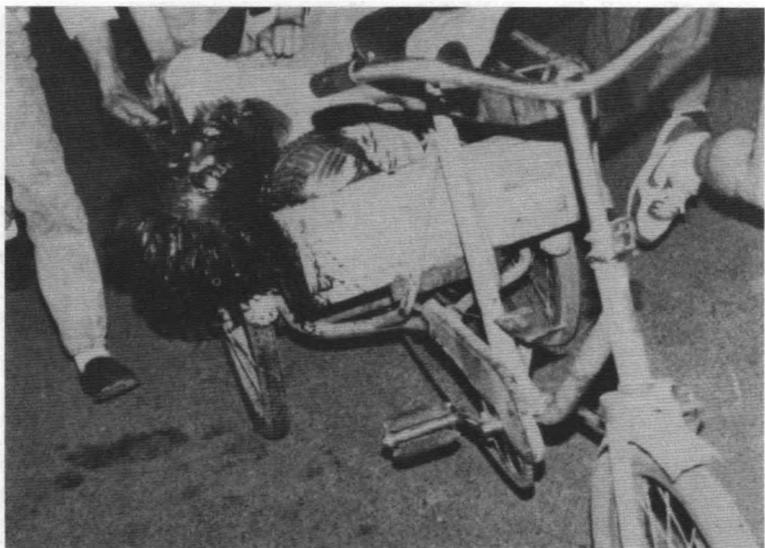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凌晨 憤怒的火



六月四日凌晨 路障



六月四日凌晨 公共汽車臨時改充救護車，接載傷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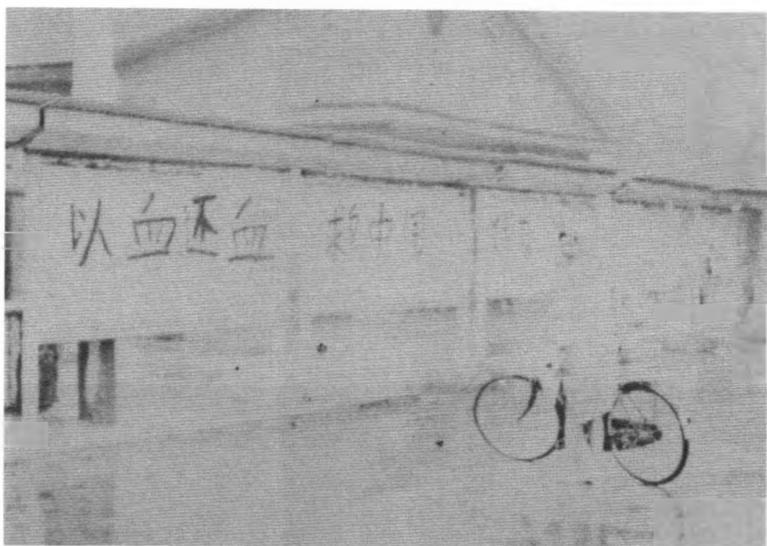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凌晨 此人最少中了四槍：右眼下、右下巴、鼻右側、喉頭。後枕蓋已告飛出，無人敢托他的頭。



六月四日早上 廣場之遠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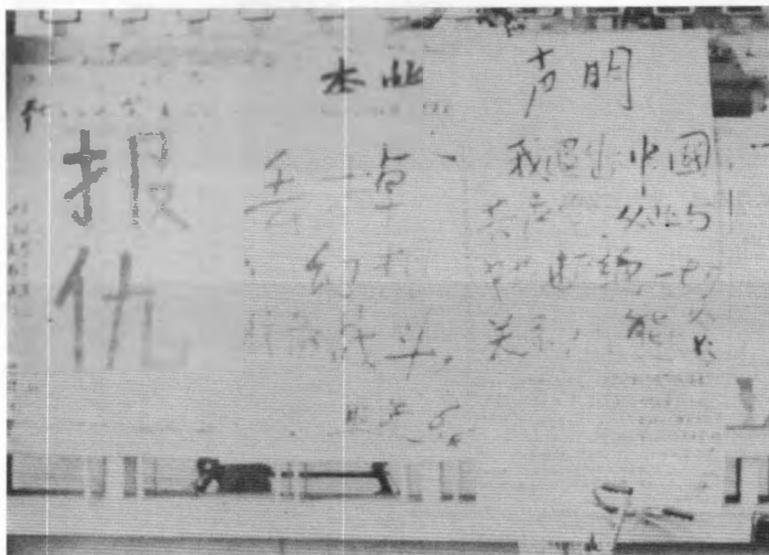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 戰後的餘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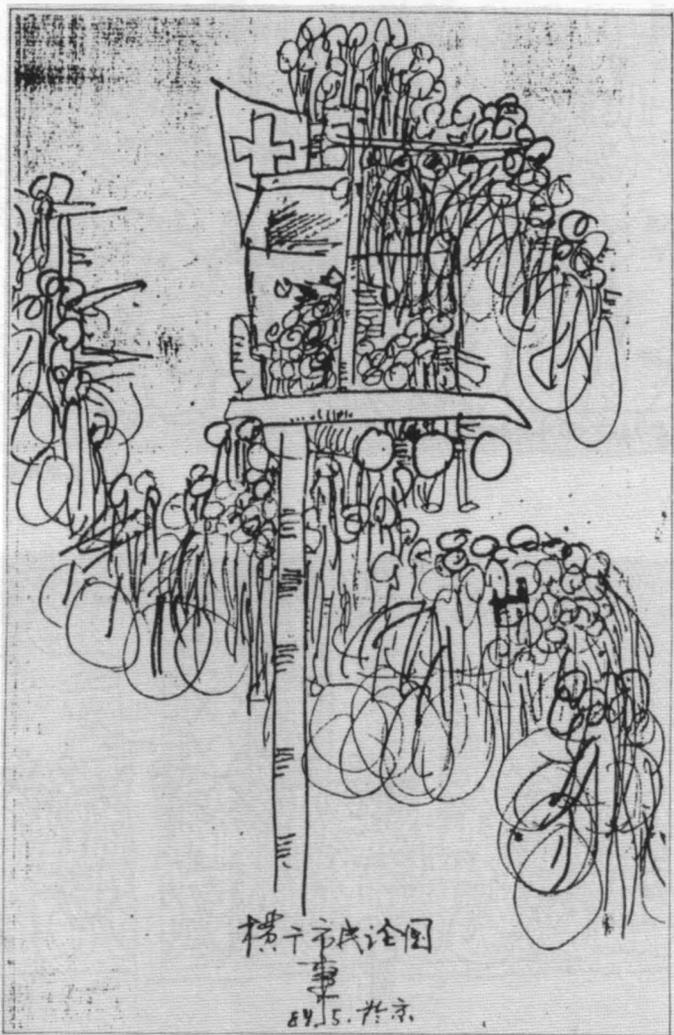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 北大三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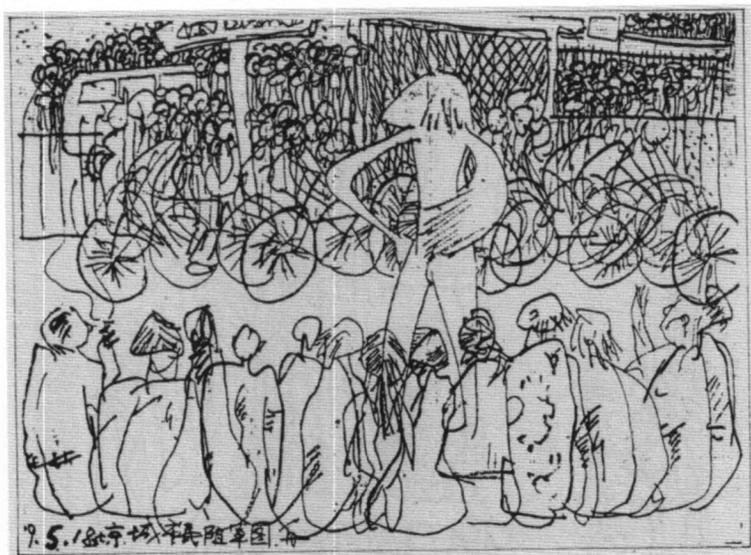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 北大三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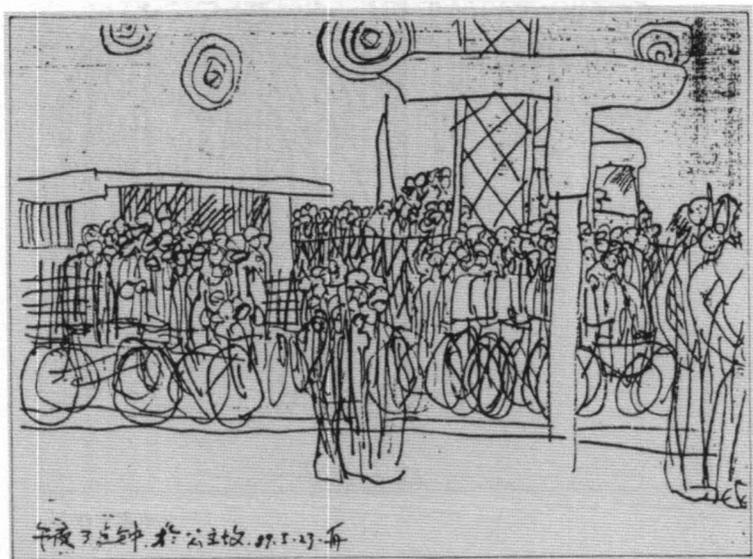
六月四日 北大三角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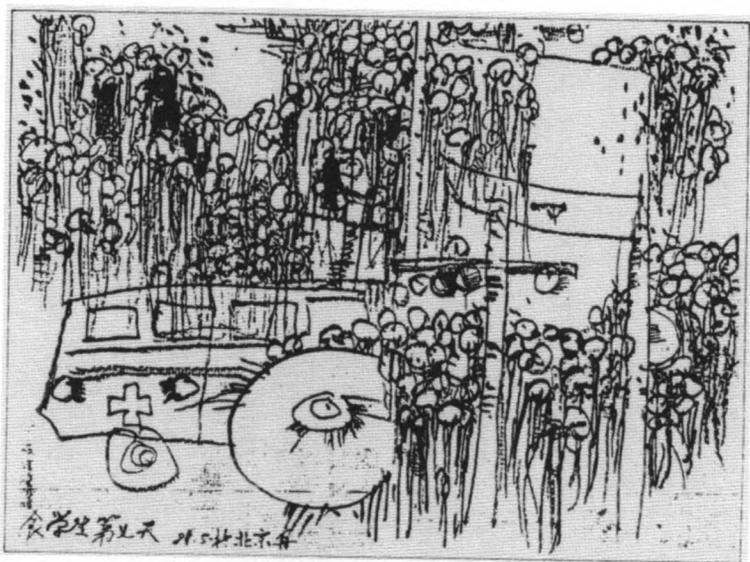
(一北京畫家作)



(一北京畫家作)



(一北京畫家作)



(一北京畫家作)

封面圖片所示作品：

《無題，2007》（細部描寫）

謝淑妮（本書〈北京紀行之十三〉作者）雕塑作品
銻鋼、雕刻的塑料、小型地球儀、世界地圖、磁石
46½" x 24" x 49"

圖片鳴謝：Gene Ogami

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

中大學生八九民運見證

編者：本書編委

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國際書號：978-988-13450-0-4

出版日期：2014年6月初版 2015年6月第二版

售價：89元

中大同學參與設立廣場上的香港物資站，並負責管理工作，「六四」鎮壓後《人民日報》於六月十五日就此點名批評中大學生會；五月三十一日中大同學推動建立「天安門民主大學」，六月三日廣場的官方廣播嚴厲指責香港某大學學生搞非法組織。我們的活動是否在運動中舉足輕重，而且威力如此巨大，以至觸動了官方的神經？

〈中大同學與八九民運〉編委

他們大多懷著「苦難的中國有明天」的心願，默默參與後來觸動千萬中國人心弦的運動。不論當年還是今天，他們沒有太多豪言壯語或「宏大論述」，但關心國家、盼望祖國進步的情懷是真切的。這些同學在近年冒起的「本土派」眼中，或許是不值一哂的「大中華膠」，但他們均無悔於當年青葱歲月的參與。

〈卑微的奉獻，真切的情懷〉 資深新聞工作者 張家偉

ISBN 978-758-029680-4



9 789881 345004

HK\$89

